目錄

第三編 國家論

第四編 政府論

第五編 政黨論

第六編 革命論

附錄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政治學的意義

第一節　政治學的對象

研究各種各樣的世界，就有各種各樣的科學，要把一種科學從其他科學區別出來，它是以各種科學所研究的客體，內容，亦即其對象作規準的。因爲各種科學必然是以存在於世界之特定方面或一定部類的現象爲其領域的。那麼，政治學的對象是什麼呢？這在一般的政治學者，都是單純把國家作爲政治學的對象的，但這已不能適用於歷史的特定階段即現階段的政治範疇。在目前國家决不能是政治範疇的全部。政治原是以社會階層的基本矛盾爲內容的，我們主要是從社會階層矛盾去分析它怎樣表現爲種種政治形態或現象，然則社會階層怎樣表現爲各種政治形態或現象呢？

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生存。人要生存，就必須取得食衣住行的生活資料，要取得食衣住行的生活資料，就必須參加物質生活的生產。因爲要參加物質生活的生產，人類就要加入一定的必需的與他們意志無關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亦即社會的基礎。但是在原始公社崩潰以後的社會之中，私產制度，變成了社會組織的原則，所以上面所說的生產關係，同時又是所有關係。人們站在這種所有關係之上，必然因着生產手段的有無，顯現出社會階層的差別，更由階層的差別，發展而爲階層的對立。於是社會上互相對立的階層，勢必由於利害的不同，演出階層的衝突，這樣的衝突如果聽其自然，就會侵犯所有關係，彼擾此奪，若任其發展下去，社會終將陷於紛爭擾亂之境，而生產手段的占有者所需要的社會的安寧秩序，也就無法維持。想要鎮壓住階層的衝突，維持住社會的秩序，就不能不仰賴於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上面的國家。國家是產生自社會，卓越出於社會之上，且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疏遠

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正是政治的力量。因爲有了國家，所以占有生產手段的階層，能夠通過國家這個機關，變爲支配者。去支配那不占有生產手段的階層。同時後者就變成被支配者。

支配者所以能夠憑藉國家這個機關而對被支配者實行支配，是因爲掌握着政治權力。沒有政治權力，被支配者是鎮壓不作的。所謂政治權力，即是一種特殊的公權力。這特殊的公權力，簡稱爲政權，政權就是國家的主要特徵。但國家單是有這樣的強制的公權力，還不充分，牠必須還對被支配者宣佈關於權利義務的規定與關於保障所有關係及維持秩序的規定。挾強制的公權力，使被支配者奉行遵守。於是由於國家權力的運用，發生出一系列的立法行政司法等的政治行爲。要別掌這些行爲，必須有立法行政及司法等政府機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設官分職，各司其事，這就是政府。政府是執行階層支配的機關，即是執行國家任務的機關，牠也當然是政治力量之一種。

然而有支配就有被支配，有作用就有反作用，以力服人，這是萬分不夠的。當被支配者微弱無力時，被支配者或許由於恐怖的感情及利害的打算而忍受支配者的支配，或許由於慣受這種支配而安之若素，但一旦被支配者有了力量幷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而激發強烈的感情，就必定會起來企圖否定那種支配。尤其在建築於發達了的社會結構之上的發達了的國家中，被支配者常常容易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容易激發強烈的感情，因而反抗支配者的支配，就時常顯現爲政治鬥爭。一切的政治鬥爭，就近代的國家說，都是巨大的、激烈的、嚴密的　因而鬥爭者的指導機關的政黨，就產生出來。政黨的組織既是指導鬥爭的組織，也是政治力量之一種。政黨這東西，固然在支配者或被支配者的陣營內，也常分化，但支配者方面的政黨與被支配方面的政黨，却是對立的東西。因爲一方面是代表支配者的利益，一方面是代表被支配者的利益的。

無論什麼鬥爭，必不能避免與支配者的國家及其壓制機關、強迫機關衝突起來，所以一切政治鬥爭達到極尖銳的時候，便是奪取國家權力，即奪取政權。因爲被支配階級，如果沒有國家權力，即沒有掌握政權，决不能有計劃的改造新社會，達到自己的解放目的。而奪取政權的行動，就是革命。有人說：「一切革命的根本任務，就是政權問題。誰有政權，

體就能解決一切」。革命是政治鬥爭之尖銳的表現，自然也是政治力量之集中的表現。

以上所序列的國家、政權、政府、政黨、革命，都是政治力量亦即政治現象的具體表現，因此我們可以說：政治學的對象，是政治範疇的全部，而政治範疇的全部，起碼是包括國家、政權、政府、政黨、革命等政治現象的，決不能是單純的國家。

也有些學者，把政權、政府、政黨、革命等政治現象，都總括在國家裏面，因此，以爲政治學的對象，主要的就是國家。政治學就是研究國家的規律之學。這是過去社會關係，政治現象比較簡單的時候，即在階層矛盾所反映出來的上層建築比較單純的時候，或許也不算錯。到了歷史發展的現階段則不然，即到了階層矛盾尖銳化的近代，上層建築隨着階層矛盾的尖銳而繁複，由社會階層矛盾所表現的政治現象，也就不單是一個國家了。自然，政權、政府是可以包括在國家裏面去的，政黨、革命等等，也與國家有極密切的關係。但是政黨、革命，則決不能拿國家這一概念來包括。特別是近代無產階層的政黨，牠決不是一個國家範圍內的組織，而是國際性的組織。但是牠們——國家、政黨、革命——的共同點，却都是以階層矛盾爲基本內容的政治現象，所以我們仍然可以把它們概括起來，概括在「政治」這一根本範疇內。

因此，這本政治學的內容，便暫分爲以下各編，在分析與綜合，敘述與證明之有機的聯繫上來展開它。

一、緒論；
二、階級論；
三、國家論；
四、政府論；
五、政黨論；
六、革命論。

第二節　政治學的任務

政治學的對象是政治現象，上面已經說明了。現在所要說明的，是政治學的「學」的意義。政治學是一種科學，是一種社會科學。一種學問要配得上稱爲科學，牠必須遵從科學的公例，把牠的對象作客觀的分析。對探求對象之中的因果律。科學的對象，是離開研究者的主觀而獨立的客觀的東西，對象之中的因果律，也是客觀的東西。科學者的職責，就在於認識這種客觀的對象，發現牠的因果律。所以在科學的公例之前，科學的任務，是探尋客觀的對象的本質，不能攙入主觀的價値的批判；在於探求對象之中的因果律，不在於估評牠的價値；在於求「眞」，不在於求「美」或「善」。

我們知道：自然科學是遵從科學的公例，探求有生物或無生物的因果律的，社會科學也是遵循科學的公例，探求社會現象的因果律。不過社會科學的諸部門，與自然科學的諸部門比較，是稍爲落後的，尤其是政治學。這是什麼原因呢？問題是很容易答覆的。人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人對於社會生活的諸現象，總不能像對於自然現象那樣客觀，即必然要受自己所處的經濟的地位與社會的環境的限制，以及歷史的傳統的見解的束縛，對於一切社會現象不免仍要用價値的尺標去估量。

在落後的社會科學之中，政治學更是落後。這種原因，把牠分析起來，可以概括爲下列三項：一、政治是以社會階層矛盾爲其基本內容，即包含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相互關係及作用，研究政治學的學者們常容易基於自己的利益的打算，不能或不願暴露政治的眞相，以免與現實政治相抵觸，與政治的支配者相抵觸；二、現實的國家的主權者，大都只能容許或嘉納與現實政治無抵觸而且有利於現實政治的學說；三、就政治作科學的研究而暴露政治的眞相以致與現實政治相抵觸的政治學說，難免不被支配者所壓抑。基於上述三種原因，所以政治學的發達比較更爲落後。所以我們在目前所見到的許多政治學著作，或者是代表着支配者的利益，或者是提出一些不合現實的理想，或者只是蒐集一些現成的政治學說，編纂

為政治學辭典，很難取得科學的稱號。

政治學這門學問，雖在科學之中，更為落後，但是學者們要在科學的基礎上研究政治現象的要求，卻是很久的。現時的政治學者們，都稱希臘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為政治學的創始者（其實只能算是一種政治學說），但是他的政治學說，與倫理的觀念結了不解之緣，弄得事實的認識與價值的估量錯雜起來。例如他主張國家是最高的道德的社會，國家的目的是至善等等，便是用倫理的標準估評國家的價值的明證。這種倫理學的政治觀念，一直支配着後來的許多政治學者們，即如在中國有一個時期主張「好政府主義」的人們，可以說都是受了這種影響。

其次，近世初期的一位政治學者馬克維尼（Machiavelli），是以分離政治學與倫理學及宗教一事而著稱的。但是他把創立民族國家的理想，放在權謀術數的上面，因而他的政治學，也只是帝王術或政治術，不能說是政治的科學。再次，從十七世紀開始流行至十八世紀而全盛的自然法學派的政治思想，其重要的部分，仍是由倫理觀念或功利主義的見解構成的。再次，反對自然法學派的政治思想而起的，是理想主義的國家思想，其代表者是黑智兒（Hegel）黑智兒的國家思想，是根據他的辯證法研究出來的東西，可說是站在進化的觀點之上的。但他的辯證法是觀念論的辯證法，他把精神的發展過程看做世界的發展過程，因而拿一種超越人類的實際生活的神祕的「世界精神」作為國家進化的指導原理，說國家是「道德思想之實現」，是「理性的外形和實質」，所以他的學說，終於變成了空虛的非科學的屬於國家的讚頌。

上述自然法學派的政治思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思想，在現代的各種政治學說的主要思潮中，還留有他們的痕跡，所謂「法治國家思想」，「幸福國家思想」，「文化國家思想」，都是從前面兩種政治思想派衍出來的。「法治國家思想」，主張國家的活動在以實現一種「法」的理想為主，即以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及自由，作為國家的理想模型。「幸福國家思想」，以保障「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或「國民全體幸福」等，作為國家的理想模型。「文化國家思想」，以「國民文化」的繁榮作為國家的理想模型。政治學是一種科學，科學的任務，在就對象作客觀的分析，以發見對象中的因果律，必

然是站在原因論的立場，並不是站在目的論的立場，而去探求對象的目的。政治學研究國家這個對象時，竟迷入目的論的泥沼而去設想國家的目的，明明是非科學的了。雖然這些政治學說，能夠代表某一部分人的要求，在近代立憲運動及民治國家構成的過程中，演出了很大的効果，但科學的要求，重在認識事實，不在估評價值。眞理的認識是有用的，而有用的東西，不一定是眞理。我們只能在現實的國家中認識牠的因果律以構成政治原理，却不能拿主觀的理想的原理，揭舉爲現實的國家的目的。

上述幾種政治學上的主要思潮，是今日種種政治學中所據以編纂的根據。現今的種種政治學，雖然有種種色色的體例，但一究其根底，總不能脫出上述幾種主要思潮的窠臼。即令自稱爲脫掉那些窠臼，而摘取上述那樣的各種政治學說，編纂爲一種折衷的混合的政治學，像那樣的政治學，也決不是科學的政治學，因爲牠所據以爲採集題材的藍本，原是非科學的東西。

看了上面的說明，政治學的任務應當怎樣，大概可以明白了。簡括的說來，政治學的任務，在於把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現象當作一個發展的過程去考察，實行客觀的分析；認識牠的本質、構造和機能；探求牠的發生、發展及沒落的各種特殊的因果律；並依據所探求出來的因果律指示改造的方法，以促成由一種政治形態到新的政治形態的轉變。

第二章　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係

政治學是社會科學之中的一種，牠和其他的社會科學，當然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各種社會科學，都是以特定的社會現象，作為研究的對象的。社會現象的種類很多，按照各種社會科學部門分類起來，可分別為經濟、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及其他意識形態等等。依據社會學的研究，經濟構造形成社會的基礎；政治法制形成社會的第一層上層建築；其餘道德宗教及其他意識形態，形成社會的第二層上層建築。社會的存在是規定社會意識的，但不是說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可以脫却意識形態而以其自身來實現，即上層建築對於社會基礎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亦可以反作用於社會基礎。從前社會科學沒有發達的時代，種種的社會現象，都屬於社會學研究的範圍，以後社會現象日趨複雜，學術上的分工也趨於細密，因而許多部門便從社會學分化出來，成為各種個別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等。而社會學就只以全體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為對象。只表現為社會發展的一般理論，對其他個別的社會科學則表現為方法；但因它自身具有一定的實在的對象。所以它便仍然是一種社會科學。在這裏與社會學最容易相混的是歷史學或歷史。因為歷史——客觀實在的歷史，也是整個的社會過程，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對象，也就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法則。但歷史學與社會學究竟是不同的，其不同的地方，是在歷史不像社會學那樣以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為對象，而是研究社會的一般法則在各個歷史階段，即各個特殊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所採取的具體形態或特殊形態。因此，社會學也是歷史學的方法；而歷史對社會學則是它得以總括的唯一現實地盤，自然，其他的社會科學也是離不開現實歷史的。所以政治學與其他各種社會科學，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特別是與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法律學的關係，更為密切。這裏便只就政治學與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法律學的關係，分別加以說明。

一、政治學與社會學　政治學的對象是政治，社會學的對象是整個社會過程。政治學的任務，在於客觀的分析政治形態，認識政治的本質的構造和機能，探求牠的發生發展及其沒落的各種特殊的因果法則；社會學的任務，在於客觀的分析社會形態，認識社會的本質、構造和機能，探求牠的發生發展沒落的一般的因果法則。政治是社會過程中的產物，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牠是隨着社會基礎的變化而一同變化的，因而牠的變化的因果法則，也隨着社會的變化的因果法則而一同變化。一定政治現象變動的動力，胚胎於一定社會的當中，所以政治變動的法則，完全受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所支配，所以研究政治學的時候，如果不根據社會學所探求出來的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必然就不能探求出政治變動的特殊法則。

二、政治學與歷史學　研究總體的社會過程的科學，除社會學之外，還有一種歷史學。但如前所說，歷史學不像社會學那樣，以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為對象，而是研究這一般法則在各個特殊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所採取的具體形態或特殊形態，因此，它不是要找出那互相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上的所共有的一般規定就算完事，而是要根據歷史發展的觀點，即由一個社會經濟結構轉化為另一社會經濟結構的觀點，與各個社會結構特殊法則的研究不可分的連系起來，去發現那歷史轉化、發展的一般法則。它的特徵，不僅要注意歷史的漸次性的進化，還更要把握住一個社會經濟結構向另一社會經濟結構轉化的飛躍，例如歷史研究現代社會是從什麼社會結構發展來的？它從發生到現在一般危機時代經過了什麼階段？它將要轉化為什麼新的社會結構？而規制這種轉化的可能性的客觀條件是什麼？為了實現這種可能性的主體條件又應由什麼社會力量來担負？亦即完成歷史飛躍之政治任務的社會階層是什麼？如何把政治任務與歷史發展法則配合起來，沒有那一種科學可以離開現實的歷史地盤的，亦即沒有超歷史的政治。

三、政治學與經濟學　經濟學研究特定社會之經濟的構造，亦即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政治學研究社會之政治法制，政治法制是依存於經濟構造的，因而政治學也依存於經濟學，這是很明白的事情。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之表現」，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政治是經濟的「自己疎離」，是經濟在社會層分不平等的社會

結構上靠着自己運動所必然要採取的形式。這就是說，在社會關係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經濟上的問題，只有在政治的形式上才能解決。但這一命題，並不排除經濟對政治是基礎的事。這只是說，一切社會過程，只有通過人的行動來表現，在社會關係不平等的社會中，只有通過社會各階層的行動來表現，而這種行動的尖端就是政治。然這種人類行動，或政治的行動，無論如何是依存於他在那照應生產力一定發展水準的生產關係的地位的。即政治、法制畢竟依存於經濟構造，只有這樣理解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才能把握住政治學之科學的基礎。因此，方能使政治學得到明確地被規定的對象，才能使政治和法制的認識都可以從所謂歷史哲學或倫理學的觀念論的基礎以及過去社會學者們的非歷史的把握之下——即形而上學的離開。被歷史規定着的特殊性的一般規定的把握之下解放出來獲得真正的科學的性質。

四．政治學與法律學　政治學與法律學關係的密切，是用不着多加說明的。政治學是研究政治的科學，法律學是研究法律的科學。所謂法律者原是由國家權力來維持的「社會關係之體系」。即當着「對社會自立起來的權力」之國家發生時，現存的生產關係，亦即社會關係便在法律的形式上被藏准，被國家權力所支持了。因而被法律所規制作的人類關係即法律關係，在內容上是生產關係、社會關係。法律既然不外是由國家權力來維持或支持的「社會關係之體系」，則法律就原不過是政治的附庸，法律學與政治學也就有着不可分的聯繫了。

政治學與各種社會科學都是有密切的關係的，上面只就與他的關係比較最密切的部門，略說了一個大概。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政治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及其所研究的範圍，同時對於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也給了一個暗示。

第三章　政治學的方法

第一節　政治學上所流行的幾種方法

從前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們，都有一個共通的觀念，以爲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不同，社會現象是人事現象，而人是有意志的，自由的，不受什麼法則的必然性所支配。尤其是倫理學者、法學者、政治學者們，都覺到有固守這個觀念的必要。他們以爲如果離開這個觀念，就會冒犯危險；如果自己的行動和意欲都不受自己的意志所支配，那就會顯現得罪與罰、善與惡、法律的判罪和道德的譴責等毫無用處了。這種觀念，在今日的社會科學上還存有牠的痕跡。

自從十五世紀後半期以來，自然科學漸漸發達，而且以不斷增加的速力向前邁進，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的方法，就是把「自然」分解爲種種個別的部分，把種種自然過程與自然物分離爲明確的種別，把生物體內部的種種形態實行解剖的研究。這種研究方法，在自然界的認識上，是最近四百年來傳承給我們的大進步的基本條件。但這種研究方法，却又遺留給我們以一種習慣——把自然物及自然過程從牠的全體的總關係分離出來，而實行個別的觀察。即是說：不在自然的運動上觀察自然，而在其靜止上觀察牠；不把牠當作根本變化的東西，而把牠當作永久不變的東西；不把牠當作生動的東西，而把牠當作個死的東西。這種思惟方法，經培根（F. Bacon）和陸克（Locke）由自然科學移入於哲學以後，就形成了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所謂形式論理學，就是這樣成立起來的。

形式論理學，正如其名稱所顯示，只是形式的，不是現實的。牠處理依據於悟性造出的定義，不研究事物的內容，至多只能通達於事物的表面（即形式）；因爲形式論理學是在事物的固定隔絕的形態上，在事物的固定不變的形態上，去考

察事物的。但事物並不是孤立隔絕的存在着，也不是固定不變存在着。換句話說。孤立隔絕的存在着的事物，固定不變的存在着的事物，在現實上是沒有的。所以應用形式論理學研究事物所得的認識，只是認識的一分段，一斷片，而不是認識的總體和總過程，所以我們如果要求得真正的知識，就不僅要認識對象的形式，並且要認識對象的內容，不僅要了解事物的現象，並且要了解事物的本質。但要做這樣的研究，單靠應用形式論理學是不濟事的，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去應用現實的論理學。

現時政治學所應用的方法，有的是直接從自然科學方面搬進的，有的是從形式論理學上採取的，有的是從歷史方面採取的，但那些方法的本身，仍是形式的，所以研究所得的結果，也是形式的。我們姑且就現時政治學上流行的幾個方法，如有機體的方法，歷史的方法，實驗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等。加以檢討。

一、政治學上的有機體的方法，可以說是應用生物學的知識研究國家這一政治現象的方法。主張有機體的方法的人，把國家看做有機體，把國家的構造和機能，看做有機體的構造和機能，這種方法，只在其把國家的發生發展及消滅比擬於有機體的發生發展及消滅的一點，是正確的。至於要想靠這個方法以研究國家的本質，國家的發生發展及消滅的法則，却是不可能。因為在其抽象的形式上，國家或許與有機體相似，但有機體屬於生物學的領域，國家屬於社會科學的領域，支配着生物界的法則，不能無條件的移用於社會。人不但受生物力及物理力的作用，還要受社會力的作用。人能從事生產，以營社會生活，這是人類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主要特徵。所以生物學上的範疇與社會科學上的範疇完全不同，因而生物學上的法則，不能適用於社會。所以應用有機體的方法以研究國家，至多只能知道國家的形式，不能知道國家的本質，更不能知道國家的發生發展及消滅的法則了。這個有機體的方法，決不能成為政治學的方法，尤其把有機體的各部分的構造和機能來比擬現實國家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地位與活動，更是不倫不類。

二、政治學上歷史的方法，是應用歷史的材料研究政治變遷的原因和路線的方法，這個方法，在其以歷史的事實作為

研究政治的資料一點，是正確的。因爲我們研究政治不能不取材於政治歷史，尤其是研究國家的起源，必須取材於前史學。但是我們要靠已成的歷史，指示我們以政治變遷的眞實原因與眞實路線，却有些不可能。我們知道，已成的歷史，大都是由歷代的支配者遺留下來的史料編纂而成的。而那些史料又多半是聖君賢相以及英雄豪傑的事蹟，各時代的社會的眞相都被隱藏或淨化。所以那樣的歷史不但不對我們指示政治變遷的眞實的原因及路線，並且往往容易使人誤入英雄主義或天才主義的迷霧，使人只知保守而缺乏改進的精神。所以當着向歷史採集資料之時，必須採取進化的觀點，即其轉化、發展的一般法則去探求被隱藏了的被淨化了的歷代政治的眞相。從這種見地說來，這個方法本身，還不能單獨成爲一個研究方法，因爲研究任何科學，都不能不蒐集資料。而蒐集資料一事，並不就是研究方法的一切。

三、政治學上的比較的方法，是比較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以抽出其共通性而求得一種普遍的政治原理的方法。原來比較的方法，是在於就各種有差別的東西加以比較，以求得類似和差別的規定的。由比較的方法所得的結果，是眞的科學的智識所必須經驗的階段，但是停頓在這個階段上，還是不夠的。我們知道，各種國家的政治制度，各自有其特殊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各自有其特殊的環境和條件。正如世界決沒有兩個完全同一的事物一樣，也決不能有兩個完全同一的國家或政治制度。所以這個方法在政治學的領域中應用起來，就不外是由多種相異的政治制度以求出其相同之點，而樹立所謂普遍的政治原理，然而在這樣成立的普遍的政治原理之中，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原理就被拋棄了。所以這樣得來的政治原理，也只是關於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即是說，由比較的方法所得的政治原理，只是抽象的，不是具體的，只是形式的，不是本質的。眞正的科學的方法，必須超過比較的方法這個階段，更進而探求具體的同一性。所謂具體的同一性，即包括一切差別性的同一性。明顯點說，即是立腳在普遍的政治原理之上，去考察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以確立各種具體的特殊的政治原理。

四、政治學上的實驗的方法，是把國家這一政治現象當作試驗室，把各種政治原理拿去實驗，以觀察其實效，決定其

價值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依據哲學上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而成的。實驗主義是主張以實際的效用爲眞理的標準的一種主義。據實驗主義說來，眞理是觀念的形容詞。觀念顯出其實效時，就叫做眞理。至於那觀念與牠的對象一致與否，却不成問題。只要那觀念顯出實效，就不問對象的有無，都是眞理。但我們知道，觀念是關於對象的觀念，觀念的眞或假，要看牠是否與對象相一致。但實驗主義，却主張觀念的眞理性並不在於牠與對象一致，而在於牠所顯出的效用，甚至那觀念沒有對象，也是可以的。照這樣說，觀念與對象無關，因而眞理也是與對象無關，這明明是形而上學的。若果依據這種實驗主義的方法來研究國家，結果所得的知識並不是關於國家這個對象的知識，所得的眞理並不是關於國家這個對象的眞理。因爲實驗主義的方法，是主張把各種政治原理拿到國家的實驗室來實驗，以觀察其實效，判斷其價值。有實效有價值的政治原理，即是眞理，即是關於國家的眞理。照這樣，政治原理並不是由於分析國家這個對象得來的，而是從外面拿來適合於國家這個對象的了。這明明是錯誤的。

我們知道，科學的研究方法的順序，是先就政治這個對象作客觀的分析，經過種種研究之後，然後纔能樹立政治原理。所以原理不是研究的始點，而是研究的終極的結果。如果要證明這個原理是否正確，是否與政治的對象相一致，當然可用實踐（或實驗）做標準。如果在實踐上證明了，那種政治原理便是眞理，否則便非眞理。但這個標準，並不是實效或價值。因爲眞理是有用的，而有用的東西不一定是眞理。價值的判斷是主觀的，不能作爲眞理的標準。科學的任務在於求眞，不在於判斷價值。

五、政治學上的心理學方法，是應用心理學的知識研究政治的方法。這個方法，主張把國家這一政治現象當作人類的精神的結合，把政治心理狀態當作國家，所以要用心理學的知識去研究國家。前面說過，國家是社會上的治者基於經濟的利害創造出來用以支配被治者的東西，並不是由於什麼心的相感作用而成的。所謂政治心理，不外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關於國家權力發生出來的心理，而兩方面的政治心理，又基於各自的經濟的利害而顯現的。所以政治心理的根源，是埋在

經濟的利害關係之中。經濟的利害的關係是根本，政治心理是前者的反映，我們只有從根本的東西，去說明由牠所發生的東西，這是無須多加說明的。

上面幾種方法，已經一一加以說明，加以批評了。這些方法，都可說是形而上學的方法。如果應用那些方法去研究政治，結果只能通達於政治的表面，而不能通達於政治的本質。如果我們要更進一步去了解政治的本質，單靠那些方法是不夠的，我們不能不應用現實論理學的方法。

第二節　現實論理學的方法——唯物辯證法

現實論理學，是超出形式論理學之上的關於自然、社會、思惟方法的學問。現實論理學，如其名稱一樣，是現實的，不是形式的；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這裏無暇述現實論理學的本身，只說及現實論理學的方法在政治學上的應用，特揭舉如下的幾個論綱。

一、由現實的經濟生活的關係去說明政治形態　經濟關係是社會的基礎，政治形態是上層構造，是從這個基礎分化出來的。經濟的構造是第一次的東西，政治的構造是第二次的東西。所以國家這一政治形態，不是可以由國家自身去理解牠，也不是可以由人類意識的一般的發展去理解牠，而是要從經濟生活的關係中尋出牠的說明來。

譬如世界先有地球存在，然後牠反映於我們的頭腦中，使我們發生所謂地球的意識，並不是由於我們頭腦中先有地球的意識，然後地球纔得發生，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同樣，在人們未有意識的統治社會關係以前，人與人之間，就不知不覺的（即無意識的）結成一定社會關係，然後這一定的社會關係反映於人們頭腦中，纔使人們意識到自己是在社會當中生活着。所以社會的意識是第二次的東西，而依存於一定的社會關係，而一定的社會關係是離開人們的意識而獨立的東西。因而，一定社會的意識的成立，應由社會的關係去說明，而社會的關係不應由社會的意識去說明。

政治對於經濟的關係，和上面所說的道理一樣。在一切社會階層不平等的社會中，不平等的社會關係，需要一定的權力來維持。而這權力的裝置，是由物與人及觀念三大要素構成的。這些裝置的總和，便形成社會之政治的構造。我們如果考察到那一個階層為着那一種目的去使用國家的權力，就能夠理解到那種政治形態的構造和機能，一切都是由社會的階層關係規定着。即經濟是根本的東西，政治是從經濟分化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要說明一定的政治形態，必須以現實的經濟生活關係為根據，纔能表現出他的眞相。

二、從政治的全體性上去研究政治　第一項中的說明，是研究政治的前提，這個前提即是要由現實的經濟生活的關係去說明政治形態。前提確定以後，第二步的工作，就是詳細的搜集關於政治的研究材料。我們在前面說明政治現象之具體的表現時，曾經列舉了國家、政權、政府、政黨、革命等現象。我們搜集材料時，當然首先要依據這幾種現象去搜集材料。關於國家所應搜集的材料，如與國家的本質，國家的起源，國家的發展等項有關的材料之類。（政權一項，可以包括在國家的材料當中去說明，所以不另立專篇）。關於政府所應搜集的材料，如與國家權力、人民權利，政府職權，議會制度，選舉制度等項有關的材料之類；關於政黨所應搜集的材料，如與政治鬥爭，政黨活動，有產政黨，無產政黨，政治鬥爭的策略與戰術有關的材料之類；關於革命所應搜集的材料，如與革命的根本問題，奪取政權的手段，革命勝利的條件等有關的材料之類。以上那些材料，都是與政治這個概念的內容有關的東西，都應詳細地一一搜集起來。

然而單是那些材料還是不完全的，因為政治現象是以階層矛盾為其主要內容的，所以關於階層的概念、形成、對立，各種各式的集團社會分子以及種種形式的鬥爭與種種形式的聯盟等材料，都要盡量搜集起來，實行分析的研究，作成有系統的說明，以為說明國家、政府、政黨、革命等政治現象的準備。

材料一經詳細搜集以後，就進行第二步工作。所謂第二步工作，就是對於一切材料，實行分析的研究。先就政治的各種要素加以分析之後，再抽出一個最主要最根本的要素，加以研究，暫將其他許多要素擱在一邊，等到把這最主要最根本

的要素研究清楚了，再順次進而研究其他的許多要素，順次加上許多複雜的規定，以到達於政治的全體性的完全認識。這裏所說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素，就是階層矛盾。我們必須先認識了社會的階層矛盾，即認識了政治的本質，然後纔能順次研究國家、政府、政黨、革命等要素。探求其互相聯絡及其聯絡的線索，以求得政治的統一的形像。

三、在政治的發展過程上研究政治形態　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在發展的過程中，即是在運動的過程中，運動是一切東西存在的形式，凡屬不變不動的東西，在現實上是沒有的。而運動的原因，起於運動着的東西的內部的對立。一切運動或發展，都由於對立物的鬥爭。我們就力學上的範圍說，力學上的運動，由於作用與反作用的對立而起；就物理學的範圍說，物理學上的運動，由於陰陽兩電的對立而起；再就化學的範圍說，化學上的運動，由於原子的結合與解離的對立而起；末了再就社會科學的範圍說，社會上的運動，由於階層的對立而起。政治是社會的上層構造，社會是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因而政治也是在不斷的發展的過程中。政治也和別的一切存在物一樣，顯現爲一個發生、發展、及消滅的過程。政治的發展的原動力，即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對立。

國家這一政治現象是包攝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統一體。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組成，根源於社會上的階層的編制。社會上的階層的編制，由於經濟力的發展而改編，因而政治上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組成，也隨着改編。歷史上的國家形態的變遷，其原動力就在這種地方。所以國家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也不是永久的或絕對的東西，我們對於國家的研究，必須站在發展的立場，探求國家的發生、發展、及其消滅的因果律。這樣的因果律的發見，原是政治學的任務。

所以依據第二項的方法，對政治做了全面的研究，求得政治的統一的形象以後，必須更進而站在動的觀點上，探求出政治的發展的法則。

四、具體的眞理之探求　「哲學的任務，不是各色各樣的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同樣，政治學的任務，不是各色各樣的解釋政治，而是改造政治。前面說過，眞理是有用的。就以國家的研究來說，我們研究國家，是在於認識國家的本

質，認識國家的發展法則。國家的本質和牠的發展法則一經認識以後，當然可以依據牠的發展法則，以改造現實的國家，使人類的生活能適應於社會的環境，而有向上的可能性。不過這裏要補充幾句的，所謂「使人類生活向上」的意思，是說在我們認識了國家的本質及其發展法則，並根據牠改進了現實國家以後的事情，却不是先拿一種「使人類生活向上」的理想，作爲國家的目的。這是與判斷價值的那種政治學絕不相同的。

然而所謂國家的發展法則那東西，也不是永久的絕對的眞理，而是相對的眞理，是可以接近於絕對眞理的相對眞理。因爲眞理必是具體的，而具體的眞理本身是可變的東西，是因時因地而改變的東西。具體的眞理，並不是超越時間空間而都妥當的東西。因而政治學所研究得來的政治原理，並不是永久的絕對的東西，牠常常隨着國家的特殊形相和特殊階段而有所改變。所以政治學上的具體的眞理之探求，就是在研究政治過程時，一面要拿政治的「普遍」的發展路線及法則性爲前提，一面對於那「特殊」的時代與政治所具有的特殊的意義，加以具體的考察，纔能引出具體的政治原理。關於這解，可以分爲兩方面去說明。

第一，政治學是要研究國家這一政治現象的科學，但牠不是研究一般國家的科學，而是研究一定時代中與一定社會形態相適應的一定國家形態的科學，這樣與一定社會形態相適應的一定國家形態，當然也有種種色色的不同。譬如就現代民主國家說，現代民主國家，是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東西。而所謂民主國家，又是各色各樣，如英美法等國家，可說都是民主國家，而這些民主國家，又各自有其特殊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所以當我們把這些民主國家作爲研究對象而探求他們的共通的本質及法則性時，這樣的本質及法則性，也只是近似的包括各種不同的民主國家。我們的認識作用的任務，一面要以這種共通的本質及普遍的法則性爲前提，一面要把各個特殊國家的特徵，和這樣的共通的本質與普遍的法則性關聯起來，加以具體的分析，以求得使特殊與普遍相滲透的具體的眞理。

第二，政治學不單是研究現代的國家，還要研究過去的國家。即是說，政治學要研究國家的過程，並探求國家的發展

法則。國家既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牠要經歷無數的發展階段。就整個的過程說來，由原始時代到有國家的時代，由古代國家而封建國家而民主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都包括在這個長期的過程之中。在國家的這個長期過程中，具有着發生發展及消滅的許多階段，具有着貫串於這許多階段的普遍的發展法則。再就全過程中的各個階段上的國家說，這各個階段上的國家，又各自成爲一個過程，也具有着發生發展及消滅的各個小階段，也具有着貫串於這各個小階段的特殊的發展法則。這各個階段上的國家的發展法則與全過程的國家的發展法則的關係，是特殊法則與普遍法則的關係。普遍法則由特殊法則而成立，特殊法則依普遍法則而存在。所以我們一面要認識全過程的普遍的發展法則，一面要認識各階段上的國家的特殊的發展法則，纔能得到具體的眞理。再則各個階段上國家的發展法則，其相互之間，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封建國家受封建國家的發展法則所支配，民主國家受民主國家的發展法則所支配。民主國家與封建國家不同，所以兩者的發展法則也不同。這不同的原因，是很明白的。正如資本主義社會高出於封建社會一樣，現代民主國家也高出於封建國家，所以隨着封建社會轉變爲資本主義社會，而現代民主國家就開始受另一種法則所支配。然而各個階段上的國家的特殊的發展法則，雖然由於歷史的演進而互不相同，而這些特殊的發展法則，却都是構成着全過程的普遍的發展法則的一部分。這一點是要明白認定的。

所以政治學在研究國家過程時，一面要立脚於普遍的法則性的認識之上，一面要去觀察一定時代的一個階段或一個時期的各種國家的特徵，並因此去抓住國家的連鎖中的最重要的特殊的環。這樣研究得來的眞理，纔算是具體的眞理。

現實論理學在政治學上的應用，大致如上所述，總括起來，可以引出如下的簡單的結論。

現實論理學的方法，是政治學上的唯一的科學的研究方法，這個方法，要求着：（一）從經濟生活的關係去說明政治形態；（二）從社會矛盾，社會鬥爭中去把握各種政治現象的發生發展和變遷，及其由低級過渡到高級形態的過程；（三）全面的去觀察和分析政治的各種要素的關聯形態，以建立包含多種複雜規定的統一的政治形態；（四）在

政治的發展過程上，探求各個階段上的發展形態，以引出包含多種特殊發展法則的普遍發展法則；（五）並依據這樣研究得來的具體的政治原理，從事於政治生活的實踐。



第二編　階級論



第一章　階級論在政治學中的地位

我們說過，政治現象是以社會階層矛盾爲其基本內容的。國家，政府，政黨，革命等等，都是社會階層矛盾之具體的表現，所以有了階級的社會，必然有國家，政府，政黨等組織，且必然要發生奪取政權的革命。政黨因爲是近代社會階層對立激化的產物，所以牠的組織的階級性，也表現得異常强烈。因此，我們在以政治爲對象，而探求它的發生成長沒落之一般的與特殊的規律時，必需要論述到階級，不，必需要以階級的論述爲其出發點。階級是一根紅線似的把各種政治現象貫串起來的。如果把政治和階級分開了來觀察，那便無論如何不能得到政治現象之真正理解。

因爲階級在經濟結構之中，亦即生產關係之中有其根據，而生產關係又是一切社會關係中的基本關係，是規定一切社會關係的特質的東西，所以社會階級關係，便浸透在一切社會關係之中，在這裏，首先就是浸透於政治關係之中。不僅此也，簡直是由階級關係才產生政治關係。階級關係反映到政治關係上，才表現爲政治上的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所以經濟上的支配階級，同時，必然是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古代社會的奴隸和封建社會的農奴，他們是在經濟上被榨取的，其特徵即是在政治上也沒有權利。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工作者，因爲在表面上也享有人權和市民權，即在法律上也跟生產手段所有者的資本家是平等的，好像是消滅了由階級關係反映出來的政治上的不平等，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者，確乎只有布爾喬亞。

反之，在另一方面，被治者的政治反抗，卻也是與階級社會共久遠的。在古代被斯巴達圖所領導的十五萬奴隸，跟奴隸主的政府作戰，綿延至三年之久（紀元前七三——七一年）；封建的中世歷史，也是以農民戰爭來點綴的歷史。近代社會，無論是資方與勞方，都組織了代表其利害的政黨，以種種形式或方法在互相對抗着。而且很明顯的，被治者之得一種

鬥爭，每一個行動，客觀的意義，都是趨向於破壞現存社會組織，現存政治制度的，因此，每一種行動，每一種鬥爭，都是含有極充分的政治性或政治任務（參加鬥爭的人有否主觀的自覺可以不問）。所謂「凡是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其意義就在這裏。

惟其如此，所以有人站在階級立場，否認政治任務，其結果爲徒勞。例如工團主義派（Syndicalists），他們對於政治鬥爭，是連聽都不願意聽的。他們要完全以工人自己的力量，用罷工或其他經濟鬥爭達到自己解放的目的，這在他們痛惡機會主義政客式的議會鬥爭，或謹防工人的利益爲無恥的政客所出賣這一點上，雖是對的，但在他們把階級和政治性分開因而從根本上否認政治鬥爭，則不免犯了很嚴重的機會主義、機械主義的錯誤。

復次，有人站在政治立場，否認階級對抗，其結果亦爲徒勞。例如俄國死去不久的一個教授，名叫都加巴拉諾夫斯基（Tugan-Baranovsky）的，他就以爲國家不是偏於一面的組織，而是超然的，即認國家這一政治形態是對於一切社會階層都有同樣利益的，對於一切社會階層都具有理想的價值，他以爲在經濟方面，國家不僅是人民統治的基礎，並且還促進經濟的發展，增殖國民財富的總量，保證一切社會階層的利益。此外國家還有文化及其他的使命，因爲政治經濟是與文化分不開的。這不僅都加教授是這樣說，社會民主主義者古諾夫也是贊成這種說法的。在都加與古諾夫之前，還有比他們高明的所謂自然法學派的政治思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思想，把國家之超然性，更是說得天花亂墜。是的，從表面上看，彷彿近代歐美國家爲發展經濟，所以拚命的造鐵路，國家爲提高文化，所以努力的辦學校；實際上，已經構成國家政權的支配者，要想剝削羣衆，擴大剝削的範圍，幫助剝削經常順利的進行，那就必須依靠各種各式的社會企業，譬如沒有鐵路網的發展，資本主義是不能發展的，沒有各種專門學校，資本主義的技術便不能提高，沒有各種職業學校便不能得到熟練的勞動力等等。但在所有這些類似的方法中，已經構成國家政權的支配者，都是從那一階級本身的利益出發的。卽不是爲的增殖國民財富的總量，提高一般的文化。有人以消極的口調，駁斥這一種理論說：「既然國家不僅是從事於壓迫，而且還

……，所以對於一切社會階層都是有利的。好乖的人兒呀！用這樣的理論什麼事情都可以證明了。因爲托拉斯不僅從事於剝削，而且還從事於生產，那末，托拉斯也是對一般社會都有利益的了。因爲美國的偵探機關不僅扭住了革命的無產者的脖子，而且還在那裏捉騙子，那末，偵探機關也對一切社會階層都有利益的了……。

其他還有許多從表面看彷彿有利益於一般社會的國家設施，例如近代國家所頒佈的工廠法便是。許多大人先生便根據此點否認國家是偏於一面的組織。可是我們祗要用片刻的光陰思考一下，就能明白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試問當資本家遇着工人的反抗覺得稍予讓步反更爲有利的時候，資本家是否即不成其爲純粹的資本家呢？國家也是這樣，爲支配工具的國家，因爲有利而向被支配者稍予讓步，是否即不成其爲偏於一面的組織呢？實際上支配階級保持其經濟勢力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有時出之於進攻的手段，有時出之於讓步的手段。他們放棄暫時的一部分的利益，其目的仍在保持其永久的整個的利益。改良政策，往往是含有毒素的進一步的對於被支配階級的壓迫，這在歷史上幾乎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樣，爲政治具體表現之一的國家組織，怎樣能夠把牠與階級分開了來觀察呢？自然，站在階級立場，而否認政治任務，排除政治作用的工團主義派，或無政府主義派，其錯誤也就是在這裏。所以企圖站在階級立場，否認政治鬥爭，與站在政治立場，否認階級鬥爭的人們，在理論與實際都是徒勞的。

因此，我們便可以瞭解「階級論在政治學中的地位」的重要了。

第二章　階級是什麼——階級的概念

我們在前面說過，因為階級關係才產生政治關係。實際上階級矛盾的內在作用，正是開動歷史的機括，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歷史上之一切重大事變不管怎樣，都是與階級矛盾相聯繫的。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向另一個結構轉變的意思，那就是說階級關係根本起了變動，所以我們首先必須把階級是什麼這一問題，加以充分的探討。

最通行的見解之一，就是把「貧」「富」的分限作為階級分裂的特徵。誰的錢多就是資產階級，誰的錢少，就是無產階級。這一見解是異常粗率而且異常錯誤的見解。如由這一見解出發，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熟練工人，便將是資產階級，而貧弱的小布爾喬亞，亦可算作無產階級了。所謂貧富相差，在嚴密的意義上是不成其為階級標準的。某織由主因經營方法的拙劣不得不借錢來維持他的營業。那他在一方面當然是受高利貸乃至金融資本家的剝削的；但在他榨取織出勞動者一方面說，他仍屬於資本家階級。在織工中雖是偶然也是積蓄了些錢的人，但他還是勞動階級。所以錢囊的大小，其結果雖然也可以使同一階級中的兩個人互相侵犯；但這是純粹的量之差異，他始終是不能成為說明階級定義之充分的根據的。這可以叫做「數量的階級理論」，其根本錯誤，在當他規定階級時，忽視了生產關係這一點。

其次，比這進了一步的是所謂「收入論的階級理論」，其特徵是在收入的源泉的差異中找出階級的最後根據。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東西構成個個階級的了。那就是「除收入源泉的共同性之外，還有從那裏生出來的利害的共同性及對其他階級的對立的共同性，個個階級都在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源泉更為豐富而使其他階級的收入縮小」。這是考次基的說法。考次基并且說這與卡爾留下來的未完結的階級理論之完成，但這種說法，決不是卡爾的意思。第一，卡爾并不曾把階級對立的根據建立在單純收入源泉的差異上；第二，考次基所謂「對其他階級對立的共同性」，并沒有把它把握為質的真的對

立，而也只是被他還元爲量的大小關係。因爲如果「各個階級都在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源泉更爲豐富而使其他階級收入縮小」而不是破壞，消滅其他階級收入源泉的話，那麼這種對立便不過是因收入量的大小而發生出來的罷了。

考次基雖然也說生產手段的分配是規定階級關係的契機；但他不曾把生產手段的分配與其基礎的生產聯結起來，不理解生產手段的分配是生產發展的歷史的結果，因此，他便從在物質生產的生產中看出社會過程的基礎理論上，跑到武力說去了。即不從社會內部的生產發展中看出階級和國家發生的原因，倒把武力看成階級和國家發生的原因了。

然則正確的科學的階級規定是什麼呢？很顯然的當正確的科學的規定階級時，就不許僅以生產物的分配（收入的源泉）或生產手段的分配爲指標。生產物的分配是從生產手段的分配歸結來的，但生產手段的分配又是生產發展的結果，生產手段的分配，雖然是決定階級關係的特徵，但離開生產本身來考察時，就不免要陷到考次基的武力說去了。所謂把生產手段的分配與生產本身的發展聯結起來考察，那就是要將社會的分工，社會的勞動組織放在這分配的基礎上，即是說應在社會的分工，社會的勞動組織之上去求分配的基礎。例如就資本主義的場合來說，當手工業從農業分離，都市從農村分離，商品生產發展時，封建的自然經濟便行分解，於是生產手段的資本主義式的分配，便經過那建築在商品生產之上的商業資本之發展而開始自然而然的發生和進行了。

這裏所謂社會的分工，社會的勞動組織決不是布哈林所說的企業內的勞動組織，它是把所有關係上的階級敵對，生產手段分配上的敵對之各種歷史形態，都包攝其中的特定的社會勞動組織。這樣，它便使各種歷史上的階級敵對形態，貫穿在那社會的勞動組織，生產的社會的體制之中，而生產物的分配經濟上的剝削、收集，都是階級關係的表現了。這樣，才能給出階級的科學的規定。

「所謂階級者，乃是根據它在那被歷史規定了的社會的生產體制內的地位，根據它在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大部分它被法律所確保和固定化），根據它在社會的勞動組織內的作用，因而根據它在社會的財富之中所處理的那一部分的獲得樣式

和大小不互相區別着的多數的人類集團。所謂階級者，乃是受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內的地位之差異的賜與，可以私有他人的勞動的這樣人類的集團』。

總之，階級存在的首要前提，是特定歷史發展階級上的社會生產體系內的各人地位之差異；這種差異的根本標誌，表現在每人對生產手段的關係之差異，即表現在生產手段的分配之中。因此，一方面沒有任何生產手段或基本生產手段的人類集團，與他方面獨占一切生產手段或基本生產手段的集團之存在，就是一切階級社會結構的根本特徵。

第三章　階級發生的原因

因為階級存在的首要前提，是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生產體系內的各人地位之差異，所以它就決不是跟人類本身共久遠的東西，這就是說階級是生產力一定的發展水準上才發生的。恩格斯曾經說過關於階級發生的兩條道路，試引述如下：

『人類開始自動物界——狹義的——脫出時，就是正當人類踏入自己的歷史時，他們尚未脫出半動物的領域，所以是粗野的，對於自然是無力的，對於自己是無智的，因此和動物是一樣的貧困，即比動物並不生產得多。那時的生活狀態，在某程度內是平等的，家長等社會的地位，也是平等的。——至少社會階級是不存在的。這種狀態，在後來文化各民族之原始的農耕共產體間還是繼續着』。

『在所有這些共產體間，自始便存在着一定的共同事務。這種共同事務，必須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委諸各個人來管理。這裏所謂共同事務，例如解決爭議，禁壓個人的越權行為，在熱帶地方為河川沼澤的管理，最後則為宗教的職能等。這樣的職務，在任何時代的原始共產體間，都是存在的。……而這些職務是被賦與了一定的權力，這就是國家權力的起源』。

『生產力漸次增大了。人口的增加在個個的共產體間生出了共同的或是抗爭的利害關係，到了這些共產體以利害關係為中心彼此結合以形成更大的全體時，於是又發生了一種新的分工，這就是設置防衛共同利益而且防遏抗爭的機關了。這種機關是全體的共同利益之代表者，同時對於其他各個共產體已保有對立的地位，不久牠因如下的理由，變得更是獨立化了。第一，因為在萬事一任自然進行的世界，牠那職務由偶然的變為世襲的；第二，因為隨着和其他共產體增加衝突更增

大了這個機關的必要』。

由以上所說看來，最初本是全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同時，便轉化爲與社會全體相對獨立的而終於成爲對立的要素了，這是一條路。

『然而和這樣的階級構成（即因分工而起的階級分裂）相並着，現在又流行了一種的階級構成。農耕家族內原始的分工，到財富達到一定階段時，便有收容一人乃至數人之家族以外勞動力的可能，這個情形在舊時的土地所有已經崩壞的地方或至少從前的共同耕作已分爲割地的個人耕作所代替的地方，發生得最多』。

『生產大大發展，人類的勞動力現在是能夠生產比單是維持每個人所必要的更多，而維持更多勞動力的資料是有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工具也存在了。在這裏，勞動力便獲得了價值。不過自己的共產體及其所屬的聯合體，并不能供給何等可以使用的過剩勞動力』。

『戰爭是供給了這種勞動力，戰爭在很早便發生了，他是同幾個共產體同時並存的，從前因爲沒有利用戰爭之俘虜的方法，他們祗有被撲殺，再從前是把他們吃了的。然而在現在所達到之經濟狀態的階段，這些俘虜遂獲得了一種價值，因此，戰勝者都讓他們活着，而利用他們的勞動。……在這裏便發生了奴隸制度』。

『奴隸制度使農業和工業間大規模的分工，方始有了可能，使成爲古代世界之花的希臘文化也有了可能。沒有奴隸制度，便沒有希臘的國家，沒有希臘的藝術及科學；沒有奴隸制度，羅馬國家也是沒有的。……』

『不論是怎樣矛盾的，怎樣異端的，但我們可斷言：奴隸制度的採用，在當時情形之下，乃是一大進步。事實上，人類是從動物出發的，所以爲了脫去野蠻狀態，必須用同野蠻差不多的動物的手段。從前共產體在他們存續的地方，形成了最素朴的國家形態之東洋專制政治（自印度以至俄羅斯的）的基礎。只有在這種共產體崩壞了的地方，各民族始脫去了自己的舊套而繼續進步。他們首先所作之經濟上的進步，是依據奴隸勞動之生產的增加而發展了。人類勞動的生產力甚不多

尙未能供給出人類必要生活資料以上的過剩生產時，生產力的增進，交易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創制，藝術和科學的建設，很明白的祇有依分工的發展而始有可能；但這個分工的發展，是須以從事單純手工勞動之大衆和從事勞動指導，國家事務，商業，以及藝術上科學上的工作之少數特權者間的一大分工爲基礎的。而這種分工之最單純最原始的形態，正是這個奴隸制度了」。

這又是一條路。概括起來說：

第一，即當人類開始脫離動物界之時，他們還未脫去半動物的境界，生活是粗野低劣，仰賴自然界現成的食物以生活，完全受自然所支配。因而他們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平等的。各家族之家長的社會地位也是平等的。至少在這種時候，社會上還沒有階級。這種狀態，一直在後來的文化諸民族之原始的農耕共產體中，還是繼續存在。在這樣的共產體中，從最初起就有一定的共同事務存在，而這些共同事務，必須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委託一部分人去處理，而這部分人爲完成其職務起見，又必須設有一定的權力。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社會有了自己消費之外的多餘的生活資料；有了多餘的生活資料，就需要有一部分人專門負保管之責（通常是民族中的長者），久而久之，等到生產力再進一步向前發展，而保管財富變成一種世襲的固定的職務時，階級就告形成。復次，由於生產力的增大，個個共產體之間，又發生了共同的或抗爭的利害關係，因而以這種利害關係爲中心的共產體，就被造成爲一個較大的全體，於是一種新的分工又成爲必要，而保衞共同利益及防邊抗爭的機關，就自然產生出來了。於是站在這樣公共機關的人們，因爲由偶然而變爲世襲的原故，便漸漸的特殊化而成爲特殊階級。甚至把自己提高到社會支配的地位，而各個支配者便結爲支配階級。這樣看來，階級發生的物質前提是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即和上述階級構成的過程相並着，又有着一種階級構成的過程。農耕家族中原始的分工，一到財富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能吸收家族以外的人們的勞動力，生產發達起來，人類的勞動生產力除了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資料以外，還

能有多餘的生產物，這時，既有可以維持較多勞動力的生活資料，又有可以使用這些勞動力的工具，於是勞動力便取得了價值。而這種過剩勞動的來源，便是戰爭：戰爭所得的俘虜，在以前是被屠殺或烹食的，到這時便把他們用來作奴隸了。所謂奴隸制度，就是這樣形成的。這種奴隸制度實是社會的分工之最單純最原始的形態。古代（希臘，羅馬）之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的繁榮與進步，就是在奴隸制度下成就的。

這樣說來，最初的階級社會，就是建基於奴隸所有關係之上的，所以基本的對立，是奴隸與其所有者之間的對立。因此，就是那隨着社會職能的執行機關之從全體社會獨立乃至對立而來的階級分化，也不是外於奴隸制的產物，所謂階級發生的兩條路，實際上不過是說明的方便，而由前一條路來的階級分化，根本也是建築在奴隸制的基礎之上的。

明白了這一點，則一般流行的所謂階級能力說（即認階級的差別由於各人能力的差別），階級暴力說（即認階級是起源於超經濟的暴力），便可不攻自破了。

第四章　階級發展的過程

在階級發展的過程裏，我們可以指出兩個階段來。第一階段，是某一階級的存在，還僅僅是生產中一個動力，僅僅是生產過程中演着一定作用之一種人的集團。這就是說，牠在這裏還不是一種自覺的社會的獨立勢力，知道牠要什麼，傾向什麼，覺悟牠的利益與其他階級利益之特殊性與矛盾性。即在客觀上階級雖已存在，而階級的自覺還未發生。等到這一階級成了自覺的社會力量的時候，即明確意識自己的特殊利害把握自己特殊階級的時候，那就進入第二階段了。那時，這一階級便不僅是生產中的一個動力，而且自覺自己階級的地位與作用，看出自己階級利益與其他階級利益的矛盾，而變成有目的的並且想達到這種目的的階級了。

馬克思對於階級發展的這兩個階段，曾經規定如下的概念：即把不自覺的階級，叫做「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把自覺的階級，叫做「自爲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關於這一點，哲學的貧困一書中有很好的說明：

「經濟關係，第一把大羣人民變成勞動者。資本的統治對於這一大羣勞動者造成了共同的地位，共同的利害。因此，這一羣人按他對於資本的關係已經是一個階級，但是還不是一個自爲的階級。在鬥爭中——經過如我們已經說明之幾個階段——這一羣衆便構成一個自爲的階級了。他們所擁護的利益，才變成階級的利益」。

這兩個階段發展的過程，在這裏祇是說明工人階級的發展的，決不能完全適用於一切階級的成長，例如奴隸與農奴，就始終不曾跑出自然生長性的範圍。因此，嚴格的說起來，所謂利害相反的兩個階級之嚴重的抗爭，祇有階級發展達到「自爲的階級」的階段後，始有可能。所以在歷史過程中一種原始的自發的散漫的鬥爭，還算不得是階級鬥爭，而且被壓迫階級，例如奴隸時代壓迫下的奴隸，封建制下壓迫下的農奴，往往是不能在階級鬥爭這一字的本來意義上行使着階

級鬥爭的。能在階級鬥爭這一字的本來意義上行使着階級鬥爭的，却祇有壓迫階級，因爲壓迫階級，總是掌握着權力或國家的；階級國家的存在，便已證明它早已有了階級的自覺，早已是「自爲的階級」了。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沒有統治階級不是自覺的階級的。

再則某一階級從「自在的階級」進於「自爲的階級」的這一過渡，決不是一蹴而成的，決不是全階級的羣眾同時變化的。因爲一切階級中的一切分子和一切層次沒有同等的生長及發展之能力，不能在同等的速度內自覺自己是一個階級，自覺自己的階級利益而以之與別種的階級利益相對抗。所以一階級中總有先進的分子和落後的分子，而引導這些落後分子到自覺的階級鬥爭上去，是很長的過程。尤其是在現代工人階級的發展過程中，它的對立物——資產階級，常常與以嚴重的壓迫，并收買工人貴族，加以分化，甚至在宣傳教育方面常常以非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及其他各種奴隸道德注入於工人層次中。

一個階級內有許多層次，如上所說，正是階級發展過程中必然有的現象，我們試就工人階級來看：在他們中間有工廠工人及苦力工人的「小層次」的區別。工廠工人與苦力工人的覺悟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因爲工廠工人是嚴格的無產階級，所以能夠由勞動條件得着團結精神和共同利益的覺悟；苦力工人則因爲勞動條件不容易促醒他們的覺悟，因而階級意識比較遲鈍。

此外工廠的大小也有關係，小工廠的工人在階級意識上通常也是發展得較慢。

工廠工人之中又分出一小部分最上層的工人，形成所謂「勞工貴族」；這種勞工貴族的利益，有時以與資本家合夥爲有利，故不斷接受資本家從殖民地或其他工人方面剝削來的饋餘，而使階級意識糢糊起來，往往出賣階級利益。

最後，女工階級，也是工人階級中一個層次。女工階級中一大部分，差不多在現在還處於「自在的階級」之狀態中，所以女工階級，是工人中最落後的，最不覺悟而遲鈍的。這個原因，不難知道：女工不但是工人，而且是婦女，受着雙重

的壓迫。

總起來說，在工人階級中，便分出：勞工貴族，普通工人階級、苦力工人階級，大工廠工人，小工廠工人，女工等。這在資產階級中也是一樣。牠大約可分出：大資產階級，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商業產資階級，工業資產階級，金融資產階級等。

總之，一階級內有許多層次，實是從「自在的階級」進於「自爲的階級」的過渡，不能是全階級羣衆同時變化的結果。但必需注意，工人階級雖有許多層次，究其極在整個社會結構起變化時，階級是不犯錯誤的，資產階級內的不一致，一臨着工人的反抗，也就自然消滅。

第五章　各種各式的階級集團的歷史性

我們既說明了階級的概念、階級發生的原因，階級的發展過程等項，現在要把各種各式的階級集團的歷史性及其運命說一說。

階級是歷史的範疇，即它爲特定的歷史階段所規定，而且隨着歷史一同變化 例如古代社會的基本階級是奴隸和奴隸主人、封建社會的基本階級是農奴和領主，資本社會的基本階級，則是工資勞動者和資本家。因爲歷史階級的不同，即社會經濟結構或生產關係的不同，便反映到階級關係的不同，而階級關係的不同，又直接表現在剝削、收奪的方法之不同中。自然，一切剝削，收奪，在它爲收取剩餘生產物一點上是一樣的，然而總由於社會經濟結構之不同，而對於剩餘生產物的獲取上各有其特徵。例如對於奴隸的剝削，其特徵是在人格上也不承認其有任何獨立性的剝削，連勞動力的再生產都不顧到的强制勞動的剝削。對於農民或農奴的剝削，其特徵則在封建制下取地租形態。而封建地租，則有所謂勞動地租、現物地租貨幣地租三種，最典型的農奴制，乃是在徭役勞動的形態上來剝削的勞動地租。對於工資勞動者的剝削，其特徵，則在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上互相採取自由。人格間的契約形式來剝削其剩餘勞動，而剩餘勞動則是以剩餘價值的形態來被剝削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者是以自由意思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勞動者和資本家對國家的關係，即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這裏實質上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被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的假象所遮住；反之，在奴隸和封建制的下面，階級支配，因爲還需要經濟以外的强制，所以這支配就公然爲國家的强制力所維持着，因而在那裏階級便表現爲身分。身分當然也不是外於階級的東西，它是披着法律的外衣的東西。

由於社會經濟結構以及階級關係依歷史轉變的結果，所以各個社會經濟結構下被剝削壓迫的勤勞者的階級運命，便也各有不同。自然，從所有這些階級，都曾經和各種壓迫他們的生產關係鬥爭過，即對於新社會的創造都曾經盡過積極的任務這一點來說，一般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的所有者，都是站在生產力發展的利益上，為了揚棄生產力的桎梏的生產關係而戰鬥的革命階級。但他們的歷史運命却各有不同。很明顯的，古代社會的奴隸便沒有能在新發生的封建制下提高自己為統治者，封建制下的農奴，亦沒有能在新發生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提高自己為統治者。而在將來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下面，即如現在世界六分之一的蘇聯，工資勞動者是已成為新社會的主人翁了。如果我們要具體的去理解古代社會的奴隸，封建社會的農奴，資本主義的工資勞動者，他們的歷史命運之所以不同的理由，那就仍然是階級結構的歷史性決定了它。這就因為封建制的農業，亦即其社會結構，在奴隸制的社會結構中，以及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在封建制的社會結構中，都是自發的生長出來的；而未來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決不會在資本主義胎內生長出來。

這樣，階級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身一樣，不是什麼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着歷史的演變，發生、發展乃至被揚棄的。因而它有其發生的歷史條件，也決不是要存留到永久的將來的超歷史現象，所以把階級看成自然的秩序，把階級的分化從個人間的生存競爭來說明它，或由生物學的要因，亦即優生學的觀點來規定它，都不是科學的階級規定。

第六章　現代社會各種階級之分析

一、基本階級——現代社會就是指的資本主義社會，它在全世界範圍內，還是具有支配的地位——雖然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已存在着社會主義的蘇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如前所說是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法的矛盾表現爲兩者之間的矛盾；同時，兩者又相互制約着，構成矛盾的統一。一般在矛盾的統一上的統一，安定，都是相對的；而矛盾、抗爭，却是絕對的。矛盾的揚棄與克服，是矛盾向前展開的結果。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推進矛盾向前展開的勞動者；要把矛盾努力抹殺，固執統一藉維現狀的則是資本家階級。

資本家最初在封建制之下，是都市商利貸、商業資本的代表者，由於產業從小商品生產向工場手工業以及工場手工業向大工業的發展，高利貸、商業資本轉化爲產業資本；產業資本家從商人之中生長出來，代表發展途上的生產力，代表新的生產方法向封建關係鬥爭，單就這點來說，它在歷史上曾經是進步的革命的。但它的進步性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階級利益而受限制，最後便走到固執統一，對於腐朽的舊社會成爲肯定的要素。目前法西斯主義的擴張，完全暴露出資產者系的腐朽性。

工資勞動者最初是由那些離開鄉村的農民，崩潰了的行會工人或徒弟，零落了的小商人或手工業者生長出來的，所謂「前期普羅列塔利亞」，就是指的這些都市中的平民要素。在最初的階段上，他們還沒有全體地統一起來，所以在政治上便沒有能越出那反對封建要素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以外，但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同時就是勞動者羣本身的成長，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衝突，存在着的現代，而且在解決這種衝突的客觀條件也存在着的現代，工人階級已經帶到有直接解決這種衝突的可能性的負担者了。

二、**從屬階級**——地主、小資產階級，可以把它們看做資本主義社會從屬的階級，其意義即是從屬於基本的階級的。

地主在封建制下本是和農民共同構成基本的階級，並且是統治階級之唯一的特權身分。但在資本制下，他已不再是身分，而是資產階級之從屬的要素，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之一部分。雖然在地租的多少與農業品價格的貴賤等上面，不免與工業資本家也有利害的對立，但因爲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已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爲其生活條件，所以它與工業資本家間的利害對立，決非在同一生產關係之下不可調和的。

小資產階級，是包括了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因爲它的成員一面無產階級化，而另一小部分則幻想能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所以在生活條件上是極不安定的，因而在政治上，也不能担負任何獨立的鬥爭。小資產階級，因爲它是小生產商品者小經營者之故，所以它反對那商品生產的桎梏即封建的支配，又因它是小所有者，所以它對大資產階級也抱着反對的氣息；同時，因爲它到底是小所有者，所以異於無所有者而仍然具有所有者的心理。因此，它的心情與行動，總在中間層或上或下的搖擺。

村中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中農。中農隨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大部分沒落爲半無產的貧農，更經過貧農而沒落爲農業無產者；小部分則發了跡變成有產者的富農。因此，它的生活條件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一樣，政治上的鬥爭也沒有獨立性，即在它參加民主革命的場合，因爲它在封建制下，被那分散性的小個主的土地所束縛住，不能成爲統一起來的爲其自身的階級，即「自爲的階級」，所以如果它不和資產階級或前期無產階級的運動合流，是不會獨立獲得民主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從屬階級——地主和小資產階級，因爲它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的向兩極分化，而在社會地位上只是副次的過渡的，因此，又叫做副次階級或過渡階級。

三、智識分子——智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是互異其在生產關係內的階級地位的，即它不構成一個社會階級，一般

的說，所謂智識分子者，是指在智識勞動與肉體勞動的分工存在着的社會中專門從事智識勞動的人。例如技術家、事務員，官吏，醫生，學者，記者，藝術家，俳優，律師等等。以上這些智識分子在他們沒有生產手段一點上說，是跟勞動者一樣，但他們有的則被資本家以薄薪僱入，有的則在勞動過程上盡指揮任務，有的則成爲下級官吏，一方面受其僱主或其上級剝削，也同勞動者一樣；一方面又在幫助其僱主或其上級壓迫勞動者及一般人民。到了少數上層智識分子，例如高級技術家，政治家，大學教授等等，則又不同；這是他們的生活條件已極接近於資產階級，甚至構成了資產階級之一員，而在社會生活向各方面積極執行資產階級的意志，其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極明顯的被反映出來。

以上是把智識分子，根據其經濟上的地位來說明的，如從社會的任務來觀察，則還可以把它分爲企業上的和政治領域上的智識分子及學者，特別是所謂學者規定他所屬社會層之主要標幟，不是他在經濟上所處地位的問題，倒是在於他散佈了些什麼意識形態到社會去的這點上，因爲所謂學者他是以發展和傳佈意識形態爲社會的職務的。智識分子差不多就是這樣從種種複雜的要素成立的，所以他決不會形成固定的社會階層，有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有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有無產者的智識分子。自然，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者的智識分子是少數的，然而他決不是外於無產者的東西，即決不是和無產者及農民對立的。否則就是把他看成一定的社會階層，看成和無產階級或農民的社會地位之爲一定的一樣了。自然，沒有脫離資產階級乃至小資產階級生活之影響的智識分子，對於他們參加某種革命運動或勞動者運動，也是需要一定警戒的。

四、游離分子——除了上述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地主、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之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有一種叫做流氓無產階級的游離分子。例如乞丐，娼妓，地痞，流氓，浮浪人，常習犯罪者等等。他們是從一切物質和精神的勞動游離的，而且是連勞動力也消失了的沒有生產手段的分子，因此，他並不是一般的失業者和貧民，因此，他是一種不屬於任何階級，其本身也不構成一個怎樣的整體物的。在社會生活上，也不是起何等積極作用的要素。

第七章　現代社會各階級之政治任務

以上我們已把現代社會各階級分爲基本階級、從屬階級、智識分子、游離分子等等，并各就其階級屬性簡單的說明了其政治任務的一般性，現在還需要引申一下。試先就現代社會之基本階級言之。

現代社會基本階級之一的資產階級，如前所說，在他代表發展途上的生產力對封建勢力鬥爭上看，他是進步的，革命的。但因爲他們是資產階級，所以其進步爲其階級屬性所限。自始就表現了他的兩重性，一面要對封建勢力鬥爭；一面又怕革命超過他們的利益要求以上。所以他的革命性，總有某種程度的不澈底，因之歐洲資產階級的革命，總以對封建支配的妥協而告終；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亦動輒以其同作——廣大革命羣衆之較激昂，而走到革命之相反的路線，即與國外的壓迫民族——帝國主義，國內的封建勢力妥協來絞殺革命。所以資產階級即在民主革命上，一般的說，亦斷然不是採取最澈底的態度的革命階級。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倒是小資產階級——都市的小資產階級及農民，特別是中農，此外一般勞苦大衆，要比資產階級革命得多。例如他們在革命的要求上抱着不等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不僅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而且要求經濟上的不等，澈底解決土地問題，平均財產，但這種要求，決不是什麽社會主義的，只是民主革命之最澈底的形式，而這種澈底形式的民主革命，決不會爲資產階級所贊同。因此有人認爲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階段，其領導權應屬於資產階級的見解，也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參加民主革命運動的資產階級，他和都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勞動者之間，并不一致。特別在勞動者以本身獨自的要求出現時，更加明顯。

其次，現代社會基本階級之一的勞動者，在他以本身獨自的要求出現時，即他由自在的階級進於自爲的階級時，他們的革命對象是資產階級，他們是代表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途上的新生產力來同資本制度鬥爭的，他們不僅是已達到於自爲

的階級，而且他們的主體條件，真正的革命組織——政黨亦已形成，其組織與結合的可能性之深刻與廣泛，出乎歷史的任何階級之上，他不僅在反對資本制度的抗爭中，是最根本的要素，即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中，也是最根本的要素。他在參加社會革命的抗爭中，是在直接解決資本主義生產的敵對性，即在他參加民主革命幫助資產階級革命以使資產階級地位日趨穩定時，這也決不是把自己本身降於更不利的地位，反而是使他們對資本制度的抗爭，引導於勝利的必然條件。如前所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衝突存在着的現代，而且在解決這個衝突的客觀條件存在着的現代，勞動者有力的參加進去的民主革命，有進到解決這種衝突的可能性，亦即有解決資本主義生產敵對的可能性。

再次，現代社會從屬階級之一的地主，他在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地方，即達到從農業資本家那裏領收剩餘價值一部分作爲地租，他便失去其爲階級的獨立性，變爲農業資本家的寄食者，或直接成爲農業資本家。即不能直接變爲農業資本家的寄食者的地主，因其生活條件需依存於資本主義社會，其與資本家的結合，可以說是當然的。并且隨着勞動運動的高漲，其結合愈加强固。在封建的地主轉化爲資本制的地主的結合，有些國家，是封建的統治者，一面保持其統治的權勢，一面把資產階級編進統治的構成員之中；并非資產階級革命徹底的清算了封建的遺物。這時，這一種國家，地主和資本家的結合，便是地主占優勢。所以在經濟領域中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壓倒一切，但在政治上卻還殘存着半封建要素。

不僅此也，還有一種場合，封建的農業關係成爲資本主義存在不可缺的一個條件，在政治上殘存着封建要素的傾向，就更加顯著。例如日本就是這樣。總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主階級，在某種條件上，它是從屬的副次的階級，而又是最鄙劣的階級。

城市小資產階級及農民，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從屬階級之一，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不斷的向兩極分化，即一方少數部分資產階級化，富農化；一方面大多數無產化，貧農化。在政治的關係上，與其說在獨立的鬥爭着，不如說在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動搖。在各自場合，他們究竟是傾向於有產者方面，抑無產者方面，那是由有產與無產兩階級的勢力關係

面，和政策來決定的。不過在資本主義的害處發展，打破了小所有者的幻想，小所有者階級獨立性的外觀，却在日趨消滅了。在他們受着日趨沒落威脅的現代，導是同情於無產者的日益加多。但因爲他們小所有者的心理和政治水準的低落，在沒落威脅加劇的時候，也很容易急不暇擇的爲法西斯所欺騙利用。不過在資本主義的勃興期，產業革命開始以前，城市小所有者在都市中佔過人口的多數，起過重要的作用。他們的下層，隨資本主義的發展日趨無產化，他們便和手工業工人、城市勞動者、浮浪人等，同構成了「都市平民的要素」。在一七八九——九三年的法國革命、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中，都市小資產階級都盡了不少的任務。特別在法國那爲雅各賓黨所代表的都市小資產階級，曾援助過農民和一般「都市平民的要素」，亦即「前期無產階級」。

農民——也可說是農村小資產階級。他在資本主義之下，正分化爲農業資本家、富農、中農、半無產者貧農和農業勞動者他決不構成爲一整個階級，但在農村中如果還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支配時，他們對於封建地主則仍然是構成一個階級的。這就是說，對於反對資本主義的抗爭，富農是反對的，中農中立，貧農和農業勞動者則成爲革命者的戰友，其態度各不相同，而在清算封建土地所有的問題上，這一切分子則又表示完全出於一致。因此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上，封建制下的基本階級——農民的意義非常重大。民主革命，雖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但資產階級所要求的民主與農民的民主是不同的。如前所說，在民主革命上，資產階級斷然不會採取澈底的形式，所以純粹的民主形態之實現，不是由資產階級而是由農民及都市平民來成就的。即如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農民也與都市小資產階級一樣，提供了很大的力量。不過農民必需在民主革命時代與資產階級聯合，在社會革命時代與無產階級聯合，才能完成其政治任務。這就因爲他始終因封建土地的束縛不會發展爲「自爲的階級」之故。

復次，智識分子，如前所說，它不構成一個社會階級，一方面它是智力勞動者；一方面它爲資產階級服務。只有不是薪俸生活的自由職業者，在經濟上和小所有者一樣，也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顯示出向兩極的分化，而在政治任務上，也在

兩極的中間搖擺不定，在某種社會條件下，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站到革命的工人方面來。不過如前所說，就其社會任務方面來觀察，以發展和傳佈社會意識爲職務的學者，却看他所散佈的是什麼意識形態，而決定他是服務那一方面的。卡爾、恩格斯被稱爲無產者集團的思想家，正是由於這種標幟。但不是學者，教授，即不專門處理意識形態的技術家或官吏等，却不能由其意識形態的內容來決定其所屬的階級。例如有一些高級技術家或官吏，即使他具有革命的意識形態，在他還沒有站在革命的方面來反對其技術之爲反革命所利用時，他依然只是不革命的智識分子。但縱然是如此，對於智識分子，決不能有不正確之估計，有人說過：任何統治者沒有自己的智識分子，也是不行的。蘇聯的勞動者沒有自己自身的生產技術家，也是不行的，這是毫無疑義的事。

此外所謂游離分子，亦即流氓無產者，有時雖然也很勇敢的來反對現存資本制度，然而與生產勞動脫離關係，毫沒有組織能力的他們，決不能在政治任務上起積極作用，這是前面說過的，不過在這裏我們還要知道：這種游離分子，對於政治任務不但沒有積極的意義，在他們參加革命運動時，甚至是有害的，例如他們往往按日被人僱來施行反動的任務，做打手，做各種偵查工作，破壞革命就是明證。

第八章 中國的社會階層

階級是歷史的範疇，社會科學的理論告訴我們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無條件的要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疇之內，再則如果講到一般問題時，還需從一般問題中，估計在同一歷史時代的具體特點。這是我們分析了現代社會各階級及其政治任務以後，必需講到中國的社會階層的原因。

不過現在還有一些人，非常憎惡階級，尤其是害怕激越的階級意識，其實階級只是客觀的歷史存在物，科學在歷史範疇內，不能任意抹殺它，并且階級也不是一塊激起鬥牛之怒的紅布，只是科學分析的範疇。

中國自雅片戰爭後，淪爲帝國主義半殖民地，而自滿清以至於北洋軍閥政府，却都不外是國內封建勢力的代表者，阻礙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它在社會經濟結構上，又仍然是一個半封建社會。不過隨着帝國主義商品的侵入，二十世紀初，國內久已普遍的商品生產，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在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國民族資本，在紡織業、麵粉業及其他工業中，有着初步的發展，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中，中國資本主義得了進一步發展的良機，銀行業亦開始發展了，雖然在大戰結束後，又受了極大的阻礙，幾使一時發展了的各部門工業走向停滯與破產。

隨着資本主義的某些發展，中國資產階級已逐漸形成起來，這就是說：中國有了資產階級。他方面，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創立某些工廠，當然更由於中國民族工業某些發展，在中國也產生了無產階級，據統計現在中國的產業工人約有六百七十五萬人，而手工業工人則達一千二百萬以上。

中國當然也有地主階級，并且他在農村中大都還具有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權，武斷鄉曲，格殺莊佃，在中國歷史上不斷的被記載着。并且歷代封建地主對於農民之殘酷的壓迫，實造成了中國民族落後及其歷史發展的停滯。封建制度下基本

的對立階級，是地主與農民。中國農民是中國人民中最受痛苦的階層，它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被地主收奪了去，此外還有賦役等封建剝削的殘餘形式。

除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地主與農民外，所謂都市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流氓無產者，亦是在中國社會存在着的。中國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內容，亦即決定了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任務，這是民主革命的任務。因此，這一革命是廣大民衆的革命。一般講來，工農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動力，城市小所有者及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內，亦成爲革命的動力。自然，隨着革命發展階級以及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動，革命的動力也是有所變動的。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運動，由於日寇之殘酷侵略，由於中華民族之深刻危機，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便是很顯明的例證。

中國農民在革命過程中，已表現出很大力量，如在歷代農民戰爭，太平天國時代，特別是北伐時代。在某種時期，某種條件下，中國農民運動，已部分的形成工人農民的聯合。中國工人在革命過程中。已充分表現了它的强大力量，是更不成問題的。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可以說就是以工人羣衆的五卅反帝罷工開始的。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要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他們要求打倒妨礙中國近代化——資本主義發展的兩重壓迫；不過在某種情勢之下，即當革命運動勢要超過他們的要求，或軼出他們所能控制的範圍，他們便對革命開始猶豫，甚至離開革命。這裏也表現一般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是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遭遇空前危機，根本危及中華整個民族的生存，因而危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生存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是積極參加革命的，例如此次對日英勇的抗戰便是。這是他們與一般資產階級——歐洲資產階級不同之點。

第三編 國家論



第一章 國家的本質

第一節 各種國家理論的批判

在這裏我們是要探究國家之本質。國家的本質是什麼？在我們還沒有提出科學的結論之前，首先應該對於各種非科學的國家理論加以批判。

第一，就是所謂神權說的國家理論。神權論者是如下所說：

『上帝創造了全世界，國家也是爲上帝所創造的。上帝爲了支配國家，特爲派遣了他的代理人，這就是國王了。因而國王的權力是由上帝所給與的。既是相信了上帝，那麼對於國王的支配，便須絕對服從的。不論國王行使怎樣的政治，如果對他說長道短，那就是冒犯了上帝。國王對於人民的支配只有對於上帝是負責任的』。

『上帝派遣教王以支配人類之精神生活，又派遣國王以支配肉體的生活。教王和國王都是上帝的代表』。

『上帝創造了國家；但是也和許多人類的罪惡爲上帝所創造一事在同樣的意義上爲上帝所創造的，國家本來是罪惡的存在；但是要像許多人類的罪惡由教會所聖化那樣，把國家也放在教會的支配下，而推行神聖的目的，那就合於上帝的意思了。即惡魔的王國變而爲上帝的王國了。因此國王須隸屬於教王之下的。教王爲上帝的代表，他可以支配了一切』。

此外還有許多幻化出來的譬喻；如教王是太陽，國王是月亮，教王爲夫，國王爲婦之類。

照這樣說來，國家是上帝所創造，即神所創造。一切的現實的國家，都要爲神所支配。這便是神權說的國家理論。這

權國家理論，在我們看來，當然是不值一笑。然而牠却不是偶然發生的，牠有牠的社會根據與歷史背景。這是中世紀的，封建的，農業的，手工業的生產狀態之反映，這個時期的政治支配，完全是地主（僧界的俗界的）對於農奴的支配。這種國家理論，就是完全爲了肯定國王（俗界的）和教王（僧界的）之專制支配而發生的國家理論。這個神祕的大幻想，由大地上的走卒們不斷的注入到了當時的人民間，不，奴隸間，制馭了當時的奴隸，而且支配了後世幾千年的奴隸們的心理，至少就是到了現在，還有這一理論的殘餘不曾肅清。

第二，就是所謂君權說的國家理論。君權說的國家理論，是神權說的國家理論之正相反對的一面，是國家反對教會的鬥爭之結果，原來最原始的「世間」權力，就是教會的支配；中世所謂神權政治，正是教會的支配。國家很慢的才從教會支配之下解放出來，即所謂國家之「世間化」。我們可以看見這種發展的三個階段：一，國家政權服從教會；二，國家與教會並行；三，教會服從國家政權，變成剝削之工具。所謂君權說的國家理論，正是教會服從國家政權的階段產生的。試看君權論者怎樣說呢？他們是：

「國家及國家目的之絕對獨立性的徹底的主張者，宗教，道德，能爲國家所利用；國家不能屈從於宗教及道德。他們基於這一根本方針，與法皇對立，努力期於英明的絕對君主之下，實現『一個統一的國家』。

『他們代表布爾喬亞之要求，爲實現分裂於當時多數之小領土的紛亂的國家之統一以得爲一切必要之事的勇氣，希望絕對的君主之出現』。

這從法國的布丹到英國有名的哲學家霍布斯，洛克，都是這樣主張的，主張個人須讓渡一切的權利於國家，而以君主專制主義爲最高的理想。由此等君權的國家論之鼓吹，唱導，於是有介在封建政治與布爾喬亞政治之過渡期的絕對君主專制主義之出現。法王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這便是君權的國家理論之具體的表現。

然而這一絕對君主專制主義，很單純的便是哲學家們鼓吹，唱導的結果嗎？不然！絕對不然！牠也是有牠的社會根據

歷史背景的。因而神權說的國家理論，循着生產狀態之進步，已陷於不可解的內面的矛盾。最初由普羅鐵斯吞特（Protestant）教徒，由基督教的立場，指摘宗教的（即神權的）國家之理論的矛盾。後由加爾文派，由宗教的改革出發，更引出政治的結論。於另一方面，更有摩亞等的理想國，描寫從教會的支配之下被解放出來的理想國家，由國家立場首先指出基督教國家之矛盾。自然，這些對於神權國家之矛盾的曝露，也不僅是對於牠之理論的批判而成立，而是社會關係自身之發展的必然的結果。歐洲自十四五世紀以來，為原來的基督教國家（即神權國家）之成立的地盤的封建的生產關係之內部，有了新的生產關係之急速的成熟。此新的生產關係，即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之發展，因由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的亞美利加大陸之發見，喜望峯的迂迴航路之發見，特別標示異常之繁榮與進步，於是逐漸與舊生產關係（封建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第一，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第二，是產業之基爾特組織。但由天國下降的神聖支配者——中世紀的神權國家，無論在任何聖經裏面，都未曾寫着那樣的事情，於是仍然死守着封建的生產關係而不知變動。在他方面代表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之新興階級，必然的不能不以打破舊國家關係為其自身的問題。這便是普羅鐵斯吞特、加爾文派、摩亞，以及霍布斯等之思想的物質基礎。也就是君權說的國家理論之社會根據與歷史背景。

第三，就是所謂民權說的國家理論。絕對的統一國家，政治的集中主義，這是適合於新興的布爾喬亞之產業制度的。所以我們在前面說過，君權說的國家理論是代表布爾喬亞的要求。然而絕對專制主義，却是封建的過渡的小領土的分立主義之反應。其實十六七世紀的絕對主義，仍然建築在封建的遺址上。尤其是封建階級與市民階級勢力均衡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殊形態。所以絕對的君權與殘餘的封建勢力，終為布爾喬亞發展之障礙。在十八世紀接着要起來的，便是民權說的國家理論。民權說之代表的理論，便是社會契約說，或主權在民說。這個契約說的形成，實在是發其端於霍布斯，（不過，霍布斯是由契約說的立場出發，主張君權的）。洛克、孟德斯鳩等，到盧梭而始集其大成。這個說法，到底怎樣呢？大體是：

「人們爲避免自然狀態的不利和維持長遠的平和起見，特把各人自己的自由和權利（天賦的權利）拋棄了一部分，用大家互結契約的辦法，讓給特定的人，相約服從這個特定的主權者的命令；這樣的主權者根據大家的契約出來發號施令。有實行命令的強制權」。

以上是說得太抽象了，如果我們再根據盧梭的民約論比較具體的說出來，他的最重要的幾點便如下：

一、人是生而自由的，人類對於自由之拋棄，就等於人格之拋棄；權利也是天賦的，所謂「天賦人權」便是。人類對於權利之拋棄，也就等於義務之拋棄。

二、社會的秩序是神聖的權利，然而這樣的權利不能由自然而生，所以必須以契約爲基礎，由人類之相互契約而生。

三、因契約的結果，人們要各自共同的把身體和一切力量放在共同意思的最高命令之下，同時，人們便獲得了成爲全體的各個分子之自己的構成部分。

四、因契約的結果，創立了以一切參加契約者爲其分子之精神的集合的團體，以代替了契約當事者的各個人，這個團體正是因這個契約而獲得了統一，共同的自我，共同的生命和意思。

五、所謂主權，不外是共同意思的實行。所謂共同意思，就是前項所說各個人由社會契約而結成的精神的集合的團體之意思。但牠既不是構成團體之各個人的意思，也不是全體意思之總和，牠乃是除去了各個意思之或「過」或「不及」的參差以其剩餘的總計所組成的正確的和以公共利益爲目的之意思。爲這個意思的主權之精神的集合的團體，就實行這個意思的觀點說，即稱爲主權者。主權者不過是由團體構成員相集合而形成了的。因此各個人都是處於二重的關係上，即對於其他各個人同爲主權者之一員，對於主權者則爲國家之一員。（一方面是治者一方面又是被治者）。結果，主權是依社會契約所組成之精神的集合的團體之共同意思，那是絕對的，單一的，不可分的，不能讓渡

於任何人的，就是把牠讓渡於教會或國王，也是不能允許的。

由上所說各點看來，我們便可知道民權說的國家理論是具有怎樣的性質了。民權說的國家理論，較之神權、君權的國家理論，誠然是一個比較進步的國家理論。尤其是牠找出了一個人民的「共同意思」，來說明國家之特別強力、武力、公權力，換一句話說，「主權」之所由出，的確算得是國家理論的傑作之一。布爾喬亞汜對封建君主之革命，而把握了如此有力之武器，所以能顯出偉大之作用。盧梭死後，震撼全歐萬宇於全世界之法蘭西革命，及其後約十年間席捲歐洲之天地的民主主義革命之革命的理論，也便是這一革命的國家理論。當時布爾喬亞革命的英雄們，也自以為眞的合理的有生命的人類社會的需要因此而實現了，試看他們當時的態度；

『他們否定任何種類自外部而來的權威。一切宗教、自然科學、社會、政治制度等都要受澈底的批評。一切在理性的審判席之前，要問究有沒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如果沒有這個理由，那就完全不能存在。理性成為一切事物的惟一尺度。……從來一切社會形態和國家形態，一切傳來的舊思想，因為都是不合理的，所以完全要拋棄。世界在向來是被偏見所指導的。過去的一切事物，都只值得憐憫和侮蔑，太陽的光亮，理性的王國，現在方始出現了。迷信、不義、特權、抑壓等，都要為永遠的眞理，永遠的正義，人類自然之平等和其不可分的權利所代替了』。

以上一段話，眞是把當時布爾喬亞革命的英雄們之態度及其社會思想的根本特徵，都完全描寫出來了。牠那內容最重要的，就是上文所謂「自然之平等和其不可分的權利」。——即所謂「自然權」（Natural Right）或「天賦人權」之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等權利。總之「自然權」的高叫，是當時一切理論的出發點。然而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這不過是一種非科學的空想。是一種利用來肯定布爾喬亞之階級支配的。試看緊接著上所引述的一段話，而又有如下一段說話：

『然而我們是知道了。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在肯定布爾喬亞汜的王國，這個永遠的正義是成為布爾喬亞汜的正義而實現的。這個平等是歸著於布爾喬亞在法律之前的平等。布爾喬亞的所有權，被宣言為最根本的人權之一，理性

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說就是實現了，那也祇能實現爲布爾喬亞的民主共和制，這樣，第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們，

也和他們所有的先輩一樣，不能超越各個時代所附的制限』。

的確！「時代所附的制限」是不能超越的。當布爾喬亞革命的英雄們，完成了他們所要的「理性的王國」即解放了利己的人類。同時，在有產者社會便伴着階級分裂之進行。即封建的殘存階級，益益沒落。人類社會，便漸次形成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二大階級之對立。兩個階級的矛盾也就日益進展。那末，所謂「共同意思」於是也漸漸成爲非現實的存在。所存在的，祇是有產者團的意思或無產者團的意思。關於這一點，盧梭似乎有所預知，他自己也曾說：

『在惡政府之下，這個平等（即人類之自然的自由與平等，——編者註）不過是外觀的繡花枕樣的，不過於維持貧者之貧困，維持富者之掠奪是有用處的。在事實上，法律這個東西，不過於有產者有益；對於無產者常是有害的。……』

那麼，所謂民權說的國家理論，「主權在民」，「共同意思」，不過仍是那末一句說話罷了。

第四，就是理想主義的國家理論。理想主義的國家理論，便是黑格爾的國家理論。黑格爾的國家理論，可以說就是民權說的國家理論陷於不可解決的矛盾時，由對於布爾喬亞汜的支配之擁護，而發生出來的一個哲學上的詭辯。黑格爾的哲學，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唯心哲學，據他說來，宇宙中最初就有個「絕對理性」或「觀念」存在。這個人類的「現實世界」，不過是那早就存在了的「絕對理性」或「觀念」的映像。所以這「現實世界」的發展，不過是那「絕對理性」或「觀念」的映像的發展。那末，在這「現實世界」中的「國家」，不過也是「絕對理性」或「倫理的觀念」之顯現。所以黑格爾對於國家之定義，彷彿國家就是一個「倫理的全一體」的意味。依黑格爾說來，家族、市民社會、國家，是歷史之倫理的發展的三階級。家族，是以一種的愛的精神結合的。市民社會，則爲家族之反對物，是幾多個家族爲充滿自己之慾望而結成之相互關係，即社會爲基於各人之利己心，爲相互利用而獲得生活資料的活動場所；且爲一切人類對於一切人類互爭各人私的

利害之戰場。到了國家則不然，國家是基於社會全體之合理的意志而組成之結合，爲確保一般的利益基於各個人之共同意思而成立。總而言之：社會是各個人私的利害之戰場，國家是代表全體利害之組織；社會是各個人私欲之表現，國家是個人道義之表現。所以國家是倫理的觀念之顯現，而又是歷史之倫理的發展的最高階段。各個人對於國家之服從，乃是各個人最高之倫理的義務。

然而黑格爾以爲他所說的那樣的國家，在過去，在現在，都不曾有過現實的存在。這一國家，乃是理想的國家，觀念的國家。由黑格爾的意見看來，歷史上的一切國家，如古代之希臘、羅馬國家，中世之基督教國家，近代之官僚國家，都與他的理想中的國家不能合致。但現實的國家之不完全，在他看來，不成爲什麼問題。又國家之現實的起源，由於强制支配，也沒有什麼關係。歷史的現實的國家，不過是以歷史的事物歷史的考察爲對象。國家的本質，則別有所在。國家的本質與現實的國家之變遷，沒有什麼關係，牠是永久不變的。牠是理想的善之發揮，合理的自由之實現，而以精神的道德的理想爲其目標。

這個理想主義的國家理論，在理論上，自然多少受了盧梭民權的國家理論之影響。可是在黑格爾的理想的國家中，像在盧梭的國家理論中所能見到的革命之熱情，已是完全消失了。他是讚美當時普魯士王國所歡迎的國家，他是對於國家之不可思議的頌歌。他是以一貫的唯心辯證法所裝飾出來的一個哲學的國家體系。牠是把基督教的國家學說（即神權的國家理論）拿來美化、純化、精練化、合理化了而描寫出來的一個國家形態。他是達到了國家之哲學上的詭辯的頂點。然而畢竟他不外是一個偉大的空論，巧妙的非科學的幻想。

歷史上種種的國家理論——自神權說的國家理論到理想主義的國家理論——到了黑格爾的理想國家，算是到了盡頭。現在種種肯定佈爾喬亞階級支配的國家學說，大概都是汲了「主權在民說」與「理想主義的國家論」之流。現時佈爾喬亞對於國家之有意的無意的種種非科學的欺騙的催眠的解釋，大概都是抬出盧梭與黑格爾兩尊偶像來，向被剝削壓迫的

奴隸們，還播其含有毒質的好音。中世的神權的國家論，爲當時土地貴族之反動的理論的武器；民權的國家論與理想主義的國家論，——尤其是理想主義的國家論，爲現在布爾喬亞之反動的理論的武器。爲維持自己之支配的地位，爲抑壓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反動的布爾喬亞汜，不待說，還要利用毫無意義的不值一笑的宗教神權等迷信。然與宗教神權同樣而較爲精練且美化、純化、合理化了的唯心哲學之理想主義的國家理論，自然更不會忘記去利用牠。今日被豢養於各大學的哲學教授們，政治學教授們，大概都是從這一方面去欺瞞民衆的官許僧侶。

我們已歷舉各種國家理論而加以批判。然此等諸說，就其立論上看來，雖然各有不同，而在實際上，即他們對於國家之本質的說明，却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他們都不曾認識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以爲從社會的外面另有一種力量，或從天上，或從地下來投入國家裏面。國家這個東西以及國家所有的强力、武力、公權力，不是神造或是神所給與的，就是人（抽象的人，一般的人，不知誰何的人）造成是人所給與的。甚至說是什麼「絕對理性」或「觀念」（非人非神的怪物，摸不着，看不見，）的映像或顯現。這種種的國家理論，分開來說，雖然有神權的，君權的，民權的，理想主義的。總起來，我們還可把牠叫做一種超越的國家理論，即超社會的、超階級的國家理論。

第二節　國家是社會的上層建築

我們在上面所批判的，是超階級的國家理論；而社會階層的矛盾是政治的主要內容，因而是國家的主要內容，要說明國家，却不能不從階級的分析開始。

但階級是科學的範疇，同時，是社會的範疇。爲要分析階級，又不能不說明社會的經濟構造及其變革，藉以認識國家在社會的構造中所占的位置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

人類要生活，不能不取得生活資料。要取得生活資料，不能不參與社會的生產，即不能不走入一定的生產關係。並且

他們只有在一定的生產關係內，纔能生產。這一定的生產關係，是與當時一定的物質的生產力相適應的東西。這一定的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的真實基礎；國家形態及法律制度，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的第一層上層建築；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第二層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根本的東西；國家形態與法律制度以及一定的意識形態，是依存於根本的東西而成立的東西。所以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決定着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一般。不是人類的意識規定他們的存在，反而是人類之社會的存在規定他們的意識。——這是社會的構造之簡單的說明。

因此我們知道，國家是建立於經濟之上的政治的秩序，即是社會的上層建築。所以國家形態不是可以由國家自身去理解牠，也不是可以由人類意識的一般的發展去理解牠，而是要從經濟生活的關係去探尋牠的說明。

在階級的社會中，一定的生產關係，即是階級關係或財產關係。這一定的生產關係，決不是內部一致的和諧體，即必然有經濟上的強者與經濟上的弱者，因此經濟上的強者階級，為保障有利的一定的經濟關係，就不能不利用國家權力，把那種經濟關係固定起來。所以權力那東西，並不是由神給與的，也不是自己成為一個發動力而存在的，牠的深奧的祕密，還是存在於不平等的經濟關係之中。

社會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社會的發展，由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與矛盾的解消而起。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動，那包括國家形態的上層建築，也就隨着變化起來。而體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對立的東西，是階級的對立。所以社會的變革的原動力，是階級對立的揚棄與再建，因而國家變革的原動力，是基於階級對立而成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對立之揚棄與改編。因為社會的生產力是不斷的發展的。生產力發展起來，就與生產關係（社會組織）發生衝突，勢必引起經濟關係的變動，同時引起階級關係的變動。於是在舊經濟關係中處於不利地位之階級，變為在新經濟關係中處於有利地位之階級；在舊經濟關係中占居有利地位之階級，變為在新經濟關係中處於不利地位之階級了。結果，新舊兩階級各自擁護其於自身有利之經濟關係，勢必不免於互相鬥爭。這種鬥爭，最初是經濟，往後就轉變為政治的。政治鬥爭的目標，是奪取政權。由

歷史上看來，任何被支配階級，爲實現其經濟利益以得到解放，總是爆發革命，推翻支配階級的權勢，掌握國家的權力，爬上支配階級的地位，以建立與新經濟關係相適應的新國家。隨着社會的階級關係的改編，而國家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也因而改編了。所以國家的或政治的變革，只有依據社會的或經濟的變革去說明。

但是國家形態雖依存於經濟構造，雖受經濟構造規定，而國家自身，也能成爲一個能動的要素，有着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即是說，經濟構造雖給國家形態以決定的作用，而國家形態也能給經濟構造以反作用。

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大概可以分爲四種。第一，國家權力能助長經濟的發展。譬如說代表新生產力的階級一旦爬上支配者的地位時，能夠利用國家權力促進經濟的發展，並且在這種情形，經濟發展的速度是很快的。近代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蘇聯的政權，加強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即是實例。第二，國家權力能夠阻止經濟的發展。譬如說，逼近沒落時期的被支配者的階級，爲擁護其向來有利的舊經濟關係，而不惜利用國家權力阻礙新生產力的發展。先資本主義時代君主專制國家，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即是實例。第三，國家權力能遮斷經濟的發展。譬如說，擁有雄厚的經濟勢力的支配者的階級，一面濫用權力，頑強的維持已無出路而又於自身有利的經濟關係，一面爲求經濟的出路而引起爭奪市場的戰爭，以致經濟恐慌，遮斷生產力發展的方向。現代帝國主義國家的互相伙併，即是實例。第四，國家權力能引起經濟資源的掠奪和破滅。譬如强國的支配者階級爲掠奪他國的經濟資源而侵略弱小國家，而弱小國家因而喪失或破滅其經濟的資源。近代帝國主義國家對於弱小民族的侵略，即是實例。以上即是政治與經濟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我們決不能忽視。

第三節　國家是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的產物

國家不但是階級組織，牠還是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的產物。現在我們可把前面所引述過的一段關於國家的學說，再引

述在這裏，作爲本節之說明的根據。

『國家絕不是從社會外部加於社會的一種强力，也不是如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理性」或「觀念」之映像與顯現。牠是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產物。牠是社會陷於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分裂爲不能調和的對立而又無力除去這種對立的宣告。但是這互相對立而又利害相反的階級，爲了使自己及社會不破壞於無益的鬥爭中，那妨止軋轢，而抑制之於「秩序」的軌道以內的，外觀上立於社會之上的權力，就成爲必要了。這個由社會產生並站在牠的上面，而又漸次與牠脫離關係的權力，便是「國家」』。

這一段關於國家的學說，可以說已經把國家的涵義及其歷史的任務之基本觀念，很明切的描寫出來了。其主要之點，尤在肯定國家是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的產物。就是說，國家的出現，是以階級矛盾在客觀上的不可調和性爲斷的。『國家』是社會陷於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分裂爲不能調和的對立而又無力除去這種對立的宣告』。其次便在肯定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個階級的統治機關』。然因爲在那一段話裏接着有『但是這互相對立而又利害相反的階級，爲了使自己及社會不破壞於無益之鬥爭中，那妨止軋轢而抑制之於「秩序」的軌道以內的，外觀上立於社會之上的權力，就成爲必要了』的話，布爾喬亞，尤其是小布爾喬亞的學者，就根據這一點，說國家是調和各階級衝突的機關。認國家就是階級調和的工具。并且以爲不使超出「秩序」範圍之外——建立「秩序」，就是調和階級間的衝突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

其實「秩序」的建立，不過是要使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成爲合法，并迫使牠鞏固起來。同時，即以緩和階級間的衝突。所謂緩和階級間的衝突，并不就是調和，又不過是壓迫階級消除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者的鬥爭方法。再如果我們更深一層加以考慮。可以說國家的存在，就證明了階級間的矛盾是不能調和的。『如果階級調和是有可能，則國家既不能存在，并且不會發生』。所以事實是如此：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這種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便有

國家。並且這種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性的程度有多高，則國家發展的程度就有多大。

有一種小布爾喬亞比較來得巧妙，就是他在理論上並不否認國家是一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性。但是他抹殺了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需要武裝革命與破壞原統治階級之國家機關這一事實，——抹殺了這一由『國家是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的產物』出發的一種必然的結論。『因為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能調和的產物，如果牠是由社會而生，站在社會之上，而又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種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統治階級之解放，不但非有武裝革命則不可能，而且非把統治階級所設立而使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政府機關破壞、也是不可能的』。

第四節　國家是一種公權力的建立

要說明這一點，我們當然又要引述關於國家之正確的學說來作我們論述的根據：

『國家的第二個特徵，便在牠是一種公權力的建立，而這個權力是組織成為一種武裝力量；並且這權力和民衆本身，不會是一個東西的。這個特殊的公權力是必需的，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之後，民衆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了。這個公權力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的。牠不僅包含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上附帶的設施，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壓迫人的設施，這些都是宗法社會、部落社會所沒有的』。

『上面所述及的公權力，是隨着國家中的階級矛盾之劇烈，隨着鄰近國家之長大與其人口之增多，而昇大起來的。我們只須把現在的歐洲（指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拿來觀察一下，就看到階級鬥爭和階級間互相爭優勝的競爭，把那個公權力增長到了極高的程度，以至於牠竟赫赫然有鯨吞全社會甚至鯨吞國家自身的危險了』。

由上面所說的看來，則公權力的建立，就是國家最重要的特徵。如果沒有公權力，就等於沒有國家，即國家之所以為國家就無從表現。這個公權力大部分所包含的是什麼呢？牠包含特別的武裝隊伍，在特別的武裝隊伍之下，還有物質上的

附帶設施，即監獄等等組織，這個公權力，即包含了赤裸裸的武裝力量的公權力，也就是用以指揮踐踏奴隸們的一種可怕的力，也恰是那個由社會生產出來，超出於社會之上而又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種「力量」之正確的概念。

『我們有權可以說那是「特別的」武裝隊伍，因爲每一個國家所特具的公權力，是與武裝人民「并不直接相符合」的，也就是說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并不相符合的』。

『常備軍和警察是政府力量之主要工具；但是除了把這種力量當作主要工具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

『在十九世紀末年，從大多數歐洲人的眼光中看來，是真以爲除了上述的工具之外，便不能再有別的方法了，他們根本不會了解「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說他們不了解『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事了』，才有上述的工具，——「特殊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然而這一特殊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做一句話說，公權力，是怎樣發生的呢？當然是發生於社會分裂成爲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這一基本事實。但是布爾喬亞及小布爾喬亞的學者們，偏要把這個問題，借什麼「社會生活之複雜」，什麼「職能之分工」的話來答覆牠。就是說社會生活複雜了，所以有職能之分工，有了職能之分工，於是發生了特別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之公權力。

『這樣的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很有效的迷惑了一般常人的知覺，掩蔽了最重要的基本事實——社會分裂成爲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這一個基本事實』。

我們對於國家的理解，就是要暴露出這一「最重要的基本事實」來，由這一「最重要的基本事實」所發生的公權力，牠正在生長流變中，日益長大，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初期，『牠竟赫赫然有鯨吞全社會甚至鯨吞國家自身的危險了』。到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爲了英德兩國之互爭世界霸權和瓜分贓物的强盜戰爭，真的全世界所有的一切幾乎爲這一國家權力的掠奪無厭所吞沒，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奇災大禍！

第五節　國家主要是獲得經濟的特權

國家既因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而從社會產生出來，一旦超出社會之上而掀有一種特別公權力，這個公權力的大部分包含有特別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而且還有物質上附帶的設施，如監獄以及其他壓迫人的種種設施。需要保持這個超出於社會之上的公權力，即要保持那特別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監獄以及其他壓迫人的種種設施，經濟的剝削就成爲必要了。人民勞動的結果就要以「賦稅」或「國債」之名供奉於國家機關了。

『官吏們掌握了公的權力和徵稅權，他們便形成了超乎社會之上的一種社會機關』。

『對於官吏們之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所謂有組織的——編者）也經訂立起來了，區區一個起碼的小警察員，他的威權要大過一氏族社會的首領』。

『這個在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借助於國家的力量，因而在政治上也變成統治階級了，並且藉此獲得了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方法』。

『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國家是一種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就是：「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不過是以資本來剝削僱傭勞動的一種工具而已」』。

『在亞細亞專制國中，一切臣民都是國家的奴隸，在經濟上國家的企業搾取私人企業，徵收巨大的貢物和租稅。依法律上個人的權利被蔑視，對於徵收貢物與租稅的行政機關的任何無理行爲，都不能不俯首忍受。大多數人民，完全不曉得有公民生活這一回事。加於他們肩上的壓迫，隨着官吏組織的完備，一天重過一天。這些官吏，本來是執行上層權力的命令，被用作活的搾取工具的。……』

看了以上各種說法，都可以斷定國家主要是獲得經濟的特權。一方面是需要保持他那龐大而複雜的公權力之官吏組

織，不能不實行經濟的特權，一方面牠之所以要保持那龐大而複雜的公權力之官吏組織，簡直完全就爲實行這種經濟的特權。縱然在歷史的過程中有甚種方式的不同，如古代的奴役制，封建的賦役供納，近代的賦稅國債和兵役義務等等，然而其中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個目標，便是經濟的特權，並且是有組織的有秩序的執行經濟的特權。

第六節　國家是生長流變的

所謂國家是生長流變的，即是說國家是辯證的發展的意思。牠不是憑空而生的奇蹟，有了社會的根據，牠才發生。如前所說，牠是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的產物。牠發生以後，也不是萬古不朽的金身。失了社會的根源，牠就要死滅。關於這我們可以讀一讀下面關於國家之發生長成消滅的兩段理論。

『這樣說來，可知國家不是向來就存在的。從前有好些社會，就是沒有國家的，在這種社會裏面簡直連「國家」和「國家的政權」這種觀念都是絕對沒有的。在經濟發展到了某一個階段的時候，在這種經濟的發展自然而然使社會分裂成爲階級的時候，國家就因爲這一個分裂而成爲必要了。我們現在正快步的行近到一個生產發展之新階段上來了；在這個新階段上，那種階級不僅沒有再存在之必要，而且還成爲生產的直接障礙了，階級在將來之必歸消滅，正與牠在過去之發生一樣是不可避免的事。階級一經消滅，則國家也必然地隨之而消亡了。在一切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的基礎之上，來重新組織生產的時候，社會便要把整個的國家機關挪到最適宜於牠的地方去——就是要把牠搬到古物陳列館中去與那紡織車、黃銅斧一類的古董相並陳列起來』。

『普羅列塔利亞特取得了國家的政權之後，首先就把生產手段變爲國有的產業。但是因這一個動作，牠便消滅了牠自己普羅列塔利亞特本身；因這一個動作，牠便消滅了一切階級的差別和階級間的矛盾，而且同時連國家也消滅了。在階級矛盾當中進展着的一切舊社會——過去以及現今所存在着的一切社會——都必需有這個國家，這就是說，

都必需有一個剝削階級之組織，以維持一切生產的客觀條件，尤其是以便藉强力來迫使被剝削階級在現存的生產方法所決定的壓迫條件——如奴隸制、農奴制、工錢勞動制之下，永遠的過活。國家是整個社會的合法的代表，是社會之綜合成爲明顯可見的一個集團；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社會的代表，祇是因爲牠是某一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在某一個時期中是單獨的代表整個的社會的。在古代有奴隸主的國家，因爲當時奴隸主便是國家唯一的公民；在中世紀時代有封建貴族的國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有資產階級國家。等到最後國家眞正的變成社會之代表的時候，牠（國家）本身便成爲廢物了。一旦社會上沒有了壓迫階級，一旦階級的統治和由現代無政府的生產所造成的個人之生存競爭，以及由這種競爭所產生的衝突和極端的矛盾，都一起消滅了的時候，從那時起便沒有壓迫，便無須乎一個特殊的壓迫權力——國家了。當國家眞正代表全體社會的時候，牠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手段所有權，便是牠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便是牠（國家）本身最後一個獨立行動。國家的權力對於社事關係之干涉，各處各地都將成爲不需要了，而國家權力的本身也將自行永眠了。此時物品的管理機關和生產過程的指導機關，便代替了治人的政府，國家并不是被「廢除」（Abgeschaft）的，而是牠自行「死滅」（Absterbt）的』。

國家是生長流變的，是辨證的發展的。這是關於國家之歷史的發展的一般的規律。我們必須理解國家發展之一般的規律，然後才能從其發展的過程中，每一具體的歷史階段中，每一社會形式中，（有階級的社會形式）找出國家發展之特殊規律來。上述兩段關於國家之發生、成長、消滅的理論，是最能表現出國家發展之一般的規律的。所以我們對於國家的本質之理解，必須把握這一點。至於國家發生、成長、消滅過程之具體的歷史的敍述，也是很重要的，在本篇的第二章便要說到了。

第七節　國家的定義

無論對於何種事象，如果站在科學的立場上，拿嚴格的科學方法去分析，必然要得到一種共同的結論。我們對於國家的本質之探求，已論述到了終點，當然要提出一個總括的簡單的結論來。

所謂一個總括的簡單的結論，老實說，就是一個國家定義。這一個國家定義，本來在前面已寫出來了的。

「如國家實是『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牠是社會陷於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分裂爲不能調和的對立，而又無力除去這種對立的一種宣告，但是這些互相對立而又利害相反的階級，爲了使自己及社會不破壞於無益的鬥爭中，那妨止軋轢，而抑制之於「秩序」的軌道以內的，外觀上立於社會之上的權力，就成爲必要，這個由社會產生並站在牠的上面而又漸次與牠脫離的一種權力，便是國家』」。

然而這一國家定義，祇有綜合的敍述，我們還應該根據以上對於國家本質之分析，寫出一個結論來，但在未提出我們的結論之前，即在未提出我們的國家定義之前，有一個很流行的，并且很普遍的國家定義，我們要先加以批判或駁斥。這個國家定義，便是以土地，人民，主權，爲國家之三要素，說，

『國家是住在一定的土地範圍內的而且共同服從一最高主權的人民之結合』。

以土地，人民，主權，爲國家三要素之不當，以土地，人民，主權三者合起來定義國家之不當，我在政治科學大綱一書裏面，已論之甚詳，如「『中國有領土而其國家之意義反不完全』，『滿州中國是不是國家？或者是的，而英日美等之實際的國家範圍裏，又同時各有各的中國』，此關於土地者。又如『至於近代資本階級的社會裏，明明分着階級，而人民兩字却是各階級的總和的意思，其實即在以人民否認階級，這也是支配者科學的理想之一，自欺欺人的手段』，此關於人民者。更如『雖然我們對內說「人民」「主權」，而實際是一階級的獨裁制；雖然我們對外也說國際間的國家之主權，而實際上許多小國對國各方面都受束縛，即使「國際聯盟」一一萬次的宣言承認，也是無用』，此關於主權者。」

那末，國家是什麼呢？不錯！國家是有土地的，但這祇限於拿牠（土地）來區分民族社會與國家時，才是妥當的。如

尚面說：氏族社會是血統組織，國家是依照地域來區分屬民的。如羅馬之「世界國家」，中國之「天下」，以及近代帝國主義已將三分之二的地球變成殖民地的時候，若必欲以土地限制實際國家之意義，却實在的不可能。不錯！國家是有人民的，但這祇限於牽他（人民）來否認階級的時候，才有意義，否則我們在任何國家裏面，却找不出一般的不知誰何的人民來，實際上所有的，在古代祇有奴隸主與奴隸，在中世祇有地主與農奴，在近代祇有資本家與勞動者。不錯——于與萬權，國家是有主權的，但這祇限於支配者來用牠（主權）的時候，才有這樣神祕美麗。如他們說（支配者）：『主權這個意義是帶有辯論性的，先是防禦的主權，後來便進而成爲攻取的主權』。『牠是最高的，唯一的，不可分的，不能讓渡的，牠是人民的共同意思』。然而打開天窗說亮話，所謂主權，祇是一種階級的權力，把牠（主權）神祕美麗的外皮剝開，牠是什麼？牠便是一「特別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壓迫的設施」。

然則我們所要提出來的國家定義，應該是什麼呢？不，必然的是什麼？這個自然不能忽視我們上面所說幾種科學的國家觀之特徵：第一，國家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第二，國家是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的產物，因此國家是階級支配的機關，第三，國家是一種公權力的建立，而公權力的大部分包含特別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壓迫人之設施，因此牠（國家）是超出於社會之上的一種特殊力量。第四，國家是有組織的經濟剝削之工具，因此經濟的剝削，是牠（國家）最主要的最終的目標。第五，國家是生長流變的，因此牠（國家）也與其他社會產物一樣，有發生，也有死滅，牠是發生、發展、消滅的過程。如果我們把這各種特徵貫串起來，便必然的要歸著如下一個結論。即：

『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由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而產生出來的一個統治階級的機關，（由社會而生）牠是建築於社會之上具有公權力的一種特殊力量。（超出於社會之上而又與社會脫離）而以經濟的剝削爲其最終目的之社會的擴大的階級組織，又與其他社會產物一樣爲社會發展之一過程』。

這個國家定義也就是國家本質之具體的顯現。

第二章　國家之史的發展

我們在上面既把握了國家的本質，并且在末了特別指出國家也與其他社會產物一樣，在社會發展的過程，——是發生，成長，消滅的過程。因此牠在歷史的過程中，因經濟構造之不同，國家形態亦必隨之而有不同，所以對於國家之具體的歷史敍述，我們在這裏還必須從其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探求出牠的特殊法則來。然則國家之歷史的發展階段究竟是怎樣的呢？約言之如下：

第一、國家之起源；

第二、古代國家；

第三、中世封建國家；

第四、近代代議制國家；

第五、社會主義國家；

第六、國家的消滅。

以上是國家之歷史的發展的整個過程。每一階段，雖然祇佔歷史之極短的一個時期，但都爲各個特殊之法則所支配；而各個階段之間，又有其不可分的內面的連鎖。即除特殊法則之外，尚有其整個的一般的發展規律。試分述之如次。

第一節　國家之起源

我們在前面說過：國家是階級矛盾之不能調和的產物，又說：國家是社會發展到達了一定階段的產物。這都是說國家

不是自古就有的。牠是在某一社會發展的階段中，有了牠社會階段才發生的。在未發生以前，曾有過無國家的社會；並且這一無國家的社會，在社會的全生命史上還是一個很長的時期。有人說：真的人類生命，如有五萬年的話，就有四萬五千年的時代，是無國家的社會。這一長期的無國家的社會，是什麼社會呢？這便是原始共產社會，在牠的末期，就有了一種氏族的組織。所謂氏族，就是在沒有國家時的一種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這個氏族組織有如下幾個特徵。第一，牠是以血緣關係為單位而結合之狹小組織；第二，牠是以母系為結合之中心的組織（到了父系起來代替母系的時候，也就是這一組織要崩潰的時候）；第三，牠是以共同生產、共同分配之自然自足的經濟組織為原則的共產體。這個共產體破壞的時候，便是國家發生的時候。這個共產體是怎樣破壞的呢？也就是等於說國家是怎樣發生的。如前所說，社會裏面有了階級才有國家。那麼，現在我們的問題，倒不是國家怎樣發生的問題，而是階級怎樣發生的問題。階級的發生，據我們在前面所說：第一，是由於原始社會中種種社會的共同事務的執行而發生的一定分工。如爭議之裁決，個人越權行為的禁壓，又如熱帶地方的河川沼澤之管理，森林地方的宗教的職能也不能不在社會秩序之下委託於各個人。關於此等職務，很明顯的須附與一定的權力。此等權力，即為國家權力之原始。加以在各共產體間頻發之戰爭，最初，擔任戰爭的本為社會大眾之事務，後來便漸變為武裝貴族或特殊人們的事務，這樣，原始社會之社會平等便受到了最重大的打擊。隨着生產力之增加，社會的職務也跟着增加。這些職務之擔當者，開始是由各家族中選舉；到後來由同一家族選出後繼者的習慣，隨着父權制的發達，漸漸變成世襲制，在這裏便留下了世襲君主制及貴族制的根基，也就是說留下了階級對立的根基。

第二、是作於奴隸的勞動力之加入生產而成立的大規模的分工。奴隸制度是怎樣來的呢？這在奴隸來源之歷史的研究上，證明奴隸的來源，大部分是戰爭的俘虜。然而不殺俘虜而用作奴隸，卻不是偶然的，這是在生產力的發達，到了一人可以生產一人以上的生活資料時，即是有了剩餘勞動與剩餘生產品可供另一人的掠奪時，才把俘虜當作奴隸使用的。殺俘虜與用作奴隸，同是對於人身之一種掠奪。用作奴隸不過是把永續的掠奪代替了一時的掠奪。（殺俘虜而食其肉）而在效用

方面，所得結果，永續的掠奪實遠勝於一時的掠奪。到得奴隸生產成了社會主要的生產時，便形成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完全建築在奴隸主人與奴隸的兩個階級對立之上的。

這樣因分工與奴隸制度的發生，階級是發生了。而且氏族團體由於生產領域之擴大與外界（即其他氏族團體）交涉之頻繁，各氏族與各氏族的成員互相移入，尤其是因航海商業之逐漸發生，使氏族社會的內部趨於複雜化，要想維持血緣的狹小的單位組織已不可能。而受共同事務委託之一部分人因世襲的結果，其地位與身分逐日益固定化。他們的經濟上的優越與地位上的優越也日益固定化。他們爲維持這優越，并抑壓其他的社會成員，即抑壓與其利害相反的階級，便須創立一種表面上彷彿是第三者的權力機關，即與全民衆相對立的特殊的武裝隊伍，常備軍警察，監獄及其他的物質上之強制等等。於是國家便發生了。即在原始社會的共產體內，因階級的形成，亦即分工與奴隸制度之成立，已作出了原始國家之原型，由此一步便轉入於古代國家。這便是國家的起源。

第二節 國家之發展

一 古代國家

國家是由階級分裂而發生，所以凡是有階級對立的地方，便有國家。古代國家，便是建築在奴隸與奴隸主人兩個階級對立之上。這個在古代社會裏面，如埃及、巴比倫、敍利亞、波斯、希臘、羅馬諸國，都各因有奴隸主人與奴隸兩個階級的對立而形成了各自的國家。尤其是希臘、羅馬之古代國家的形態爲最典型的國家形態。現在試就希臘之雅典國家來看看。雅典在原始共產社會崩潰後，不常規的農業生產變爲常規的，而商業亦由是發展，航海貿易，雅典尤爲著稱。希臘文明的光輝遂由雅典商人之貨幣面上放射出來，至此適應於新的經濟組織之新的政治形態，就有必要。而這一新的政治形態，即是奴隸主人對於奴隸的統治。原來當雅典全盛時代，在全部五十萬人口之中，能有公民權的自由民，合計不過九萬

名口，而奴隸便有三十六萬五千人，特那些專以觀劇競技為生活的主人供給生活資料的，是這些奴隸，在驚濤駭浪的大海之軍艦及商船中，把世界各國的富力搬運到雅典的，也是這些奴隸。然而奴隸所享的報酬是怎樣呢？他們老是隔離了一切權利及自由，而在不斷殘忍的榨取及虐待之下，鞏固雅典文明之經濟的基礎。至於羅馬的文明，比較希臘起來更其是直接的奴隸文明。原來古代羅馬的社會，是沒有許多生產物，更沒有什麼輸出品，完全靠着國外輸入一切生活必需品，所以羅馬簡直是一個靠侵略主義來維持自己的國家，常年必需從所征服的各小國徵發一定量的穀物及毛皮、家畜等；還需要徵發多量的勞動力，所以也必需常年從所征服的各小國，徵發強壯的男女，有能的職工，以及學者藝術家等，在羅馬的統治之下當奴隸使用。羅馬市民的長處在政治、法律，這差不多是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事實，但羅馬的文學、美術、音樂等方面，却完全靠當時奴隸中的學者與藝術家的貢獻。然而羅馬對於他們的報酬，却也祇有難堪的侮辱與老是隔離了一切的自由與權利。他們是牛馬，是「能言的牲口」，受盡極不人道的虐待。所以有人對於奴隸的概念，是如下所說：

「奴隸是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許所有的完全的無所有者，又是徹底的被搾取者。區別奴隸與其他被搾取者（如農奴及近代的無產階級）的事情，就是奴隸是連自己的肉體，即連自己的勞動力都不能所有的一個完全的無所有者這一點。另一方面，奴隸可以看做物件，即可以認為一個生產手段，但奴隸之所以被認為一個生產手段的，就是因為他們是完全的無所有者，是徹底的被搾取者」。

這個是很明顯的，古代國家是奴隸所有者的國家，是奴隸主人用此統治并搾取奴隸的機關。從這一種歷史事實看來，國家是搾取階級對於被搾取之壓伏機關的性質，便愈益明確。在這個時候，固然還有貴族與自由民的對立，（即貴族與平民的對立），本國人與外來移民的對立，但這都不是主要的、決定的、基本的。而主要的、決定的、基本的對立，却是奴隸與奴隸主人的對立。所謂奴隸制度，即是以奴隸生產為主要的生產之一種經濟組織。在這一階段，為確保生產上之主要形態的奴隸勞動，必需通過征服而作出多數之奴隸，且必需把他無假借的置於政治的支配之下。

二 中世封建國家

中世封建國家，是建築於農奴與封建地主兩個階級對立之上的。在這個時候——中世，奴隸勞動的生產技術之發達已到盡頭。即奴隸所有者在其生產上，完全放棄其組織的機能，專靠奴隸為他們生產生活資料及奢侈品而變為純粹之寄生蟲以後，生產技術的進步就開始停滯。為生產手段之主要的奴隸，奴隸所有者使用他們的時候，又完全如使用一件物品一樣，希望奴隸的本身來促進生產技術，由其生活條件來說已成為不可能。即奴隸所有者對於奴隸過度使用之後，也將如過度使用了的物品一樣要變成一種廢物。於是奴隸制度便要崩潰了。

「給他一點土地吧！如果要他做很忠實的奴僕，自然要使他和你的土地更密切」。於是大地主似乎知道把奴隸的榨取形態拿來變更一下，即允許奴隸除為地主耕種土地外，他自己還能享用一部分土地。這一部分土地，奴隸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有收益權，如此一來，必能刺激榨取對象（奴隸）的興奮性而於地主有利，這件事，他們（地主）似乎是已知道了。因此他們為要獲得較大的利益，就不惜犧牲小的利益，奴隸於某種條件之下，也被允許有着很少的土地，並且制定了使他們（奴隸）不能離開土地、出賣土地的法律。此後，奴隸在地主的土地上也有了自己的家族并所住的小屋及所使用的土地。他們此時已不是純粹的奴隸了，而是與地主的土地更密切的一種很忠實的奴僕，即是一種農奴。這便是由奴隸轉變到農奴制的過程。

奴隸制與農奴制的區別如下：

奴隸關係與農奴關係的相異，決不在於搾取的程度及個人自由的態度。奴隸制比起農奴制來，有的固然要苛酷些，有的并不見如此。這兩種制度根本的差異，應該向那從屬階級在生產過程裏所占的地位中去尋求。農奴與奴隸一樣，個人自由是被剝奪的，但他（農奴）有自己的小小家屋及自己的家族。農奴可以耕種自己的小小地面，或者在自己的作坊從事一種職業；對於封建的領主，交付封建的租稅，或者獻納封建的勞役。然而奴隸不但沒有自己的小小地

面或小小作坊，就是他自己的勞動力亦不是歸他自己所有的。

中世封建國家，是農奴所有者的國家，是封建地主用以統治并攫取農奴的機關。在這個時候，固然還有君主與家臣，師傅與徒弟等等的對立，而主要的對立，則爲封建地主與農奴。這個時候的經濟基礎則有兩種顯明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法蘭西有名的諺語，所謂「無無領主的土地」，是形容這個特徵最適切的話；第二個特徵，是商工業獨占之基爾特制。在這個經濟基礎上所建築起來的國家，叫做封建國家。封建這個名詞，是從「封土」兩個字來的。封土，即是皇帝賜給封建諸侯的土地之意義。而在實質上，是在這種土地上的農奴，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應歸入於封建諸侯的掌握中。所以「封土」是國家的政治單位，也是封建社會上「諸侯」與「農奴」生產關係的最高經濟單位。而建築在這一生產關係之上的國家原理，便是專制主義，所謂「神權政治」，「王權神授」等等，都是封建諸侯的走卒們，拿來肯定封建諸侯，大地主，對於農奴的支配的。

但由於在封建社會之胎內的生產力之發達，領主的大土地所有，基爾特制，身分制，以及上部構造之封建的國家組織，都被顛覆，於是又由新興的資本生產制，開闢了一條向着近代國家的大道。這一過程，便是資產階級革命。有人對於十七世紀之英吉利的與十八世紀之法蘭西的資產階級革命，寫出如次之特徵：

『一六四八年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不是單純的英吉利與法蘭西的革命，乃是全歐羅巴式的革命。這對於原來之政治制度不是一定的社會階級之勝利，這乃是歐羅巴之新社會的（即新生活諸關係）政治制度之宣言，資產階級在這一革命，已得着勝利，可是這，資產階級勝利，在當時可以說是種種社會制度之勝利：是資本主義的所有對於封建的所有之勝利，是國民主義對於地方主義之勝利，是地主之土地支配對於土地之地主支配之勝利，是啓蒙對於迷信之勝利，民族對於家族之勝利，產業對於英雄的愚行之勝利，資產階級的法律對於中世的法律之勝利』。

三　近代代議制國家

（A）近代國家之成立過程

近代國家更面，有幾種顯然不同的體型：第一，是以資產階級之階級支配爲原則的一批資產階級國家以至於帝國主義國家；第二，是已經踏入社會主義建設的蘇維埃共和國；第三，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剝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我們先說明前者。

前者的國家形態是怎樣成立的呢？牠是通過由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歐羅巴之種種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成立。而資產階級革命的推進力，即實現這個國家形態的推進力，當然又是由於社會生活內面的經濟過程之變化。亞美利加之發見，亞非利加之周航，東印度及中國市場，亞美利加殖民地之需要等，變革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羅巴之生產及交換方法。基爾特的經營，變爲工場手工業，更因爲蒸氣與機械之發明予工業的生產以大革命，於是資產階級之代表的生產力，叛逆了封建地主及基爾特所代表的生產秩序。由如此的物質條件之變革，遂不能不表現於階級與階級之政治的衝突。英吉利也好，法蘭西也好，無論那一國家，如果不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便不能成立所謂近代國家。

資產階級，明確的形成自己的國家，可以說是在推翻了絕對君主政治之後。與資產階級，在其與封建主義的抗衡中，自然要經過長期的頑强的鬥爭。並且是以種種的形態從事種種鬥爭的。有人這樣說道：「那在封建領主的支配下被壓迫的身分，那在獨立都市有武裝的自治聯合體，他們或在這裏獲得了自治的都市共和制，或在那裏獲得了有給王朝納稅義務的第三身分，其次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則於半封建的或專制的王國內爲與貴族之均衡物，以及一般大王朝的主要基礎，最後，他們於大產業及世界市場確立以來，就獲得了近世代議制國家中的唯一的政治支配。至於近世的國家權力不過是資產階級全體處理其共同事務之委員會」。

資產階級國家之前行階段，是絕對君主國家。所謂絕對主義（Absolutism）從歐羅巴十六世紀前後開始，法蘭西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之傲語，即爲絕對主義之最好的象徵。絕對主義實即以領主的大土地所有與嚴格的身分制爲基礎之封建

君主與十九世紀之立憲君主間的過渡的特殊的政治形態。所以這一政治形態，中世特徵，既很顯著，同時，他的政治組織又已經有了許多近世的特徵。如官僚制、常備軍制、財政的中央集權等，這都是資產階級國家機關之先驅。資產階級國法學上之主權觀念，也成立於這個時代。在絕對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是主權之支持者。君主因爲與貴族對抗不能不利用資產階級，但因利用牠在政治上增加了資產階級之優越後，君主又回過頭去再與貴族同盟。所以資產階級在那時簡直是以君主與貴族爲其正面之敵而戰，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終於奪取政權於自己之手。

在絕對主義之下，尙有無數的封建生產制之殘存物，資本制生產力之發展，遂不得不粉碎這些殘存物幷其上部構造之絕對主義。因爲：

資產階級之支配的經濟的條件，若已成熟，則絕對主義之破壞，將一瞬也不能留，人類往往於行將消滅的世界之歷史的成果上建設新的世界。人類在這個發展的過程裏面，務必先作出新社會自身之物質的條件以及思惟及意識之發展，亦即精神的條件，否則絕不能把人類從他的運命解放出來。

所以資產階級國家，即資本主義社會所特具的國家之集中政權，是產生於絕對專制政體崩壞的時期，他開始獲得了議會的權力，以後又設法完成了行政權之獲得。這個行政權，有無數官僚和軍隊的組織，有種種複雜的人爲的政府機關。官吏和常備軍這兩種組織，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特別表徵。而這一切都是由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創建的。所有革命都使這國家機關更臻於完善。資產階級的國家，即爲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須的政府機關，是由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創建與完成的。這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恰是要破壞這種國家機關，成一個正反對。這一點我們要非常注意。

因爲官吏和常備軍這兩種組織，必然要成爲資本社會軀幹上的寄生蟲，牠是使這個社會破壞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一種寄生蟲；同時又是塞住這社會軀幹上之毛孔的一種寄生蟲。所以不去掉這種寄生蟲，新興的革命階級是沒有辦法的，關於這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說到。

資產階級國家，是以三權分立爲其政治組織的原則。所謂三權分立，就是把國家權力作用，分爲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立法權屬於議會，司法權屬於裁判所，行政權屬於國家的地方的行政機關，而使各機關各自獨立互不侵犯的意味。但在表面上，議會是國家的最高機關，而議會的組成，是由選民選舉代議士而間接參與政權，所以有人把近代資產階級國家，叫做代議制國家，或民主國家。

（B）近代國家之發展——帝國主義國家

近代國家隨着資本主義之發展，走上了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就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就是腐化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它使大部分人類不能生活下去，它造成廣大的政治經濟危機，妨礙乃至破壞生產力的發展。所以世界之分割，勢力範圍之設定，關稅壁壘之森嚴等等，使資本之自由運動成爲不可能，而行着武裝的資本之世界的競爭，對於國內勞動階級之壓迫及對於弱小民族之搾取，也就成爲資本帝國主義之生存原理。

政治，是經濟之上部構造。不僅此也，政治，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這種事實，在帝國主義時代國家之性質上，更其是一種最强烈的反映。

帝國主義國家之第一個特徵，是經濟與政治的限界之漸歸於消滅，國家帶着經濟上支配者的金融資本之執行委員會的性質，國家權力成爲金融寡頭貴族之直接的武器。金融寡頭政治是金融資本獨占之最露骨的表現，這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一切經濟的設施中無一例外，被織入於從屬關係之緊密的網中。老實講起來，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不過是全生產過程之管理的實現。有人把這樣的一種國家組織，叫做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這種集中的過程，就是證明政治與經濟的限界是差不多已經消滅了的。

帝國主義國家之第二個特徵，是行政機關之强大化，官僚羣及軍隊比較任何時代都要擴大而成爲國家權力之中樞。牠是資產階級國家之歷史的及論理的發展之成果，最初發展於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之時代，代表人民意志的議會，現在已屬

脆弱無能的東西，全行政機關成爲資產階級之執行機關而活動，內閣獨占成爲金融寡頭貴族之私的議會，有人說，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期，財政資本時期，偉大的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由單純壟斷的資本主義進到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這時期表現出國家機關之異常的鞏固，官僚和軍事機關的空前的發展，益發表示對於勞動者階級抑壓之增大，這些現象，無論在君主國或在最自由的共和國裏，都無所異。因爲帝國主義國家，早已不是由於議會而統治，乃是通過強力化了的行政權力而統治。

帝國主義國家之第三個特徵，是牠的政治原則，早已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反動。激烈的階級鬥爭，國際的規模，日益擴大；勞動者階級至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壓迫民族結成強力的統一戰線，而資產階級除了壓迫以外，也不能有其他政策。資本主義，在對於封建主義鬥爭之時代，是諸國民之解放者，可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則變爲最大的抑壓者，以前是進步的；現在是保守的。

帝國主義國家之第四個特徵，是資本主義之經濟的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性，在這個時代特別強烈的結果，致帝國主義戰爭之爆發，具有必然性。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個經濟，以及各個國家的發展，要想平衡的增進，成爲不可能。即一個新興國飛躍向前，而另一個原來的先進國却被擠落後，而落後的希圖恢復；新興的希圖更進一層的進展。如果要回復被破壞了的平衡，在政治上的手段，不外戰爭，所以現在祇有武力，是維持帝國主義國家的平衡的手段，是回復被破壞了的平衡之解決者。關稅戰爭也罷，原料市場或資本及商品市場之爭奪也罷，又任何國之資產階級決定要攫取殖民地奴隸之剩餘勞動也罷，結局都不外由經濟的方法，走到訴之於武裝之威力與現實的戰爭，戰爭不外是繼續戰前政策的一個強力手段。在帝國主義政治支配之下，帝國主義戰爭之爆發是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戰爭、帝國主義和平、在本質是無何等差異的。

國家之歷史的發展到了帝國主義，已達絕頂，國家之全組織，以緊張之狀態，爲經濟的反映，而開始成爲經濟之能動的因素，也沒有如今日的，中央集權，隨資本之集中達於極度、階級鬥爭亦表現爲最露骨的最無慈悲的，至此，主權在

民、公同意思議說，已到了無論如何不可迴的絕境，資產階級民主的假面具也維持不住，而表現出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所以我們在這裏要特別注意：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非常複雜，可是牠的本質只有一個，就是說我們如果分析這個國家到最後，必然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專政。帝國主義國家不僅發揮了極端的中央集權及資產階級專政之能事，而且完成了新社會出現之前提條件。所謂極端的中央集權及資產階級專政之徹底的表現，便是法西斯主義。

（C）法西斯主義與拿破崙主義

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總危機日益深刻化之下，法西斯主義是普遍的現象，因為法西斯主義就是金融資本的公開專政或公然獨裁，它是在政治經濟一般危機的階段上，布爾喬亞感受普羅列塔利亞直接革命的威脅，在政治上由布爾喬亞所委任的一種獨裁者的統治形態。它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統治，它意味着布爾喬亞議會主義，民主主義的完全放棄。

法西斯主義，有時雖然也表現出「反資本主義」的外形，例如德國獨裁魔王希特勒自稱其法西斯黨為「國民社會主義勞動黨」或「國家社會黨」，其實不過是為吸引落後民衆，特別是小布爾喬亞階層的空議罷了，不過是騙人的鬼話罷了。

布爾喬亞政治家縱然有時也對於法西斯主義表示排擊的態度，例如有些法西斯主義黨徒，在口頭上也大罵法西斯，其實不過是施放政治上的煙幕，甚至於是各種法西斯因小有不同而互相競賽的表現。

唯一從法西斯主義之下來防衛布爾喬亞民主的主要勢力，是各國的勞動者及一般勞苦大衆。例如法蘭西及各國人民戰線的分子乃至各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分子都是。

在某種社會條件下，即在這一社會經濟結構過渡到另一社會經濟結構和兩種社會集團的勢力相互平衡下，往往產生了拿破崙主義，拿破崙主義在本質上當然是不同於法西斯主義的；但現在卻有人看不清這兩者社會的本質的差別，所以我們需要從法西斯主義說到拿破崙主義。

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的布爾喬亞們因為和外國作戰或者由於封建的反動以致喪失自己的成功，曾企圖在拿破崙一

世的獨裁之下來維持自己的利益；又在一八四八年，法國布爾喬亞，雖然擊退了普羅列塔利亞的攻擊，但在鬥爭中已告疲勞而且失却統治力量，也選擇而接受了拿破崙三世帝制的統治，就像這樣把强力政府建立在兩個階級勢力的均衡之上，即在兩個階級勢力多少相均衡的狀態上，由一種强力政府來加以維繫的政治形態，謂之拿破崙主義。

拿破崙主義的典型，就是拿破崙三世的帝國。卡爾說過：「實際上，這個帝國是在布爾喬亞已經失去統御國民的能力，而工人階級又還沒有獲得這個能力的這種情形下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見卡爾著法蘭西內亂）伊里基也把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鬥爭的尖銳化，規定爲拿破崙主義的古典地盤。

不過拿破崙主義，不單是法國獨有的現象，而是在歐洲普遍可以看到的現象。它甚至是舊的專制君主失却舊的封建統治的支柱轉化到布爾喬亞的民主時所必然要通過的不可避的過渡階段。恩格斯曾論述過畢士馬克的拿破崙主義，說它一方面藉普通選舉的實施和社會政策等等來對當時的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裝做擁護普羅列塔利亞的利益的姿態；而另一方面則又用社會主義鎮壓法等等東西來對付普羅列塔利亞，藉以擁護布爾喬亞的利益。這就是有意把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勢力弄得互相均衡起來以謀地主階級的利益。但是在這種場合，地主已走上布爾喬亞化的道路，所以結果仍是擁護了布爾喬亞利益，表現了普魯士的專制君主向布爾喬亞王朝的轉化。

在舊俄一九〇五年前後，當沙皇不可避免的要進一步去推進中世紀的農業關係的資本主義的農業轉化時，即當沙皇的專制政治要進一步向布爾喬亞王朝轉化時，也出現過斯脫利賓（Stolypin）的農業拿破崙主義。在這裏，也是那沒有獲得完全的政治自由的布爾喬亞與於抬頭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均衡，使拿破崙主義成了可能。還有伊里基明白地指出一九一七年克倫斯基政府，也是站在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抗爭的激化之上，而以此爲地盤表現出拿破崙主義的傾向的。

由以上看來，拿破崙主義，乃是在布爾喬亞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而在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之前已失去其自信時，代表布爾喬亞利益而出現之國家形態或政治形態。因此，它跟法西斯主義，有着本質的不同。申言之，拿破崙主義的古典形態，

適於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它對於產業資本的發展有過助長的作用；而法西斯主義却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產物，它循着向下級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危機之表現，是頹廢的過程在歷史上決沒有包含絲毫進步向上的成分。因此，看不見法西斯主義和拿破崙主義本質之不同的人們，是有意的歪曲，是非歷史的看法。

四　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在說明了資產階級的一般國家後，現在我們應該說到社會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發展到了帝國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機能已達絕頂，因此牠由於工農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國家。但這一轉變，決不是把官僚和軍事的國家機關，從一部分人手裏，轉遞到另一部人手裏，因爲新興的革命階級，不能簡單的奪取現成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而運用牠來完成自己的目的。所以牠們不能僅限於佔有這個機關，而必須破壞這一現成的國家機關。所以破壞官僚和軍事的國家機關，變成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於國家問題之首要的任務。因此這一轉變，是一個由量變質的國家轉變之實例。是以原則上根本不同的一個國家形式來代替一個舊國家形式的一種偉大的改革，老實說，便是由資產階級的國家變爲無產階級的國家，由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特殊力量的國家，變爲實際上已非真正國家的一種形式——所謂半國家形式。所以這一轉變，決不是偶然的。就經濟方面說，是生產力已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發生劇烈的衝突再也不能平衡下去；就政治方面說，是勞動者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從新建設自己的新政權，這一新的政權，較之資產階級的政權，是一個新的民主國家（代表無產者和一般貧民的）；也就是一個新的專政國家。這因爲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牠的任務：第一是要利用其政權，把一切生產機關都集中在國家手裏用最大的速度促進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的建設；第二是要利用其政權的抑壓資本家和一切反動勢力並防止其復活，並且要徹底澄清一切舊社會勢力，根絕人剝削人的現象；第三還要利用其政權以與國際的反動勢力相抗衡而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包圍；第四，工人階級還要通過這一政權去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所以這一新的政權，一定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權，老實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然而這一專政不是爲鞏固或永續

自己階級的支配而專政，乃是爲消滅階級一般，消滅國家的支配而專政，並且在執行專政的期間不是少數人對於多數人的專政；而是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專政。實際上就是一種比較澈底的德謨克拉西，——較之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更爲廣大的德謨克拉西。工人階級的政權實際上是以廣大的民衆爲基礎的民主集中的政權，所以牠在表面上亦不諱言對資產階級及其他社會勢力的集中支配。並且明顯的宣言爲無產階級專政。因爲牠不是永續其專政，而是要以專政來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本身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所以有人把牠叫做社會主義國家，現在舉一個實例來說明牠的政權之組織。這便是：前面所說近代國家之二，即已經踏入社會主義建設的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國家制度既已編入歷史的篇章，我們在政治學的領域內，自然不能不研究牠。

（A）什麼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是 Soviet 這一字的音譯。牠的意思，就是會議。如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是工兵代表會議。牠在近代的歷史，是產生於俄國一九〇五年，然而在那個時候，實則祇是一個萌芽，因爲牠祇存在了幾個星期，牠本來是一個在革命中鬥爭的組織，後來就變成了政權的組織——國家的組織。

我們說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時，是就牠的形式說的，牠的形式自然不同於議會主義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國家的形式，牠不是統治於歐美各先進國家的那種尋常形式的政權，即我們在前面說的一班資產階級國家或帝國主義國家的那種尋常形式的政權，而是一種特殊的巴黎公社式的那種形式的政權，即我們在前面說的無產階級國家的那種形式或在實際上已非眞正國家的一種形式的政權。

若就這一政權的階級成份來說，最初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漸進於無產階級與貧農，而至於純無產階級；牠是發展的。但在牠的發展過程中，無論何時，牠的階級相互關係，總是無產階級站在領導地位，這不是那一個人的主觀要求這樣的，而是各階級的生活條件決定這樣的。

至於說到這個政權的政治性質，牠便是一個革命的專政。即牠不是按照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法律，不等待大學教授或法律專家替他們寫成組織創建國家的法律草案，而是由於數千百萬民衆的自動，按照他們自己的路線，直接從下面創設起來的政權。這就是說這一政權的來源，不是預先由國會討論和通過的法律，而是各地民衆直接從下而上的創設，用普通的話來說，就是直接的奪取。

所以牠是特殊的一種國家形式，牠是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革命時代，提出來的一種最高的民主國家的形式，據恩格斯的意見牠已不是按照字面本意的國家，牠與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的國家形式是不同的，資產階級國家中最稱完美和先進的形式，就是議會主義的民主共和國，政權屬於議會。政府的機關和管理機關，就是所謂常備軍，警察，官吏等等。官吏實際上不行更換，他們居特別地位，處在人民之上。然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則恰恰與牠（議會主義民主共和國）成一個正反對。

第一，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牠是以全民的直接武裝，來代替離開民衆和民衆對立的機關的警察和軍隊。（這種全民的直接武裝，本爲民族社會的產物，因國家的發生而成爲不可能，但牠現在卻又要因資產階級國家之破壞而復興起來）。

第二，在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內，官吏僚屬，或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權來代替，或是至少要受人民的特別監督。他們不僅要經過選舉，並且按照人民的要求，可把他們即行撤換，他們應居於簡單的代表地位；他們從盤據高位的領取資產階級式巨數薪俸的特權階級，轉爲利用「特種工具」的工人，他們的俸薪，不得超過高等工人的尋常工資。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之所以爲特別形式的國家，其實質就祇在於此，此外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與議會主義民主共和國，還有各種差別。

第一，從議會主義民主共和國，回復到專制帝國，是輕而易舉的（已由歷史證實），因爲舊的壓迫人民的機器，還是

秩毫沒有動搖，如軍隊，警察，官吏等等。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即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則把這種壓迫民衆的機器破壞和消除了。

第二，議會主義民主共和國，壓制和抹殺羣衆的獨立政治生活，以及羣衆自下面上的對於整個國家的民主建設的參加；工農兵蘇維埃，即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正好相反。蘇維埃造出巴黎公社式的國家形式，即「可在經濟上解放勞苦羣衆的公開政治形式」。

如果我們不嫌重複，我們要很明確的很實際的寫出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輪廓來，我們還可以把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與議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的比較，不斷的寫下去。

在議會主義民主共和國內，即在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內，統治者用千百種詭計來排除羣衆的參加統治，以及禁止他們的集會與出版自由等，蘇維埃共和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能吸引羣衆來參加統治的。勞苦羣衆如要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是爲幾千百種詭計所阻隔的，所以勞苦羣衆們都知道而且感覺到資產階級的國會是陌生人的機關。蘇維埃是勞苦羣衆與被剝削羣衆自己的直接的組織，爲使他們有自己組織國家自己管理國家的可能的機關。爲勞苦羣衆的先鋒的城市工人，因爲他們爲大企業組織得最好的緣故，在這一方面享有特別的優越地位，他們最容易選舉與管理選舉。蘇維埃組織能夠使一切勞苦的被剝削的羣衆聯合起來圍繞在他們的四周。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即官僚制度，富者的，資產階級教育的以及交際上等等的特權，一切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之下都消滅了。出版的自由不再是虛僞的了，因爲印刷局與紙張都從資產階級那裏拿來了。最好的建築、皇宮別墅，與地主的住宅，也都拿過來了。蘇維埃政權把幾千萬這類最好的房屋一下子從剝削者那裏拿了來，這樣，使民衆的集會自由的權利，增加了千萬倍的德謨克拉西。因爲集會自由的權利，如果沒有房屋，德謨克拉西」不過是欺人之談，所以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比了任何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要更其德謨克拉西到一百萬倍，蘇維埃的政權比了最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要更其德謨克拉西到一百萬倍。

我們總合起來說，蘇維埃是新的國家機關，他——蘇維埃：

（1）給我們以工農的武裝力量，這種力量，不像舊的常備軍那樣，和人民分離，而是和人民密切相連的，在軍事上講來，這種力量，比較從前一切軍隊，都强大得多；在革命的觀點上講來，他不能爲其他任何力量所代替。

（2）這個機關對於羣衆和大多數人民發生絕頂密切的不可間斷的，易於檢查和恢復的聯繫，在舊的國家機關之下，這種聯繫，簡直是夢想不到的。

（3）這個機關的成份，爲人民所選舉，因民意而撤換，沒有官僚主義的架子。所以比以前的機關，都要民主化些。

（4）他和各項的職業，緊密的相連，因之他可以不經官僚主義的方法而促成各式各樣的深入民衆的改良。

（5）他是一種組織形式，即是被壓迫的工農階級裏面最覺悟最堅强最先進部分的先鋒隊的組織形式。經過這種機關，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可以提高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中的廣大羣衆，這些羣衆，直到現在，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及歷史之外的。

（6）他可以使我們合併議會主義和直接民權的長處，就是說他把立法的作用和法律的執行，合併於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身上。和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相較，這點是在民主主義的發展上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進步。

總之這與從前的國家比較是翻了一個大身。從前是祇有富人，和富家出身的官僚，即受過教育的人，有專門學識的人，有特殊地位的人，有特別資格的人，方能管理國家，方能進行日常的管理工作。而現在却正相反，是由全體貧民，全體勞苦羣衆，覺悟的工人，兵士，來管理國家，來進行日常的管理工作。至少是一定要求學習管理國家的事情。

不過這種成見是有的，或者說是不能即刻消滅的。即有些人們以爲祇有富人，有學問的人，有特殊地位的人，才能管理國家的一種成見，但這種成見是根據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的成見而來的，或者說是根據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而來的。殊不知資本主義把國家的行政任務簡單化了，他給予人們以推翻從前的資產階級的國家統治而急轉直下的造成一種全體勞

著群衆能夠直接管理國家的可能，即用全社會的名義來僱用工人、監工、職員等等的可能。

資本主義的文化已創設了大規模的生產制度，有了工廠、鐵路、郵政、電報等大規模形式的建設。在這個基礎之上，舊式國家大部分的職權已大大的簡單化了，在實際上，這種職權已進化到了很簡單的手續，如登記、填表、和檢點號碼等等一類的事務了。而這一類的職務，是每個識字的人都很能夠勝任的，是全體勞苦羣衆，全體貧民，他們的工人、兵士，都能夠勝任的，至少是可以學習的。

現在如果我們說到國家機關的另一方面，即除了主要的是供給壓迫之用的那些機關，如常備軍、警察、官吏等等以外，在近代國家中，還有和銀行，新迪加，特別密切相連的機關。這種機關就祇是執行計算與登記的工作。（倘可以這樣說的話）其他郵政局、消費合作社、職員聯合會等，都是資本主義創設的計算機關，這種機關，尤其是巨大的銀行，是建設社會主義時所需要的，而這些都是可以現成的得之於資本主義的機關。在這些機關上面，祇要截去那種發育上的資本主義性質，把牠改造得更大，更民主化，更能賅括一切，便能爲全民所利用。如果最大銀行中惟一最大的國家銀行，在各個鄉區，在各個工廠中，都有分行，那末，牠就已經是十分之九的社會主義的機關，是全國的會計，全國生產和分配產物的計算，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骨骼。

這種國家機關，（在資本主義之下，牠不完全是國家的，但在社會主義之下牠就完全是國家了的）。是可以「拿來」一下子，一道命令，就使牠動作，因爲實際上會計、監督、登記、計算、算賬等等工作，即銀行、新迪加、商店等等職員的「國家化」，是在技術上政治上完全可以實現的事情。因爲資本主義，尤其是財政資本主義給牠做下了準備工作。

試舉兩個例子來說：在歐戰中，各交戰國所施行的強迫的新迪加化，即在政府監督之下的強迫聯合，就是資本主義替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準備下來的東西。再如在歐戰中所發現的麵包的專賣和麵包券以及強迫勞動，也是交戰的資本主義國家所造成的。在這上面，也像其他歷史的創造一般，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是從資本主義那邊拿來的，而不是自己的創

托邦。

如果麵包舖、麵包券，普遍的強迫勞動等等，掌握在社會主義國家手中，掌握在擁有全部政權的蘇維埃手中，那末，這些都可以成爲最有力的計算和監督的工具。這樣也可以產生出一種歷史上空前的推動國家機關工作的力量。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曾稱「郵政局」爲社會主義制度的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的郵政局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下組織起來的一種企業，帝國主義正在逐漸的把所有的托拉斯都變爲同一形式的組織。所以社會管理組織，的確是由資本主義準備好了。簡單說，依照郵政局的制度去組織整個的國民經濟，而使所有的技術專門家，管理員，事務員，以及一切被僱用的人們，（自然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內，應該具有比從前更多的工程師，農學家，技術師，及各種有科學知識的專門家，但這些都是可以由全體勞苦羣衆所管理的國家僱傭得來的）。都在全體勞苦羣衆的監督之下工作，都作爲全體勞苦羣衆所管理的國家之下的官吏，而付給這一切的國家官吏以普通工人的工資，這樣的一個國家，就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所以這一國家形式是特殊的，因爲他已不是尋常的議會主義國家了。他已不是國家這一字本來意義的國家。因爲管理國家的，已不是與民衆脫離的軍隊，警察，以及有特權的官吏等等了，所以由這一種事實，即可除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成見，以爲祇有那些在整個社會地位上，完全依靠資本主義的特別官吏，方能管理國家，更可以打銷這一種企圖，即企圖以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辦法來管理國家。

但這種國家政務之簡單化，尤其是減低國家高級官吏的薪俸一事，似乎僅僅是原始真純的德謨克拉西之一種單純的表現，有些人們會屢次盡其才能，用嘲笑的口吻來嘲笑「原始」的德謨克拉西，但這種人第一就完全不理解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非有幾方面回轉到原始的德謨克拉西的現象，是不可能的，第二，他沒有理解建築在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的基礎之上的「原始德謨克拉西」，與太古時代或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原始德謨克拉西，究竟不是一件東西。

（B）巴黎公社的追溯

我們在上面曾好幾次提到了巴黎公社的國家形式，這就是因爲蘇維埃的國家形式是早發源於一八七一年之法國的巴黎公社的。不理解巴黎公社，就無從理解蘇維埃，因之蘇維埃的國家形式，絕不是一個什麼人臆想出來的烏托邦，而是從歷史的發展中，從一個羣衆運動的實際經驗中得出的一個答案。

從巴黎公社慘苦的經驗中，作過十分精密的分析後，我們便可知道牠的組織形式，及其階級成份與政治性質怎樣。

十九世紀的時候，發端於中世紀時代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在各方面所設立的機關，如常備軍、警察、官吏、教士，和審判官等等機關，都發達起來了，國家之含有純粹壓迫的性質，也更見其明顯，法國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那次革命以後，國家遂成爲資本進攻勞動的戰爭中之一個武器。而拿破崙第三的帝國，更鞏固了這個武器。直接與帝國處於反抗地位的，便是一八七一年由勞苦羣衆所直接創設出來的巴黎公社，自牠出生以後，便在歷史上發現了一個共和政體的特別形式。牠不僅要消滅一般共和政體中階級統治之帝制形式，並且要推翻階級統治本身。

巴黎公社曾經着手創造的，究竟是一個什麼形式的國家呢？牠第一次所發表的命令，便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裝。牠是依照普選制，由巴黎各區所選出來的城市代表所組織的，他們是完全負責的，並且隨時可以撤銷他們代表資格的。他們的大多數是工人或是被工人階級所承認的代表，警察從來只是政府的一個工具，現在把牠原來一切的政治職務都立刻革除了去，而變爲隨時可以更換的公社負責機關了。同樣，對於其他一切行政機關的各部官吏，巴黎公社也應用這種方法。從公社社員起直至最低下的工人止，自上而下的，凡在機關中負職的人員，都給以與普通工人同等的工資。一切政府發高官吏的特權以及賦與政府代表的特權和酬金，現在都跟着這些官吏本身之消滅而同歸於盡。牠把舊政府所有物質上的武器，常備軍和警察等等既盡行消滅之後，牠又毫不遲疑的集其注意於破壞精神上壓迫的武器，這就是教士、牧師、神父的權力。審判官在此時也失去了他們那種虛僞的獨立性，以後他們應該公開的由民衆選舉出來，要對人民負責，並且人

民還有隨時撤銷他們的權力。

「公社不能不承認，一旦工人階級得到了政權，就不能再去使用那舊的政府機關了；而且工人階級爲要避免失去其已得的政權計：第一，就不能不剷除那從前反對過牠的一切舊的壓迫機關；第二，就該提防牠自己的代表和官員們，向他們宣言，（警告他們——編者）他們的職權是隨時可以被奪的撤銷的，沒有任何例外的，藉此以鞏固公社本身」。

「爲避免使國家和國家機關從社會的公僕轉變爲社會的主人起見——這種變化在一向所有的政治制度中都是不可免的　公社就使用兩種有效的方法：第一，牠把所有的行政司法，和教育的職位統統都用普通選舉法選舉出來；同時，選舉者得隨時決議撤銷被選舉者的職位。第二，牠給予那些官吏的薪金，不分職位上下，都與其他勞動者所領取的工資相等。公社所規定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這樣，那些獵官職和鑽營的人們就遇着了一重障礙，甚至爲代議機關的議員們創造了一種不可抵抗的命令」。

這裏便是國家由量變質的一個實例。這就是一個比較完滿徹底的德謨克拉西。由國家變爲實際上已非真正國家的一種形式。在這裏值得特別注意的，就是牠取銷政府代表的一切酬金，和官吏的一切優厚的薪俸，以及把國家一切服務人員的薪俸都減低到工人工資的水平線。從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變到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這一個破壞，在這裏比任何地方都要表現得明顯些。牠是很明顯的從壓迫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變爲被壓迫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從以前以壓倒別一個階級爲目的的階級統治勢力變爲用大多數民衆（工人和農民）的整個勢力來壓倒壓迫者的一種統治。

對於一切官吏的完全選舉制，和隨時可以執行撤銷權，降低官僚的薪俸到普通工人的工資一樣的程度，這是很簡單而且明顯的德謨克拉西的辦法，而這種辦法正是與一般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相適合的，同時牠也就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道橋樑。

，再很明顯的巴黎公社不是一種資產階級議會的集團，而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機關。

「從前統治階級的議員們，每三年或六年改選一次到議會中去代表人民和鎮壓民衆；現在不然。在公社組織之下的民衆採取普選制以吸收所有爲公社中一切企業所必需的工人、監工、辦事人員等，這正像單獨的企業主應用他個人的選擇權來吸收工人職員到他自己的企業中去，是一樣的情形」。

每隔數年把統治階級裏那些應藉議會來欺凌壓迫人民的分子來決定一次，這便是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本質，但在這裏，公社的辦法，並不是取銷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而是要把「談話會」式的代表機關變爲實際的工作團體。我們舉任何一個實行議會制的國家作例，不論美國、瑞士、法國、英國，他們政府裏的國家大事，都是在後台先解決好了，然後由內閣的各機關，法官們和部員們來執行罷了，而議會僅僅是藉空議的形式，來達到他們愚弄普通人民的特殊目的而已。

巴黎公社採取了新的制度，以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之買賣式的腐敗的議會主義，在這種新的制度之下，思想言論的自由，就不只是一句欺人的謊話了。因爲代表們必須自己工作，必須自己執行他們自己的法律，必須自己來檢查實際行動中所得的結果，而且還必須自己直接來對選舉者負責。代表制此時還存在着，可是把議會主義作爲一種特別組織，作爲立法和行政兩種職能分工的組織，以及作爲議員們設置一種特權位置的組織等等的情形，現在都統統沒有了。

沒有代表制，不能夠想像有一個德謨克拉西的存在，但可以而且應該實現一個沒有議會主義的德謨克拉西。

當講到巴黎公社和勞苦羣衆的德謨克拉西所需要的那些官吏之職務時，上面一段話拿這些官吏來與其他各種僱傭的工人們相比，就是說與普通資本主義各種企業中的工人、工頭、職員等人相比，這也是很値得注意的。這就可以證明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絕對沒有一點烏托邦思想的痕跡，並絲毫沒有要發明或幻想一個新的社會。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的形式過渡到後者的形式，很忠實的作爲一個科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研究，他利用羣衆運動的實際經驗，而努力從這種經驗中取得實際的教訓。但是：

『歷史上新的創設，普通所遭遇的命運常是這樣：牠每每被人指爲抄襲舊的，又因那些新的創設多少有些與舊時的社會形式相類似，因此牠就甚至於被人誤爲社會生活中之已死亡的形式。因此這個破壞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建設的公社，也就被人看作中世紀時代的公社之復活，或被人看作許多小國家的一個聯邦，或被人看作古代用以反對過渡的中央集權的一種誇張的爭鬥形式。……』

這樣就簡單的把公社看做是一種聯邦主義（註）或「市政自治制」了。並且還誤解到牠是拿聯邦主義，或市政自治制來反對中央集權制，破壞國民統一了。聯邦主義和市政自治制，在原則上是無政府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之直接的產物。凡是非難公社，以爲公社要破壞國民統一和取消中央集權，這便是一種故意的奸詐。公社所要的是一種整個而不分立的共和國的政治形式，實質上，牠是一種民主集中主義，統一而不可分離的共和國。假使勞苦羣衆把國家的政權握在他們自已手裏，把他們自已都組織在公社之內，將所有公社的行動聯絡一致，藉此以壓服一切反抗，以至於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的私有財產都交給全體民衆，難道這不是中央集權制嗎？縱使公社本身的存在包含着地方自治，但是在性質上這裏的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國家政權了。因爲國家政權這時已經成爲殘餘物了。

不過公社式的中央集權，已不是官僚主義軍國主義的中央集權，『從字義上說來，公社已經不是國家了』。即當被壓迫的不是大多數人民，而是少數人民（剝削者）的時候，公社已經不是國家了。這時牠已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而人民大多數起來已經自已登台，以代替一種特殊的壓迫勢力了。凡此一切，都已經離開了國家的原義。從社會主義和政治爭鬥的全部歷史中推斷出來，這樣的國家是必然會消滅的，而國家消滅之過渡時期（從有國家到沒有國家的過渡時期）的

（註）蘇維埃國家，是包含許多民族的聯邦國家，但牠仍是以民主集中爲原則之中央集權國家。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聯邦主義不同。

政治形式，就是公社式的。公社式的政權之集中，其目的在消滅階級，在暫時的建立被壓迫階級的專政以實過渡，所以牠不是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然而無疑義的在此過渡時期，必須要國家，即「革命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對於勞苦民衆是必要的。而無政府的聯邦主義派，自治派，或非權力派，反對一切威權，反對一切服從以及一切權力，甚至於誤解了巴黎公社的實質，這自然是極愚笨而又很重大的錯誤。

關於未來時期的政治形式，在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顯然有下列各種錯誤。即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忙着想去發明一種使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可以實現的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則將任何政治形式的問題，都回避不談，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人們，却抱定了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德謨克拉西的國家政治形式而認爲不可超越的界限，這都是不理解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形式的科學的根據的。

「對於巴黎公社解釋之繁多，及所表現的利益之分歧，證明了公社是一個十二分富有彈性的政治組織。可是一切舊時的政府，在本質上都是壓迫人的組織。公社之真正的意義是在：牠在實質上是工人羣衆的政府，是生產者反對占有階級的鬥爭之結果，是最後發見而能完成工人羣衆本身的經濟解放的政治形式」。我們對於國家形式的問題，絲毫不應冷淡，而且必須非常細心去分析每一個過渡的形式，以便照顧每一種形式的歷史的具體特點，來確實各種過渡形式之由來與其趨勢。

當一八七一年巴黎的民衆運動爆發的時候，雖然是短命的，失敗的，但牠確是第一次成立了最後發見的國家形式。在這個形式之下，勞動者的經濟解放是可以進行的。這個政治形式是可以而且必須來代替已破壞了的國家機關的。

後來到了俄國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不同的環境之中和各異的條件之下，已經繼續了巴黎公社的工作，即建立了蘇維埃，所以我們歷史的分析了巴黎公社，正是現實的來理解了蘇維埃，對於蘇維埃的理解，正是須要對於巴黎公社的理解來幫助的。

巴黎公社，或者說蘇維埃，牠已是代替破壞了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牠是過渡的（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國家形式，牠是工農民衆自己的政治組織，牠是最後發見的國家形式，牠也是歷史過程中最後的國家形式，因此牠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在這樣的一個共和國內，已經沒有凌辱人民的警察，沒有壓迫人民的常備軍，沒有高踞民上，擁有特權，永不更換的官吏。這就是說全部的武裝隊伍以及政權和管理權，都握在工人、農民，佔人民之大多數的人們手中。

國家本是一個壓迫機關，但這個壓迫機關，在公社或蘇維埃裏是掌握在大多數人民的手中，與在奴隸制，農奴制，和工錢勞動制之下那樣爲少數人所佔有的情形，迥然不同，可是一經到了民衆的大多數壓倒了他們的壓迫者的時候，這種壓迫的特殊力量，便再沒有必要了，即大多數人代替了享有特權（特權的官吏，常備軍的將領）的少數人的特殊組織，他們自己便能直接來執行一切職權，國家的一切行政職權愈是落到多數人手裏去，則這個國家權力的需要便愈少了。在這種意義上，國家便開始消滅了。

不過在近代存在着的還有一種國家體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我們留待後面去說明。

第三節　國家之消滅

一　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消滅之過程

上面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即是一種過渡期的國家。所謂過渡，即是由資本主義的舊社會過渡到無國家的社會主義新社會。但這一新社會的出現，決不是隨便可以把牠搬出來的一件東西，牠是要有新社會出現之必然的經濟基礎的。新社會之經濟基礎，如前所說，牠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內就有了牠的根源，即在帝國主義國家內，已完成了新社會之前提條件。於此又經過過渡期的國家之促進，則在經濟方面，一切生產機關的國有，就要完全實現，即在前面所說的：「當國家眞正代表全體社會的時候，牠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便是牠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便是牠本身最後的一個獨立

行動』。生產機關的國有，既然實現，則私有生產機關者和沒有生產機關者的區別，也就要隨之消滅，即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階級區別就要隨之消滅。階級區別既然消滅，則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本身，也就當然沒有了。按之國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社會無階級必然就會無國家——牠與階級同生，也就與階級同死。這是一個必然的原則。不過國家的死滅，牠是徐徐死去的，牠是由漸進到飛躍。有人把國家的死滅用「衰亡」兩個字來表示，這是很有意義的，衰亡即是逐漸凋殘之意。因社會革命的結果，社會階級的分裂歸於消滅，那國家以及政權的性質就要開始轉變，從政治的到單純管理的，即政權就要失掉牠的政治性而變成與社會利益有關的單純的管理職權了。「政治的國家」，便要變成「非政治的國家」了。這便是國家「衰亡」或「死滅」之過程。

在這裏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便是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牠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出來的，實際上，舊組織的殘餘遺留在新組織中的事實：無論在自然界或在人類社會中，或在人生每一步的旅途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事實。所以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在經濟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其餘的一切關係上，都還沒有脫除那個產生牠的舊社會的薰習，因此生產機關雖然國有，私有生產機關和沒有生產機關的階級區別雖然消滅，但在分配上，還是祇能實行下一個原則，即：『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在這種社會裏，每個生產者都向社會正確的取回自己所給與社會的東西（扣除爲社會全體所必要的費用之後）。牠給與社會的東西，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向社會領受了一種證券，這種證券上面，寫明供給這些分量的勞動（扣除了他爲社會全體所行的勞動），拿了這個證券，向消費品的社會倉庫，取出與這個所費的勞動相等的東西。這就是他把他在這個形式上所給與社會的勞動，在別一個形式上取回。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家還是需要的，但牠已在轉變的途中了。

在今日蘇聯的特殊場合，國內階級區別雖已消滅，社會主義社會雖已建立，且正在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候，但是國家不但不能任其死滅，而且仍需加強，因爲蘇聯是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它被包圍在帝國主義列強之中，隨時都有被帝

擊的可能。帝國主義法西斯黨徒還常常派遣奸細、暗探、間諜到蘇聯去或在蘇聯內部建立這樣的奸細網。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國內階級的消滅，仍不能使它不需要國家，倒反要把它大大加強起來。

在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雖然沒有生產手段的佔有者與不佔有者的區別，一切人都成爲社會的勞動者而勞動，各人都應其所提供於社會的勞動而從社會領受一定的報酬。這在表面上彷彿是各人在社會上的權利都是很平等的。然而我們要知道：一切權利，都不過是資本家社會的殘滓，因爲凡在主張權利的處所，是沒有平等的，一切權利，都是不平等的權利。所以在這種以各人所提供的勞動量來做分配標準的場合，即以勞動這種尺度來做衡量各人所得權利多寡的場合，一定還要發生許多不公平的事。例如有一人對於別人，在內體上或精神上，都佔着優越的地位；因之在同一時間當中，他能夠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更多的時間，他所得的一定要比別人多。因爲把勞動當做尺度使用，提供的勞動量多，則所得的權利自然也多；提供的勞動量少，則所得的權利自然也少。這個却已於不知不覺之中，把不平等的個人的天分，以及不平等的個人的勞動能力，認做「自然的特權」了。所以這個，從其內容來說，也同一切權利一樣，是不平等的權利。還有其他的，例如一個人結了婚，一個人沒有結婚，這個人小孩子多，那個人小孩子少等，都可以使大家縱然做同一勞動，對於社會的消費財物取同一分量，也要發生一個在事實上所得的東西比別人多，一個人比別人富那樣的事情。

然而這些弊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即在牠經過了長久的分娩的痛苦之後，初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因爲權利這個東西的公平，永遠不能超過牠的經濟的發展的階段，和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的文化程度。所以當時的經濟狀態、政治狀態、文化發展等等，都還殘留着舊社會的慣習，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並不會完全消滅，國家依然繼續存在着，牠存在着作爲一種社會分子間之生產品分配與勞動分配的調節者。『不做工的人便得不到衣食』，「這個新社會的原則已經實現了，『等量的勞動可以獲得等量的生產品』，這個新社會的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只要我們不陷於烏托邦的空想，就不能以爲資本主義社會一經破壞之後，人們就立刻會知道去爲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法

規。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中，一種國家的形式，還是必需的。這種國家保持着生產工具的公共所有權，保持着勞動的平等和生產品分配的平等，到社會主義社會最高形態的路線，他的發展的第一步是破壞舊社會唯一的不公平——即生產手段爲少數私人所覇占有的這個不公平。他的發展的第二步是破壞進一步的不公平——即依照所做的勞動而決定的消費物品之分配所構成的不公平。要把進一步的不公平破壞了，國家才自然歸入他自己所掘就的墓穴。

二　社會主義社會的高期形態——國家的完全消滅

以上所謂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多少時候，才能入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高期形態，我們當然無權說他一定在三個月以後或三年兩年以後，但生產手段既爲社會所公同領有，各人的消費按着各人的勞動得到平等的分配以後，即社會全體分子對於生產手段的使用獲得了平等之後，也就是說在勞動的平等和工資的平等獲得了之後，一定能使社會的生產力成就巨大的發展。我們祇要知道了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是怎樣的阻礙着生產力的發展。又知道了在現在所已經達到的生產技術的基礎之上，是可以怎樣快的使生產力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十二分確切地說，在人類的眼面前必然的立刻會發生一個從形式上的平等到實際上的平等的更進一步的問題，即由破壞唯一的不平等到破壞進一步的不公平的問題，也就是說發生一個實現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爲原則的平等問題。下面一段話，說得最爲透徹。

「在社會主義的高期形態中，在由於人類受制於分工的原則而造成的奴役人類的隸屬消滅之後，隨之精神的勞動和肉體的勞動的對立也撤廢了之後，在勞動不僅爲維持生活的手段，而勞動本身成了第一個生活要求之後，在生產隨着個人的全面的發展一同增加而共同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十分流出了之後，到了這個時候，社會才完全從資產階級的法律的地平線超拔出來；而且只有在這個時候，社會才能在旗幟上大書特書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裏所說的「各盡所能」，就是各應其能力爲生產財富而勞動的意思；所謂「各取所需」，就是各人應其生活慾望而消費社會財富的意思。這兩句話，是把社會主義社會高期形態的根本原則（即共產主義的原則），最個鮮明晰表現出來的

話。這一原則的實現在社會裏雖然是一個最高形態，然把牠比較起來，就是在現在一個家庭的內部，倒是常規的實行原則的。例如家庭裏面的老人，病人、小孩子等，他們差不多都不能勞動，但家庭對於他們，都應他們各人的必要，供給以食品和衣服；特別是對於有重病的人，雖然他一點也不勞動，而家庭給與他的消費，反遠多於勞動的人，在雖不勞動，只要有必要，就給與他同必要相同的東西這種地方，才是人類有「人的生活」的地方。如果一個社會裏，一方面有沒有必要而占有許多物品的人；他方面有痛感必要而苦於缺乏物品的人；決不能說是公平的狀態。在各人能應其必要而領受物品的場合，才有完全的公平，才有保證無差別的眞平等。社會主義社會的高期形態，就是一種有眞平等的社會形態。但這種新社會的高期形態，不是立刻能夠實現的。要實現牠，是必要以巨大的生產力的發展爲前提條件。所以前面說：『生產力隨着個人的全面的發展一同增加而共同財富的一切源泉十分流出了之後，……社會才能在旗幟上大書特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如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條原則實現了，則每人都已獲得了一定的生活保證。既到了每人都獲得了生活保證的時候，就沒有把勞動當做生活手段從事勞動的必要了，於是那種『勞動不是爲維持生活的單純手段，而其自身就是第一個生活要求』的事，才能夠同時實現，到了各人已不把工作當做單純生活手段，能在工作本身當中發見自己的目的的時候，各人的「自由發展」，才能實現。這就是所謂「個人的全面的發展」。到了個人能夠這樣成遂其全面的發展，各個人熱心致力於其工作的時候，社會的生產力，當然就要有極大的發展，所以說：『生產力也隨着個人的全面的發展一同增加，共同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十分流出』。還有到了各人都得到生活保證的時候，則那種只是窮人不得不負擔的肉體勞動，即經濟上的壓迫就要消滅，所以說：『在由於人類受制於分工的原則而造成的奴役人類的隸屬也就消滅』。在人人都享受生活保證的世界中，教育就不能歸祇有財力的人所獨占；所以那種基於境遇差別的個人才能的人爲的懸隔也就消滅，困難而不愉快的肉體勞動，都要社會全體人員去負擔，甚至於一切方面，都能實行機械的發明及應用，大部分工作，都能轉變

「自然力」去負擔，所以說：『精神的勞動及肉體的勞動的對立也隨著消滅』。總而言之，這些事情，都是有相互的因果關係的同時存在的現象。

於此，我們便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高期形態一個顯著的區別：即社會主義社會，是僅僅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一個原則。在這個狀態之下，國家的形式，還是必需的，不過這個國家的形式，不是官僚的政府，由特殊的武裝隊伍來執行國家的政權，而是真正民衆的政府，由民衆自己的武裝來執行國家權力的。而且這個時候的國家權力，因爲把廣大的民衆都吸收到政府機關來，得到廣大民衆的擁護，更能發揮其國家權力，加强其國家權力，完成國家的衰亡過程。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高期形態，便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一條原則，在這個狀態之下，就完全沒有何等組織的權力之必要，就完全沒有任何形式的國家權力之必要。不用說，我們現在就是在一個家庭以內，有時也不免要發生夫婦吵鬧和父子衝突的事情。那末，縱然就使到了各人生活都得着保證的世界裏，人和人間的不和或爭論完全絕跡這件事，恐怕也是不可期待的。不過那時爲鎮壓那種不和或爭論起見，大概也用不着强大的組織的腕力，如現在社會裏的軍隊、警察、監獄等，因此，這時的社會，若從無需强制的腕力這一方面說，可以說是一個完全「無爲而治」的社會。所以如果把國家當做强制的權力的主體來想，則社會主義社會的高期形態，就是國家完全無用的時代，——國家完全死滅的時代。本來在沒有政治（國家組織）以前，是已經有了社會組織的，即沒有政治秩序以前社會裏面就很明白的有了社會秩序的。所謂社會秩序，即是人間社會生活之基本原則。當社會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之後，國家才會完全消滅，就是說，當人們經過了過渡期的國家的長期訓練之後，已經慣於遵守社會秩序，即社會生活之基本原則，而他們的生活力又發展得很大，以至於他們都自願的盡其所能的來工作的時候，他才會完全消滅。因爲只要不知幾百萬次習慣關於人們對社會生活之必要的規律，只要沒有引得起憤恨、反抗、叛亂的原動力，那就沒有什麼鎮壓的必要。關於這個理論之有系統的敍述，我們曾把他引述在前面，現在試重述一遍如下：

國家是整個社會的合法代表，是社會之綜合成爲明顯可見的一個集團；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爲社會的代表，祇是因爲他是某一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在某一個時期中是單獨的代表整個的社會的。在古代有奴隸主的國家，因爲當時奴隸主便是國家唯一的公民；在中世紀時代有封建貴族的國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布爾喬亞汜的國家，等到最後國家真正的變成社會之代表的時候，牠（國家）本身便成廢物了。一旦社會上沒有了壓迫階級，一旦階級的統治和由現代無政府的生產所造成的個人之生存競爭以及由這種競爭所產生的衝突和極端的矛盾，都一起消滅了的時候，從那時起便沒有壓迫，便無須乎一個特殊的壓迫權力——國家了。當國家真正代表全體社會的時候，牠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便是牠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是牠本身最後的一個獨立行動。國家的權力，對於社會關係之干涉，各處各地都將成爲不需要了，而國家權力的本身也將自行永眠了。此時物品的管理機關和生產過程的指導機關便代替了治人的政府。國家並不是被「廢除」（Abgeschaft）的，而是牠自己「死滅」（Absterbt）的。

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這個自己死滅的國家，是無產者的國家，即所謂過渡期的國家，也就是前面所說僅僅是監督勞動和消費的國家。這一國家的權力，已不是所謂「固有意義上的政權」。至於資本家的國家，是祇有由他力來破毀他；決不能期待他自己死滅的。

因爲過渡時期的國家，既有了那樣一種經濟的基本條件，所以簿記和監督，就成了那一時期的主要事務。所有公民，在那裏都變成國家的僱員。那時所有的事情就只是在使一切人民都做平等限度的工作，一切都按規則遵守工作的標準而得到同等的報酬。而這必要的簿記和監督，又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達到了極端簡單化的地步。如檢查，登記，開發收據等等。這些工作，只要能夠閱讀，能夠書寫，懂得起碼算術的人，都能夠勝任愉快，所以此時國家就失了牠的政治性質，就很容易歸於死滅。

這裏還有幾個論點要指示出來：即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期形態內，既沒有階級，而還有所謂有產者的法律的國家形

式，又由有國家的社會過渡到無國家的社會，他的橋樑却是所謂無產者的國家。這在一般人看來，或以爲眞是奇論謬說。殊不知這種過程正是辯證法的發展過程。

所謂國家的完全死滅，本來不是偶然的，他的經濟基礎，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高期形態，即是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的一種社會形態，而一般人，也以爲這不過是一種純粹的「烏托邦」。這種態度，也只是暴露了他們自己的成見與非科學的態度。我們如果不抱着主觀的成見，就知道上面所述國家的完全死滅以及社會主義的實現過程，是處處由他經濟基礎說明的。對於社會的進化法則確實把握了而拿一種客觀的科學的態度來說明國家之發生、發展、消滅的過程的人們，他們的全部理論，是以最有次序，最完整，最精審，而又最充實的形式來說明一切的一種進化論。他們沒有一絲一忽的動機，要想憑空建築一個空中樓閣，或創造一個烏托邦，並且沒有預先懸想着一種不可推測的東西的企圖，他們根究社會變革的過程及新社會之必然要到來的問題，正像自然科學家研究一種新的生物的進化問題一樣，他知道了一物之來源，又知道此物之如何變化，發展，終結。所以在一般人的觀念中，一若社會主義社會是一件無生命的，死殭的，永古不變的東西，殊不知事實上却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時代，才開始發生迅速的，眞正的，實際的，人羣進化。

（附註）我們在上述各節，敍述了國家發生，發展，消滅之全過程，這絕不會因國家之終歸消滅，損及國家之尊嚴，這正如敍述一個偉人之死，不會損及那人的尊嚴一樣；因爲這是歷史的本質發展之科學的結論。不但不會損及國家尊嚴，而且不會有礙加强國家權力的企圖與努力，卽與某一時期『國家至上』的信仰，仍然不至相悖。『我從書中知道，在共產主義社會裏面國家將要死滅；同時，我們現在的任務（指蘇聯——譯者。）却是用盡種種手段，加强國家權力，兩者怎樣能兼顧呢？』（見少共眞理報。）有人答覆道：『使國家政權最高發展，以造就國家政權逐死的條件，歷史發展的本質正是如此。』不過加强國家權力的路徑，是使國家與人民密切接近，是國家對羣衆的骨肉聯繫，決非與人民脫離的特殊威力。

第三章　國家論與中國

上述國家論是包括了兩個主要部分：一是國家的本質；一是國家之史的發展。這是完全站在政治關係之一般法則的基礎上論述國家。這種一般法則當然是可以無例外的適用於中國的。不過科學要求我們不能把適用於任何國家的一般法則和某一特定國家——例如說中國的特殊法則對立起來。這裏的任務就是要在一般法則與特殊法則的相互滲透融和之中，給現代的中國國家以政治學上一個適當的位置。

中國的國家在一般的法則上，當然也不是和中國人類社會共永遠的，即它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級的產物。易經序卦傳的後一節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這幾句話說明在母系社會只有夫婦沒有父子的關係，在父系社會國家未成立以前，只有父子沒有君臣的關係。所以國家是逐漸產生出來的，禮義也是逐漸產生出來的。

自從殷墟契文發現後，中國信史，只能從殷代開始，自從真正的歷史科學輸入中國，經過好幾次的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以後，中國歷史也無例外的有着奴隸制這一階級。因此，中國的國家，也首先是以奴隸國家的姿態出場的。不過奴隸國家的形成，即中國國家的起源，究竟是在殷代，抑在其他朝代，還未能成爲定論。殷代是中國的奴隸社會，奴隸國家形成於殷代，例如呂振羽氏，他引周書多士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又引詩商頌說：古帝命武湯，征域彼四方，方命厥命，奄有九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呂氏以爲：『在這些記載中，實記述着殷革夏命而創立其國家，確定其政治疆域的過程』。（見所著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八九——九〇頁）。西周是中國的奴隸社會，奴隸國家形成於西周，例如郭沫若氏，他說：『中國的社會在西周的時候，剛好

如古代希臘羅馬一樣，是一個純粹的奴隸制的國家」。他說：「周書的十八篇（自牧誓至文侯之命的十八篇），有八篇是專門對付殷人說的話，我們看那周公罵殷人是「蠢殷」，「戎殷」，「庶殷」，或者說「殷之頑民」，而且把那些「庶殷」徵發來作洛邑，用種種嚴厲的話去恫嚇他們，那不完全是表示着被征服了的民族當成奴隸使用嗎」？（見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六——一七頁）。

但不論中國的奴隸社會及奴隸國家，是形成於殷代或西周，而中國國家的起源，是不能外於國家起源之一般法則的，因奴隸社會及奴隸國家，究竟形成於何時，未能成為定論，因而中國的封建社會及封建國家，形成於何時，亦未能成為定論。但中國有着封建社會及封建國家，更不成問題，更不能外於國家發展之一般法則。郭沫若氏說：「事實上周室東遷以後，中國的社會才由奴隸制轉入了真正的封建制度。從那時以後，在農業方面，中國才有地主和農夫對立的莊園制的產生；在工商業方面，也才有師傅和徒弟對立的行幫制的出現。春秋的五伯，戰國的七雄，要那才是真正的封建諸侯。後來在秦統一了天下以後，在名目上雖然是廢封建而為郡縣，其實中國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巍然的存在着的。我們不要為文字所拘泥了。周室在古時雖號稱為封建，但事實上在周官有鄉、遂、縣、鄙之分，并不是全無郡縣。秦以後雖然稱為郡縣制，但漢有諸王，唐有藩鎮，明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堯，就是一般的行省總督，都號稱為「封疆天子」，并不是沒有封建的名稱就不是封建制度。……所以儘管一部二十四史成為流血革命的歷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依然無恙」。（見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〇——二一頁）。

自然，中國的奴隸社會及奴隸國家，決不是典型的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及其奴隸國家；中國的封建社會及封建國家，亦與典型的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及其國家有別。這就是說中國的國家具有中國自然條件及其社會條件的特徵，我們要說一般之中看出其特點來。

再則關於國家之基本概念，也是如此。但一般上也是沒有例外的。中國古代所謂「國」，原不過指有城郭的地域而言：

亦即是希臘、羅馬的城市國家。『殷墟契文國作𢦏或作或，或作𢦚，從戈守口，象國有衞』。（見羅振玉、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按口實像城郭形，不像後代一般的所謂國有抽象的意義。再則「國，邦也，從口或聲。臣鍇曰：口，其疆域也。「或」亦「域」字，古或反』。（見說文通釋）。按國爲後起之字，古「國」字「域」字，皆作「或」，「口」與「土」旁，都是後人加上去的。所以毛詩「奄有九有」，韓詩作「奄有九域」，又或把「九域」解作「九州」，或引洛書『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囿』，認爲「九囿」亦即「九有」，「囿」字與「域」字發音相近，所以古時通用。古「國」字、「域」字既皆作「或」，所以「或」可通用於「域」與「國」，可以指私人所有之地域，亦可以指領主封君所有之國土。因此，從字源上說，中國古代所謂國，實即領主封君之國土；而領主封君之國土，實即領主封君之私產。此種以國家爲領主封君之私產的觀念，終封建之時未嘗改變。我們試看漢劉邦作了皇帝以後，很得意的向他的父親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與仲多』。又試看李世民要乘隋末農民叛亂起而篡奪隋代天下，起初，其父李淵不允，後來終於允許了，李淵對他的兒子世民說：『破家亡國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這都是把國家當做「產業」，當做「私產」的最好證明。法蘭西封建時代有名的諺語說：『無無領主的土地』。中國有名的詩句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在古代國家之基本的概念上，是與一般的國家之基本概念一致的，然而也不是沒有微小的差別，例如中國古代不曾有過國家二字聯綴成一名詞的事實，並且把「國」與「家」分別得極其界線分明，例如孟子上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樣，「國」便是立於「天下」與「家」之間的一種政治階級。但孟子上又有『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的話，似乎「國」與「家」又是實同名異的一物，可以隨處換用。而所謂「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又似乎「國」與「家」的不同，祇在財產所有的大小。不過從這裏也可看出國家是私產是領主封君所有土地的意味來。因此，這祇是用語的微差而已。到了現代，西方因資本主義社會及資產階級國家的出現，其全因社會主義社會及社會主義國家之出

現，國家的觀念及其體型，都有着顯著的變更了。這種種國家的觀念輸入中國，而主要的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亦即歷史條件的變遷，對於現代中國國家的本質及其概念，亦不能不有所變遷。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特別是馬關條約與義和團運動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獲取了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種種特權，把中國淪爲半殖民地，雖然一方面在帝國主義的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國的民族資本有着初步的發展，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但使中國的紡織工業，麵粉工業等等有着突飛的發展，而銀行業亦開始發展了，可是因爲自滿清政府以至於北洋軍閥政府，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同時又代表着國內封建勢力拚命掙扎，使中國的生產方法始終跳不出半封建的範圍，於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畢竟不能不受到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的阻礙，因此，中國的社會及其國家，便不得不暫時停頓在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狀態。

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當然是不同於歐美資產階級的國家的，因爲民主革命還未完成，當然更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因爲它是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對象。這種國家的畸形，決定了它革命的主要內容，不能不是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而這一國家也就應該是一廣大民衆的國家，即它不是封建領主集團一面性的國家，亦不是資本家集團一面性的國家，乃是包括廣大民衆的全面性的國家。申言之，即它必須建立在以一般勞動民衆爲中心的各階層的共同利害之上，代表以工農大衆爲中心的各階層的共同利益。

不錯，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其主要內容，是反對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而担負這個任務的是廣大民衆。目前由於日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中華民族危機的加深，使單獨反對日帝國主義保衞中國，爭取民族解放，實現民主自由，改善民衆生活，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的中國，成爲當前之惟一任務，一切皆應服從這個任務。而所謂「抗戰建國」所要建立的新國家，應該，不，必然是各階層各黨派聯合統一的國家，申言之，即是以國民黨爲領導的，容納各階層各黨派於三民主義體系之中和統一在一個民族戰線（這一民族戰線不是孤立的，）之內所組成的統一國家。

而這一國家，當然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不過它能遵照三民主義，確立一定方針，通過一較長時期的革命與建設過程，使各階層各黨派的利害矛盾，適應每一革命與建設過程，得到合理的解決，同時，更能有機的互相滲透融和向新的前途轉化，則斷然是有轉變到更高階段的可能的。這也就是說，這一國家，在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環境中，必然會從各階層內容之全民性的形式，走到無階層差別之全民性的實質的一種有無限發展性的國家。

這一種國家，也就是在上面提出的近代第三種體型的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



第四編　藏府論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政府的概念

政治學上有若干概念是不容易把牠弄明白的，而各個概念之間，又往往互相混淆，什麼是政府呢？卽政府的概念如何呢？我們請先看下面的兩個解釋：

「從一般人的眼光中看起來，所謂政府，恐怕就是幾個官吏而已。上海的東洋車夫大概以爲路上的巡捕就是政府，鄉下農民以爲縣長及其衙役就是政府。這是因爲與東洋車夫接觸的政府勢力祇是巡捕的權力，與鄉下農民接觸的也祇是縣長的權力而已。但政府的意義却決不能這樣淺薄。簡單的說起來，所謂政府是一種組織，其目的是爲人民或人民的團體服務的，其所管得到的事務範圍是非常廣大，差不多包括人與人在社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務，就是所謂公共事務」。（見張慰慈先生著政治制度淺說一頁）。

「……凡是一個大社會，決不能完全依靠風俗習慣作爲社會制裁的方法；同時一定還要有一種較爲正式的較爲有系統的方法與手續，使各個人服從團體的意志，受團體的支配，並管理各個人間的一切事務與行動。這就是團體表示那無上威權的第二種方法，叫做正式的政府，這種社會制裁方法的特點，就是在團體之內，設立確定的機關。其職權是決定什麼事務是各個人或團體所能做的，什麼事務是不能做的；並且各個人如有違背那已經表示的團體意志的行爲，這個機關或其他機關就能處以相當的刑罰。這一類的行動，往往稱爲政治的行動；據政治學者的意見，祇有政治的行動，才能包括在「政府」這名詞的範圍之內」。（見上著十八頁）。

上面兩種解釋，從大體上說來是沒有什麼錯誤的，即在他把政府看做是一種組織，是一種機關，政府的行動是一種政治的行動等等，這都沒有什麼錯誤，而他的缺點則在沒有發見政府的集團對立性，沒有理解社會階層矛盾爲政治的基本內容，所以他說去說來，總不會抓住政府這一東西的根本特質，他說政府的目的是爲人民或人民的團體服務的。不錯！但什麼是人民？什麼是人民的團體？如果空空洞洞的說，一定就祇能顧到「人民」或「人民團體」的形式，而不能發見他的內容。即不能指出其由集團對立而表現出來的政治支配。同時，他否認巡捕與縣長等等的政治性，也是由於他不會從集團對立關係來理解政府。其實在它執行國家特殊的公權力，以完成其職務時，巡捕的權力與縣長的行動，就是政治的行動或代表政府的行動。

政府在政治學上的地位，不是孤立的，因而政府的概念，也不能把牠孤立起來說明。它是執行政治任務的，它是國家的機關或形式，而政治則以階層矛盾爲其主要內容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活動及行爲，國家即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對立的統一體。因而政府便不能外於政治與國家之基本的範疇來理解它。

如前所說，由於國家權力的運用，必然發生出一系列的立法、行政、司法等的政治行爲，要司掌這些行爲，必須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機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設官分職，各司其事。這就是政府明確質直的說明。那麼，政府不過是執行政治任務運用國家權力的一種機關罷了。

第二節　政府的歷史性

政府的概念，是不能離開國家與政治的概念，孤立起來說明的，因此，每一時代的政府，都各有它特殊的歷史內容。

例如在近代國家（如前所謂代議制國家）裏面，由於國家權力的運用，發生出了一系列的立法、行政、司法等的政治行爲，同時使發生了專管立法、行政、司法的各種政府機關，然在古代國家、中世國家裏面，雖然政府的執掌，大要也不

用這三種範圍，但決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的「設官分職，各司其事」的，一切政權大概都由一人（君主政治）或少數人（寡頭政治）獨攬。然實際上總是歸一集團獨攬。如在古代，總是奴隸主人，在中世，總是封建地主。所以司法權和立法權，在政府的發展史上，都是經過了長期的變化才成立的。正式法庭的設立，決不是很早的事，就是有了法庭以後，各人是否願意把訴訟提交法庭解決，還是可由各人自已決定。直到以後政府才把許多事件（如屬於刑事方面的）在法律上規定出來非提交法庭解決不可，司法權才算確定。至於立法權的確定比較司法權更晚。所謂立法權，就是由政府制定一種法律把各個人間的關係，主要的是財產關係，確定起來，這一部分叫做私法。另一部分則規定政府的組織，政權的行使，犯罪的處罰等等，叫做公法。而專設一個機關專管這一件事（立法的事），可以說一直到十九世紀才算確定。立法、行政、司法這一系列的政治行為，由立法、行政、司法各種政府機關分擔，在表面上看來，似乎與大權獨攬者不同，而實際上近代行政權仍高於一切，與古代中世國家之一人或少數人獨攬大權者並無所異。自然，近代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近代政府，也是資產階級的政府。這就是說無論在那一個時期之政權或執行政權的政府，在表面上是個人或少數人的，實際上總是集團的。

然則為什麼古代、中世國家的政府組織比較簡單、缺陋，而到近代則不然？這個可以說完全是由於古代、中世社會的經濟組織，社會狀況，都比較簡單缺陋之故，所以政府組織，完全是經濟組織的一個反映。古代社會經濟結構，形成了奴隸主人與奴隸的對立，中世社會經濟結構，形成了封建地主與農奴的對立，兩者都要求着階級的支配，但因古代中世經濟的保守性、固定性、落後性所反映出來的因襲、傳統、迷信等等的束縛，被支配階級的反抗力不能不薄弱，而支配階級的支配機構（即政府組織），也自用不着十分完備。近代由於國家權力之運用而發生出來的一系列的很完整的立法、行政、司法等的政治行為，自然也是近代社會經濟結構的反映。在這裏已用不着多說。

不過古代、中世的政府，因為是不曾有很完整的一系列的政治行為，而且有很完整的一系列的政府組織，在表面上好

像是大權獨攬，於是有人把牠叫做專制政府；而近世政府的組織原則是所謂三權分立，在法律上，各個政府機關的職權也規定得很嚴密，似乎一切都要受一種法的統制，所以有人把牠叫做立憲政府。而且把古代專制政府的支配看得比近代立憲政府的支配還要強。其實政府的本質同是執行階級的支配，階級支配的機構，是隨着經濟組織的發展，階級矛盾的尖銳而日益增強的。我們決不能說前者的支配強過後者，所謂「專制」與「立憲」，不過是名詞的外表罷了。科學的研究，必需從其各種特殊的歷史內容去理解它。

第三節　政府的職權

我們在這裏所說的「政府的職權」，是指國家所賦與於政府的一種權能。如前所說，政府既是執行國家權力的一種機關，則政府的職權，也就是國家的職權。不過國家是一種抽象的東西，牠的職權，不能不假手於政府而行之。然則政府的職權是什麼？則不外是對內對外，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積極的，消極的種種，這是無間於古代，中世，近代政府之一般的原則。至於職權的大小與牠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廣狹，則是要受各個特殊的歷史內容限制的，歸根到底，即是要受各種社會經濟結構的限制。

明乎此，則一般人所說的國權的範圍與政府職權的分配，并因此而吵吵不休者，我們都可以得着適當的解決。例如關於政府職權的範圍與其分配的爭論，有人硬把牠（即不管牠的時間性與空間性）分為個人主義派與社會主義派。說：「個人主義家主張縮小政府的權力；社會主義家都主張擴張政府或團體的權力。個人主義家不信任國家，把國家看作不好的東西，所以極力縮小他的權力範圍，社會主義家却信任社會和國家，把社會和國家看作積極的好東西，所以極力要擴張他的權力範圍。」（見高一涵先生編：政治學綱要一〇二——一〇三頁）。

果真是這樣的嗎？個人主義，是經濟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促進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是自由競爭，經濟上的

個性的自由競爭反映在政治上便拒絕政府的權力在產業方面的干涉。他們主張縮小政府的權力，確是事實，但這是那一個時間（資本主義初期）的經濟條件所要求的如此，並不是「俟諸百世而不惑」的；也祇是歐洲的幾個先進國家（特別是英國）如此，更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社會主義，及社會主義家的產生，自然也不是無條件的，超時空的，社會主義家——一個夠得上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家，決不是無條件的主張擴張政府或國家的權力，也決不是無條件的信任社會和國家，把社會和國家看作積極的好東西。國家社會，或者說政府的職權，一個眞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家，卻祇在可以證實的條件之下才證實牠，而所謂集中國家權力，實行集中支配，它的條件是吸收廣大民衆來參加國家機構，加强政府的實力。而所謂政府，又祇是工人農民執行專政的工具。並且它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永續强有力的支配，而在消滅强有力的支配。

第四節　憲法在政府論中的地位

我們在前面祇籠統的說了政府是一種國家的機關，說牠是執行國家權力的一種機關，但牠決不是各種獨立存在的個別的物體之堆集，而是相互聯繫着的、種有組織的活的有機的統一體。惟其如此，所以牠才能完成其對內對外消極積極之各種任務。如前所說，牠的組織與牠的各種機構完備與否，雖因時代而有不同，但牠是有組織的則無所異。尤其到了近代這個時期，立法、行政、司法各種政府機關的組織如何，他們彼此的聯繫如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組織如何，彼此的聯繫如何，以及各種職權的分配如何，總之，政府的組織，職權的範圍，以及人民的權利、義務等，都需要有一種嚴密的規定。這種規定牠們的東西是什麼呢？這便是所謂憲法。

憲法在近代國家裏面，已經有兩種不同的表現：一是布爾喬亞國家的憲法；一是蘇聯的新憲法。其不同點約如下：

一、布爾喬亞國家憲法的出發點，是認定資本主義制度爲不可動搖的，即此種憲法的基礎主要由資本主義的原則爲其支柱而構成。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及生產手段的私有是憲法所必需保障的，他們站在一切生產手段私

有的原則上，反映此種原則，並以立法確定之。蘇聯新憲法則與此相反，它的出發點，是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的勝利。即蘇聯新憲法的基礎，主要由社會主義的原則爲其支柱而構成。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之社會主義的公有，憲法必需保障之。根據「不作工者不得食」的原則，以工作爲一切健全公民之義務與責任，新憲法反映此類原則，並以立法保障，確定此類原則。

二、布爾喬亞憲法之又一默認的前提，是利害相反的兩社會階層的對立，爲構成社會關係之基本內容。因此，無論任何政黨組織政府，指導社會之權，必屬於布爾喬亞；同時，其所需之憲法，是與布爾喬亞的要求一致的，而尤其在使布爾喬亞社會秩序更加鞏固。蘇聯新憲法則不同，其出發點乃爲下列事實：即社會爲友好的人羣——工人與農民所構成，社會關係已不是以利害相反的兩種人羣的對立爲內容，主持政府的爲工農，社會指導之權，則屬於工人階級，而所需之憲法，則是與廣大勤勞大衆的要求一致的，而尤其鞏固勤勞大衆的社會秩序。

三、布爾喬亞憲法，對於民族與種族的規定不是平等的。在憲法的規定中，有享全部權利之民族，有享部分權利之民族，此外，更有被壓迫剝削的民族與種族，例如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等，此種憲法根本爲侵略的民族主義之憲法，統治民族之憲法。與此種憲法相反，蘇聯的新憲法則爲澈底的國際主義的。其前提爲一切民族種族在憲法上均享平等權利。一切民族，種族，無膚色語言之差別，文化水準或政治水準等均不能作爲規定民族權利不平等之理由。

四、布爾喬亞對於民主主義的着重是形式的。他們一面說全體公民均有同等參政權，但同時立即加以居住、教育、財產等資格的限制。一面說公民權利平等，但立即加以保留，使不適用於婦人，或僅部分的適用於婦女。此爲布爾喬亞憲法之一類，其另一類，甚至公開否認或事實上否認公民權利之平等與民主自由，例如法西斯獨裁。蘇聯新憲法則不然，它是一貫的與澈底的民主主義。因此，對於公民參政權與平等權利，絕無上述限制與保留。新憲法不承認男女間權利的差別，不承認居處有定與居處無定，有產與無產，受過教育與未受過教育等權利上之差別；而認定一切公民權利絕對平等。決定

每一公民之社會地位的，不是財產，民族，性別，官階之不同，而爲其本人的能力與勞動。

五、最後，布爾喬亞於憲法條文上規定了公民權利，但完全不注意如何行使此權利的條件，以及實現此權利的可能與手段。他們誠然說公民平權，但忘却廠主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在事實上的條件不可能平權；他們誠然在憲法上明白規定：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但忘却貧民苟無開會場所，良好的印刷，充分的紙張的利用，一切自由均將變爲空談。蘇聯新憲法則不僅規定形式上的公民權，而且對此種權利給與充分之保障，使確有實現此權利的可能與手段。例如新憲法規定權利平等，它的保障是在蘇聯剝削制度之消滅，社會階級結構之變更；規定公民有工作權，它的保障是在蘇聯沒有經濟恐慌，沒有失業。所以蘇聯新憲法是徹底的民主主義，實質的民主主義。

由兩種憲法形式與實質的不同，便產生了近代政府之各種不同的姿態。

第二章 議會政府（議會政治）

第一節 議會政府的憲法

照我們前面所說，（見國家論第二章）是把代議制國家看做近代國家三種類型之一的。所謂「代議制度」與所謂「議會主義」，「立憲政治」，「民主政治」，這些東西名稱雖異而實則同，總之，他們都是布爾喬亞的政權形式。而執行布爾喬亞政權的政府機關的組織，以及人民權利義務的規定等等，又都是所謂憲法來體現的。這便是上面所說的布爾喬亞憲法。

憲法是所謂一國的根本大法，牠的內容，主要是包括下面幾個部分：一、政府的組織與職權；二、各級政府或一級政府間各機關職權分配的方法；三、人民與政府間的各種權利與義務。有這樣一種具體內容的憲法，當然是近代的產物，但其表現出來的形式却不一樣，普通有所謂：成文憲法，不文憲法，剛性憲法，柔性憲法，欽定憲法，民定憲法等等。就其產生的歷史來說，大概從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洲殖民地對英宣布獨立組織北美聯邦起至一七八九年北美聯邦憲法成立時止，便開始了近代歷史上一個蓬勃的制憲時期，法國的第一次憲法是於一七九一年九月公布的，德意志各邦是於一八一四至一八二九年之間多數採用憲法的，他如西班牙憲法公布於一八一二年，挪威憲法公布於一八一四年，丹麥與荷蘭憲法公布於一八一五年，葡萄牙憲法公布於一八二二年，比利時憲法公布於一八三一年，意大利與瑞士憲法公布於一八四八年，奧大利憲法公布於一八六一年，瑞典憲法公布於一八六六年，總計自一八〇〇年到一八八〇年之內，歐洲各國曾經公布的憲法不下三百餘種，然這種憲法，都是所謂成文憲法，所以近代憲法的形式雖有種種不同，主要的却還是成文憲法佔多數。

以上是歐戰以前所制定的憲法，在歐戰以後，俄德奧三個大帝國，有的經過革命，有的陷於分裂，在舊有的區域內割出了許多新國家，於是就需要新的憲法來重行規定一切，所以在最近十餘年內，又制定了許多種新的成文憲法。如德國、普魯士及其他各邦奧大利，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波蘭、芬蘭、匈牙利、蘇聯各國的憲法，都是在歐戰以後制定的。

在近代立憲國家裏面，民主政治的新觀念，一般都以爲憲法雖有種種形式上的不同。而實際上都是由人民以主權者的資格制定的，并且以人民爲一切之根源。所以美國憲法條文之前還有一個總綱，說明我們合衆國人民爲什麼制定此憲法。波蘭憲法也說明我們波蘭民族爲什麼在波蘭共和國會中制定此憲法。捷克憲法也規定『人民爲捷克共和國一切權力的惟一的源泉』。其他瑞士、比利時等國的憲法，差不多都有類似此等意義之規定。而例外則祇有歐戰以前的德國與日本，他們大概都是把憲法看做是國王制定（即前所謂欽定）的。但白紙黑字的憲法條文規定是一事，而一般人民是否眞爲一切權力之源流又爲一事。我們如果確認了以上兩種憲法的實質，則無論所謂憲法是由人民以主權者的資格來制定或由國王以主權者的資格來制定，而實則所謂主權，祇是布爾喬亞主權，例如在以上各國的成文憲法中，何嘗不列舉人民言論、思想、出版、結社、集會種種權利，而實則全無保障，即無實現此種權利的條件與手段。對於私有財產制的各種權利，各國憲法尤其是給與特別的保障，布爾喬亞憲法的主要精神即在這裏，但這在客觀的事實上，很明顯的就祇有有財產的一小部分人才是憲法所恭謹的嘉賓，其餘大部分沒有財產的人便拋在憲法的圈子外了。

蘇聯的新憲法具有不同的精神，已如上述，這裏不贅。

第二節　布爾喬亞憲法中的人民權利

憲法中的人民權利一部分，在上面雖然偶爾說到，但這是很不夠的。據近代一般政治學者的意見，大概所謂人民權利，即是人民的自由平等。因此英國的老政治學者蒲徠士（Bryce），把人民的自由分爲四種，把人民的平等也分四種：

（一）公民的自由，（Civil Liberty）這是指的人民的身體及財產不受制裁的自由；（二）信仰的自由，（Religion Liberty）這是指的人民對於宗教信仰不受束縛的自由；（三）政治的自由，（Political Liberty）這是指的人民參與政權的自由；（四）個人的自由，（Individual Liberty）這是指的個人在不妨害公共福利的範圍內所有一切的自由。以上是蒲氏所謂四種自由。此外尚有蒲氏所謂四種平等：（一）公民的平等，（Civil Equality）這是指的人民私權的平等，即一切人民在私法上都有平等的資格，如人民的生命財產等項，都受法律平等的保護，如被侵害即有控訴於法庭之權利；（二）政治的平等（Political Equality）這是指人民的公權的平等，即一切人民都有平等的參與政權之權利；（三）社會的平等（Social Equality）這是指的一切人民在社會內無門第財產等階級差別說的；（四）自然的平等（Natural Equality）這是指人類生來都是一樣（如五官等項），所以凡是人類都應平等。

上述種種自由平等的權利，自然都要反映於近代立憲政府的憲法中，而把他們歸納起來，則成為下列三種基本權利：

消極的基本權利：例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住居自由，營業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類是。

二、積極的基本權利，例如一切人民有享受國家設備最小限度教育的權利，老幼殘廢者有享受國家特別救濟的權利，勞動階級及一切勞苦民衆有享受國家特別保護之權利等是。

三、參政權：例如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之類是。

其有明文散見於各國憲法中的，則有如『人類生而平等』。『政治結合之目的，在保存人類天賦權利，即自由權，財產權，生命權，壓迫之反抗權等』。『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全體，任何集團，任何個人，在無明文規定的權力以外，不能行使任何權力』。『法律為一般意志之表現，凡屬市民，皆有直接間接參與制定法律或同意法律之權。法律之前，萬人平等，對於所有稱號，官職，公務，按各人的能力，皆有平等參與權』。『無論何人，在法律規定以外，不受糾問、逮捕、

武裝』，『無論何人，有信教自由，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等』。然而這些都是規定在憲法之中的，這些權利究竟實現了沒有，或實現到了何種程度？最好還是聽蒲徠士的話。他說：『……從前人們希冀政治的平等能夠保障社會上一般的滿足與和平，現在政治的平等已得到了，非但不能保證社會上一般的滿足與和平，反而使有產無產兩階級的懸隔，日甚一日，這兩階級除了投票權的平等之外，再沒有別的平等了。假使國家的行爲仍然不能改良人民的生活狀況，那末，從前人民千辛萬苦所爭到的參政權究竟有什麼用處呢』？（見所著現代民治政體）。

看了蒲氏以上的話，彷彿他是在上面那些自由平等的權利中，特別注重政治的權利，並且以爲政治的平等是已得到了，不過牠不能保證社會上一般的滿足與和平，而且反而使社會階級日益懸隔，何以是這樣子的呢？蒲氏未能發見這種原因，或許是他不願說破這種原因。關於這點，我們在這裏不願多說，因爲在這裏我們是專在指明布爾喬亞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祇是布爾喬亞的權利罷了，但在一般的政治學者中，（蒲氏亦居其一）似乎也曾指出了政治的平等所以不能保證社會上一般的滿足與和平的原因，實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如他們說：『故人類各種平等的理想，應該以經濟的平等的理想做基礎。經濟的平等是地基，其餘的各種平等都是上層的構造，經濟的平等是主因，其餘的各種平等都是結果』。（見高一涵先生著政治學綱要一一九頁）。又說：『現在一般人都相信，人類如果得不到經濟上的平等權，便不能享受政治上的自由權。真正是人人都能平等享受的權利，乃是經濟的基本權利，經濟的基本權利最少也有三種：（一）凡是勞動者生產的東西，都應該完全歸勞動者自己享用，由這個原則上發生出來的權利，便是全勞動收益權。（二）凡生存在社會中的人類，都應該獲得那滿足各人期望的必需品，來維持他的生存。由這個原則上發生出來的權利，便是生存權。（三）凡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該有勞動的機會，由這個原則上發生出來的權利，便是勞動權』。（見前著一三六頁）。

是的！政治的平等是建立於經濟的平等之上，『人類如果得不到經濟上的平等權，便不能享受政治上的自由權』。但怎樣（用怎樣的方法和手段）達到經濟上的平等這一點又是他們不曾明白指示出來的。至於達到了真正的經濟上的平等，

就無所謂政治上的平等，因爲當到了在經濟組織上能夠說眞正平等的時候，那像現在的這種政治組織，已經不復存在了。

第三節　議會政府下的選舉制度

用選舉的方法決定一件事的好壞，決定參加政府組織的人員，偶然的在歷史上可以說老早就有過；但常規的選舉政府人員的全部（代議士及各種官吏）或一部（僅僅限於代議士），并決定政府的政策，卻是近代議會政府的特徵。因爲要有效的合法的來執行選舉，便有所謂選舉制度，在選舉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選舉權與選舉資格。所謂選舉權，就是在法律上（選舉法）被許可參加選舉的一種權利，但須具有選舉資格的人才有選舉權。所以選舉資格，就是用來決定選舉權的。我們在這裏就只想就這一點來說一說。

關於選舉資格在議會政府底下，大概都是有種種限制的，例如宗教的，教育的，社會的，性別的，年齡的，財產的，而財產的限制尤其是嚴重。法國在一八一四年規定年納三百法郎的賦稅與年滿三十八歲的人才有選舉資格；英國，在一八三二年以前規定限於有年値四十先令地產的地主才有選舉資格；美國，日本，意大利等國，都一樣有對於財產及其他的限制。其次，選舉權的限制上，對於性別的限制，即對於女子參政權的限制，一般人都認爲是選舉權歷史上最有興趣的一頁。實則女子選舉權的限制，仍不外是財產限制的副產物。在歐戰以前，世界各國一般是限制女子的選舉權的，雖有少數的國家實行了一部分女子的參政權，但一九〇七年芬蘭憲法的規定，女子必要年滿二十五歲並能納一定數目的賦稅才有選舉權，足見女子選舉權的限制，仍離不了財產限制的這一基本事實；不僅女子選舉權的限制是這樣，其他社會的，教育的，年齡的，宗教的限制，都是這樣。所以我們可以說選舉權的限制，祇有財產的限制是基本的，即一切的限制都是由牠決定的。這種選舉，一般人把牠叫做「限制選舉」。

到了一八四〇年，歐洲開始了成年男女的普遍選舉運動。即開始了打破各種選舉上的限制運動。於是一八四八年法國

憲法規定：凡享有公民權利年滿二十一歲的法國男子都有選舉權。英國一九一八年的選舉法規定：凡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並在選舉區域住滿六月以上的都有選舉權，凡女子年滿三十歲並有住屋一所，或其丈夫有住屋一所亦能有選舉權。美國從一八二〇年起就逐漸廢除種種選舉上的限制，但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才承認全體白種男子都有選舉權，其他如意大利在一九一二年，日本在一九二五年都取銷了選舉上的納稅資格與教育資格。在歐戰以前，如前所說，女子參政的國家是很少的，可是到了戰後，德國一九一九年的新憲法規定年滿二十歲的女子能參與國會選舉，一九二〇年普魯士的憲法規定女子能參與邦選舉，捷克、波蘭、奧大利、愛爾蘭等國的新憲法都有女子參政權的規定。那末，現在有選舉的人算是很普遍了，一切選舉上的限制都打破了，一般人把這種無何等資格限制的選舉，叫做「普通選舉」。

人民的選舉權由限制選舉到普通選舉，可以說是選舉權的「大進步」，「大擴張」，所以有人就把近代代議制度看做是政治上之最民主的形式，甚至於把這一種政治形式看做國家的最後形式，而希圖由議會的多數達到政治上的和平轉變，如果這種看法與這種希圖是與具體的事實相符而有可能，自然是很好的。但所謂普遍選舉無論普通到何種程度，中間總是隔着一層牆壁。這層牆壁正是隔離大多數的勞苦民衆的。事實上在所謂實行普通選舉的國家裏，就明顯的還有下列各種限制，破產的，沒有確定住所的，犯罪的，剝奪了公民權的，受國家慈善機關贍養的，未曾正式在選民單上註册的，都不准其有選舉權，並且在所謂實行普通選舉權的國家裏，縱然在法律上規定了某種人（例如工人）的選舉權，而在事實上故意不予以執行選舉權的機會。（例如選舉不於星期日舉行）則選舉權的意義仍等於零。再現今的代議制政府，因爲執行政府機關的任務的，往往是某一政黨，所以又名政黨政府，而一切選舉可以說都是由政黨操縱，甚至候選人的名單都是由政黨提出，當選舉的時候，選舉人祇能在選舉票上已經列入的候選人中投票，這又無異於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的選舉權。他如選舉運動選舉競爭，勞苦羣衆絕對不能勝過富有勢而且受過教育的人們，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這些基本事實，都充分的證明了布爾喬亞政府所謂普通選舉之欺騙性：這是無足怪的！本來布爾喬亞的德謨克拉西，在牠的全部意義上，都不過是

一切自由主義者愚弄勞苦羣衆的謊話。

在這裏我們可以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來證實在布爾喬亞的國家裏，縱然採用了普選制度，而當選的總是資本家、廠主、大商人、律師、地主等，而決不是工人、農民，例如以一九二五年法蘭西國會選舉的結果來說：議員共六百一十名，其中律師有一六四人，地主有一〇八人，廠主有六二人，言論家有三九人，醫生有三八人，大商人有二六人，學者有三十人，高等官吏有二六人，職員有一九人，軍官、工程師、銀行家共有九一人，而工人只有二一人。

這就是所謂實施「普選法」的布爾喬亞國會的榜樣，在工農人口佔絕對多數的國家，然其國會的成分，尚且如此，其他即可想而知了。

第四節　議會政府的組織原則——三權分立

議會政府通常把政府的組織原則，定為三權分立。所謂三權，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所謂三權分立，即把國家權力之作用，分為立法、行政、司法，而以立法權屬於議會，行政權屬於國家的地方的行政機關，司法權屬於法庭，使各自獨立而互不相侵之謂。在近代極力發揮三權分立論的，首推法蘭西之孟德斯鳩，他著有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一書，即是發揮這一學說的。他說：

『每種政府都有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君主或行政官用第一種權力，來制定暫時的或永久的法律，修改或廢止現行的法律。用第二種權力，來宣戰媾和，派遣或接受公使，保障國內的公安，設備國界的防禦。用第三種權力，來處罰犯罪或裁判個人中間的爭訟。

『人民政治的自由就是指着每人確信自己無發的意志安寧而言。要想得到這種自由，那末，政府的組織一定要使人人不必互相怕懼，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通同放在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手中時，便沒有自由可說，因為將要發生怕懼，

恐怕君主或元老院要制定專制的法律，並且要用專橫的方法去執行他，再如果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不分，也沒有自由可說。倘若司法權與立法權合併，那末，裁判者同時就是立法者，人民的生命和自由便要受專斷的支配。倘若司法權與行政權合併，那末，裁判官便要兇殘了。再如果三種權力放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團體手中，無論他是貴族團體或平民團體，一切事便都完結了。』（見所著法的精神第十一編第六章）。

孟德斯鳩的這一學說出世之後，在當時——十八世紀，幾乎成爲歐美布爾喬亞政治學者及政治家的信條，所以法國革命時代的政府組織，在憲法的規定上，即特別注重這種分權的原理：美國的聯邦憲法和各邦憲法，關於政府組織部分，也都一致的採用這一大原則，其實所謂三權分立，即在當時也不過是騙人的，例如美國的司法官雖然名爲獨立，行政部與司法部雖然名爲分工；但是衆議院有彈劾權，上議院有審判權，這明明是國會也可以行使司法權。到了英國的責任內閣制更加進步，簡直連行政權也收歸議會了。

不錯，英國不是一個以分權制著稱的國家，但就是以分權制著稱的美國，也不是能夠澈底實行三權分立的，所以三權分立，不過是形式上的。實際上一切議會政府組織之根本特徵，乃在於中央集權，通常所謂中央集權，又即是行政權之集中的意義，行政權之超過於立法權與司法權而爲集中的行使之意義。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觀點，一爲追溯代議制政府權力發展之過程，便可知道代議制政府權力之重點，開始是由議會權力，而逐步轉移到行政權力的。即布爾喬亞，首先是爭取議會權力，更進一步才以行政權爲中心而行使其集中的支配以確保其支配地位的。所以不論是以分權制著稱的美國或不以分權制著稱的英國，要之從其政治權力之發展上看來，都是與所謂三權分立說不相符的。

更具體的說，議會政府權力的發展歷史，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即在他的發展過程中，實分着很明顯的兩個步驟：所謂第一步，係以革命的手段成就其準備之一半；第二步則成就其準備之他一半，即第一步奪取議會權力；第二步則奪取行政權力，試看法蘭西的革命，一舉而完成了所謂議會共和國，議會在當時首先奪在布爾喬亞手中，作爲布爾喬亞與封建君主

及貴族鬥爭之有力的武器。但布爾喬亞為要壓服其他之各種階級，確立自己的政治支配，議會已不十分有力，於是馬上體驗到確實掌握自絕對君主政治時代以來之發達的行政機關，為確立其階級支配之不可缺的要素。此後布爾喬亞——不僅是法國的布爾喬亞，就特別感覺行政權的重要。於是不但對外為要壓服其他階級，即在他們自己內部的各派互爭政權的惡戰苦鬥之下，也有了掌握行政權即是掌握政權的意義。

以上可以說把議會政府權力之重點，由議會移於行政機關之論證，已相當的申述了。總之，行政機關之大權，起源於絕對君主專制時代，到了布爾喬亞的政府機關，遂益加大大發揮其機能。這種政府機關之特徵，即所謂中央集權。關於牠的歷史的意義，早在「康民尼斯特宣言」裏面，有一段話說得最好：

『布爾喬亞抑止生產手段、財產、人口之分散，於是人口被集中，生產手段被集中，因之財產也被集積於少數人之手。此必然的結果，便是政權的集中，即政治上之中央集權，牠們——布爾喬亞，把不過形成聯合的種種利害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稅制不同之各獨立地方，努力做成一民族，一政府，一法制，一階級的利益，一關稅的境界之國民。』

這樣的中央集權的政治，自然是以行政權為中心而表現，政府權力之集中化，益加顯露出布爾喬亞專政之本質。所謂三權分立的組織原則，自然是虛偽的東西。

第五節 所謂分職論——由分權到分職

高一涵先生所著政治學綱要說：

『從前的國家是以主權者的資格治人的，所以政府的組織專門注重權力的分配；現在的國家是以事務員的資格治事的，所以政府的組織祇要注重職務的分配。柏拉圖在兩千多年前，便把分工的原理應用到國家的職務上邊去，想造

成專門治國，專門護國，和專門生產的三個階級，好讓國民因才服務，各展各的才能，各練各的技術。但是他的理想從來沒有實現過；就是近代的亞丹斯密，（Adam Smith）也祇把分工的原理應用到工業上邊去，却不曾引伸出來應用到政治上邊去。最近的國家，職務上大生變化，就是治人的權力日見減少，治事的職務日見增多。將來的國家，也許可以同近來的地方自治體一樣，把軍政權、刑罰權等逐漸丟開，專門做公共的事務。到了這時，便沒有分權論存在的餘地，所有政府的組織問題的研究，一定要集中在如何分職一件事上來了。」（見政治學綱要一四九）。

這就是所謂分職論，據高先生說英國社會主義家韋伯（Sidney Webb）有一種計劃，擬將英國的政治組織分為兩院：「一是專管警衛事項的政治議會，一是專管社會產業事項的社會議會。政治議會的職務在辦理外交、殖民、國防、司法等事；社會議會的職務，在決定現在一切人想享受什麼精神的物質的環境。詳細說來，就是：（A）決定目前社會享受什麼種類的文化；（B）對於將來社會，創造一定的文化環境。故社會議會的職權，就在因時制宜的支配全社會的經濟的社會的各種活動。他的主要任務，就在行使私有財產的處分權，生產機關的監督權，財產權，課稅權，教育權，衛生施行權，交通機關的監督權，社會財源的管理權，科學的調查施行權，及關於物價貨幣的支配權等」。

這種分職的方法，又據高先生說：「與從前的三權分立說大不相同。就是一方面把議會分開，一方面又把行政事項分開。政治議會議決的事項，由內閣執行；社會議會議決事項，都不交由內閣執行，祇交由該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執行。各個常設委員會之下，又設立行政各部。而社會議會，常設委員會，及行政各部，對於產業或公益事業，祇行使普通的監督權，實際上的執行，乃在他下面所設的各種事務局。這種分職的辦法，幾乎同工廠分工的辦法相同。這樣分職的原因，就是想增加政府做事的效率。所以從前的分權說，專門注重制衡；現在的分職說，却專門注重效率。從前的分權大部份是想防止政府專制的；現在的分職大部份是想增加政府做事效率的。這就是專門治事的國家，所以生出這種分職學說的原因」。

我們讀了上述的偉論，如果把政府的歷史性丟開不管，現在議會政府是那一歷史內容政府丟開不管，即把議會政府權

力發展的歷史過程丟開不管，那末，分權的政府，的確比之分權的政府，可以算得是一個「好政府」了。但是分權論如上所說，如果祇是一個虛偽的東西，所謂分職論，也不過是小資產者的社會主義家（指韋布）腦海裏面所浮現出來的「蓬萊仙島」。高先生說：『最近的國家，職務上大生變化，就是治人的權力日見減少；治事的職務日見增多』，尤其不是事實。所謂最近的國家，即是前所謂帝國主義國家，我們雖然指出了帝國主義國家之第一個特徵，是經濟與政治的限界，幾歸於消滅，雖然指出國家在現今，不過是全生產過程之管理的實現，但這祇是益發證明帝國主義國家或政府是完全為金融資本家服役，國家與政府，完全帶着經濟上之支配者的金融資本家之執行委員會的性質。再我們指出帝國主義國家之第二個特徵，是行政機關之強大化，官僚羣及軍隊比較任何時代都要擴大而成為國家權力之中樞。這種強大的官僚羣與強大的海陸空軍隊，是專治事而不治人的嗎？并且我們在前面曾說：『特別是帝國主義時期，偉大的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由單純壟斷的資本主義進到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這時期表現出國家機關之異常的鞏固。官僚和軍事機關的空前的發展，益發表示對於勞苦大衆抑壓之增大。這些現象，無論在君主國或在最自由的共和國裏，都無所異。』

第六節　行政機關組織的三種形式——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

我們在前面說議會政府權力的重點，是由議會而逐漸轉移到行政機關的，又說帝國主義國家之第二個特徵，是行政機關之強大化，所以我們在這裏特先把所謂行政機關組織的三種形式提出來加以說明。所謂行政機關組織的三種形式，便是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

（1）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大概行政組織採用單獨制的就是所謂總統制，現在的君主國家君主雖然是一國的元首，但在實際上已經不是行政部的真正元首。總統制的特點，就其與政府其他機關，如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來說，就在牠與立法機關完全分立，行政元首的選舉在憲法上既有特別規定，他的權限也明白規定在憲法之內，所

以行政元首的政策、任期，都非立法機關所能過問。而行政元首以下的內閣閣員，則直接由行政元首任命，直接受行政元首的指揮監督，直接對於行政元首負責。因之所有閣員均不能同時兼任議會議員，甚至於不能出席議會，答覆議會質問。這就是說閣員的行政行爲均不對議會負責。因此就是閣員的行爲和政策，不爲議會所同意，議會也不能使用不信任投票權，使他們去職。他們在任期中祇能由總統根據憲法上的權力自由罷免，並不負有連帶上的責任。倘若議會對於公共政策的意見，與總統和內閣不合，總統既不能解散議會，請求選民公判，議會也不能要求總統去職。並且有往往總統屬於這一黨，而議員的多數則屬於那一黨的事。據說：美國是行總統制成功的國家，所以美國的布爾壽亞學者，常常稱道總統制的好處。

再所謂總統制也有好幾種：一、行政元首對於議會祇有政治上的獨立，其他法律事項，還須受議會的彈劾；二、行政元首對於議會完全獨立，無論犯了輕罪重罪，議會都不能彈劾；三、除非犯了叛逆罪要受議會彈劾之外，其餘的權力一概離議會而獨立。

（2）內閣制。（Cabinet System）近代各國的行政組織，除上述總統制外，還有與總統制恰相對應的內閣制。內閣制所不同於總統制的，就在他是與立法機關聯成一氣。凡行內閣制的國家，實際上的行政元首就是內閣。一切政治上的設施，直接對議會負責，間接對於選民團體負責。至於總統即名義上的行政元首，却站在沒有責任的地位。通例內閣的閣員，同時就是議會的議員，就是在議會中多數黨的領袖。非同時兼任議會議員的閣員，也有出席議會的特權。簡單說：就是內閣與議會打成一片，由他們組織起來做實際上的行政元首，凡名義上的行政元首之一切政治行爲，必要由他們副署，才能發生法律上的效力。他們對於立法機關提出預算案及其他重要議案，議會在每一會期中所通過的議案，大部分總是由內閣發議的，故採用內閣制的國家，與其說是議會控制內閣，不如說是內閣控制議會。因爲多數黨的領袖，既都是內閣的閣員，而議會議員不過是他們的黨徒，所以實際上議會祇有聽內閣的指揮操縱。但是

在有一種時候，如果內閣不得他的黨徒所信任，即不爲議會中多數黨員所信任，否決內閣所提出的議案，或對於他投不信任票，使祗有兩條路可走：一、閣員負連帶責任，全體辭職；一、解散議會，訴諸選民。在解散議會重行選舉之後，如果政府黨仍佔多數，內閣自然繼續執政；如果反對黨佔多數，內閣便須讓位。據說：英國是內閣制的發源地，許多年來都是由議會中多數黨組閣，所以這種行政組織，又有人把牠叫做「議會政府制」。（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採用這種制度的國家是很多的，例如荷蘭、法蘭西、比利時、瑞典、挪威、丹麥、希臘、日本都是。

（3）委員制。在以上所述兩種行政機關的組織外，即總統制，內閣制外，還有所謂委員制。委員制的特點，就在行政權和立法權完全合而爲一。行總統制的國家，行政權與立法權互相對峙，誰也不能支配誰；行內閣制的國家，雖然有行政立法打成一片的事實，但是在法律上行政立法兩部仍是分立的。至於採用委員制的國家，立法行政的大權往往同在一個最高的議會，議會選出自己相信的人員，委託他們去組織行政部。這個行政部是事事聽命於議會的，祗許行政權隸屬於立法權之下，絕不許行政權與立法權相對抗。故立法部與行政部的關係，是主從的關係。委員由議會選舉而來，他的職務由議會委託，或事先受以意旨，或事後予以撤消。這種樣式的行政部，關於國家行政的職權，不是由一個首領行使，祗由一個衆人合組的合議團體行使。組織這個合議團體的分子，彼此都立在平等的地位上，法律上的權限彼此都是一樣的。雖然也有一個人做形式上的首領，可是權限卻不見得就優越於其他委員。所以這個制度，一方面和總統制不同，一方面又和內閣制不同。採用委員制的國家，就是瑞士。現在蘇聯雖然也是採用委員制的政府組織，但牠與瑞士的委員制，祗是形式上的偶合，在本質上是絕不相同的。

以上所述行政機關的三種形式，祗不過是三種形式罷了。實際上無論是總統制也好，內閣制也好，委員制也好，都是就行使國統治權利的機關。所謂那一種制度較之那一種制度好，那一種形式較之那一種形式優，祗是在執行支配的効率上，支配者自己在互較短長，在被支配者看來，除了支配的程度有深淺外，正是無關休戚。並且從行政機關之日趨強大化

一點來檢討上述三種行政組織，似乎所謂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在帝國主義時代都成了過去的東西。即現在的政府，正在走向法西斯蒂主義，而暴露其布爾喬亞獨裁的本質。例如在歐戰時，以內閣制著稱的英國，便實行了所謂各黨的聯合內閣，又有所謂「國民政府」，「超然內閣」，「舉國一致內閣」出現。而倣行內閣制之日本，最近也不斷的發生法西斯蒂的暴動暗殺事件，自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內閣總理犬養毅被暗殺後，也組織了齋藤實的所謂超然內閣，舉國一致內閣，所謂「國民政府」，「超然內閣」，「舉國一致內閣」，實則即所謂法西斯蒂內閣，布爾喬亞獨裁制的露骨表現。老實說：就是以明目張膽的獨裁制代替了假面具的隱蔽獨裁的內閣制。一般人所標榜着的內閣制，既然到現在不過是有名無實了，其餘所謂總統制、委員制，自然也都是一種形式而已。

第七節　立法機關的組織——議會

上節已將行政機關組織的三種形式加以說述了，現在進而說述立法機關的組織，即議會的組織。關於議會的組織，大概採用兩種最通行的制度：即所謂兩院制（Bicameral System）與一院制（Unicameral System）。採用兩院制的國家尤佔多數，採用一院制者，卻祇有捷克斯拉夫、芬蘭，以及德國聯邦中幾個小邦而已。

關於一院制與兩院制的利弊，一般政治學者曾各持理由嗷嗷不休，茲略爲介紹如左：

主張兩院制的人說：兩院制能夠救濟議事的輕躁，所謂四隻眼總比兩隻眼看得更多更好，兩院制能夠限制專斷，兩院制能夠調劑進步，兩院制能夠維持行政部的獨立，兩院制能夠代表階級的利益等等。主張一院制的人也有許多理由，例如他們以爲一院制能夠使責任明確，一院制能夠使民意統一，一院制能夠使議事敏捷等等。但這也不過如我們在前面所說，是支配者自己在想到他們該如何執行支配時候的一種互較短長的事，我們可以不必深論。

但不管採用一院制的國家也好，採用兩院制的國家也好，都是所謂採用議會制度的國家。而議會議員的選舉，大概又

多採所謂「屬地主義」的制度。即各國選舉議員，爲便利起見，多把全國分爲若干選舉區，而採用分區投票制。分區選舉明明所採的是屬地主義。又議會的議員，在名義上是全體國民的代表，而實際上則祇能代表毫無組織的個人本身，不是代表有組織的一羣個人中間公共的某種特定的利益。於是弊端百出，在他們自己也感覺到，而有下列一串他們自己最適行的「自我批判」：

（一）議會往往不能代表眞正的輿論：因爲議會的任期，不是五年，便是四年，離選舉的日期過遠，故不能代表民衆最近的感情和意見。

（二）議會的選舉往往爲特殊勢力所左右，利誘威迫，都所不免，故不能代表眞正民衆的意見。

（三）議員的選舉以政黨爲運動的主力，故往往便宜了黨內的庸人，而一般品行高潔和思想獨立的人，都不大願意就政黨的範圍，所以不得當選。

（四）議員由政黨指名，而政黨的經費多得實業界的資助，故當選者往往重視物質的後援者或出資者的私意見，而漠視民衆的眞意見。

（五）議員因圖謀當選，往往一味阿附選舉人，甚至於不擇手段，用種種欺騙或詭辯的方法。

（六）議員爲政客所獨占，故往往以爭權奪利爲主，不把民衆的利益放在心上。

（七）議員因由屬地主義而選出，故多注目選舉區的利益，而不注意到全體社會的利益。

（八）現在的議會多不能適合社會生活的實際狀況。現代社會生活分成種種經濟集團，在橫斷的國民主義之上立腳的議會，往往不能代表縱斷的經濟生活。

（九）爲政客大本營的議會，事實上不得不變成野心家的集合所，辯論家的舌戰場，而且人多嘴雜，責任不明。

（十）議會制度不過是布爾喬亞的假民治制度。

——以上十項，見高一涵先生所著政治學綱要一八五——一八六頁。

就以上所說看來，議會制度已是很明顯的走上了崩潰的路。但爲救濟以上的弊害和議會本身的崩潰起見，一般政治學者以及所謂政治家，似乎有種種新的辦法提出，即所謂議會制度的新趨勢。而最主要的便是所謂職業代表制。這種辦法，據他們說，就是把從前屬地、屬人代表制，變成利益代表制。而近來採用職業代表制的方式，計有兩種：即一、德國式的職業代表制，二、俄國式的職業代表制。把俄國的職業代表制與德國的職業代表制并舉，這正如他們把俄國的委員制與瑞士等國的委員制併爲一談，一樣是有意識的淆亂是非。我們現在祇就德國式的職業代表制介紹一下：

德國一九一九年的新憲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區經濟會議及中央經濟會議的組織，應令全國各重要職業團體，均有選出代表的權利』。一九二〇年五月的暫行中央經濟會議組織法中，規定：中央經濟會議由三百二十六名代表組織而成，代表名額按照十個團體分配：一、農林，六十八人；二、園業，漁業，六人；三、工業，六十八人；四、商業，銀行業，保險業，四十四人；五、交通業，公益事業，三十四人；六、手工業，三十六人；七、官吏，專門家，十六人；八、消費團體，三十人；九、德意志各聯邦，十二人；十、德意志共和國，十二人。總共三百二十六人，若把這三百二十六個代表，再加以分類，則可歸納爲下列四類：

（一）各企業的雇主的代表；

（二）各勞工團體的代表；

（三）消費團體的代表；

（四）政府的代表。

但在這裏我們要知道，德國除了這個採用職業代表制的經濟會議外，仍有一個採用地域代表制的普通會議。并且這個經濟會議的代表成分是資本家與政府代表佔多數，而這樣一個不健全的經濟會議，還祇能對於經濟立法與社會立法有建議

權和審議權。這所代表的還是少數人的利益，所以資產階級的議會，無論是採取地域代表制，職業代表制，仍不失爲一個執行布爾喬亞支配的機關。然這種職業代表制在希特勒執政以後，都已經沒有了。

第八節　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的組織，顯然是與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組織不同的。立法機關的組織是兩院制或一院制的會議，而立法的權力是寄託在許多議員手上；行政機關的組織是上面所說的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而行政的權力是寄託在一個人或少數人手上，但有許多國家實際上總是放在一個人手上。司法機關的組織形式，是司法權力一方面既不放在一個人手中，一方面又不放在多數人手中，通常由幾個法官，有時組織一個單獨法庭，有時組織一個合議法庭，來審判各種案件。據說近代各國法庭的組織很有一點像一個尖形寶塔，下面有多數初級法庭，按照人口多寡和事務繁簡的原則，分佈於全國；頂上有一個全國最高的法庭，處理各種上訴的案件。

關於各種案件，不待說，例由法官組織單獨法庭或合議法庭裁判，但也有採用人民陪審制度的。現在的英國，便是一例。英國的陪審制度是以普通人民爲陪審官，受法官的指導，以審查判決那些關於民刑訴訟事實問題。陪審官十二人，在發生案件的地方，由有一定財產的戶主之中，用抽籤法選出，判決須得全體一致的同意。但訴訟人有正當的理由，有拒絕某人爲陪審官的權利。陪審官的職務以審查事實問題爲主，法官便就那由證據所證明的事項而下判決。法官宣告法律的適用；陪審官則審查事實，以決定犯罪之有無或輕重。前者是需要專門知識的；後者祇要有普通常識便行。一般政治學者以爲把專門知識與普通常識結合起來，便可以維持裁判的公平。

但這都是屬於一般的問題，而代議制政府的司法機關的特點，却在司法機關的獨立。一般政治學者對於這一特點，是極端稱讚的。例如高一涵先生在其所著政治學綱要中說：

「凡是組織完善的政府，能夠使人民的一切權利得到極鞏固的保障，便當然要有個獨立的司法機關，專管一切司法的事件。如果沒有司法機關來解釋法律，適用法律，裁判爭訟，保障權利，或者有別的機關代行司法機關的權限，便要毀壞人民的自由。在君主國中，固然要有獨立的司法機關，以防止君主濫用威權去侵害人民的權利；就是在共和國中，在實際經驗上，也要有獨立的司法機關，以防止專橫的政黨侵犯法律和憲法。法庭比較別的政府機關都可靠，就因為他程序確定，組織完備，不容易為個人偏見和羣衆感情所搖動。……」（見政治學綱要三二一——三二二頁）。

上面一段話，對於司法機關的獨立，可謂為極其禮讚之能事了。但在實際上司法權是否真能獨立，法庭是否真能離開其他政治機關而行使其獨立的機能？究不能不成為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在近代國家裏，代議制政府的司法機關，是支配者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場執行其階級支配的最根本的權力機關之一，不受集團利害的影響，不為個人的偏見和羣衆感情所搖動，而能完全獨立的執行其公平裁判的法庭是不會有的。布爾喬亞社會的裁判是以支配者的利益為中心的裁判。

在布爾喬亞社會裏，不僅為一國之根本法的憲法，是以支配者的利益為中心，即各種私法，如民法、商法等，也是以支配者的利益為中心。法律是社會的產物，在各種法律的條文裏，都充分的反映着現存的社會關係。現存的社會關係，是治者抑壓被治者的關係，因之法律不外是治者的一種工具，司法權決不能獨立於社會關係之外。

以上種種，止是布爾喬亞憲法根本精神及上述各種特徵之澈底的反映。

第三章　法西斯獨裁政府

第一節　法西斯主義的特徵

根據上述布爾喬亞憲法的根本精神，議會政府，或說議會政治，民主政治，本來只是形式或外貌，然而隨着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垂死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許多帝國主義國家都走到法西斯的獨裁了。尤其當戰後第一期資本主義直接革命危機緊張的時候，例如當一九二二年時，法西斯主義首先就乘意大利革命危機尖銳化而革命陣營的力量尚未鞏固時，以暴力奪取了意大利政權。一九二九年以來，普遍於全世界的深刻的經濟、政治危機，動搖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法西斯便愈加瘋狂起來。一九三三年德意志希特勒的爬上德國政治舞台，日帝國主義趨於法西斯化，都是很顯然的事實。

除上述意、德、日外，法西斯還在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取得了全部的或部分的政權，乃至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都存在着深刻的法西斯的危險。即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正在威脅着全世界，首先是以非法的獨裁的政府姿態，威脅工人集團，革命的農民階層，小布爾喬亞階層以及一切愛好和平正義的人們。

有人把法西斯主義看做超階級的政權或政府，又有人以爲法西斯政府，是小布爾喬亞專政，這是錯誤的。它的特徵是什麼呢？——是否認議會政治的暴力獨裁制。議會政治的政府形式，本是布爾喬亞的政權形式，但現在已不能適應金融資本家的需要。所以在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中，議會早已成了廢物，一切政權都握在法西斯黨領袖的手中。但法西斯的獨裁決不能與無產者的獨裁相混，無產者的獨裁是極大多數人對於少數反革命者的獨裁，實則極富於民主的色彩；而法西斯的獨裁，卻是少數寡頭用暴力壓迫大多數人民，慕索里尼與希特勒就是權力的源泉；一是擁護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法西

斯上台執政，爲利用一部分羣衆——農民，小布爾喬亞，甚至一部分落後工人，它也不得不標榜着「反對資本」，「拯救祖國」，「代表全民」等政綱；但它是受着金融資本家的資助與維護的，也只在未上台前或政權尚未穩定時，口頭說說而已；等到它政權穩定之後，就立刻把他們那種爲資本家謀利益，擁護資本制度的恐怖主義的面目暴露無遺。三是虛僞的全體主義，即它在表面上否認社會階層的對立，而大吹其所謂全體和諧的全體主義。在「全體主義」的美名之下，禁止工人組織工會，禁止工人爲自己利益的罷工運動，禁止革命羣衆的革命鬥爭。四是國粹至上主義，即法西斯政府對於本國的一切東西，都無批判的加以推崇，尤其把腐朽的中世紀的骸骨——神學的玄祕的一切東西，當着實物翻掘出來，阻止一切科學的進步的東西，而對於外來的優良文化則無條件的加以排斥。此外在所謂優生學的觀點上，推崇本民族爲天之驕子，製造野蠻的排外運動，尤其是希特勒殘酷的排猶運動。五是戰爭狂。因爲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所形成的深刻的社會矛盾，只有戰爭可以解決。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的絕對原則，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愈加嚴重，便使得日、德、意等法西斯國家，必然的走到絕望的軍事冒險，『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這句名言，正是描繪它的戰爭狂的，

以上法西斯主義的各種特徵，它們之間卻不是各個孤立的，它是在擁護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一根本特徵上把各種特徵聯繫起來的。

第二節 法西斯主義的先決條件及其定義

法西斯獨裁政府形成的先決條件，簡言之有三：一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極端動搖，惟其如此，所以它適應這種客觀的需要，起來擁護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二是中間階層的貧窮化，惟其如此，所以它能利用農民、小布爾喬亞，甚至殺落後的一部分工人對於現狀的不滿，標榜欺騙的政綱，很迅速的形成一種政治上的勢力；三是下層民衆直接革命的威脅，惟其如此，所以爲要鎭壓革命運動，決非採取過去的合法手段所能奏效，即非迅速拋棄虛僞的民主政治的假面具不可。所以它對

於下層民衆革命的壓迫是澈底的公開的暴力壓迫」。

然則法西斯主義到底是什麼呢？關於它的定義，各人的說法都不相同。即法西斯主義的創始者對法西斯主義所下的定義，也是空泛而不着邊際的。例如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的精髓，是在國家的觀念中。試看他在意大利百科全書法西斯主義一項下說：『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是國家的觀念，這是它的特性，它的責任，它的目的。法西斯主義認國家是絕對的，所有的個人與團體，同這比較起來，都是相對的』。這些話只能說明法西斯主義的制裁性。非但空泛不切實際，而且是不正確的。此外有許多人說：法西斯主義是有派的獨裁制。這種說法也不對。因為歷史上有許多有派獨裁的事實，如中國秦始皇的專制，過去帝俄的專制等等，都不能說是法西斯主義。另外還有人說：法西斯的上台執政，只不過是一個布爾喬亞政府代替另一個布爾喬亞政府，好像二者之間沒有什麼分別，其實這是大不相同的。法西斯的執政實是表示由布爾喬亞統治的某一種國家形式——政府，轉換另一種國家形式——政府。這就是說以布爾喬亞的公開專政代替了布爾喬亞的形式民主。法西斯的政治與形式的民主政治，雖同為布爾喬亞統治的政權方式，但二者却有公開與隱掩的不同。

因此，法西斯的正確意義，我們只有從它的發展過程中去找解釋。法西斯主義之所以產生並能發展到相當力量，是有着如前所說三個先決條件，即：一、資本主義的極度動搖；二、中間階層的貧窮化；三、勞苦大衆革命勢力的發展。很明顯的，在歐戰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一個暫時穩定的時期後，就踏入經濟總危機的階段。這個泛濫世界之經濟總危機的洪流，使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發生極度的動搖。在這大洪濤中不但大布爾喬亞受到很大的打擊，就是中產階層也受到很大的損失。中產階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本來是向着兩極分化的，即小部分資產化，大部分無產化，再加以空前的經濟的總危機的來臨，更使他們只有走到無產赤貧的深淵去。同時，在世界經濟恐慌的狂潮下，勞苦大衆只有失業，只有飢餓，只有革命是惟一的出路，更是不成問題的。以上三者匯集起來，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根本的威脅，他們看到自己地位的危險，自然要多方想法挽救。而他們所用的方法，就是吸收中間階層的分子，用武力去壓迫革命的力量，藉以挽救資

本主義垂死的命運。這樣，法西斯主義就產生了。所以法西斯主義，就是現代布爾喬亞到了垂危的時期，利用貧窮化的中間階層，以制止革命勢力的抬頭，而圖挽救資本制度之最後企圖的一種反動的政治形態。

從上面的分析中，也許有人以為法西斯主義的產生，中間階層的地位非常重要。但無論如何，法西斯是金融資本家所資助與養育長大的，中間階層只被騙而受利用。所以季米特洛夫，在討論法西斯主義的報告中，綜合法西斯各種特徵，曾經說過：「法西斯主義就是財政資本自己的專政」。并在最後的結論中說：「法西斯主義就是布爾喬亞向勞動羣眾施行的最殘酷的進攻，就是橫行無忌的民族侵略主義和強盜的戰爭」。

第三節　法西斯的組合國家及政治上的恐怖

法西斯政府是擁護垂死的資本制度為布爾喬亞服務的，但為吸收一部分工農及小布爾喬亞羣眾，不但曾用過很動聽的政綱去實行騙術，而且還造出所謂「組合國家」的政府形式去阻礙革命勢力的發展。「組合國家」的重要意義，就是要承認生產領域內私人企業對於國家利益的重要，工人應與廠主積極合作，增進生產，因此，絕對禁止工人組織獨立的工會，發動罷工。以上是一九二七年意大利勞動憲章的根本精神，而一九三四年頒布的德國勞動法，也有同樣的規定。所以法西斯主義組合國家的實質，即在破壞工人獨立的組織，壓迫革命的工人，農民及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尤其是橫在眼前特殊的深刻的經濟恐慌。

然而結果怎樣呢？德意的經濟狀況，自法西斯執政後，不但沒有改善，而且日趨惡化。波蘭時報對於法西斯波蘭的經濟狀況，還有如下一段描寫：

「波蘭農民現在所使用的辦法，可說只是中古時代才採用過的辦法。他們買不起火柴，將火留在火爐裏，把它借給鄰居用，把一根火柴切成好幾片；他們買不起肥皂，互相借用污濁的肥皂水；沒有鹽吃，把鹹魚桶放在水裏，養出

鹹水來。這并不是謠言，而是農村的實況，每個人都可以相信的』。

此外政治上的恐怖，尤其是駭人聽聞。據說：『在法西斯德國的苦工營裏，格斯譜波（暗探局）地下室裏，在波蘭的監獄裏，在保加利亞和芬蘭的暗探局裏，在南斯拉夫的監牢裏，在羅馬尼亞的大獄裏，在意大利的囚人島上，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革命農民，爲人類光明前途而奮鬥的戰士，每天所遭受的那種惡毒的拷打和侮辱，就是俄皇暗探局的最殘忍的刑罰也是望塵莫及的。萬惡的德國法西斯主義，把男人當着他們妻子的面前切成肉醬，把殺死的兒子的屍灰用信包寄給他們的母親。強割睾丸已經變成法西斯所慣用的鬥爭手段。在刑房裏面，法西斯強迫被捕的反法西斯的戰士打毒針，打斷他們的手足，挖去他們的眼睛，吊打他們，用水灌入他們的鼻孔，在他們的活身體上用刀刻出法西斯卍字形來』。（見反戰反法西斯鬥爭的當前問題八——九頁）。

另外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一個統計材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德國、波蘭、意國、奧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國，被殺者、受傷者、被捕者、成殘廢者、被拷打者，究竟有多少。單就德國一國而言，在國家社會黨人執政期內，被殺的人就有四千二百以上，被捕的人數，有三十一萬七千八百，受傷的或受嚴刑的人數，有二十一萬八千六百以上。所有這些難民，都是反法西斯的工人、農民、職員、知識分子。……在奧國，從去年二月戰鬥時期起，基督教的法西斯政府，殺死了一千九百個，打傷了一萬個，逮捕了四萬個革命工人（當然指未被併於德以前）。』（見前書九——十頁）。

這種政治上的恐怖，眞是空前絕後的，這便是法西斯專政的實質。

第四節　法西斯主義的前途

法西斯運動，如上所說，一時籠罩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最近德、意、日法西斯之瘋狂侵略——德併奧，吞捷；意既征服了阿比西尼亞，復野獸似的佔領阿爾巴尼亞；日寇無止境的進攻中國，轟炸中國不設防城市，姦淫擄劫，無所不用其

梅，似乎整個世界人們的命運都操持在他們慘無人道的屠刀下，生或死，一切都要他們來決定。然而究其實際，法西斯的政權是不牢固的。因爲它在目前，不僅是勞工階層的敵人，而且是革命的農民、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及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正義的人的最凶殘的仇敵。

首先，由於法西斯之露骨的反動性，不顧一切地建立殘暴酷虐的政治壟斷權，用暴力消滅國內各政黨，禁止工人的活動，結果不僅沒有克服布爾喬亞營壘內的矛盾，反而加深了國內各階層的矛盾及布爾喬亞間的矛盾。例如在目前的德國，不僅工農大衆是反對希特勒的，甚至布爾喬亞自由主義者，也很多是反對希特勒的。法西斯雖盡忠於金融寡頭使金融寡頭不需要的各個政黨沒有公開存在的可能，可是它絕對不能制止革命的政黨祕密的存在。

其次，由於法西斯主義實行最反動的民族侵略主義，不僅引起了被壓迫被侵略民族堅決的抵抗，例如過去西班牙、阿比西尼亞，乃至亞爾巴尼亞，現在中國繼續不斷的英勇的抗戰，而且更有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這句話是千眞萬確的。

最後，由於法西斯未執政前之無恥的欺騙宣傳與執政後之盡情的掠奪、搶劫、屠殺的暴行，使得羣衆一天一天認識他們的眞面目，離開它，痛惡它，不斷的縮小它的羣衆基礎，甚至起來與之作積極的鬥爭，亦即助長了羣衆革命化的過程，促成反法西斯的大聯合，這就是法西斯本身所包含的炸藥。

試看法西斯現在已迫使各國下層大衆與其他民主勢力結合成爲反法西斯的廣大統一戰線。各國工農和民主制度的擁護者不能不起來爲保衛民主、和平而戰，一切被侵略民族也不能不起來爲反法西斯侵略保衛民族獨立自由而戰了。

第四章 蘇維埃政府

第一節 蘇維埃政府是普羅專政的國家形式

蘇維埃政府是一種新式組織，因爲它是普羅專政的國家形式，普羅列塔利亞需要打破布爾喬亞的國家機器，用普羅民主去代替布爾喬亞民主，所以它需要一種新式的政府組織，不僅能用普羅民主去代替布爾喬亞民主，而且成爲普羅國家的政權基礎。這種新式的組織，就是蘇維埃。蘇維埃與舊式組織——即布爾喬亞民主政府比較起來，有什麼優點呢？

一、蘇維埃是最包括普羅列塔利亞及廣大羣衆的組織。

二、蘇維埃不僅包括工農羣衆，而且包括海、陸、空軍的兵士及知識分子等一切勞苦羣衆的組織。而在廣大羣衆中，蘇維埃是最便利於普羅列塔利亞對羣衆革命鬥爭政治領導的工具。

三、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中之最强有力的推動機，例如革命時領導實行武裝起義，革命勝利後實行普羅專政的任務。

四、蘇維埃是羣衆自身的直接組織——是羣衆最民主的而又是最有權威的組織。它最能發揚羣衆革命的積極性，最能把廣大羣衆吸收來參加國家的管理。

五、蘇維埃是各級的，由下而上的，由各個地方蘇維埃聯合而成的政府組織，主要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權組織。

所以蘇維埃是政權組織的一種嶄新的形式，它與舊的布爾喬亞民主的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它的專政與所謂法西斯獨裁，並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它是一種新形式的政權，是最適合於普羅專政的任務的。不過並非只有普羅專政，可以採取

蘇維埃的形式，即民主革命階段的工農民主專政，亦是可以採取蘇維埃的形式的。

以上是蘇維埃的優點，此外它還有它所獨具的特徵：

第一、它在社會階級存在的條件下，能保證最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有最廣大的民主，它是大多數人民的政權，它的專政是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

第二、它在有階級的社會中，有國家、民族之間隔的社會中，蘇維埃政權組織是一切國家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它反對并粉碎一切民族壓迫，它使各民族自願聯團結成爲一個親密的聯盟，所謂蘇聯就是五十多個大小民族親密團結的大聯邦。

第三、蘇維埃如前所說把立法、司法、行政等權合併爲統一的政府組織。并且以生產單位（如工廠、農場、機關、學校等）的選舉制來代替區域的選舉制，它使工農羣衆和政府機關直接聯繫起來。

第四、它能使軍隊脫離對於布爾喬亞指揮的服從，使工農與軍隊真正聯合起來，創制出强有力的工農紅軍，保障社會主義的勝利。

第五、只有蘇維埃才能一下子澈底破壞舊的布爾喬亞的官僚機關與司法機關，而組織成新的普羅專政的政府與法庭等等。

第六、只有蘇維埃才能吸收廣大羣衆參加國家的管理，充實國家力量，集中行使强有力的政權，準備國家的衰亡。

蘇維埃政權形式，是普羅專政的國家形式。

第二節　蘇維埃政府與普羅專政的系統

蘇維埃政府是普羅專政的形式，普羅專政，在蘇聯不是共產黨的專政，也不僅僅只靠蘇維埃政府。它是一個整體的一

系列的系統組織。不過在這一系統組織裏，有領導的或指導的力量，有轉動的輪帶及起重的槓桿等作用或意義之不同。

什麼是普羅專政系統組織裏的這些「輪帶」或「槓桿」呢？又什麼是「指導或領導力量」呢？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輪帶或槓桿，就是黨外、政府外的一些羣衆組織，如果沒有這些羣衆組織，或政府不藉助於這些羣衆組織，就不能實現專政。指導力量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先進部隊，即普羅列塔利亞政黨。這種指導力量，即主力及其副次的力量，即助力，是普羅列塔利亞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它們（主力及助力），普羅列塔利亞在它爭取勝利的鬥爭中，在有嚴密的組織和有完備武裝的布爾喬亞面前，便會成為沒有武裝的赤手空拳的軍隊。這些組織是普羅專政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普羅列塔利亞在為推翻布爾喬亞的鬥爭中，在為鞏固自己政權的鬥爭中，在為建設社會主義鬥爭中，便會遭受不可免的失敗。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的職工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支部，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及其他組織。職工會聯合所有一切職業的工人——這不是黨，不是政府，而是全體工人的組織，從這樣的組織中訓練自己，把自己隊伍裏的優秀分子提拔出來，作所有一切部門與的管理工作，幫助政府，并把工人階級中的前進分子與落後分子聯繫起來，把工人與黨與政府與其他羣衆聯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農民所有的各種合作社及其在各地的支脈。這是農民羣衆的組織，不是黨，不是政府，但這種組織把農民聯合起來——最初把他們以消費者（消費合作社）的資格聯合起來，然後就把他們以生產者（集體農莊以及其他生產合作社）的資格聯合起來。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在廣大的建設時期，這種合作社有極重大的意義。它使黨與農民羣衆的聯結緊密，并吸收農民來參加政府的社會主義建設。

第三、這就是工農青年的羣衆組織，在蘇聯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它不是黨與政府的組織，但它是很接近於黨的組

織。它的任務就在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青年，代替普羅列塔利亞的其他一切羣衆組織，造就一些供給所有一切管理部門工作的青年後備隊，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在對於一切青年羣衆廣大文化教育工作時期，它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第四、這就是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無產羣衆的先鋒隊。它的力量，就在於它把所有無產羣衆中的優秀分子都吸收在自己的隊伍中來。它的任務，就在統一無產羣衆的工作并指導他們的行動，使他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走，向着解放自己的目的走。這種統一和指導，對於無產羣衆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革命鬥爭的一致，奪取政權的步驟，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普羅列塔利亞政黨，才能統一和指導無產羣衆工作，才能完成蘇維埃政府專政系統組織中基本領導的作用。

第五，最後，這就是蘇維埃政府及其在中央和各地方的無數支脈——即在中央和各地方的蘇維埃。蘇維埃是普羅專政的直接表現形式，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來實行的。工人羣衆對於農民及其他羣衆的領導，也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羣衆和黨與政府聯結起來。

第三節　蘇維埃政府普羅專政的任務

蘇維埃專政，是普羅專政的形式，但它所要完成的任務是什麼呢？這裏必需明確的指出，約言之，有如下各點：

第一，是要鎮壓已被推翻的布爾喬亞反抗，即消滅他的復辟的企圖。工人奪取了政權和公有了工廠、作坊、土地、森林，礦山及其他一切生產工具和手段以後，便以為可以安心樂意去睡覺，認為一切工作都作完了，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新社會，就可以自然的到來，這是很大的錯誤。如果俄國的十月革命，革命工人不是很快的就組織了自己的國家和政府，以及軍事力量來壓倒革命的敵人，那麼，俄國的革命就不會保持最後的勝利。再則要是以為那被推翻的資本家、地

主，會自願放棄已得的權利，無條件的來服從新制度，那更是笑話。恰恰相反，他們一定會拚命反抗工人革命的政權，因為他們在初失敗時，還有國際的幫助，還保存一些事實上傳統上的優勢——例如他們還有錢，還有管理政治的技術知識。而且革命後的小商品生產也還能產生資本主義出來。所以他們的反抗的力量，一時還沒有完全被消滅。他們會竭其所有力量來恢復自己的統治而鬥爭，他們還會建立反革命軍隊，進行國內戰爭，進行各種搗亂破壞來反對專政。

所以得到革命勝利的工人羣衆，就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建立強有力的普羅專政。蘇聯二十年來不僅能維持自己的蘇維埃政權，而且還粉碎了敵人一切反革命運動，就是因為它建立了自己的蘇維埃政權。

第二，它是要團結全體勞動羣衆，把他們加以革命的改造並改造工人自己。因為要鎮壓反革命者的反抗，為要擊退他們對於蘇維埃政權的進攻，工人就應該與其他廣大羣衆團結起來，共同的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社會。但需注意，其他廣大羣衆，例如農民，他們的本身就不是一致的。在俄國革命勝利之後，農村還有貧農、中農、富農。

貧農是半無產者——因為它一半是工人，一半是農民。自然他們是很願意而且馬上就與工人結成友軍共同進行鬥爭。但是中農有向兩極的分化的可能，即向上極走到富農，向下極走到無產者。雖然他們也受富農的某些剝削，但也不能阻止他們向上極爬的幻想。而他們又是占大多數的基本的羣衆，所以當工人政權尚未達到消滅富農階段之前，必需要向中農證明或保障：資本主義的路，不是一條有利的路，中農惟一有利的路是社會主義的路，集體農莊的路。工人政權不僅要在口頭上而且要在實際上感化中農，改造中農。

工人政權領導中農走上了集體農莊的道路，工人不但在鬥爭與建設中改造了中農，同時，也改造了自己。蘇維埃政府要用一切方法去鞏固工人與農民的聯盟，經過合作社和蘇維埃吸收他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這是蘇維埃政府專政的第二個任務。

第三，它是要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為着進到社會主義就必需有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即工業化。此外，必需有

大規模社會主義的農業，即國有農莊，集體農莊的擴大。然而這就需要普羅專政的蘇維埃政府來有計劃地進行與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把社會主義的生產大大地提高起來，把城市中及農村中資本主義分子（如小商人與富農）消滅下去，并且把一切反革命派，例如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等的搗亂、破壞，竭力防止肅清。

在一切剝削者和一般階級消滅以後，工人自己還要消除資本主義舊社會的習慣，改造自己的生活、意識，使自己的一切思想行動都效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使自己盡一切力量去建設和鞏固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主義社會。

以上就是蘇維埃政府專政的任務。

第四節　規定在蘇聯憲法中的國家權力、政府職權及人民之權利義務

蘇聯的新憲法，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由全蘇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的。但它還有一種舊憲法製定於一九二四年。新憲法是反映它從一九二四——一九三六年來經濟體系和社會階級結構巨大變遷的一種法律形態。試就規定於新舊憲法中的東西，作一比較研究如左：

第一、蘇維埃政府之經濟基礎，我們可以在關於公有財產和個人私有財產之明確規定中看出來。蘇聯舊憲法分上下兩篇，其中所規定的，完全是關於中央各機關和加盟共和國地方機關的權限，而關於社會制度和財產的何者公有，何者個人所有，都沒有明文規定。新憲法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蘇聯為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條），『土地及蘊藏、水流、森林、工廠、作坊、煤井、鑛礦、鐵路、水上及空中運輸事業、銀行、電信事業，國家舉辦的大規模農業企業與夫城市和工業中心的公用事業和房產，均為國家財產，亦即全體人民的財產』（第六條），凡公民個人『勞動收入和儲蓄，住宅和家庭附屬業務，家用品和家俱，個人消費品和便利用品』，均為個人私有。這些私有均受法律保護，并有繼承權。

第二、關於國家組織的變更，舊憲法中加入蘇聯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只有七個，即：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

俄羅斯、南高加索聯邦、土克門、烏茲列克、達吉克。新憲法則有十一個。即將南高加索聯邦取消，把構成它的亞美尼亞、喬治亞、阿才倍疆改爲獨立共和國，直接加入蘇聯；此外，並將從前屬於俄羅斯聯邦的卡查爾和去爾去斯兩個自治共和國，亦改爲獨立共和國，直接加入蘇聯。這樣，連舊有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土克門、烏茲列克、達吉克算上，便是十一個。它的特點是鄭重規定：『各加盟共和國保留自由退出蘇聯之權』。（第十七條）它們的領土，非經同意不得變更。

第三，是關於國家權力機關的改變。舊憲法規定，蘇聯最高權力機關爲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爲大會所舉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舊憲法中，中央和地方的權限，立法機關和執行機關的權限，都是混在一起的。新憲法則將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取消，改設最高會議爲最高權力機關，而最高會議則由聯邦院和民族院組成。聯邦院是由蘇聯公民按選舉區選舉代表來組成的，計每三十萬人中選舉代表一人；民族院是由各加盟共和國，各自治共和國及各民族區選舉代表組成的。計每一加盟共和國選舉代表二十五人，每一自治共和國選舉代表十一人，每一自治省選舉代表五人，每一民族區選舉代表一人。兩院享有同等權力，兩院舉行聯席會議，選舉最高會議主席團。最高會議任期四年，依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完全執行蘇聯的立法權；最高會議主席團依第四十九條之規定，則執行國家元首的職權。最高執行和命令機關，則爲聯盟人民委員會和其下所設各種人民委員部。於此可以看出新憲法之更邁於民主化，因已將立法與行政各種職權重加分配故。

第四，是關於選舉制度的改革。舊憲法凡年滿十八歲的男女和紅軍兵士，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至於資本家、地主、大商人、富農、僧侶，以及帝俄官吏、警察等，都沒有選舉和被選權。新憲法則規定：『凡年滿十八歲的蘇聯公民，除精神缺陷者及被法院剝奪選舉權者外，不分所屬色種、民族、信仰、性別、教育程度、住居年數、社會出身、財產狀況、及過去活動，均有選舉和被選舉權』。舊憲法關於選舉權之行使，工農是不平等的，即工人在政治上比農民佔優越地位；新

憲法已撤除此種不平等。舊憲法同於各級蘇維埃選舉，採用間接選舉法；新憲法規定：『代表選舉採直接制』。舊憲法採取公開提名通過方法；新憲法則改行祕密投票制。

第五、是關於司法權的改革。舊憲法司法權并非獨立的；新憲法則規定：『法官獨立，僅服從法律』；『檢查官亦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地方機關的干涉』。并規定一切裁判事務，專屬於法院管轄，審判用公開方式，且採陪審制。

第六、是關於公民權利義務的明確規定。舊憲法祇說一切公民有勞動的義務和集會、結社、及言論的自由，其他各項義務和權利，并無明白規定；新憲法則列舉公民有工作權、休息權、生活保障權、及教育權，且『公民身體有不受侵犯保障，任何公民，非經法院裁可或經檢察官批准，不受逮究』。關於公民義務方面，新憲法規定，『每個公民須保護及鞏固公共的社會主義財產』，『捍衛祖國』，『凡背叛祖國，違犯誓言，投降敵人，損害國家軍事實力，替外國作間諜者，都看做最大罪惡，受法律最嚴厲的制裁』。（以上請參考張仲實編譯生活書店出版蘇聯新憲法研究）。

蘇聯新憲法關於上述各點，都充分表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而其特徵正如上面所說：它是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徹底的實質的民主主義的。

第五章　民主與獨裁

上面所說政府的各種形式：第一，所謂議會政府，它在憲法中的規定，是民主的。如所謂主權在民，最高權屬於國會，政府組織採三權分立制，人民有政治上的各種自由——言論、思想、集會、結社、出版、住居、營業、信仰之各種自由。雖然由於布爾喬亞之集團覺性，憲法中的各種民主規定不能不受限制，布爾喬亞的民主，只是形式的民主，然它却確實的佔領了歷史上一個重要階段，成爲一時的支配的政治形態，即它在近代史上也盡過它進步的革命的任務，完成了它歷史的使命。所謂民主、民權、民治，只是一個名詞。它的譯名都是「德謨克拉西」。但無論什麼名詞，——民主亦然，是有它的歷史內容的，是發展的，不是一個絕對的抽象物，亦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歷史上有古代式的民主，有布爾喬亞的民主，更有普羅列塔利亞的民主。由低度的狹隘的形式的民主，發展而爲高度的或接近實質的民主，正是歷史的進步。因此，布爾喬亞的民主也必然要占領一個歷史的階段而表現它的某種進步性。

第二，所謂法西斯政府，它是表示由布爾喬亞統治的某一種國家形式替換另一種國家形式，這就是說它以布爾喬亞之公開專政（獨裁）代替了布爾喬亞的形式民主。它爲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鎮壓勞苦羣衆直接革命的威脅，不能不把布爾喬民主的假面具揭開，不能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所以布爾喬亞憲法及一般法律的規定，在法西斯看來，都是一些絆腳絆手的東西，尤其是議會政治的饒舌，各黨各派的自由活動，政客黨士的縱橫捭闔，及其他什麼言論、思想等等的自由，都是法西斯認爲最討厭的東西，故不惜一一加以摧毀。本來所謂獨裁（專政）不是別的，它是在新形式中社會對抗手段之繼續，它的正確意義是表示出不是依據法律而是依據於強力（暴力）的無限制的政權，法西斯獨裁是依據金融寡頭力量的一種無限制的政權。布爾喬亞的民主，因爲它還具有形式的民主，所以法西斯必需摧殘它；又因爲它只是形式的民主

（實質是布爾喬亞獨裁，）所以勞苦群衆也認爲不大滿足。然而站在勞苦大衆的立場，是不是說，爭取民主的鬥爭會是根本的錯誤。不，絕不，相反的，若勞苦群衆不爲民主制作普遍的鬥爭，則不能準備自己去戰勝布爾喬亞，尤其在法西斯蠻情絞殺布爾喬亞民主的現階段，保障民主的鬥爭幾成爲目前全世界人類共同的課題。

第三，所謂蘇維埃政府，它也是公開的專政——普羅列塔利亞專政。但這種專政（獨裁）是與法西斯獨裁有着本質上的不同的。它的專政是依據於廣大群衆的力量的無限制的政權，是壓制暴力者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有利於廣大群衆的專政。而專政的本質還不僅是在對暴力者剝削者和壓迫者與以無情的制裁，并且是在群衆的組織與領導在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專政是以建設社會主義，消滅階級對立和消除一切剝削基礎爲目的。這是專政，也是民主；且是高度的進步性的民主，距離實質的民主甚近，與布爾喬亞形式的民主逈不相同。正如中山先生所說，不是少數人的民主而是廣大多數人的民主。一九三六年頒布的蘇聯新憲法，充分反映了蘇維埃政府自成立以來所達到的和取得的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績，同時，也充分反映了大多數人民主的實質。因爲它規定了普遍的、直接的、祕密的、選舉法，并規定了每個公民都享受工作權、休息權、教育權；且給與物質經濟條件的保證，徹始徹終貫徹了眞正的惟一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精神。然而它這樣做，決不是減少普羅專政的力量，恰恰相反，正是擴大和鞏固普羅專政的力量。把廣大群衆吸收進來參加國家管理，把專政建築在大衆忠心的擁護上，正是等於把政權的韁索拿在一隻手內那樣穩定而牢固。

這樣，我們便可斷言：「民主與獨裁」決不是兩不相容的絕對的兩極，而是相反相成互相滲透的辯證的對立的統一物。布爾喬亞的民主，是形式的低級的民主，然而它是可以在新的歷史內容之下發展爲實質的高級的民主的。普羅列亞利亞的專政，同時，也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只有法西斯獨裁（對於金融寡頭也可以說是民主），一方面是絞殺布爾喬亞形式的民主，另一方面又是與大衆爲敵阻塞社會主義民主之路而把法西斯獨裁本身亦陷於無出路的絕境的。它正在以瘋狂的姿態，威脅着全世界的民主制度及民主政府，所以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必需結成堅牢的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各盡其力的來粉

碎它。例如有的國家如蘇聯，應該積極的發揮民主制度；有的國家如英、法應當盡量的爭取民主的前途或保持民主的精神；有的國家即如法西斯德、意、日的民衆，亦應當爲民主而與本國的法西斯政權鬥爭；再如中國，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更應當努力爭取民主并創建自己的新式民主制。

第六章　中國的政府

中國的政府，顯然沒有典型的布爾喬亞的民主歷史——即不可能形成典型的布爾喬亞的議會政府，這是與它不可能是一面性的布爾喬亞國家相符合的；同時，在另一方面，它也沒有普羅專政或社會主義的民主歷史——即在目前它還沒有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決不可能形成普羅專政的社會主義政府。至於由資本主義垂死的階段所反映出來的法西斯獨裁，更與中國歷史發展的本質無緣——因為法西斯獨裁的前提條件，是：『資本主義的極度動搖，中間階層的貧窮化，勞苦大眾革命勢力的抬頭』，而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社會，它的政治出路是廣大民眾的反帝，反封建——各階層的民族統一戰線。現在是三民主義革命最後階段「抗戰建國」的民族統一戰線，那麼，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民主，或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民主怎樣呢？甚至於歷史上所謂拿破崙主義的「第三政權」怎樣呢？這在中國歷史也不會有。因為它一方面不是布爾喬亞一面性的國家，同時，在另一方面也不是封建領主集團一面性的國家。中國的歷史條件，決定中國各社會階層，有同時要求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特殊性。關於這一點，著者與黃松齡、馬哲民兩氏集體寫成的貢獻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一文中由黃松齡氏執筆的一部分論之最詳。他說：

『中國國民黨上述諸特徵表現於政權上面，規定了國民政府的特殊任務。國民政府這種政權，在形式上頗類似於西方近代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謂「第三政權」，（按即前述拿破崙主義——著者註）。像法國大革命後所形成的拿破崙第一政權；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後在法國形成的拿破崙第三政權；稍後又在德國形成的畢士馬克政權，以及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形成之克倫斯基政府；但實質上則完全不同。拿破崙第一政權，建立在資產階級、小市民，以及廣大農民各種矛盾均衡之上，用以抵抗壓制國內外封建勢力的反動，保持大革命的果實；而它的主要任務是代表資產

階級利益，發展資本主義前途。拿破崙第三與畢士馬克政權，建立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均衡之上，主要任務在於將無產階級利益拘限於資產階級利益之中，以扶助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過拿破崙第三是用較廣大的民主制度，畢士馬克則用改良的社會政策，作爲矛盾調節的機構，有所不同罷了。克倫斯基政府，則更包含有地主的成份，只是形式上比沙皇較爲民主。因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勢力，突進發展，故其命運比其他第三政權特短。國民政府，則是建立在以下層勞動民衆爲中心的各階層共同利害關係之上，代表以下層民衆爲中心的各階層共同利益。其基本任務，在於遵照三民主義，確立一定方針，通過一長期的革命與建設過程，使各階層的利害矛盾，適應着每一過程，得到合理的解決；同時，更能有機地互相滲透融和向新的前途轉化。換言之，國民黨政權是從有產性走到社會性，從多階層內容之全民形式走到無階層差別之全民實質的一種有無限發展性的政權。這與西方現在已經有（法國，西班牙——那時西班牙政府軍還未失敗——著者註）將來更要發展的聯合政權，與今後世界革命已經合流，具有相同的歷史意義與任務。不過一則是代表西方式的革命政權；一則代表東方式的革命政權。在內容上所代表的階層略有廣狹不同；在形式上它是由人民陣線表現爲各黨派并行的聯合政權；國民黨政權，則是以國民黨爲領導，容納各黨派於三民主義體系之中和統一在一個民族戰線之內所組織的國民黨統一政府』。（見成都新民報增刊半月座談）。

不錯，中國的政府，正是所謂具有特殊任務和特殊歷史內容的政府。它符合着中國歷史——半殖民地革命歷史發展的本質，它更符合着當前「抗戰建國」的任務。這一特殊性早已包含在孫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裏。關於政府部分的，乃是五權憲法的遺教。

孫中山先生在研究歐美各國憲法後，他說：『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立一種新制度，叫做「五權分立」，「這就是人人都知道的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五權。他更詳細地加以解釋說：『大家要曉得五權憲法是兄弟創造的，五權憲法好像一部大機器。……如果要治理一個新國家，就不能不用這個新機關的五權憲法。……除了憲法上規定五權分

官之外，最要緊的就是縣自治，行使直接民權，能夠有直接民權，才算是真正的民權。……五權憲法好像是一架機器，直接民權，便是這架大機器的掣扣。人民要有直接民權，要有能官權。……甚麼叫做創制權呢？人民要做一種事業，要有公意可以創訂一種法律。……甚麼叫做複決權呢？立法院定好了法律……要人民加以複決，這個法律才是能夠通過了』。

建築在五權憲法，直接民權基礎上的政府，當然是不同於上述各種形式的政府，而是以下層大衆為中心，符合於下層大衆利益的新式民主政府。所以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孫中山先生更具體地確定建設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辦法。第一條便說：『國民政府本革命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第二條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第三條：『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第四條：『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政府當抵禦之；并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國際地位，國家獨立』。

此外關於人民權利之保障，孫中山先生尤為重視。在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中，他又提出了許多保障民權的條款，如：『實行普遍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對於勞工、農民、婦女、兒童之權利，亦莫不有明文規定。

這都是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他的「建國大綱」，他的「對內對外政策」，和他的整個主張一樣，是處處以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為前提的，是處處以工農大衆利益為中心的。所以『國民黨政權，必然是從有產性走到社會性、從多階層內容之全民形式走到無階層差別之全民實質的一種有無限發展性的政權』。而在抗戰建國的當前，『國民黨政權，則是以國民黨為領導，容納各黨派於三民主義體系之中和統一在一個民族戰線之內所組織的國民黨統一政府』。

這是由孫中山先生選教產生、發展所必然達到的革命的東方式的政府形態。

第五編　政黨論

第一章 政黨的概念

一切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都是社會發展過程的產物。政黨便是社會階層對立尖銳化到了近代社會所產生出來的東西。因爲一切社會鬥爭，都是政治鬥爭，而政治鬥爭之最完成、最統一的形態，便是政黨的鬥爭。

那末，政黨是什麼？換言之，政黨的概念如何？也許有人以爲這個問題已沒有討論之必要了，實際却不是這樣的。因爲在論述關於社會現象之科學的定義或其概念時，即論述和人類關係最多的各方面之科學的定義或其概念時，在階級社會中，往往因一部分人社會存在的不同而反映在他們的社會意識上，便發生出正相反對的見解。例如有人說：

『政黨是爲在政治社會佔優勢凡爲繼續其優勢之有一定意見的人類爲共同的活動之任意的繼續的結合』。

『政黨是以參與國家政務爲目的而結合之自由團體』。

『政黨是關於政權之掌握有共同利害關係的人們，以共同之力在立憲政治下爲掌握政權而結合之永續的集團』。

以上各種說法，很明顯的是代表一部分人的社會存在所決定的社會意識。由這種社會意識所給與之黨的各個概念，在表面上看來雖各有不同，而實則有一個本質相同的共同點，這便是他們不從社會關係來理解政黨，把政黨看做超階層的，從政黨裏面抽出其階層性，而拿什麼「一定之意見」，「參與國家政務之目的，」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抹殺政黨之本質的現象。關於這一點，下面一段話，說得最好。他說：

『諸君！布爾喬亞科學，關於黨這個名詞的定義，是非常含糊的，他們的代表者，很少明言黨是社會鬥爭的組織，這一簡單的，誰也明白的眞理，布爾喬亞學者們，却和避免指摘議會及教會之本質同一理由，不欲且不能加以承認。布爾喬亞制度，在牠的性質上，迫得牠有把一切制度都變爲有利於普羅列塔利亞階級之籠罩——而成爲階層調停

機關之必要。他們努力使這個成爲輿論，使自身也假作取了這樣的形態，決不使發生階層鬥爭的現象』。

如上所說，足見關於政黨是什麼的問題，布爾喬亞的政治學者只給與了極含糊的定義或概念。這不僅限於布爾喬亞學者呢？對於政黨之正確的科學的觀念未曾切實理解的人們正多着哩！政黨論之首要的任務，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然則政黨究竟是什麼呢？

所謂黨這個名詞，英語叫做「party」，原是從拉丁語「pars」這一字來的。意譯就是部分的意思。因此黨便是一部分。我們在前面說過，政黨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尤其是近代階級社會的產物，因此黨便是一定階級之一部分。然而僅是這樣說法還不充分，因爲階級之爲物，就大體說來，雖然是等質的、一律的、完整的，但就個個分子加以分析，則他們的智力、體力，及其階級意識或階級覺悟，總不免有許多差異。爲使這個包含有種種不同分子的階級，全體從事於有效的鬥爭，指導的部分便成爲必要。不用說，這一負擔指導鬥爭的一部分，必然是全階級中最有階級覺悟、最能團結、又最勇於爲本階級利益奮鬥之一部分。這一部分便是政黨，因此我們可得出如下之明確的、科學的、政黨之概念。

『所謂政黨，是一定階級之一部分，且是全階級中最有階級覺悟、最能團結，又最勇於爲本階級利益奮鬥之一部分。概括言之，牠便是由全階級中之先進分子結集而成之指導社會鬥爭的組織』。

這樣說來，足見政黨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的指導部分，打一個比方說，牠便是階級的頭腦，階級的先鋒。這一政黨的概念，不僅是適用於某一階級之政黨的概念，而且是適用於一切階級之政黨的概念。

第二章 政黨的形成過程

我們在前面曾說過，政黨是階級社會的產物。那麼，是否社會一有了階級對立便有政黨呢？不，有了階級對立的社會，不一定就是有了政黨的社會。任何社會產物，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現成東西，牠必然要經過發生到成長的形成過程。就階級的本身說牠的產生是要經過一定的階段的，而產生牠的歷史的前提則有如下幾項：

一、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餘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係上社會的不平等一天比一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的舞台。

政黨由發生到成長的形成過程，我們固然也可以說牠是隨伴着階級由發生到成長的形成過程。但不能說有階級的社會都有政黨，古代社會，封建社會，是有階級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却無我們現在所要探究的政黨。在中國過去歷史上的漢之黨錮、宋之洛、蜀、朔，清之牛、李，明之東林，絕不是我們現在所要探究的政黨；在歐洲過去歷史上的希臘、羅馬之貴族黨、平民黨，中古意大利城市之教皇黨、皇帝黨，十七世紀英國之保皇黨、議員黨，也絕不是我們現在所要探究的政黨。固然自從原始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於新的有階級對立的歷史時代，每一階級都有隨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變化而爭取其階級利益之必要，但奴隸與農奴，却不可能具有明確的政治意識，甚至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爲實現政綱奪取政權而奮鬥，即他們不可能結成政黨，爬上統治者的地位。

前面說了，政黨鬥爭，是政治鬥爭之最完成、最統一的形態。然則政治鬥爭而取着政黨的形式，必然要在什麼時候才能見到呢？這必然是要在近代社會，因爲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牠的基礎——經濟構造，才能容受較完整的各種上層建

築，例如政治、法制、意識形態等等，政黨必需在某一階級感覺到政治鬥爭之必要，而且有了鬥爭，指導的科學，以及政綱、政策、策略、戰術，才能有政治的組織，即政黨的組織。

像這樣的一種政黨，近代意義的一種政黨，是要以「階級的自覺」做條件的。任何社會的階級對立，都是基於階級利益的對立，但對於本階級一般的、基礎的利益之理解，却不是隨着階級地位而即刻便能意識到的。第一、由經濟結構中的矛盾所反映出來之階級利益的矛盾，祇有在較進一步的發展階段上才能暴露出來；第二、階級不是從天上掉下的現成東西，牠是由「許多不齊一的社會層次發綴分化出來的；第三、任何階級要有階級自覺，必需經過其存在在及其歷史舞台上鬥爭之一定時期。第四、支配階級對於其被支配階級，往往用人工的有計畫的方法去摧殘被支配階級之階級自覺的萌芽。所有這些情形都歸結到這樣一種形態，即某一階級已經存在着，但自覺的階級却還不存在。階級是存在了，但尚缺乏階級意識，這即是不自覺的階級，這一種不自覺的階級，即前面所說「自在的階級」，（Class in Itself）然而無論如何，階級意識在最終是必然伴着既成社會內在的矛盾之深刻化而次第增進的，即因種種的鬥爭經驗，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終於要達到自覺的程度，這一種自覺的階級，即前面所說「自爲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

等到被壓迫階級，亦即代表新生產力的階級，在鬥爭的過程中，由自在的階級進到自爲的階級，同時牠必然要造成自己鬥爭的組織，即領導本階級全體羣衆的那種戰鬥組織。這一組織便是近代意義的政黨。這一組織正是用來與壓迫階級之國家組織相對抗的。因爲國家組織的存在，便是證明壓迫階級已經成爲一個「自爲的階級」，一種國家政權的行使，便是證明壓迫階級對於其基本利益之充分的覺悟，壓迫階級是以一切國家機關爲工具去與被壓迫階級作戰的。在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惡戰苦鬥的當間，被壓迫階級也祇有最有效的適用牠那與國家組織相對抗的組織即政黨組織，才能與他的敵人應戰，一旦革命爆發或國內戰爭到來之時，這種政黨的組織，便將要衝破敵人的陣線而成爲新的國家機關之雛形的組織。我們試拿資產階級革命做例，法蘭西大革命時的人民黨或雅各賓(Jacobin)黨，這是最初的立憲同志會……他們是建立於以啓

衆人民爲目的的基礎上，以爲宣傳比行動重要；但是環境逼迫他們轉入政治漩渦，並直接參加行政。我們再拿無產階級革命做例，在俄國大革命期間，工人與兵士的戰鬥組織——蘇維埃(Soviet)和工人的政黨組織——布爾塞維克(Bolshevik)便成了新國家的基本組織。

由上所說，我們便可得到一個很明確的結論：政黨之形成過程是伴隨着階級之由『自在的階級』進到『自爲的階級』的形成過程的。

第三章 階級、政黨、領袖

當我們說到政黨是以階級的自覺做條件時，就可以看出政黨與階級是有如何不可分離的關係。我們必須很透徹的理解階級，才能很透徹的理解政黨階級是什麼？我們在前面已比較充分的說明過，在這裏不再贅。

在有了階級的社會，便必然要發生社會鬥爭，而一切社會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政黨的鬥爭是政治鬥爭之最完成、最統一的形態。爲什麼甲階級與乙階級作戰時必須有政黨來指導呢？換言之，甲階級與乙階級本身爲什麼不能直接作戰而必須有政黨這一指導作戰的組織呢？這就因爲任何階級，決非均等同一的全體，即在一階級內必有自覺的分子與落後的分子，試一考察現代之勞動階級，其自覺的程度決不一致，其自覺的階級意識，常爲一階級內的小行會、小團體、小幫口等意識所掩蔽，所以一階級中的一切分子和一切層次，決不能在同等的速度內自覺自己是一個階級，自覺自己階級的利益與別種階級的利益是相反的。由先進的分子引導落後的分子到自覺的階級的路上去，必是一個無盡頭的過程。總之所謂共同地位，共同利害，階級的一致，祇是相對的，即以這一階級與那一階級相對比，就其對外說，這一階級或那一階級，自然都是一個特殊的一致的人們的集團，如就一個階級的內部再來分析一下，即就其對內說，必然會表現出許多幫口、行會等諸社會層次不一致的現象，這種不一致的現象，便是各自利害關係的不同。於是牠們（各小社會層）最先便祇能看見牠們各自的利益，而不能看見全階級的總利益。這便是一階級內之「不同性」，一階級內有了這樣的不同性，就是政黨成爲必要的原因。所以一定階級之一部分，必然要形成一個特殊的組織——政黨，所謂一定階級之一部分，必然也就是前面所說的最覺悟、最英勇、最進步、最有訓練而又最能團結之一部分。

假定我們認爲任何階級都是完全的、絕對的、均一的，那牠們隨時都有動員全體羣衆的可能，牠們隨時都可以獨出[illegible]

當的人或集團以任一切行動的指導，或輪流着擔任一切行動的指導，這樣一種常任指導機關便將成爲贅物而不必要了。但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鬥爭的指導，在敵人的力量愈是强大時，更几是必要。

由上述我們已知道階級的不同性，便是這一階級所以有政黨必要的原因。實則一切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不僅在一個階級內部表現出幫口、行會、小團體等等的不同性，就是一個階級的先鋒，即指導階級作戰的政黨 牠的內部也有智力不等、前進落後、利害相反種種的不同性存在。所以拿政黨與階級相對的說，自然政黨是較有自覺的一致的一部分，可是單就政黨本身絕對的說，則正與我們考察階級時相同。既然如此，專靠政黨本身仍然不能指導作戰，即政黨內部的分子仍然不能隨時選出適當的人或集團以任一切行動的指導，或彼此輪流着担任行動的指導。這樣一種常任指導的人物——政黨的領袖就成爲必要。領袖的任務，就在於劃一全體黨員的意志，排除其不同性而正確的執行黨的政治路線。這樣，政黨內部不同性，便是這一政黨所以有領袖之必要的原因。但領袖必須以階級、政黨的全部利益爲出發點，才能完成他的任務。

綜上所說，階級、政黨、領袖，三者是對立的，因爲政黨不就是階級，政黨的領袖不就是政黨。但同時又是統一的，因爲政黨必依存於階級，政黨的領袖必依存於政黨。政黨、政黨的領袖，在領導階級作戰時，因此其相互間便非有極緊密極適當之關係不可。因爲政黨與階級的關係，即是黨員與非黨員的關係。黨員對於非黨員大衆，一方面必須領導和指揮，一方面必須教育與說服，缺乏教育與說服是不能夠領導的。再則一方面黨必須要自己團結着而成爲極堅實的階級之一部分；一方面牠又必須日益緊密的同非黨員羣衆聯繫起來，而把廣大的非黨員羣衆盡量的吸收到自己組織的周圍。

第四章　政黨的種類

我們如果承認近代意義的政黨，是以階級的自覺做條件，則我們便不能把牠看做社會的自然生長的東西，牠必然是含着社會的各個經濟集團（階級）的目的意識性，某一政黨的一切行動，一定就是社會的某一經濟集團利益，即某一階級利益的代表者。然而社會發展到了最近代——帝國主義時代，政黨的組織特別發達，政黨的名目與派別也特別繁複，一般人看到政黨的名目與派別之繁複便因為弄不清楚的緣故而作了許多形式的浮面的分類，於是拿什麼地域、信仰、種族、政見等關係的不同，認為是政黨有種種不同的根據，於是便把政黨分為地域的政黨，宗教的政黨，民族的政黨，政見的政黨等，同時，又拿思想的不同而把政黨分為：一、極右黨——立憲保守黨，二、右黨——立憲自由黨，三、左黨——社會民主黨；四、極左黨——社會革命黨等。但我們如果要從政黨的本質上觀察，則對於政黨的分類，畢竟祇能以其組織的核心階級為主眼，所以無論有多少政黨，無論有多少名稱，牠的目的性却極簡單，總之為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而出現。那末，我們要說明政黨的種類是離不開階級的種類的，關於階級的分類，在前節是列舉了：

一、某社會形態內之基本階級；

二、從屬階級；

三、知識分子；

四、游離分子。

階級的分類有這麼許多，政黨的分類也應該有這麼許多。不過嚴格的說來，上舉三、四、兩項，並算不得是一種階級，牠們決不能獨立的為擁護自己的利益而形成一種鬥爭的組織。祇有上舉一項基本的階級對立，在資本主義社會，便是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牠們才能組織各自的政黨，爲各自的利益而鬥爭。由基本的階級對立，必然要形成主幹的政黨對立，這便是布爾喬亞（Bourgeois）政黨與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n）政黨。再上舉三項的從屬階級與三項的知識分子，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都是向兩個基本階級的兩端分解，都是站在兩個基本階級的中間動搖不定，但因牠們各自的特殊性而形成一種改良主義的政黨之可能。智識分子是社會上佔數的腦力勞動者，牠是因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展的結果而形成的，牠的腦力勞動對於社會生產是起組織作用的，所以在社會中也有不小的力量。雖然牠也和從屬階級一樣，有時向兩極分化。例如銀行經理、大學教授、律師、醫生等收入較多的智識分子，很接近資產階級或已資產階級化；下級職員、小學教員等收入較少的智識分子，很少與工人有區別，然牠仍保存有牠自己的特點，有牠自己的社會形像。因爲牠們是有智識的，就常以爲高出資本家和工人之上而欲站在超階級的地位以調和勞資爲己任。但資本主義日趨崩潰，經濟恐慌，工商業凋落，腦力勞動者的過剩，必然趨使一部分智識分子，跑到無產者的陣營來，加入無產者鬥爭的黨，但這卻就是在工人政黨中組成左右個機會主義和調和派的幹部人才。另外所謂從屬階級，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牠是封建生產方法之殘餘，牠與智識分子的分別，是在於牠依賴於生產手段的小私有之上。因爲手工業者與農民，正是有一定的財產關係的。在實際上有一大部分的小資產階級，差不多比無產階級還生活得壞些，所以不斷的向工人階級補充，也有一小部分的人逐漸昇到資本家隊伍中去。所以牠動搖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性，也和智識分子一樣。我們在這一點可以說從屬階級與智識分子都是一個中間的集團。小手工業者，農民，牠在自己勞動而不剝削他人一點，是相當同情於無產階級的；但在私有（雖然很小）方面，牠的意識卻是接近於資產階級的。因此從小生產的條件中造成了牠們典型的個人主義。牠們的大部分因無產階級化，雖然也不能不加入無產者的陣營，如西歐有許多破產的小手工業者加入所謂社會黨，然而這也正和智識分子一樣祇造成了機會主義政黨的基礎。（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擁有一個時期的統計，八五〇、〇〇〇黨員，其中便有三五〇、〇〇〇是智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這一種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的政黨，也可以把牠叫做小布爾喬亞政黨。

這樣說來，我們拿階級做政黨分類的主眼，則不論政黨的名目與派別怎樣繁複，牠的類別卻極簡單，即：

一、布爾喬亞政黨；

二、普羅列塔利亞政黨；

三、小布爾喬亞政黨。

以上自然是以整個階級利益爲主眼而分類的。但因任何階級內部都具有不能完全一致的不同性，所以在布爾喬亞政黨中，又有代表地主利益的保守黨，代表工商業者利益的自由黨，及代表接近資產階級之小有產者利益的自由民主黨等；在普羅列塔利亞政黨中，也有代表工人貴族利益的社會民主黨，及代表流氓無產階級利益的無政府黨等。

不過在這裏我們還要注意一件事，即現在除了帝國主義國家或現代歷史的經濟結構所反映之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小布爾喬亞各種政黨外，還有一種特殊類型的政黨，這便是諸落後國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政黨，例如土耳其的國民黨，埃及、印度式的國民會議，中國國民黨等。但中國國民黨是具有最優異的諸特徵的，容後再記。此外還有一種非政黨的政治集團，它是站在黨的組織以外，或圍繞在黨的周圍擁護特定階級的利益的，老實說，牠就是一種特定政黨的別動隊。這例如現有許多政治運動團體，社會運動團體，勞工運動團體，以及其他含有政治性的什麼教育團體，學術團體，什麼主義研究會等都是。

第五章　政黨的要素

政黨是階級之一部分，是代表階級利益爲全階級的整個利益而鬥爭的。那末，牠的構成必須具備下列幾種要素：

一、黨員；

二、主義及政綱；

三、組織。

構成政黨的第一個要素，當然便是黨員，如是某一階級的政黨，必然就是某一階級的羣衆占黨員成分之多數，不過因爲階級具有不同性，所以決不是全階級的羣衆都是黨員的，而且有時某一階級政黨的黨員，并不限於某一階級本身。（如非某一階級而能某一階級化的）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便是某一階級的黨員如何取得某一階級政黨之黨員的資格問題。有一種政黨對於黨員資格問題看得極其鬆動。甚至於有人說：『政黨不向願意加入牠的人發問：「你屬於什麼階級」？所以社會民主黨也是不問的，只要誰在根本上承認黨的原則，黨的要求，即黨的黨綱，那就誰都可以加入黨，至於這個黨綱所包含的內容不單是一定的經濟利益的要求，即除經濟利益的領域外，還包含有一定之政治的及哲學的見解』。有一種政黨則不然，牠對於黨員資格必須有極嚴密意義之規定。例如說，凡屬某一政黨的黨員，除承認黨的原則，黨的要求，即黨的黨綱外，必須加入黨的組織，參加黨的活動，同時還必須繳納黨費，遵守黨的紀律，實行黨的一切決定。我們這裏所說黨之構成分，既爲構成政黨之要素的黨員，自然是指後一種資格的黨員說的。

構成政黨的第二個要素，便是主義及政綱。什麼叫做主義呢？凡屬一個政黨，必然有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Ideologie），即一定的經濟的，政治的，哲學的見解。所以每一個政黨也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結晶體，或是一種特殊的一定的

經濟思想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的複合體之代表者。這一切思想的複合體之集中的表現，便是黨的主義。不過我們要注意：所謂「一定的經濟的、政治的、哲學的見解」，所謂「一切思想的複合體」，決不是空中浮蕩着的，而是由那些階級的生存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即是代表着那些階級的經濟利益的，政治的，哲學的部分不過爲其經濟的部分之外衣。什麼是政綱呢？便是由這一政黨的共同的意識形態，即由一定的經濟的、政治的、哲學的見解所推演出來的具體的政治綱領。主義與政綱便是一個政黨的生命所託。因爲一個政黨的根本目的與牠所負的最後使命，都表現在牠的主義與政綱上。所以一個政黨鬥爭的方向，努力的目標，根本的任務，以及一切政策、策略、戰術，差不多都要根據牠的主義與政綱才能決定，而且一個政黨爲吸引羣衆和取得一階級內最好的分子入黨，也要藉牠的主義與政綱去號召，所以每一政黨必然要有顯明的主義與政綱爲牠的構成分。

現在要說到構成政黨的第三個要素了，這便是政黨的組織。政黨是指導作戰的機關，牠要在指揮統一的機關之下行使及運用牠全部的職權，所以組織是特別重要的東西。通常黨的最高機關必然是中央黨部，依次便有所謂省黨部，縣黨部，區黨部等等。在特殊情形之下，因事實之必要，除通常組織外，多設特別黨部。如民族部，婦女部，軍人部等等。黨的細胞組織，換言之，黨的基礎，無非代表着羅列塔利亞特的政黨，牠的城砦是在工廠。而代表布爾喬亞的政黨，則把黨看做一個選舉機關，爲應選舉的必要而組織，因而牠們黨的基礎，是在選舉區。這一點，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以上僅就黨的組織形式而言，一個黨的組織是否嚴密，是否强有力，完全要看牠的紀律如何，紀律是政黨之能否成功的根本條件，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黨內，牠的紀律是鐵的紀律。每一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組織，實行黨的一切決議，絕對不許任何人逃脫組織上的範圍而在黨內分系分派。即「所有分派之完全廢除」。但分派之絕對禁止，決非在黨內禁止討論之自由，而是在討論被決定後，少數者須完全服從多數者的意見。少數服從多數是黨的紀律之一根本原則。關於這一點，下面一段話說得最透徹：

「如果沒有一個團結的和鐵的紀律的強大的黨，奪取並保持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沒有統一的意志，沒有一切黨員完全一致的行動，則黨的鐵的紀律也是不可能的。自然，這並不是說黨內不許有意見上不同的鬥爭，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僅容許而且提倡黨內的批評和意見的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該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僅容許而且提倡自覺的和自願的紀律，因為祇有自覺的和自願的紀律才是真正鐵的紀律。但到了意見鬥爭已經終了，批評已經過去決議已經通過之後，一切黨員的統一意志和統一行動就成為必需的條件，如果沒有這種條件，則整個的黨及黨之鐵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嚴密的黨的紀律是從黨的組織原則生出來的。民主集中主義，常常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政黨之組織的根本原則。所謂民主集中主義，即是集中與民主相結合的一種主義。民主的成分與集中的成分，是由黨的活動情勢來決定的。以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黨來說，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以前，黨是偏於集中主義的，各級黨部的選舉者往往不能從選舉產生，因為在當時的反動情勢下，如果不採取中央集權辦法，黨便不能生存。到一九〇六年以後，黨的規約漸偏於民主主義；革命以後，即由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黨因為要與國內外的反革命武力鬥爭，甚至把黨內一切工作方法都軍隊化了。這又是嚴格的中央集權。所以在紀律方面，黨須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外，還須實行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在俄國的黨內，當時這些原則的嚴格的執行雖然引起了許多動搖分子的攻擊，說這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但要黨能有計劃的工作，要領導鬥爭，是不能不厲行這些原則的。

黨是某一階級有組織的隊伍，但黨不是惟一的某一階級的組織。還有許多非黨的組織，如工會、協作社、社會運動團體、政治運動團體，以及其他含有政治性的教育團體、學術團體等等，黨還要用組織的力量來領導他們。不過這決不是說由黨直接命令牠們，而是對於他們的活動，經過在這些組織內鬥爭着的黨員，給與牠們以卓越的階級戰的指針，而把牠們放在自己組織的周圍。

這樣、黨員、主義及政綱、組織，都具備了，便能形成一個活潑的、敏捷的、英勇的、強有力的、指導作戰的有機體。

第六章　政黨的特性

關於政黨的本質或其特性，在前面我們曾在各種關於政黨的說明中零星的說到；但現在我們要把牠集中起來系統的說一說。

第一、一個政黨首先應該是一個階級的先鋒隊。政黨應該集中所有優秀分子，以及其經驗，其革命性，其對於階級利益之無限的忠誠，到組織裏面來。但一個政黨要變成真正的先鋒隊，牠便應該具有革命的理論，知道運動與革命的必然法則。牠必須這樣，才能站在階級前面，才能比階級看得更遠，才能領導階級作戰。政黨的作戰條件比較軍隊的作戰條件來，即使不更爲複雜，至少也不更爲簡單。牠也有進攻與退守，也有戰術與策略，也有後備軍及其運用。誰能夠分析這些條件，誰能夠指示幾百萬羣衆以正確方向呢？在軍隊裏面，這自然是一個有經驗的司令部，在階級的作戰上，這個司令部，便是政黨。社會鬥爭沒有革命政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一樣。所以政黨就是階級作戰的司令部——也就是階級的先鋒隊

但一個政黨不僅僅是階級的先鋒隊而已，同時應該算是全階級中的一部分，與全階級緊密的聯繫着。先鋒隊和階級本身的其他羣衆之區分，即黨員和非黨員之區分，本來是不能消滅的。這種區分除非到階級本身消滅，無產階級同化一切階級以後，才能消滅。但這種區分如果成了隔離，即是說一個政黨如果關起門來而離開了非黨員的羣衆，這一政黨也就不成其爲政黨了。政黨是領導階級的，但牠如果不能緊密的聯繫於非黨羣衆，羣衆一定就會不接受牠的領導，即羣衆就無從對牠發生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仰。那末，政黨的擴大和鞏固，也就要成爲問題。所以一個政黨對於非黨羣衆用一種精神上政治上無形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繫起來，這是極端重要的一件事。這樣才能做到政黨是階級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第二、一個政黨應該是一個階級有組織的隊伍，一個政黨不僅是一個階級的先鋒隊，牠還應該是本階級有組織的隊伍。以無產階級的政黨來說，牠在資本主義條件底下，任務是異常艱巨和複雜的，牠要在內部和外部發展之異常艱巨和複雜的條件底下奮鬥。如果環境要求進攻時，牠就應該領導進攻，如果環境要求退守時，牠就應該領導工人羣衆退守，以避免敵人重大的打擊。牠還須給予幾百萬無組織的無黨工人羣衆，以鬥爭必須有紀律有計劃的精神，以組織和堅持的精神。但一個政黨要實現這些任務，是無疑義的，必須自己是爲紀律和組織的規範，必須自己就是一個有組織的隊伍。拿一件歷史的事實來說，俄國的多數派在黨章第一條，就確立下黨是一種有組織的單位之概念；確立黨是各種黨內組織的單位之總和，而黨員同時又是黨內某一組織的分子；少數派卻反對這一條黨章，他們提議一種自動入黨的「系統」。按照這個系統，凡每個教授，每個學生，每個同情者，祇要他們幫助黨，即許他們不加入且不願意加入黨內任何組織，也可以給他們以黨員的名義。這樣必然使黨內充滿了教授和學生，使黨的組織退化成爲一種流動的未成形的無組織的機關，使黨沉沒在「同情者」的大海裏，尤其是消滅了黨和階級的界線，卸去了黨提高無組織羣衆至先鋒隊水平線的任務。這樣的政黨，也就不能擔負在革命進程中組織階級的作用。

但一個政黨不僅是黨內組織之總和，同時又是這些組織之整個的系統。這些組織的形式聯合爲一整個的單位，在此單位中，有高級的或低級的指導機關，少數須服從多數，實際的議決案一經通過，全體黨員都須服從執行。沒有這些條件，政黨就不是一整個的組織單位。就不能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去領導爭鬥。黨變成了有組織的，這就等於創立了一種權力，就等於把思想上的威權變成了權力上的威權。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集中領導黨的工作的原則，在組織關係上是必須堅決施行的原則。然而這種原則在俄國多數黨內往往引起許多人的攻擊，說這是一「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而多數黨的領袖，卻把這些人叫做「俄國虛無主義」和「封建諸侯的無政府主義」，認爲非剷除不可。試看他說：

「俄國虛無主義者特別帶有這種封建諸侯無政府主義的特性，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巨大的「工廠」；都

分服從總體，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是一種「束縛」；在中央領導之下的分工，在他們看來，是人變成了「機器的螺絲」；黨的組織章程，在他們看來，是一件輕微無用之物，是可以完全用不着的。……斷然可以看出，他們高喊反對官僚主義，不過用來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幾個人之不滿意而已。……你是官僚，因為你雖受大會委任，但未合我的意思，而且違反我的意思；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雖然依據大會形式的決議，但未得我的同意；你行動太機械了，因為你雖依靠於黨大會「機械的」多數人，但你並未顧及我是否也贊成你；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願將權力交給你的親熱的舊朋友」。

這就是嘲笑那些反對組織的人們的。這樣看來，黨必須是一階級有組織的隊伍。

第三、一個政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政黨是一個階級有組織的隊伍，但政黨不是唯一的階級組織。除了政黨外，還有許多其他組織。例如無產階級，除了無產階級政黨外，還有工會、協作社、工廠委員會、議會黨團、無黨的婦女聯合會、出版物、文化團體、青年聯合會、革命的團體、國家的組織形式（如果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等。這些組織的大部分，是非黨的，祇有其中的一部分是直接加入於黨或為黨的一支派。但在這樣繁多的組織之下，怎樣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怎樣能夠保證這許多組織不致於引起領導上之不統一呢？人們可以這樣回答，說是每一個組織的工作都是限於自己的特殊範圍，因此不會妨礙別個組織的工作。這自然是對的。但這些組織的工作應該朝着同一方向做去，這也是對的。因為這些組織都是為一個階級之利益。試問誰來決定所有這些組織工作之一致的方針呢？那裏有一種中心的組織，不僅有必需的經驗能夠確定這種共同的方針，而且有充分的權威能夠迫使所有這些組織來施行共同的方針，以造成指導上的一致並避免人各為政的狀態呢？

這種組織就是政黨。政黨的確具有為這種中心組織之必需的條件。我們還是拿無產政黨來說吧！第一、因為政黨是無產階級優秀分子的集合，直接與非黨組織有聯繫並時常領導這些組織；第二、因為政黨既然是優秀分子之集合，就成為良

好的學校，訓練出工人領袖，能夠指導本階級的一切組織形式；第三，因爲無產政黨既是訓練工人領袖的學校，就成爲唯一有經驗有權威的組織，能夠集中鬥爭的指導，因此又能夠改變所有非黨組織爲仲介的機關，爲黨和階級間聯絡的線索。所以政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無產政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自然，這並不是說，工會、協作社等非黨的組織，應該形式上服從黨的指導，主要的是加入這些組織的黨員，應該盡力使這些組織的工作接近於黨並自願的接受黨的政治指導。黨是指導力量，這些非黨組織是轉動機的輪帶或起重的槓桿。有人主張非黨組織「獨立論」或「中立論」，以致產生了獨立的議員，離黨的新聞記者，偏狹的職工運動者，以及小資產階級化的協作社運動者。這都是不理解政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所發生出來的錯誤理論。

第四，政黨是階級專政的工具。如前所說，政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是階級諸組織之根本的指導機關。不僅此也，牠還是階級專政的工具。一個階級在不曾取得政權時，可以用牠來奪取政權；既取得政權以後，又可以用牠來鞏固政權，執行階級專政。以無產階級爲例，無產階級需要黨，不僅爲奪取政權，尤其爲保存鞏固擴大此政權，以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但保持並擴大政權，或者說執行階級專政，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灌輸紀律和組織精神於幾百萬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在羣衆中造成堅壘和利器以反對小資產階級腐敗和成見之影響；這就是說，加緊組織工作以改造小資產階級分子；這就是說，幫助羣衆訓練自己，使成爲一種勢力，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的條件。

一個階級需要黨，爲的是奪取並保持專政，所以說政黨是階級專政的工具。但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在消滅階級，由此可以推知：階級消滅，任何專政也消滅，政黨也要跟着消滅。

第五，政黨的意志是統一的——即黨內不容有黨派存在。我們在前面說，政黨是階級專政的工具。牠奪取並保持階級專政，如果沒有一個團結的和鐵的紀律的政黨，奪取政權或保存政權，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沒有統一的意志，沒有一切

黨員完全一致的行動，則政黨的鐵的紀律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統一的黨及黨的鐵的紀律，是與黨內黨派的存在，不能並存的。如果一個政黨以內，有了黨派的存在，則一個黨內必予發現幾個中央，黨內有了幾個中央就等於沒有一個共同的中央，就等於破壞統一的意志，就等於削弱並消滅紀律，削弱並消滅專政。因此，凡是一個眞正的無產政黨，必然要求完全消滅一切黨內的分派，必然要求立即解散黨內一切根據特殊政綱組織的派別。不然，則無條件的開除出黨。

在這裏我們有重述上面一段話之必要：「自然，這並不是說，黨內不許有意見上不同的鬥爭，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但容許而且提倡黨內的批評和意見的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該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僅容許而且提倡自覺的和自願的紀律。因爲祇有自覺的紀律才是眞正鐵的紀律。但到了意見鬥爭已經終止，批評已經過去，決議已經通過之後，一切黨員的統一意志和統一行動，就成爲必需的條件。……」

第六、政黨往往因肅清了黨內機會主義分子而能鞏固起來。無論一個什麼政黨，黨內總是有許多分派的。而革命政黨內的分派之發生，當然是由於黨內有機會主義分子。以無產階級的政黨來說，牠決不是採關門主義的黨，這個階級，也不是閉關的階級。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而無產階級化的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不斷的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中來；同時，無產階級隊伍中也不斷的蛻化出上層分子，例如從職工運動中和工人議員中蛻化出來的，就佔一大部分，這因爲資產階級拿殖民地額外利潤的一部分來收買他們。

所有這些小布爾喬亞的派別，這樣或那樣不斷的蛻化到無產者隊伍中來，自然也就要這樣或那樣混進黨來，他們自然也就要把動搖猶豫的和機會主義的精神，破壞和多疑的精神帶進黨來。大體說，他們就是黨內分派和糾紛的源泉。一個政黨遇著這樣的情形發生，祇有不顧惜的肅清他們出黨。這是不能僅僅以黨內思想鬥爭的方法來戰勝他們的。一個政黨想建立黨內的統一和堅固的團結，首先就要懂得在適當時期肅清這些機會主義分子。黨因肅清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因爲在革命之前夜及在爭求革命勝利之最劇烈的鬥爭時候，領導鬥爭的政黨內部，若有少數機會主義分子或領袖，稍一動搖，

就可以喪失一切，葬送革命，或顛覆已經到手的政權，如果這種運動的領袖或少數機會主義分子，此時離開了黨，老實說，即從黨內把他們驅逐出去，這並不是削弱了黨，削弱了革命，反是增强了黨，增强了革命。過去俄羅斯和匈牙利的經驗就很明顯的證明這個。在俄國革命的過程中，黨遇見多次困難，如果少數派，改良主義者，小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俄國黨始終把他們放在黨內，蘇維埃政權一定是要被推翻的。

以上六點，即是任何政黨所應該具有的特性。

第七章　政黨的戰略與策略（或戰術）

政黨爲了指導鬥爭必須採取各種適當的手段，而戰術與策略則爲指導鬥爭的一種科學，牠在鬥爭的過程中，佔著鬥爭之成功與失敗的決定地位。這兩種東西（戰略與策略）在表面上看很相類似，而實則有極明顯的區別。要說明這兩者的區別，最好是按照一般政黨的實際慣例，用一、理論，二、政策，三、戰略，四、策略或戰術四種東西的順序而加以解釋。

任何政黨都有牠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和一種共同的政治綱領，由這兩者便形成那一政黨的理論，但政黨的理論，從牠的性質上講，本來祇是一種比較抽象的，概括的東西，根據這種理論更擬出一種比較具體的政治行動方針來，便是那一政黨的政策。所以政策是要在實際上去施行的。不過怎樣才能施行牠的政策，却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問題。因爲鬥爭的對象是多方面的，客觀的環境又是很複雜的，政治經濟情形也是像流水一樣隨時變動的。爲要達到政策的實現，便必須因爲特殊情形，有某一特定階段內的戰略。戰略已經決定，牠便還要運用一種策略，好像軍隊作戰一樣，使用一些什麼「各個擊破法」，「內線作戰法」，「敗一勝二法」，以及其他種種鬥爭的方法，從範圍的大小說，策略的範圍小於戰略的範圍，同時又服從於戰略，受戰略方針的指導。總之政黨的戰略與策略，就是普通軍事學上的所謂戰略與策略，而是一種講解作戰的科學。

以上是就一般政黨的實際慣例說的。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的領袖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的戰略與策略所下的解釋，是有更明確的範圍與更明確的定義的。如說：

「戰略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在革命的某一階段所立下的進攻方針，是支配革命勢力（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軍）所擬定的計劃，是在這一革命階段內實行此計劃的奮鬥」。

又說：

「政治戰略，乃階級運動之根本趨向，循此趨向，則最有利於這一階級，足以與其仇敵以根本打擊，而達到黨綱上所確定之目的」。

從這種觀點上來看，要確定一種戰略趨向，必需知道全局的形勢，知道歷史發展的具體階段，以及規定這些階段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但這樣說來，似乎是太抽象了，決不能因此而獲得戰略之具體的理解。最好我們拿一個政黨之運用戰略的實際材料來證明。這一實際材料，便是俄國革命的歷史材料。

俄國革命我們可以把牠分做三個階段。而每一階段，是有每一階段的戰略的。而歷史階段不同，戰略便要因之而變。

第一階段：（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的——推翻沙皇專制主義。完全肅清中古時代的餘孽。革命的根本勢力——普羅列塔利亞特與農民。主要的進攻方針：使自由帝制派的布爾喬亞陷於孤立——這一階級是努力與沙皇主義妥協，抓取農民并消滅革命的。支配革命勢力的計劃：普羅列塔利亞特與農民聯盟。「普羅列塔利亞特必須抓住農民羣眾，澈底進行民主革命，以擊破專制政治頑抗的力量并使搖動的資產階級守中立」。

第二階段：（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的——推翻在俄國的資本帝國主義并從帝國主義戰爭中抽身出來。革命的根本勢力——普羅列塔利亞特與貧農大衆。鄰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可靠的後備軍。戰爭的延長和帝國主義的危機，是良好的機會。主要的進攻方針：使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派（孟雪維克黨人、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牠們是努力與帝國主義妥協來抓取勞動的農民羣眾并終止革命的。支配革命勢力的計劃：普羅列塔利亞特與貧農聯盟。『普羅列塔利亞特必須抓住鄉村半普羅列塔利亞特羣眾，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以擊破資產階級頑抗的力量并使搖動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守中立』。

第三階段：（十月革命以後）目的——在一個鞏固普羅列塔利亞特專政，實行社會主義建設，並以一國社會主義

的勝利爲根據去領導全世界普羅大衆和被壓迫民族的勞苦大衆，進行推翻一切國家的帝國主義的鬥爭。革命越出了一個國家的範圍，開始世界革命的時代。革命的根本勢力——一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和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軍——先進國的半普羅列塔利亞特羣衆和小農羣衆，殖民地弱小國家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解放運動。主要的進攻方針：使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派陷於孤立，使第二國際政黨陷於孤立——這些分子是贊成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政策的。支配革命勢力的計劃：全世界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革命與殖民地弱小國家解放運動的聯盟。

戰略所注意的是革命的根本勢力及其後備軍。革命若從這一階段進至別一階段，則戰略亦隨之而變；但在某一革命階段內，戰略是根本不變的。

以上是關於戰略的解釋。策略怎樣呢？如說：

「策略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在運動的高潮，或低潮即革命的高漲或低落之較短的時期所立下的行動方針，是以新的鬥爭和組織形式替換舊的鬥爭和組織形式，新的口號替換舊的口號并集合這些形式和口號來實行此方針的奮鬥。如果戰略的目的是在戰勝沙皇主義或布爾喬亞，是在徹底進行反沙皇主義或反布爾喬亞的鬥爭，那末，策略的目的就比較狹小些，因爲策略所努力的，并不在贏得整個的大戰爭，而在於革命的某一高漲或低落時期之具體環境中贏得部分的衝突或部分的接觸。策略是戰略的一部分，是依附於戰略，受戰略的指導，因而服從戰略的。

「策略隨運動的高潮或低潮而變。譬如在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時（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的計劃是不變的，但策略則經過幾次改變。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這一時期，黨的策略是進攻的，因爲那是革命的高潮，運動繼長增高，策略必須顧及此事實。因此，鬥爭的形式是革命的，是適應革命高潮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政治的總罷工，抵制國會，暴動，革命奮鬥的口號——這些便是這時期先後遞變的鬥爭形式，鬥爭形式變了，組

織形式亦隨之而變。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多少公開的工人政黨——這些便是這時期的組織形式。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這一時期，黨不得不採取退守的策略，因爲那些運動的低潮，革命的低落，策略不能夠不顧及此事實。因此，鬥爭的形式和組織的形式不能不變。從前抵制國會，此時參加國會；從前公開的國會外的進攻，此時國會內的進攻和國會內的工作；從前政治的總罷工，此時部分的經濟罷工或簡直停止罷工，在這時期，黨自然須入於祕密狀態，羣衆的革命的組織沒有了，代之而興的，是文化教育的、協作社的、儲蓄會的及其他合法的組織。

『革命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也是一樣。在各階段中，策略改變幾十次，戰略的計劃則保持不變。

『策略所注意的，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些形式的變化及其混和。在革命的某一階段中，隨革命的高潮或低潮，高漲或低落，策略經過幾次的變化』。

看了以上關於戰略及策略的解釋，則戰略與策略的區別點何在，以及一個政黨要如何靠牠的戰略與策略而制勝，便覺顯豁了。

第八章　政黨對於戰略與策略的指導

關於戰略與策略之正確的運用，在有產政黨方面，很少實例供我們的記述，無已，則仍以無產政黨為例，而無產政黨對於戰略與策略之指導的實例，又祗有取材於俄國革命的歷史。

政黨對於戰略的指導的任務，在正確使用所有後備軍，俾在革命發展的某一階段中，達到革命的根本目的。而革命的後備軍，約可分為直接的與間接的兩類：

直接的後備軍為：一、本國的農民及一般中間分子，二、鄰國的工人階級，三、殖民地弱小國家的革命運動，四、革命政權所已佔有和獲得的東西。

間接的後備軍為：一、無產階級以外之本國其他階級相互間的矛盾和衝突，革命可以利用來削弱敵人的勢力增強自己的後備軍，二、資產階級國家相互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革命可以利用來向敵人進攻或對敵人防禦。

第一類的後備軍的意義，用不着解釋，至於第二類的後備軍的意義，在這裏還有說明之必要。譬如俄國在第一次革命時及第一次革命以後，社會革命黨人與自由派兼帝制派的資產階級中間之衝突，對於農民從資產階級底下解放出來的運動，無疑有相當的作用，是無可否認的。十月革命時期，各派帝國主義者因互相拚命戰爭，不能集中力量反對新興的蘇維埃政權，使俄國的革命勢力得以鞏固，這一事實之有重大的意義，更是無可否認的。在這裏有一問題，便是怎樣能正確使用這些後備軍？關於這一點的答覆，就是必須實行若干必要的條件。

第一、當革命已經成熟，工人四面取攻勢的革命行動即將爆發，而後備軍與先鋒隊之聯絡又成為勝利的必要條件之

時，黨必須在此緊要關頭集中主要的革命勢力以打擊敵人最脆弱的一點。就是戰爭。當時俄國多數黨就在這問題上團結廣大羣衆於先鋒隊的周圍，反對戰爭，革命的結果證明，這樣使用後備軍是對的。

第二、必須選擇革命發動的時間。這時，應該是恐慌已經達到頂點，先鋒隊已經有決心戰鬥到底，後備軍已經準備好了贊助先鋒隊；敵人方面已經十分張惶失措。俄國十月革命，就是應用這種戰略的一個例。不遵守這個條件，就會發生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喪失時機」。那時黨或是不上運動的進程，或遠走在運動的前頭，而造成一敗塗地的危險。俄國有一部分同志欲於一九一七年八月逮捕德謨克拉西會議時，而起暴動之企圖，可以作為這種「喪失時機」的一個例。

第三、必須不猶豫的遵循已定的方向走去，不管這條到目的之路有何種困難和阻礙。必須如此，先鋒隊才不會失去鬥爭的主要目的，而羣衆向這目的走時，並在先鋒隊周圍團結時，才不會走入歧路。不遵守這個條件，就會發生危險的錯誤，即所謂「錯亂方向」。俄國黨在德謨克拉西會議停止時，即決定參加國會籌備會，可以作為這種「錯亂方向」的一個例。俄國黨此時似乎忘記了國會籌備會乃是資產階級使俄國離開蘇維埃道路而走上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道路之企圖。不過這種錯誤，不久就糾正過來了。

第四、當敵人勢力強大，退守成為必然之勢，敵人的挑戰受之不利，而在各種勢力關係上又祇有退守之一法，才能夠避免先鋒隊的受打擊，并保存其背後的後備軍之時，必須善於操縱後備軍，採取適當的退守。關於這一點，有一段話說得最好：

「革命的黨應該學得齊全。黨已經學過進攻了，現在應該明白，這種學問還不夠，應該拿別一種學問來補充，即應該學習怎樣能適當的退守。必須明白，——革命的階級而且在自己痛苦的經驗上學會了明白——不懂得適當的進攻和適當的退守，是不能勝利的」。

這種戰略的目的，是在延宕時間以破壞敵人的勢力並積聚自己的勢力以備以後重新進攻之用，當時俄國與德國結的不

列斯特和約，可以作爲這種戰略的一個例。這次和議使俄國黨能延宕時間，能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衝突，能破壞敵人的勢力，能保持背後的農民並能積聚勢力，準備向高爾恰克和田尼庚進攻。

以上便是一個政黨正確指導戰略之主要的條件。

一個政黨對於策略的指導，是戰略指導中的一部分，可以說策略的指導是附屬於戰略的指導的。策略指導的任務，就在習練鬥爭和組織的一切形式。在這正確使用這些形式，求在某種狀況之下，取得準備戰略上成功所必須的最大限度的效果。在這裏又有一個問題，就是怎樣能正確使用鬥爭和組織的形式呢？關於這一點，也必須實行若干必要的條件。

第一，所使用的主要的鬥爭和組織形式，必須是最能適合當時運動高潮或低潮條件的，是能夠促進並保證幾百萬羣眾行向革命地位，行向革命戰線並分配於革命戰線的。

祇有先鋒隊認識舊制度不能保存終必顛覆，這還不夠，必須幾百萬羣眾也明白這個並表示已準備贊助先鋒隊，但羣眾祇有在自己的經驗上，才能明白這個。策略的任務，就在使幾百萬羣眾能夠在自己的經驗上認識舊制度必然要被推翻，而所使用鬥爭的手段和組織形式必須能夠促進羣眾在經驗上認識革命的口號是對的，如果拿俄國革命的實例來說，假使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黨不決定參加國會，不集中力量在國會的工作，使羣眾以自己的經驗認識國會是無用的，俄國立憲民主黨人的許諾是騙人的，與沙皇妥協是不可能的，工農聯盟是必需要的。那末，黨就會脫離羣眾。質言之，沒有羣眾在國會時期之經驗，則立憲民主黨人的假面具不能揭破，無產政黨的領導權也不能形成。當時撤回派的策略所以危險，就在這種策略能夠使先鋒隊脫離幾百萬的後備軍。

再，如果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當孟塞維克黨人和社會黨人尚未表露他們是贊成戰爭並幫助帝國主義，而羣眾亦尚未以自己的經驗認識這二派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自由等演說都是騙人之時，俄國的無產階級立即跟着那號召馬上推翻之左派黨人走去，那麼，黨就會脫離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會失去在廣大農民羣眾中的威權。又，如果沒有羣眾在克倫斯

基時期之經驗，則俄國孟雪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不能孤立，無產階級專政也不能形成。所以那時不憚煩的指出小布爾喬亞政黨的錯誤，並公開在蘇維埃內部爭鬥，這種策略乃是唯一正確的策略。那時俄國左派革命黨人的策略所以危險，就在他們那種策略能夠使一個政黨從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領，變成空洞無力的陰謀家的小團體。

第二，在某個時期，必須從過程的鎖鍊中找出特別的一環，務使拿住這一環，就可舉起全串鎖鍊，並可準備達到戰略上成功的條件。這就是說，從黨面前的許多任務之中，找出特別的一種任務，務使這一任務解決之後，其他任務能跟着勢如破竹的解決去。這可用底下二個例來證明，其中一個是較遠的事實（即當俄國無產黨成立的時期），又一個是較近的事實（即新經濟政策時期）。

在俄國無產政黨成立的時期，無數的小團體相互間尚未聯絡起來，黨內自上至下充滿了原始性質和小團體習氣，思想的複雜成了黨內生活的特性。在這時期，鎖鍊中根本的一環，即黨面前的任務中根本的一任務，就是出版一種刊物供給全俄國。爲什麼？因爲當時祇有出版一種刊物，才可造成黨的有力的中堅，能夠將無數的小團體結合起來，能夠準備思想上和策略上之一致的條件，因此能夠建立黨的真正基礎。

再，在俄國從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工業等於破產，農村經濟又缺乏城市製造品之供給，而國家工業和農民經濟之結合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在這時期，鎖鍊中根本之一環，即任務中根本的一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因爲在新經濟條件之下，工業和農民經濟之結合，祇有經過商業才有可能，因爲祇有用發展商業手段來擴大商品之貿易，工業亦才能擴大，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起來，祇有拿住商業，祇有拿住這一環，然後才能希望工業與農民市場相結合並迅速的解決其他的任務，以便造成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條件。

以上便是一個政黨正確的指導策略之主要的條件。

第九章 政黨鬥爭的方式

前面所說政黨的策略，也就是政治行爲的具體的實踐上的表現，這種行爲的方式，即所謂鬥爭的方式。自然，這些鬥爭的方式是很多很複雜的，而策略的決定，則決不能不注意到這些鬥爭的方式。

鬥爭的方式，既然很多而又很複雜，然則這些繁複的方式，因什麼而決定的呢？下面便有答覆：

普通作戰的方法，或者說戰爭的方式，不是永久相同的，牠們都要跟着發展的程度而變更，首先便是跟着生產的發展而變更。所以成吉思汗時代作戰的方法，和拿破崙第三時代作戰的方法是不同的；二十世紀作戰的方法和十九世紀作戰的方法，也是不相同的；現代作戰的方法，一定要包括一切作戰的方式和科學上的發明，還會利用牠們。融合牠們，或者因形式的不同而各別的應用牠們。

不僅普通的軍事作戰，政治鬥爭的方式也是如此。政治鬥爭的方式或許比軍事作戰的方式更加繁複。因爲這些方式跟着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而變更，跟着各階級的狀態而變更，跟着政權的性質以及國際關係而變更。

對於無產政黨，大概可以指出下列幾種鬥爭方式：

一、祕密方式，

二、公開方式，

三、國會方式，

四、武裝方式，

五、國家方式。

自然，每一鬥爭方式，都必須適應於客觀的歷史條件及具體形式，關於上述各種鬥爭方式與客觀的歷史條件及具體形式之間的關係，可以大概論述如下：

第一節　秘密的鬥爭方式

政黨鬥爭之祕密方式，是與專制政治的總形勢有關聯的，在一種專制政治的環境裏，祕密方式差不多是典型的惟一的鬥爭方式。可是應當說明，不僅在專制政治的環境裏，祕密方式是最主要的最實際的鬥爭方式；在特別情形的時候，就是在鬥爭極端劇烈的時候，即使在布爾喬亞的民主政治之下，也祇能採取祕密的方式。例如在目前許多民主國家或法西斯國家中，最顯著的如意大利，日本，波蘭，南斯拉夫，芬蘭等國家中，那裏的無產政黨也祇能處於祕密的或半公開的狀態。如果在這種形勢之下拋棄祕密方式，祇求公開，那就是拋棄革命鬥爭。總而言之，在專制政治的環境裏，即在一個政黨沒有任何公開的可能的時候，那所謂「地底下」的工作，簡直是鬥爭之唯一方式。

第二節　公開的鬥爭方式

在某一種環境之下，如果一個政黨有公開的可能，這一政黨自然要利用牠而實行公開的鬥爭。自然，鬥爭的公開，尤其是公開的規模分量及作用，完全要看公開可能的多少而定。如果雖有公開的可能，而黨的本身還不能完全公開，那麼，牠的工作中心仍舊應該是祕密的，這種公開與祕密的分量是必須注意的。否則不計公開的規模與分量，黨一下子就將工作中心移到不甚妥當的公開可能上，黨便要變成一種所謂可能主義的黨，變成機會主義的黨。黨自然應當利用所有一切的可能，以使組織羣眾並取得羣眾，但是不應當不計量公開的規模與分量，而盲目的把公開當做鬥爭和工作的根本方式。

如果在各種公開可能之中，有國會方式的鬥爭，黨自然也要利用牠。但是有一個附帶的條件。如果為革命的利益，當

時確有國會外的革命行動迅速發展的趨勢，統治者已經不受大多數羣衆的贊助。那末，黨就可以並且應當抵制國會——拒絕國會選舉等等。爲什麼？因爲假使在這種時候而把鬥爭轉移到國會裏面去，那就等於分散革命力量，造成羣衆對於立憲的幻想。所以黨對於國會的利用，決不是無條件的，即令有一個時候，爲便利革命工作的進行，黨有利用國會議壇的公開可能；但是第一必須明白鬥爭的重要方式仍舊在國會之外，第二必須將工作及鬥爭重心仍舊放在祕密方式裏。

爲加重這一意義，在這裏可以換一個語調來說，假使無產政黨在各方面都可以公開，一切工作、鼓動、宣傳、組織等，總之一切行動都能公開，自然就沒有祕密方式，自然，前面說的祕密與公開的比例分量可以消滅，不過對於國會方式的關係，有一點是永久不變更的。就是無論怎樣，革命工作的重心，始終是在國會外的行動。如果人們沒有中過迷信國會主義的病，如果要把國會方式的鬥爭應用得沒有毛病，無產政黨就應當永久記得這一點。

第三節　國會方式

對於利用國會策略之整個概念，上述還嫌不夠，所以必須再加以詳細論述。

首先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參加國會，利用國會的鬥爭方式，是否必要，是否適當？這一問題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爲在目前工人羣衆之中還有些派別，例如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工團主義，根本否認政治鬥爭及政黨之必要，當然也否認國會方式的鬥爭。這個根本原因是有許多國內的工人政黨採取機會主義，藉國會爲個人升官發財地步，以致喪失了對於工人方面的信用，所以工人因反對那種機會主義的政黨，便連國會鬥爭也反對了。

我們這裏且不必來證明工人階級必須要有政黨和政治鬥爭，因爲這種必需已是很明顯的，至於參加國會的必要及目的，可以述之如下：

無產政黨對於國會方式的態度，從第一國際時代一直便是利用資產階級國會做宣傳。參加國會是爲的要發展階級羣

識，就是說要引起被壓迫階級對於壓迫階級的敵意。

但這種態度，隨後是有點變更了。不過這並不是因爲學說有什麽改變，乃是受着政治發展過程的影響。即後來因爲生產力的生長及資本主義式的剝削範圍日益推廣，所以資本主義及國會制度的國家得着了長期的穩定，因此無產政黨的國會策略，便發生對於有機的資產階級國會立法工作的適應手段，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的改良運動的勢力一天一天大起來，社會民主黨之所謂最小限度黨綱大占優勢，而最大限度黨綱便變成了討論遙遠的最終目的的題目了。因此就發生國會裏的升官發財主義，賄選，公開的或隱祕的背叛工人階級的利益。但這很明顯的不是學說有什麽變更，而是歷史的具體條件把學說腐蝕了。

到了最近的時期，即由資本主義穩定時期到帝國主義時期，國會的本質又顯然有很大的變更了。有人說：當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國會制度有相當的積極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如今到了帝國主義時期，即資本主義動搖和衰落的時期，國會簡直變成了一種詐騙，欺罔，強暴，欺凌弱者強詞奪理的工具。在這帝國主義的陰謀，掠奪，強暴，盜竊，破壞的行爲之下，所謂國會裏的改良，絕無系統，絕無計劃，絕不穩固的對於勞苦民衆實際上已經毫無意義。

從這裏說法看來，自然的結論，彷彿是：在國會裏一無作用，國會方式的鬥爭，簡直用不着。但這是錯誤的。上述情形，並不使無產政黨應該拋棄國會裏的鬥爭，卻正要格外實行這種鬥爭，不過目的不同罷了。換言之，無產政黨看見資本主義社會到了危機的時候，看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走過了那有機的時代，而到了動搖衰落的時代，他就按此情形定出革命的國會鬥爭的策略。這種策略最簡單的意義，就是進行這種國會方式的鬥爭，是爲着直接準備推翻資產階級的國會。這就是說，此時國會對於無產政黨，並非爭得改良的場所，革命工作的重心，完全移到國會之外，黨之所以參加國會，牠是以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及國會爲目的。老實說，無產政黨參加國會，是因爲要在資產階級政權機關內有自己的同志，藉以揭露牠的罪惡，使得更加容易破壞資產階級國會的信用。

無產政黨對於國會方式的鬥爭應當這樣看待，所以牠們對於國會的策略，實際上是取消國會制度的策略。用參加國會的手段去破壞國會的信用，取消國會，這在第一眼看來彷彿是很奇怪的，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大部分工人羣衆現在對於國會還有許多幻想，即認為這種國會的民權主義的統治方式對於自己很有利益，很有必要，殊不知對於無產政黨，國會的時代已經過去，如前所說，國會是欺罔誑騙的工具，這種事實本來已經很是明顯，可惜還沒有為一般大多數的勞苦民衆所都能看見。要證明現代國會的這種本性，使一般民衆都能看見，最好的方法是無產政黨參加國會，適用國會方式的鬥爭。因為參加國會，格外容易證明給落後的民衆看，為什麼這種國會應當解散，為什麼國會制度應該在政治上死滅。

國會鬥爭方式之正確的意義是如此。那末，有些工人政黨，現在還在繼續着舊時國會鬥爭之策略，即把國會制度看做是為工人階級爭得民權主義的改良之工具，迷信國會，這自然不是國會方式之正確的意義，而工人階級中的某某總派，如前所說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完全否認國會鬥爭。也是犯了策略上極大的錯誤。

但到國會（或議會政府，民主政治）一方為勞苦民衆所不滿，一方為最近跑上政治舞台的新貴——法西斯獨裁盡情摧殘時，全世界廣大民衆都要為反法西斯而鬥爭，民主政治的惟一象徵的國會，雖然只是一種形式——民主的形式，却應該來保存它，把它當做反法西斯之武器。國會鬥爭的方式，其目的決不應該是推翻它而是擁護它了。戰略應該隨具體的歷史條件而定，否則就是革命的機械論者。

第四節　武裝方式

現在再接下去講武裝的方式。這種鬥爭方式，是革命羣衆要達到戰略上的目的所不可避免的方式。因為在鬥爭的過程中，等到要實行戰略上總攻擊的時候，武裝鬥爭就要成為最重要的鬥爭。自然在武裝行動之前，黨應當先有教育羣衆，取

得羣衆，組織羣衆的種種工作，所以武裝行動必須是羣衆的，如果祇有少數人的武裝行動，那就是冒險主義，白朗吉主義（Blanquism）。這就是說，武裝行動是最負責任的時機，應當有極嚴格的準備，對於具體的形勢，應當有極嚴格的許多次的詳盡的考察，因爲武裝行動是一種政治鬥爭的特殊形式，牠有一種特別的規律，這種特別規律是：

一、無論如何不可弄着武裝行動好玩，行動既然開始，便須明確的知道——必須幹到底。

二、必須在最緊要的地點和最緊要的時機，集中充分占優勢的力量，否則本來組織得準備得比較好的敵人，便要消滅武裝行動的人們的。

三、行動既然開始，便應當十二分堅決的行動，而且無條件的必定要取得進攻的形勢，「防守是武裝行動的死路」。

四、應當努力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的時機，突然襲擊敵人。

五、應當每天取得勝利，就是最小的勝利也好的；（可以說應當每小時取得勝利，如果像僅是一個城市裏的行動）。

無論如何必須保持精神上的優勢。

上面所述關於武裝行動的規律和條件，當然可以增加，但是無論如何不可以減少，至於增加，說得確切些，要具體化這些規律，武裝行動在具備上述的條件之外，必須與總同盟罷工相適應。

有一個時候，有人以爲武裝行動是不能執行的一種鬥爭方式，他們說，因爲現代的軍事技術和現代城市構造的性質，使得武裝行動不可能。但是，經驗上證明出來，這些障礙是可以消除的。因爲在城市方面可以有特別的巷戰策略，在軍事技術方面，可以設法散亂對方軍隊組織，這是一個革命過程中很重要的工作，因爲軍隊是保持舊統治最固定的工具，是資產階級組織最嚴密的地方。

所以武裝行動，是這樣的一種鬥爭方式。牠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革命對於敵人襲擊的最高方式的鬥爭，革命本是強力行動，牠就是在這一方式要具體化罷！

第五節 國家方式

任何政治鬥爭的目的，總是取得政權。無產政黨的鬥爭，自然也是這樣。但一個階級或一個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後，牠的地位便有一種根本上的改變，因之牠的鬥爭方式也就要跟着改變。這是絲毫沒有疑義的，因為這一政黨得到了政權，即掌住了國家機關；而國家機關是一個強迫的行使權力的機關，是一種為這一階級各方面的事業和利益服務的機關，牠能使這一政黨手裏有最大限度的力量資料，一直到軍隊。

歷史上現在已有了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取得國家政權的事實，這就是前面說過的蘇維埃共和國，這便是歷史所湧現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與一切反革命勢力鬥爭。這種拿國家做鬥爭工具的方式，就叫做國家方式的鬥爭。這種國家方式的鬥爭，自然不能和國家政策相分離，但仍舊有牠的特別形式的行為，即所謂純粹的黨務。不過在這個時候，黨務的工作和國家的工作是相適應相融和的，國家與黨的職任是同一的，而黨與國家比較起來，黨却站在領導的地位。所以就近代的政治意義說，黨是高出於國家的。黨在取得政權以後，黨是領導并決定國家政策的機關。

無產政黨之鬥爭的國家方式，是非常繁複的，甚至對於反抗者適用鎮壓的方法也包含在內，如適用武裝的力量等等。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首先便是摧折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用強力鎮壓他們要想恢復舊統治的企圖。單靠法律是不中用的，法律是建築在武裝的力量上，所以為鎮壓反抗，往往不顧法律，一直到羣衆的恐怖政策。

有些人說，革命在邏輯上用不着恐怖政策，自然，恐怖政策不是一種原則，一種制度，但在某種程度內，某種必要上，就是恐怖政策也要用。因為歷史上並沒有任何革命，當革命階級取得政權而成為治者階級之後，却能不被迫而實行多少恐怖主義的；無論那一革命，對於已經推翻可是仍在反抗的階級敵人，多多少少都要實行某種形式的恐怖主義。

從上述看來，所謂恐怖主義，是指無產政黨旣成執政黨之後的一種鬥爭方式，所以恐怖主義，就是取得政權後的無產階級鬥爭之一種國家方式。但除了這一種意義的恐怖主義以外，還有另一種意義的恐怖主義。如在俄國的歷史上，當初社會革命黨，反對沙皇政府，曾經用過恐怖主義，後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也用過恐怖主義。這種恐怖主義，就是個人的暗殺，個人的暗殺，也是一種鬥爭方式，但這與上面所說的爲無產階級鬥爭之一種國家方式的恐怖主義，是沒有絲毫共同點的。暗殺主義是個人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鬥爭方式，永久應當是羣衆的，國家方式的恐怖主義也是羣衆的。

在論述鬥爭之國家方式的結論裏，還要加上一層，即：無產政黨利用這些國家方式的鬥爭，同時也應用到國外的戰線上去。因爲無產階級雖取得政權，牠的國家還處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無產階級應當利用國家方式的鬥爭，去組織並促進社會主義的國際革命。在這一點上又可以用祕密的和公開的兩種可能。所以在國家方式之中，也有祕密方式和公開方式。

凡此一切，都是歷史上實行的經驗裏所湧現出來的各種鬥爭方式。政黨的職任，就在於能夠運用所有的鬥爭方式。

第十章　政黨組織的方式

政黨在自己的鬥爭中，在實現自己的行動中，如上所說，既有許多鬥爭的方式，因此，便發生組織方式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意義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規定如下：

軍隊組織的方式、種類、編制等，都要適應作戰的方式和方法。如在襲擊的作戰裏，則以馬隊爲最重要；在佈陣的作戰裏，馬隊便毫無作用，或者祇有第二等的作用；而重砲隊、飛機隊、坦克隊、以及毒瓦斯的射擊之作用，則可以解決一切。軍事技術上的職任，就是要有各種類的軍隊，竭力的改良他們，養成完備的組織，而且要在動作的時候，綜合適應各種軍隊。

以上是軍事鬥爭中的組織方式，政治鬥爭中的組織方式，也是如此。政治鬥爭組織的方式，也和軍事一樣，應當和鬥爭方式相適應。

從上述看來，這裏所講的組織方式是什麼意義，大概已經很明白了。那末，我們就可以對於牠下一個定義。所謂『工人階級鬥爭中的組織方式，乃工人階級鬥爭及運動之各種方面裏的力量之組織的方式及種類』。

組織有幾種方式及種類，可以指出來呢？我們已經說過，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有密切的關係，那末，無產政黨在每一具體的歷史形式裏所進行的鬥爭方式，都應當有各種的組織方式與之相應。

如果是在專制政治之下，即在那種沒有公開可能的條件之下，既不能有公開方式的鬥爭，所以組織方式也是應當秘密的。革命職業家的秘密組織，就是當時組織自己力量的根本主要方式，就是當時革命軍隊的主要種類。

如果在有公開可能的時候，既有公開方式的鬥爭，可是無產政黨還沒有公開的存在，那末，除革命職業家的秘密組織

以外，還可以有工會、協作社、文化運動的組織，以及國會裏的組織，即國會裏的黨團等等。

如果在羣衆的革命運動時候，無產政黨亦可以公開，那末，除工會、協作社、國會裏的黨團等等之外，還可以有其他緊急狀態之下的組織方式。例如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等。

最後，即革命勝利之後，既有國家方式的鬥爭，便亦有相當的國家方式的組織。

組織的方式，大致如上所述。但是，應當牢牢記住一個規律，就是：無論這些組織方式是怎樣的，政黨本身總要做總參謀部，要做中心的指導工作。政黨應當竭力使其他各種方式的組織，信仰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主要的政治組織，而能服從自己。無產政黨應當反對一切所謂「獨立論」，「中立主義」。所謂獨立論，中立主義，即有些人們或黨派主張其他各種羣衆組織對於政黨是獨立的或中立的，不應受政黨之政治上思想上的領導。

這一種重要規律（即政黨本身總要做總參謀部，做中心的指導工作）是根本的規律，如果不遵守牠，政黨就不能進行有成效的鬥爭。如果政黨對於各種組織方式不能盡自己的責任，就是取得這些組織，日益改良他們，使成爲完備的組織，也不能進行有成效的鬥爭。

世界各國無產政黨，各自在他所處的具體形式之中，運用適應這些形勢的鬥爭方式，自然也都應用各種各式的組織方式。他們在每一鬥爭的具體階段上，愈加能考察各種組織方式之必要，並且這些組織方式的綜合相應的妙處，愈加堅決的認定：黨是總參謀部，是主要的中心，應當在思想上政治上統率其他一切組織方式。那麼，國際革命的形勢也就愈加容易發展。

第十一章　政黨的口號與指令

第一節　口號與指令的概念

口號是什麽？答道：口號就是某種職任或目的之簡明的標語。一切鬥爭之中，尤其是政治鬥爭，口號占着極重要的地位，所以要提出口號來，必定要很謹慎的研究總的形勢，很明確的觀察當時的職任及目的。

我們試看在普通軍隊作戰之際，如果能很正確的標明戰爭的目的，而在這一標語，又爲每個兵士所了解，那末，往往僅僅這一標語，就足以決定戰爭的勝敗。因爲這種標語可以振作兵士精神，鼓勵兵士勇氣，政治鬥爭中口號作用之大，也如在軍隊中一樣。如果這一口號，恰是幾千萬幾萬萬民衆所需要的政治要求，那末，這一口號，自然也可以決定這一鬥爭的勝敗。

但是口號的性質，却有種種不同。而其不同處，是要看那一政黨所抱的目的如何而定。如果那一政黨所定出來的口號，是時間性比較長久的，是一種標明戰略職任的標語，那末，這種口號，便帶着宣傳的性質，即所謂宣傳的口號（Slogans of propaganda）。宣傳口號的目的，是要造成堅定而忠實的革命者。

如果到了實現這一口號所標明的職任之時機成熟的時候，到了要吸引極廣泛的羣衆的時候，那末，這一口號，便變成鼓動之口號。（Slogans of agitation）

但是在鬥爭的過程裏，黨不但要從宣傳之口號，進於鼓動之口號，牠還要往前走，就是還要從鼓動之口號再進而至於行動之口號。（Slogans of action）那就是可以並且必需運用實力，推動羣衆直接行動，去實現黨的職任的時候了。

由此再進一步，便有所謂政黨的指令。（Directive）所謂指令，就是直接下「動員令」，即在某日某時，應做某事等等，指令并不是對於全黨，在緊急的時候，甚至於是對於各個黨員的。

自然，口號不但應當明顯，不但應當是指示職任的集中的整個兒的標語，而且應該像指令一樣，要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在這裏還須注意，決不可以將各種口號相混，更不可以將口號與指令相混，因為如果將鼓動之口號與行動之口號相混，或者將口號與指令相混，那就很危險的，甚至於有致命之傷，也和過早的或過晚的發動一樣。

在鬥爭的過程中，有的時候會造成這種形勢，即逼得黨非在很短的一定的時間以內取消或變更已經決定的及已經成熟的口號或指令不可。因為不如此，不能避免敵人的打擊，以待較適宜的時機。

一個政黨的口號上究竟有什麼樣的職任呢？請看下面所說：

「黨的職任，就在於會及時將鼓動之口號變成行動之口號，將行動之口號變成具體的指令；如果有特殊的形勢，又要會用必要的伸縮性以及堅決的判斷力，去及早取消某種口號，那怕這種口號是已經很普遍很成熟的口號，也不可有所顧惜」。

第二節　口號與指令之實際運用的經驗

以上所說，都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假若我們不能找一個實際運用口號與指令的具體事實來說明，無論說得怎樣圓滿，恐怕還是不容易理解的，現在可以舉俄國無產政黨在這方面的實例來說說。

俄國無產政黨從登了鬥爭舞台之後，便採取當時勞動解放社所標明的主要宣傳口號，即「打倒專制政治」的口號。還有一個積極的口號，便是「要求民主共和」的口號。等到一九〇九年革命將開始的時候，他們便將這兩個口號變成鼓動的口號。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前，他們的黨已經把「打倒專制政治」的口號，從鼓動的口號變成行動的口號，因爲這一口號在那時已經完全成熟。

二月革命開始，這一口號實際上已經變成指令，而且立刻便實行，同時，在二月革命之前，他們的黨考察整個形勢之後，就開始推翻民主共和的口號；到了二月革命的時期，便決定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完全取消民主共和的口號，而揭出新的口號，即「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此外還有許多附屬的口號，這便是「停止戰爭」、「麵包與和平」等。

因爲那時俄國革命發展的速度很快，所以「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做宣傳口號的時間很短，不久便成了鼓動的口號，而且又很快的變成行動的口號，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七日）便變成直接的指令。

二月革命後八個月之間，他們的黨却也遇着過一次這樣的事，有些黨員將「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鼓動口號，誤解成爲行動口號。這件事發生在那年四月間彼得城示威運動的時候。當時他們的黨決然反對這一件事，馬上便恢復了當時這一口號的相當的性質。

這八個月中間，也遇到一次取消已經成熟的口號及指令的事實。這件事就是在那年曾經決定過一次武裝示威的指令，後來又取消這一個指令，因爲當時他們的黨考察到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之下的示威，可以爲敵人屠殺彼得城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口實。

後來他們的黨居然得到了政權，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自然又要提出新的口號了。他們的黨仍舊能夠及時的標明目的和職任，就是提出新的口號，而且不使各種口號與指令相混。

取得政權以後的主要口號，便是：「擁護蘇維埃政權」。若把這個口號拿來分析一下，當國內戰爭的時候，這一口號在後方是一種行動的口號，在前敵就是指令。國內戰爭時期是他們運用口號及指令最巧妙的時期。那個時候，他們的敵人也不得不佩服他們的能幹，能夠很適當的發出口號，並將這種口號變成別種口號，而且這種轉變富有伸縮性及決斷力。

國內戰爭勝利之後，他們的黨又提出新的口號，這種口號主要的就是標明經濟建設的責任。這裏有宣傳的口號，例如「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也有鼓動的口號，行動的口號及指令，針對着解決根本職任的方向，用一定的步驟而發出。同時，還永久存留着一個根本鼓動的口號，例如「擁護蘇維埃共和國，反抗國際資本主義；」這一口號依照國際形勢的轉變，往往可以很快的變成行動之口號及指令。

後來第三國際指導國際的一切革命運動，在運用口號及指令的時候，也利用俄國黨的經驗。

這裏可以指出下列兩個事實：第三國際考察到現時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行遲緩之後，決定暫時不直接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鼓動口號，而祇把牠當做宣傳口號。第三國際又另外提出「工農政府」「國民革命」等鼓動口號，依各國特殊的性質及形勢而定，這都是俄國黨提議的。

再則第三國際嚴格的認定混淆鼓動口號、行動口號、及指令之不當，——當一九二〇年三月間德國的事變，便是如此。這也是根據俄國黨的經驗的。

以上所引的事實及經驗，自然祇是最主要的口號和指令。不過用來指明一個政黨對於口號及指令的運用方法，藉以便於口號及指令運用之理解耳。

第十二章　政黨之歷史的運命

我們在以上各章，已就政黨的各方面作過一般的研究，現在我們就要說到牠的歷史的命運了。這就是說牠在歷史的過程中，由牠的發生到成長以後，也如一切社會產物一樣，要日就其死滅之途。

政黨之形成過程，如前所說，是根源於階級的自覺，即由「自在的階級」進於「自爲的階級」的時候，才有政黨的形成。然則牠的死滅是如何到達的呢？我們以爲牠的第一步驟，就是政黨的單純化。我們知道政黨是一定階級之一部分，因階級之不同性，一個階級往往有幾個政黨，一個政黨又分許多派別。然隨着階級之日趨單純化，這許多政黨，許多派別，自然也是要日趨於單純化的。何以政黨之單純化就是政黨死滅之第一步驟呢？因爲在一個階級內的許多政黨，許多派別，原是階級層次的反映，而階級的小層次總是不斷的向兩極分化，政黨的種類也必然不斷的向兩極分化。同時在許多政黨中，必有某一政黨是眞能代表全階級的總利益，爲全階級的總利益而奮鬥的。如果牠眞能代表全階級的總利益，爲全階級的總利益而奮鬥，牠必能隨着階級意識的發展漸漸得着組織并指導全階級的地位，牠的內部自然會日益團結日益統一，其餘的許多政黨或者因革命階段的深入推動牠們，自願歸併那眞能代表全階級利益的政黨，或者漸漸消失自己存在意義而自然歸於消滅。甚至於許多小派別也由那一眞能代表全階級利益政黨的教育作用而自然泯除界限以完成所謂政黨的單純化。但政黨單純化的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階級的單純化。如果階級單純化到了最後的階級，到了一種由舊社會過渡到新社會的最後階級，當階級必然是日在過渡的崩潰中，代表這一階級的政黨也必然是日在過渡的崩潰中，階級因過渡完了而死滅，代表這一階級的政黨，自然也要因過渡完了而死滅。但牠的死滅是經由了單純化的過程的。所以我們說政黨之單純化，是牠趨於死滅之第一步驟。什麼東西都不是突然死滅的，都是由漸變到突變，政黨的命運也是一樣。

那末，什麼是牠死滅的第二步驟呢？這是一個在上面的說述中已經答覆了的問題。漸變——突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是一切社會產物在歷史上必經的過程，政黨那能是例外呢！

第十三章　布爾喬亞（Bourgeois）政黨

第一節　布爾喬亞政黨的形成

我們在前面各章，曾把政黨作過一般的研究，現在想就有產政黨與無產政黨作爲各別的說明如下：

近代意義的政黨，不待說，是以布爾喬亞政黨開始的，因爲布爾喬亞在最初也是一個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牠要從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解放出來，就不能不與當時的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鬥爭，鬥爭便需要政黨的指導，鬥爭的結果才達到自己變成剝削者壓迫者的地位。所以正如前面所說：

「布爾喬亞發達一步，他們的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一個武裝的自治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共和都市（如德意志，意大利），有的變成君主政治下納稅的「第三等級」（如法蘭西）；以後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被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貴族的工具，且在事實上是大王國統一的柱石；最後，自從近代的產業和世界的市場都成立了，他們就成爲布爾喬亞，一手把持了那近代代議制度國家的政權。近代國家的行政機關，只算是他們辦理公共事務的一個委員會罷了。」

這樣說來，很明顯的，布爾喬亞爲了和中世紀的封建諸侯，乃至封建末期的集中的權力之絕對專制君主鬥爭，即與政治史上所謂絕對主義鬥爭，以戰取布爾喬亞今日這種支配地位，也正如今日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對於布爾喬亞一樣，最終必然要達到所謂政治鬥爭的。他們爲了要指導這一政治鬥爭，便不能不具有他們自己的政黨。

但如我們在前面所說：近代意義的一種政黨，是要以「階級的自覺」做條件的。因之布爾喬亞的階級形成，也是經過

兩個階段，即「自在的階級」與「自爲的階級」這兩個階段。布爾喬亞在封建制度及絕對君主制的支配之下，使自己構成爲「自在的階級」的階段，布爾喬亞爲了使封建社會成爲布爾喬亞社會，而從事於顛覆封建制及絕對君主制的鬥爭，使自己構成爲「自爲的階級」的階段，這些階段的經過爲期是很長久的，而且需要最大的努力，才能使最後的勝利歸於自己。所以布爾喬亞對於封建諸侯及絕對君主制的鬥爭，也是經過一定的步驟以部分的鬥爭開始的。由部分的鬥爭漸漸展開之布爾喬亞的團結，就是布爾喬亞政黨了。

布爾喬亞政黨，在最初雖然是與封建諸侯及絕對君主制鬥爭的武器，到後來，却一面要同別的產業進步上利害不同的本國布爾喬亞鬥爭，一面還要經常的同外國的布爾喬亞鬥爭，所以布爾喬亞政黨，在其與封建諸侯及絕對君主制鬥爭勝利以後，則變爲布爾喬亞與布爾喬亞（有時是本國的有時是外國的）自己鬥爭的武器。這便是由布爾喬亞內部具有不能完全一致的「不同性」產生出來的，這也便是布爾喬亞在表面上往往有幾個政黨的緣故。在這種種鬥爭裏，即與本國或外國布爾喬亞的鬥爭裏，布爾喬亞覺得自己必須鼓動普羅列塔利亞特，求它的幫助，因此便將普羅列塔利亞特牽入政治的漩渦中。於是布爾喬亞就將自己的政治教育普通教育的要素供給普羅列塔利亞特。換句話說，就是付給普羅列塔利亞特以鬥爭的政黨的組織，把對抗布爾喬亞的武器付給普羅列塔利亞特了。

這樣，布爾喬亞政黨形成以後，在其鬥爭中，也爲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發展開闢了許多坦途，即是說也促成了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的形成。

第二節　布爾喬亞政黨與德謨克西拉（Democracy）

布爾喬亞政黨在牠和封建諸侯及絕對專制君主鬥爭時，牠所代表的利益是「第三等級」（the "Third Estate"）的利益，所謂「第三等級」，就是當時尚未達到階級化分之各種階級的混合體，其中包含有布爾喬亞、工人、過渡階級，（如

手工業者、小商人等）；他們與那特權的封建諸侯、貴族、地主比較起來，在法律上是一無所有的，他們可以說是與當時封建諸侯，貴族，地主相對抗之各種階級的聯合體在法律上的表現。而在「第三等級」中，自然是布爾喬亞的形成，較之工人，手工業者，小商人等，都要健全，所以與封建諸侯等的鬥爭，也要以他爲領導，而所要求的利益，當然是「第三等級」整個的利益，因之他們在鬥爭中所把持的理論根據或指導精神，是所謂德謨克拉西。德謨克拉西這一概念，可以說在當時是成爲自文藝復興以來個人生活解放運動之思想的基礎，而牠的代表理論，便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及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兩書。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如前面所說，他主張人類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人類在自然狀態之下，服從自然法的命令，得各自享受生命，自由，財產之安全。但因共同生活之擴大，人類理智之進步，在無國家權力的地方，不能充分獲得生命、自由、財產之保障，於是由相互契約而創立國家，即各人將其自然權之一部份讓與於國家主權者之手，而服從牠的支配。這樣由社會契約而創立的國家，其主權者屬於一人的場合，便是君主制；其主權者屬於少數人之場合，便是貴族制；其主權者屬於人民全體之場合，便是民主制；而以民主制爲其最理想的國家形態。國家主權既是由人民讓與的，所以無論其主權者爲君主爲貴族，都必需依據人民之共同意志行使職權，自然更不能違背人民之共同意志濫用職權，否則人民便有推翻他的權利。這種權利，叫做「革命的權利」。那末，封建諸侯，絕對專制君主壓迫人民，乃是違反了社會契約，而「第三等級」的人們，起來推翻他們，起來革命，正是社會契約所授與的正當權利，於是他（盧梭）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來反抗封建之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一切束縛。孟德斯鳩研究了英國的最初的憲政，甚爲讚賞，於是也依據英國政制精神，主張把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這便是所謂「三權分立論」。他的意思是不使政權歸於一人之手，即不致發生專制，獨斷，毀竊等弊，這在前面也略爲說過。盧梭的契約論，本來不過是一個假定的說法，但卻適合當時困頓於專制君主乃至封建諸侯壓制之布爾喬亞的心理，就是說他給與了布爾喬亞的革命以理論的根據，於是在這一理論基礎

（這一理論自然是那一社會經濟的產物），便爆發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

以法國大革命爲契機，全歐洲都充滿了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的波浪，布爾喬亞便到處得了勝利，一掃了從來的封建制度，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論」也被各國採用爲政治組織的原則，尤其在美國的政治組織上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典型的形態，這樣以議會爲中心的政黨政治，以憲法爲準繩的立憲政治便風行了一時。

在布爾喬亞對於封建諸侯及絕對君主專制革命的開始，他是代表「第三等級」的利益，領導當時幼稚的工人階級及過渡階級，向封建階級鬥爭的，所以那時高揭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而這一面大旗在那時也有相當的意義，即自由、平等、博愛，對於工人階級，過渡階級，也不全是粉飾的好聽的空話，即在布爾喬亞推翻了封建階級後，爲與本國的外國的同階級鬥爭，如前所說，也還需要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幫助。但布爾喬亞，一旦自己掌握了政權，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達到了所謂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即帝國主義的階段，他們所說的自由，對於工人、農民，城市小商人，尤其是普羅列塔利亞特，便成爲搾取的自由與壓迫的自由；他們所說的平等，對於工人、農民，城市小商人，尤其是普羅列塔利亞特，便祇是形式上的平等與口頭上的平等。其餘所謂博愛，便更談不上了。因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到了所謂帝國主義的階段，自由競爭便轉變爲獨占，因此他們對於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的追求已不感到有何等利益，加以隨着布爾喬亞之强大而强大起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偉大勢力，不斷的以種種鬥爭威脅着他們，於是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也轉變爲布爾喬亞獨裁。這樣布爾喬亞政黨，在領導着幼稚的工人階級對封建階級鬥爭時，是革命的；等到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偉大力量起來，以他們爲革命的對象時，便轉變爲反動的了。所以到了這種時候，布爾喬亞政黨在表面上雖有種種不同，然而他們根本上的主張，差不多是一致的。他們站在形而上學的立場，把現存制度——資本生產制永久化，絕對化。依他們的意見：社會主義及社會主義革命，是有害的烏託邦，是理想家的幻想。他們以爲普羅列塔利亞特永遠不能管理國家及一切工業，人類社會只有在私產制度之上才能發展。所以他們反對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革命鬥爭，而贊助帝國主義戰爭。

第三節　布爾喬亞政黨之史的發展

一　英美的布爾喬亞政黨

要說明英、美的布爾喬亞政黨的形成，最初是導源於所謂托勒黨（Tories）與輝格黨（Whigs），到十九世紀中葉，托勒黨改稱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輝格黨改稱自由黨。（Liberal party）在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and Mary III）以前，內閣常由英王在托勒、輝格二黨選任若干人，後來感覺這種辦法有許多不便且滋流弊，於是 英王喬治一世（George I 1714-1727）的時候 ，他便把組閣的重任專門交給輝格黨的領袖瓦爾坡（Walpole）。瓦爾坡組閣凡二十一年，由此便樹立了一黨內閣的先聲。並且形成了一個英國政制上的慣例。什麼慣例呢？這就是托勒與輝格二黨，誰黨的黨員在下議院佔多數，便由誰黨的領袖組織內閣。內閣成立後完全對議會負責任。等到議會對內閣表示不信任時，內閣便祇有兩條路可走：一即改組內閣，一即解散議院，訴之選民。布爾喬亞政治學者，把這叫做責任內閣制（Responsible Government），或議院內閣制。（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又因為牠是兩黨對立：一黨在朝，一黨便在野，所以專就政黨來說，便是二黨對峙的二黨制（Bi-Party System）。

我們在上面說過輝格黨的領袖瓦爾坡組閣凡二十一年，其後因輝格黨內部發生內訌，托勒黨的領袖彼得（Pitt）繼之組閣又凡二十六年。但輝格與托勒二黨更番組閣，他們的階級基礎政治主張與其所代表的利益，究有什麼不同呢？我們可以列一簡表如下：

托勒黨	輝格黨
一、黨員成分豪紳、僧侶佔多數；	一、黨員成分小地主、商民佔多數；
二、主張國教的統一；	二、主張容許非國教的傳佈；

三、限制人民濫用請願權；
四、主張人民不能反抗君主；
五、主張王位繼承應遵循正統順序的規定而行；
六、主張國權非授自國民，國王無須遵守憲法。

三、主張人民有自由請願權；
四、主張人民有反抗君主權；
五、主張削除王族中違反憲法的王位繼承權。
六、主張憲法是國民與國王共守的契約。

以上是輝格黨與托勒黨時代兩黨對立的根據，到了自由黨與保守黨時代（輝格黨在一八三〇年改爲自由黨，托勒黨在一八三一年改爲保守黨），成爲兩黨對立的根據的，也有提綱挈領的幾點：一即一八三二年的新選舉法案（The Reform Act），自由黨是贊成的，保守黨是反對的。由自由黨主張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的自由貿易說；保守黨則相反主張保護貿易說。又如一八四六年保守黨提出穀物輸入廢止法（Corn Law），自由黨又不贊成，十九世紀末葉的愛爾蘭自治案，更爲二黨爭論的一大問題。保守黨反對愛爾蘭自治，自由黨贊成愛爾蘭自治，所以在一八八六年自由黨領袖格蘭斯頓（Gladstone）擔任組閣時，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Home Rule）卒遭自由黨右派首領張伯倫（Chamberlain）所反對（張伯倫不久即加入保守黨）。從這些對立的根據上，很明顯的看出自由黨是代表工商階級的黨，保守黨是代表地主階級的黨。他們各自代表各階級的利益，有時在朝，有時在野，有時得勢，有時失勢。例如到了二十世紀初頭，保守黨一時歸於失勢，失勢的原因，大概因一九〇〇年對南非殖民戰爭的失策，一九〇四年損照案（Licensing Act）的否決，以及對於失業問題不能解決等等，保守黨失勢的時候，當然便是自由黨得勢的時候，歐戰正酣時，不幸自由黨又分裂爲二，工黨（Labor Party）便起而代之，於是有一九二四年工黨內閣的出現。但這也不過是布爾喬亞政黨在不能應付各種勞動運動時，暫請小布爾喬亞政黨出來代行欺騙與鎮壓而已。一旦階級鬥爭日趨尖銳，欺騙政策無效時，還是祇有由布爾喬亞政黨來執行鎮壓政策。這便是英國保守黨現在重復執政的社會根據。

以上是關於英國布爾喬亞政黨之簡單的史的敍述。

美國布爾喬亞政黨我們可以把牠分爲三個時期來說：

第一個時期，是聯邦黨（Federalist）與共和民主黨（Republican Democrat）對立的時期。原來美國的政黨是起源於費拉達爾費亞（Philadelphia）憲法會議的時候，因爲那時一派主張增加聯邦政府的權力，所以叫做聯邦黨，這派以哈密爾頓（Hamilton）爲領袖；另一派主張各州分權，所以叫做反聯邦黨，（Anti-Federalist）這派以嘉費孫（Jefferson）爲領袖，後改稱共和民主黨。這兩黨所代表的利益是各有不同的：前者代表工商階級的利益；後者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華盛頓與亞當姆（John Adams）都是聯邦黨的總統，聯邦黨得勢以後，不免濫用權力，如一七九八年僑民律和煽亂律（Alien and Sedition Acts）的通過，就是明證。所謂僑民律，就是大總統若認僑民有危害於國內安全與和平者，得驅逐其出境。所謂煽亂律，就是凡有用印刷品攻擊聯邦政府的任何機關者，都構成犯罪。這樣布爾喬亞便認爲聯邦黨的施政，反乎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於是就傾向於共和民主黨。所以一八〇〇年共和民主黨的領袖嘉費孫便當選爲總統。自此共和民主黨便繼續執政二十八年。

第二個時期，是民權黨（Whig）與民主黨（Democrat）對立的時期。在共和民主黨二十八年的黨治下，經濟界已起了變化。就是說國內的農工業已由東南部向西北部發展，這樣的經濟變化當然要影響於政治。即政治日趨於民主化，於是共和民主黨益發得到西部農民和東部勞動者的擁護，該黨也就漸漸拋棄從前的黨名，索性改爲民主黨了。因爲（Democrat）這個字，在當時還有人認爲急進可怕諱而不用。所以由共和民主黨改爲民主黨在當時確是一個大胆的改進。當時美國的大總統是査克孫，（Jackson）他便是民主黨的領袖。在査克孫的統治之下，比較的能代表平民，所以那時美國人有「査克孫的民治」（Jacksonian Democracy）一語，但是無論在善良的與非善良的統治之下，都免不了是有反對派出現的。當時反對査克孫的一派，便另組國民共和黨（National Republican），後來其組織日漸擴大，又改稱民權黨。一八四〇年當選總統的哈利孫（Harrison）一八四八年當選總統的太雷，（Taylor）都是民權黨的首領。民權黨的政治主張，可以說是完

全接受聯邦黨的信條的，或者說牠即是聯邦黨的繼承者，更爲適當。

第三個時期，是共和黨（Republican）與民主黨（Democrat）對立的時期。在一八四〇年主張廢止黑奴的一個團體叫做自由黨，這便是共和黨的前身。後來共和黨與民主黨便因爲放奴問題成爲贊成與反對的焦點。不待說，共和黨是贊成放奴的。因爲共和黨所代表的是美國北部工商資產階級的利益，對於黑奴在生產上不感覺必要；民主黨是反對放奴的，因爲民主黨所代表的是美國南部地主階級的利益，美國的地主階級及所謂種植家，在農業勞動上全靠奴隸來執行，甚至於可以說黑奴勞動就是他們的命脈，兩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既不相同，所以主張便完全相反，有名的南北美戰爭，就是由這一問題引起的。戰爭結果，共和黨獲得了最後勝利。於是在一八六五年通過憲法的第十三次修正案——廢除奴隸制，自共和黨對於這一個問題的主張勝利後，便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繼大總統林肯而起，常常握到美國的立法、行政，司法的大權，執政時期亦特別長久。民主黨在失敗以後，自然要努力於黨運的復興，結果亦能於不久的時期握到政權，選出克內夫蘭（Cleveland）爲大總統。此後美國的政治大權，不在共和黨便在民主黨了。現總統羅斯福，他的黨籍便是屬於民主黨的。因爲美國的政黨也是兩黨對峙的，所以布爾喬亞學者把牠聯起來叫做英、美式的政黨。

二　大陸的布爾喬亞政黨

我們這裏所謂大陸的布爾喬亞政黨，是以法、德兩國爲代表的。大陸式的政黨與英、美式的政黨在表面上不同的特徵，就是前者是多數黨分立；後者是兩黨對峙。我們現在就從法國的布爾喬亞政黨說起。

法國的政黨在歐戰以前，著名的有兩黨，這便是王政黨（Monarchist）與共和黨（Republican），他們產生於一八七一年第三次共和沒有成立與普魯士訂立和約時的國民大會中。後來共和黨又分爲二派：一是投機派；一是急進派。投機派以甘必大（Gambetta）爲首領，主張和平的改造；急進派以克勒滿梭（Clemenceau）爲首領，主張急進的改造。當時兩派所爭辯的主題，尤其是所謂政教分離問題，投機派主張政教不能分離，急進派則主張分離。從一八七九年——一八九三

年的十四年中都由這二派循環執政，至一九〇五年後，二派中又復分為四派。投機派分化為國民黨與進步黨，急進派分化為急進社會黨與社會黨。

以上是歐洲大戰以前的法國布爾喬亞政黨分立情形。歐戰以後，國家元氣大傷，為急謀恢復，各政團都爭相提出新的政治主張，於是政黨不免又有新的分化。第一、便有所謂法蘭西行動派，這是從一八九八年創立的一個法蘭西行動委員會成立的，牠的領袖：有摩拉（Maurras）都特（Leon Daudet）他們都是文學家，主張推翻共和，恢復王政。大戰以後，在法國社會上頗有若干潛勢力。第二、便是所謂愛國同盟會，這是在普法戰後由共和黨人組織的，牠的領袖，有米勒蘭（Millerand），戴丁吉爾（Taittinger）。其勢力多在法國北部工業城市中，他們對內主張強有力的共和政治；對外主張對德復仇伸張勢力於國外。所以戰敗德國後，不主從德國領土撤兵，在其內部另組織一愛國青年團，具有軍事上的規律，以擁護國家主義為目的。第三、便是所謂共和聯盟，牠是舊時和平派共和黨的變相，於一九〇三年由進步黨、自由共和黨、國民共和社、三派合組而成的，總部設於巴黎，黨員的根據亦在巴黎及巴黎以北的小工業家，現在全國共有八十個支部，二百餘種機關報，主張團結一切共和主義者，對內注重施行適於共和政體的政策，對外注重強硬的外交，該黨因為在法有較長久的歷史，故亦在政府中常常握到政權，對於過去的白里安（Briand）及普恩開雷（Poincare）內閣，都曾予以援助。當一九二四年左黨大聯盟時，該黨主張組織右黨大聯盟與之抗。第四、便是所謂社會共和民主黨，牠在法國歷史也很久，所以在全國都有了牠的活動分子，前說普恩開雷，就是該黨領袖。從大體上說，牠對內主張在鞏固的共和制度之下，施行改良主義，對外傾向於國家主義，對德施以強硬手段，對俄主張聯合進攻。此外還有社會主義黨、共產黨、急進社會主義黨諸黨派。國會由兩院組成，由各黨分占議席。一九三六年的選舉，人民陣線大勝利。所謂人民陣線，是由上院的左派民主社會主義及下院的急進及急進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黨、共和黨聯盟、共產黨諸政派組成的統一陣線，藉以防止法西斯的執政的。

以上是關於法國布爾喬亞政黨之簡單的史的敘述，茲再就德國布爾喬亞政黨加以申述：

德國布爾喬亞政黨，我們可以分開兩個時代來說，一即德意志帝國時代的政黨；一即德意志共和時代的政黨。

德國也是多數黨分立的國家。政黨的起源，可以說在一八六二年，當時有兩個政黨出現於德國，一為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牠是擁護政府的（當時首相是畢士馬克），但黨員甚少，勢力亦薄。一為進步黨（Party of Progress），牠是反對政府的，黨員較多，勢力亦較厚。所以從當時情形看來，畢士馬克的地位，似很難保持，然因帝政時代，首相是對德皇負責的，所以牠不能動搖畢士馬克的首相地位，到後來，保守黨分裂為二：一、保守黨；二、自由保守黨。前者是擁護政府的；後者是反對政府的；進步黨亦分裂為二：一、國民自由黨；二、進步黨。前者是擁護政府的；後者是反對政府的。

在帝政時代，除了上述四個政黨外，還有二黨要補述一下，一即中央黨，（Catholic Center party）一即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但後者是打的無產政黨的旗幟，實為小布爾喬亞政黨，茲先述前者。中央黨的組織是由於普魯士的教徒發起，所以牠的黨員成分多天主教徒，德意志帝國成立以後，政權大半落於新教徒之手，天主教徒為維持他們的利益，乃有此政黨的組織。組織以後，他們的勢力日見擴張，到一八九〇年，該黨竟成為政治的中樞，於是黨內的宗教色彩亦漸歸於暗淡，一九〇九年後，竟完全洗去了宗教色彩，論其政治主張的大體，可以說該黨是保守兼民主的，貴族的兼平民的。

以上是關於德意志帝政時代政黨的敘述。

歐洲大戰以後，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發生革命，從此便一變帝政而為共和，在德意志共和時代，便有所謂一、國權黨（German Nationalist），牠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以前的保守黨蛻化出來的。該黨的領袖有達爾披利克（Delbrück）及杜靈格（Duringer）等，黨員成分大多屬於資本家、大地主、軍人，對內主張復辟，對外主張強硬外交，所以牠在德國

算是最右的。二、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rty）牠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從以前的國民自由黨蛻化出來的，領袖爲施特勒斯曼（Stresemann）黨員成分多大商人，對內主張由國民的意志自由決定國體，對外主張融和政策。該黨在戰後的德國頗佔勢力，在一九二三年的所謂人才內閣中，領袖施特勒斯曼，曾充外交總長，一直到施氏死去才離開政治舞臺。三、中央黨，原是很保守的，後漸民主化，共和時代更表示左傾。因牠站在各黨中間，所以在共和時代的內閣中，無論左派右派擔任組閣，都有中央黨分子參加。牠的領袖，有貝葉爾（Bayele）翟利朋（Trinborn）等。四、巴威略人民黨（Bavarian People's Party），牠是在一九一八年從以前的中央黨分離出來的，因黨員成分多巴威略，故名，該黨的領袖爲賴起（Leich）。牠對於巴威略王家是很效忠的，對內主張徹底的聯邦主義，反對中央集權。五、民主黨，牠是在一九一八年從戰前的進步黨和國民自由黨的分子混合而成的，領袖有老曼（Naumann）及敦保（Dronburg）等。對內擁護共和，反對國家干涉個人自由，尤重視文化及職業教育。但到了現在，則只有國社黨爲惟一之合法政黨，希特勒爲黨魁。黨內有褐衫或縮寫SA，和挺進隊或縮寫SS兩組織。國社黨國家，據說係建築於種族純粹的精神上，規定非阿利安人不得爲公務員及新聞記者，並限制其在職業中的人數，黨員需無條件的服從黨魁的命令。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組閣後，採用嚴厲手段，下令撤廢威瑪憲法中所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權，德國就走上了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獨裁。

以上是關於德國布爾喬亞政黨之簡單的史的敘述，因法德過去都是多黨分立，所以布爾喬亞學者把牠們併起來叫做大陸式的政黨。

二 日本的布爾喬亞政黨

有人說日本的布爾喬亞政黨，彷彿是別具一格的，與英美式大陸式的政黨都不同。實則日本的政黨却很接近於英美式的政黨，因爲牠也標榜着兩黨對峙的政黨政治。

日本最早的政黨，是所謂自由黨與改進黨。自由黨的領袖是板垣退助，改進黨的領袖是大隈重信。不久兩黨勢力都歸

於消沉，於是有一個叫做後藤象二郎的，用來糾合自由改進兩黨的分子，組織在野大同盟。然到明治二十二年後藤之入閣，大同盟亦歸於瓦解。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日本舉行第一次衆議員選舉，不能不有政黨以資運用，於是自由改進兩黨乘機復活。自此經過四五年間，兩黨都能一致團結以與政府相抗。有人把日本這一時代叫做政黨政治與官僚政治的對抗時代。

自政黨的勢力露頭角後，政府知政黨勢力不可侮，於是以後的伊藤內閣，松方內閣，都各自聯結一黨以爲聲援。但以甲黨與乙黨間往往不能調和，使內閣不能久於其位，到明治三十一年，於是合併自由改進兩黨爲憲政黨，而組織大隈板垣的憲政黨內閣。有人說：這是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

後來兩黨又發生內訌，自由黨單獨組織憲政黨，而改進黨則組織憲政本黨。不久憲政黨投入伊藤博文旗下，組織政友會，成立伊藤內閣。政友會幾常獨握有政權的在朝黨。同時，憲政本黨也發生分裂；一部分改組爲立憲國民黨，以與政友會相抗。旋又組織新政黨，叫做立憲同志會，黨勢擴張在政友會之上，其後，更糾合其他分子組織憲政會，推加藤高明爲總理，這便是日本大正五年時候的事。但有一派——即犬養毅一派，則保持立憲國民黨的營壘。

政友會從伊藤、西園寺兩總裁以後，便有原敬。原敬以大正六年的選舉獲勝，遂出組內閣，以大正十年被刺死，繼承他的爲高橋是清，然高橋內閣亦僅支持到十一年便倒，後亦被殺。政友會此時以不欲反對黨出來組閣，於是促成超然內閣的出現。因此繼起的便是一個出貴族院所擁立的內閣。內閣總理，自加藤、山本而至淸浦。這樣在野各黨大不滿意，於是發生所謂護憲運動，政友會便由此分爲兩派；即政友會與政友本黨，政友本黨便是擁護淸浦內閣的。淸浦倒後，遂由三派——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合組護憲內閣。

三派合組的護憲內閣當然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不久便發生分裂。政權單獨歸於憲政會，即憲政會單獨擔任組閣。憲政會的內閣，自加藤而若槻。一直到昭和二年，方因政友會與政友本黨的共同攻擊而倒，憲政會內閣倒後，由田中義組政

友會內閣，不料政友本黨以後又發生分裂，一部加入政友會，大部則與憲政會相合併而組織立憲民政黨以濱口雄幸爲總裁。昭和四年，政友會田中內閣倒，於是乃有民政黨內閣的出現。

日本歷史最悠久的政黨，爲立憲民政黨和立憲政友會，民政黨代表工商業利益，主張金本位及節省國家地方支出，施行統制經濟，救濟農業、漁業，對滿蒙問題要求澈底解決。政友會則代表地主利益，主張國有鐵道、道路、灌溉等以增地產價值，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贊成積極大陸政策。新組織之法西斯黨，有國民同盟，主張廢除內閣制，而代以直接對天皇負責之國務會議，對外圖建立東方之無上威權，最近日本政府在軍人支持下，日益傾向於法西政治，故極右派於一九三七年二月間組織散漫的二百餘團體以集合成一大黨之事實，距離尚遠；後雖組織日本主義鬥爭協會，然其前途仍不可樂觀。

以上是日本布爾喬亞政黨之簡單的史的敍述，雖然牠們的合併與分解，沒落與復興，名目與派別，都是極端複雜與無常，但始終不離布爾喬亞之黨的本質。

第四節　布爾喬亞政黨與一黨專政

我們在上面把英美式的布爾喬亞政黨，大陸式的布爾喬亞政黨，日本的布爾喬亞政黨，都作過簡單的史的敍述，但對於布爾喬亞政黨的敍述，似乎還不免有一些遺漏，因爲除了上述的二黨對立制與多黨分立制的國家以外，很明顯的還有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最明顯而爲一般布爾喬亞學者所樂道的，則有意大利的法西斯黨與蘇俄的布爾塞維克黨。（但布爾塞維克并非一黨專政）布爾塞維克黨屬於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範疇，姑置不論。實則政治之法西斯化，現在也不限於意大利一國，他如波蘭、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德國、日本等國都是。

尤其是意、德、日，意、德、日的法西斯組織雖有不同，它的階級屬性却完全一樣，法西斯是以暴力爲出發點，而以

退伍軍人爲領導。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軍人出身，而日本的法西斯，亦以軍閥荒木貞夫及少壯軍人爲主幹。後台則不外克虜伯、蒂孫、拉瀧波士根、胡堡根等軍火商人及金融巨頭。至於外形的特徵，意大利法西斯黨人，穿着黑衣，手持棍棒，德意志法西斯黨人，則穿褐色制服，全副武裝。

自然，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是一黨專政的典型。我們現在就即以意大利法西斯黨爲代表而一述其簡單的歷史。所謂法西斯黨，是標榜着法西斯主義（Fascism）的一種政治鬥爭的集團，是歐戰以後——即一九一八年停戰後，由於意大利社會革命之爆發而誘致的大反動所產生出來的一種反動的政治集團。由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法西斯黨在意大利各處，不過有很少的支部，但不久便成爲遍於意大利之都市與鄉村的全國組織，成爲意大利政治上之反動的獨裁的政黨。牠的首領是有名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墨氏在歐戰時，還是社會黨的首領，主編社會黨的機關報，戰後便轉變爲國家主義者，成爲意大利布爾喬亞獨裁政治的首領。）而其黨員成分，則爲學生、退役軍人、小商人、知識分子、農民、以及多數之無賴漢。至於牠的組織，差不多一切黨員都軍隊化，其目的即在消滅一切有革命傾向的團體，及其指導者與團體員，所以意大利目前的勞動運動，社會運動，幾成爲不可能。法西斯黨的黨旗爲黑旗，黨員着黑衫，黨的標語是「不辭水火」，所以有人把法西斯黨叫做國粹黨，或黑衫黨。但墨索里尼之取得意大利的獨裁政權，却也經過了好幾個階段：最初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進取羅馬，稱爲法西斯革命。其實不過是對墨索里尼組織政府加以擁護的示威運動。墨索里尼的第一次內閣，還是諸黨混合的內閣，慢慢才把其他各黨排除出去，而成爲完全的法西斯內閣。一九二四年四月，實施了二三年的選舉的改革法，法西斯黨始在議會中占多數，一九二五年二月，經過了二次選舉法的改正，採用了單一選舉區制與比較多數制，於是法西斯黨在議會中才可有確實的多數。這樣，才有完全的法西斯政治。

上面說過，政治之法西斯化，並不限於意大利，這就是說布爾喬亞在目前，無論是國家機關，無論是階級前衛，一般都法西斯化了。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因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到了所謂帝國主義的階段，自由競爭便轉變爲獨占，

因此他們對於布爾喬亞德謨克西拉的追求已不感到有何等利益，加以隨着布爾喬亞之强大而强大起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偉大勢力，在歐戰後，不斷的以種種鬥爭直接威脅着他們。於是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乃轉變爲布爾喬亞獨裁。這是很明顯的，這一個時代，——帝國主義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是一個大轉變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資本主義制度日趨崩壞，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却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日趨成熟。而新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勢力，却正在推動這一歷史的車輪促其加速度的轉變，所以布爾喬亞爲保持舊社會組織，舊社會制度，對此新的勢力必須要用非法的高壓手段來對付。所以法西斯政治之普遍化，就是布爾喬亞不能用虛僞的德謨克拉西來鎭壓反對者之具體的表現。即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來鎭壓革命勢力之具體之表現。因此布爾喬亞政黨的一黨專政，實際即爲布爾喬亞一階級專政。嚴格的說，本來是無所謂一黨專政的，黨不過是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罷了。那末，在布爾喬亞階級專政底下，一黨專政與多黨專政，絕對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所以我們在這裏不能不加以申說。

第五節　布爾喬亞政黨的本質

我們在前面說過：政黨的產生是由於階級的自覺，任何政黨，總是具有一定的階級基礎而代表其一定的階級的利益的。不待說，布爾喬亞政黨便是代表布爾喬亞利益的。代表布爾喬亞利益，自然就是布爾喬亞政黨的本質，但是我們在敍述布爾喬亞政黨之史的發展時，同是代表布爾喬亞利益而却有許多政黨，於是有人懷疑到「一階級一政黨」的原則，同時也就懷疑到我們前面政黨分類——分政黨爲布爾喬亞政黨，普羅列塔利亞政黨，小布爾喬亞政黨——之不當。這在前面也說過，一個階級在表面上之所以有幾個政黨，如所謂多黨對立制，二黨分立制，是因爲階級之具有不同性。再如就布爾喬亞政黨之史的發展來看，政黨政治的產生，一方面是因爲封建社會的貴族地主階級，自產業革命以後，其運命便日趨於危險，他們爲保持其垂危的運命計，不得不對「第三等級」讓步，即容許其參加政治，他方面則因爲「第三等級」佇於工商

業的發展，經濟實力日趨雄厚，時時企圖從封建階級手上奪取政權。畢竟「第三等級」走上了政治舞台，政治的支配發生本質的轉變。但殘餘的封建勢力，即貴族地主的勢力，決不因此就消滅下去，並且他們為適應經濟關係以圖存，必然在經濟上亦有全面的轉變，即從前以「等級」為生活資源的貴族地主，現在便轉變而為藉地租（資本主義社會的地租）及資本利息企業利潤以為生活的資本家。所以此時政黨總是代表着二種勢力，即舊的地主、高利資本家的勢力與新的產業資本家的勢力。因為地主、高利資本家與產業資本家利益不能相同，所以或主自由貿易，或主保護貿易，或主使用奴隸，或主解放奴隸。後來資本主義的發展由產業資本而進為金融資本，於是又由產業資本家與金融資本家的利益不能相同，而經濟政策，政治主張，亦不能不有表面上的差異，例如日本政友會與民政黨之對於國內思想問題，對華問題，過去都有若干不同，然亦不過僅在有程度之差耳，並無什麼根本的不同。因為政友會民政黨之在日本，政友可說是三井黨，民政可說是三菱黨，政友若係產業資本家黨，民政實是金融資本家黨。關於這點，也有人說過：

『我在考察終了之前，還不能不說到下一問題，即說不定有人要攻擊我說一階級不會有幾個政黨的問題。無論如何，這是不錯的，例如布爾喬亞就是以一階級而有幾個政黨的。共和黨、民主黨、急進社會黨、急進黨、自由黨、保守黨便是，這種事實，豈不與君之定義矛盾嗎？也說不定有人像這樣問我。但是我敢答覆說：否。我以為布爾喬亞各黨實際上非一個獨立的黨，而僅僅是布爾喬亞黨的各分派。這些分派，有時像牝雞互鬥那樣的神氣——特別在選舉的時候——但普通這都是空洞的。有時——在對於他們有利的場合，在民衆之前，一見好像他們彼此之間有重大意見的不同，然而在實際上，關係於數百萬人的根本問題，他們卻完全一致，他們所爭的只限於第二義的問題，凡關於民衆爆發革命而要影響他們利益的根本問題，特別是關於私有財產問題，所有布爾喬亞政黨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們說關於根本問題，即在本質上，布爾喬亞政黨只有一個——這一政黨即是奴隸使用者、私有財產所有者的政黨。畢竟是沒有什麼矛盾的』

第六節 布爾喬亞政黨對立之虛僞

如前所說，布爾喬亞政黨有所謂二黨對立制，多黨對立制。所謂二黨對立，即二大政黨交互組織內閣，一黨在朝施行政治，他黨便在野監視政治，而使互相製肘。這樣的政黨政治，一般人稱之爲立憲政治下的憲政常軌。然而這種對立是虛僞的。因爲這樣的兩個政黨，同樣是資本家地主的政黨。所謂一黨在朝他黨在野的交互作用，不過在一黨的支配不能欺騙勞動者農民的耳目時，他黨即起而代之，假裝起來矯正前一黨的失政，再給與或散佈一些幻想於大衆，更深一層的欺騙蒙蔽大衆的耳目罷了。實際上布爾喬亞政黨的對立，決不是政治綱領的對立。即政黨的名稱雖不同，而政治綱領則沒有什麼分別。例如英國的保守黨，自由黨，名稱是不同的，然而就牠們兩者的政綱來說，實在看不出牠們的分別在什麼地方；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也是一樣。牠們政治綱領的分別不明顯，較之英國尤甚。舉例來說，美國一八八八年的總統選舉，共和黨標出政綱十九條，民主黨標出政綱十二條。然而便有九條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者只關於關稅率的一部分而已。又美國一八九二年的總統選舉，共和黨標舉政綱二十條，民主黨標舉政綱二十一條，其不同的也祇有關於關稅率的一條。到一九二〇年，我們算很明顯的看見了美國兩黨意見的衝突，這便是對於外交問題，民主黨主張批准國際聯盟，而共和黨則表示反對。所以有人把美國的兩大政黨，比做兩個空瓶，兩個空瓶裏面，是灌進什麼酒去都可以的。

又有人把布爾喬亞政黨的政綱，比做同類營業的廣告，例如同是營出版業的，無論他們各自的廣告，如何標新立異，總祇能用印刷精美，紙張潔白等以爲標榜。所以他的政綱決不能有本質的差異。商人的廣告原是欺騙主顧藉廣招徠的，因之布爾喬亞政黨的政綱，也是欺騙民衆藉以奪取政權的工具。至於政權到手以後，政綱便等於一張廢紙。關於這種事實，美國有一很富於趣味的譬諭，這個譬諭大概是如下所說：

『有一乘客立於火車的上下口，即 Platform 上面，管車的見了，告訴這一乘客說照火車上的規則，乘客不得

立於 Platform 上，勸他離開。這位客人聽了這話，答道：「Platform 是給人乘車（get on）用的，不許人踏上 Platform，難道有這樣的規則嗎？」卒不聽管車的勸告。於是管車的說道：「閣下對於實際政治的情形，想來是知道的，Platform（政綱）不是教人乘着（get on）的，這只是上車（get in）用的呀！」

政綱也叫做 Platform 這就是暗示政綱只用於選舉議員之時，議員當選以後便不要政綱了。這樣看來，所謂二黨對立根本是虛偽的。多黨對立，自然也是一樣，因爲他們雖然有的代表地主的利益，有的代表資本家的利益，有的代表產業資本家的利益，有的代表金融資本家的利益，然而按其在要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的地位，按其對於生產機關之關係，按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按其取入的方法及其所能支配的財產之大小，他們都是屬於同一人羣，即屬於同一階級。他們都是布爾喬亞，所以他們在根本問題上都是一致的。

第七節　布爾喬亞政黨的組織與財政

我們在第五章裏面會說：「民主集中主義，常常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政黨之組織的根本原則，」然則布爾喬亞政黨的組織原則是什麼呢？我們可以說是領袖中心主義與地盤主義。

關於這種事實，試拿英國的布爾喬亞政黨來說，英國的保守黨，他就是先決定黨的領袖，然後才組織幹部起草政綱的。該黨分爲院內保守黨與院外保守黨兩部。院內保守黨在議院以內擔當實際政治；院外保守黨則在議院以外宣傳主義政策以蒐本黨多得議員人數。兩者同戴一首領。首領的地位即由該黨上下兩院議員及議院候補人大會選出，黨的政策，也由首領幹部會議決定。照例院內黨的領袖便是黨的首領。如果由他組閣的時候，內閣閣員也就是黨的幹部。一旦下野，則組織所謂「Shadow Cabinet」以爲對抗。英國的自由黨也如保守黨一樣分爲院內與院外二部。並且黨的首領，不是由選舉產生的。依照慣例凡現任內閣總理即爲黨的首領，即在下野的時候，也仍然是該黨的首領，自然首領組閣，其他幹部便

是內閣閣員，黨的政策也例由領袖會議決。所以從英國保守黨、自由黨的統制關係看來，都完全是一種領袖中心主義的組織。

因為布爾喬亞政黨是先有首領，然後才組織幹部決定政策的，所以結果不免於領袖中心的組織，正以此故，牠們就像封建諸侯之有采邑一樣。各個布爾喬亞政黨，都有牠的地盤為其根基。這種地盤主義既經確定，往往一個議員在他的地盤以內，不問黨籍有否變動，而始終有當選的把握，以日本的布爾喬亞政黨來說，起初有政友會與憲政會的對峙，其後政友分裂為政友本黨，最後政友本黨與憲政會合併起來形成現在的民政黨，不久，政友本黨中的床次一派又脫離民政黨，而歸政友會。黨籍雖有變更，然而床次在他的選舉區內却始終能當選。這就可以看出地盤勢力的偉大與個人中心的堅強了。

但是有了地盤，有了領袖，甚至於有了廣告式的政綱，然而在財政上如果沒有充分的準備，當選舉時還是不能操必勝之權。所以充分的財政的準備，實是布爾喬亞政黨活動的原動力。

政黨財政的支出，大體也與一般無二，有所謂經常費，有所謂臨時費，經常費大概即是黨部辦公費以及一切經常的支出。臨時費大概指選舉費而言。如在選舉的時候，用之於擴充黨勢，運動選舉的都是。因為有的黨員雖然有能力自己擔任選舉運動費，而有的黨員則不能，於是祇有由黨的財政來擔任。且一個選舉區非常龐大，所有候選人未必為一般人所周知，所以為使候選人見知於選舉起見，候選人例須舉行公開講演，或至選舉區各處巡迴講演，這種借講演會場及旅行的費用，一定也不在少數。據說在美國紐約，借一講演會場並把牠佈置一下（如裝飾、音樂、紮彩等），普通就得需要三千元美金以上。又據日本當選一個議員，普通都需要五萬元以至十萬元。這樣看來，臨時費實較經常費要多到無數倍。

除了經常費、臨時費的支出以外，布爾喬亞政黨還有所謂正當支出與不正當支出二種。正當的支出大概都有賬目可查，因為牠是公開的，如成立選舉事務所，印行散發各種宣傳品，付給書記、辦事人等的薪資等都是；至於不正當支出，例不公開，在各黨的報告書上都把牠隱祕起來，所以局外人簡直不得而知。據熟悉於美國政治及選舉舞弊情形的人說：美

國投票總數的十分之二是不正當的。有一個叫做雷（Ray）的人說：「即在以民衆政治自詡的美國，有很多地方其選民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五是可以買收得到的。」這不僅美國爲然，其他一切布爾喬亞政黨的選舉收買，可以說都成了公開之祕密。因此不正當支出也遠超過於正當支出。

在這裏便發生了一個問題，即這樣一筆巨大的黨費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在表面上總說是靠黨員的黨費，其實這是騙人的，每個黨員很少認眞繳黨費的，就是都如數的繳納，杯水車薪，亦是有限的很。此外能夠比較來得多一點的，便是由黨員出身的官吏及候補人對於黨的捐款。如在美國，凡由黨員出身的官吏必須以其薪金之若干捐納於黨，這在布爾喬亞法律是不允許的，然因爲黨員的官由黨的援助而來，不捐款官就要發生動搖，所以雖然違法，捐款仍然是要捐。但就是這樣，黨費的收入還是有限，這黨費的眞正來源還是只有求之於另一祕密。這一祕密是什麼？這便是資本家拿出牠搾取勞動者的利潤的一部分來辦黨，又拿黨來幫助牠搾取。所以很明顯的，如在日本，政友會的背後便是三井，民政黨的背後便是三菱。資本家以金錢關係控制政黨使爲己用。這便是布爾喬亞政黨的財政之眞正來源，所以布爾喬亞政治，實即金權政治。

第十四章　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n）政黨

第一節　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的形成

普羅列塔利亞特，是現代社會裏兩個主要的對立的階級之一，牠隨着對於布爾喬亞的種種鬥爭，即隨着階級發展的成熟——由自在的階級進於自爲的階級，必然要發展到爲推翻布爾喬亞的政權，建立自己階級政權的鬥爭。這種鬥爭——奪取政權的鬥爭，無疑的便是所謂政治鬥爭了。

普羅列塔利亞特，不僅是現代社會裏兩個主要的對立的階級之一，牠同時還是最强健的擔負歷史使命的階級。這就是說，祇有普羅列塔利亞特，是現在担負創造前進的更高級的更完美的新社會關係的階級。這主要的原因：第一、因爲普羅列塔利亞特沒有任何生產手段，它除了堅决的破壞布爾喬亞制度沒有別的出路；第二、因爲它是創造社會上的一切建設與財產的勞動者，所以只有這是新社會關係的建設者；第三、因爲它的利益與廣大勞苦農民、手工業者的利益相接近，使它能對廣大羣衆起領導作用；第四、因爲它要最終消滅階級與壓迫制度，所以它不僅反對布爾喬亞的壓迫，而且反對布爾喬亞前期的封建壓迫，民族壓迫，所以只有它是一切革命澈底的戰士——社會主義革命，布爾喬亞民主革命澈底的戰士。

在普羅列塔利亞特達到階級的成熟之種種階段，把對於布爾喬亞的種種鬥爭，導引爲政治鬥爭，更使這些鬥爭發展到完全地履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歷史使命之統一的指導機關時，普羅列塔利亞政黨便形成了。這種意義上的普羅列塔利亞政黨，亦就是現在各國的無產政黨。

但普羅列塔利亞特達到階級的成熟之種種階段，即由「自在的階級」進於「自爲的階級」之階段，決不是一蹴而成的，

也不是全階級的羣衆同時變化的。一階級中的一切分子和一切層次沒有同等的生長及發展之能力；又因爲普羅列塔利亞特隨時吸收農民及其他破產的小布爾喬亞進來，使它隨時受到小布爾喬亞意識的薰染，所以不免使階級中有先進分子，也有落後的分子，而引導這些落後分子到自爲的階級鬥爭上去，是一個很長的過程。甚至於這一過程到了普羅列塔利亞特已經奪取政權而得到了統治地位之後，還沒有完成。這在前面已說過，而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的形成，却必然的要由「自在的階級」進於「自爲的階級」後，才有牠的根據。也惟其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羣衆不能同時變化，所以才有普羅列塔利亞政黨之必要。

這裏所說的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牠不是改良主義的政黨，和平發達的政黨；牠在客觀上是擔負偉大的歷史使命的政黨，牠必需能夠打破一切艱巨的困難和障礙，忍受巨大的犧牲和失敗。因爲這一歷史使命——取消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關係，實現更高級的更完美的新社會關係，決非改良和平的方法所能達到目的的。

但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特鬥爭的歷史上，有許多例證，證明普羅列塔利亞政黨往往與名不符實，甚至出賣普羅列塔利亞特利益。這種政黨是和眞正代表普羅利益政黨的性質大不相同，而在國際的範圍內看起來，是屬於第二國際的各政黨，普通稱這些政黨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例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英國的勞動黨、法國的社會黨以及日本的社會大衆黨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這種政黨，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小布爾喬亞政黨。在這裏沒有多說牠們的篇幅。

第二節　普羅列塔利亞政黨及其國際

我們在前面說過、現在的無產政黨，他的組織是國際的，所以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政黨，全部都加入了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是各國眞正無產政黨之國際組織——是他們的最高機關。現在各國的黨，都成爲第三國際的支部，根據牠的指令而活動。這就是說：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爲了遂行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歷史的使命而鬥爭，已經不是各國單獨的鬥爭，而是

全世界統一了的成爲一個有機的全體之階級鬥爭。玆將第三國際的規約，擇要揭示如下：

一、新國際勞動者團體是以完全的廢止階級實現新社會爲唯一目的而努力，爲了組織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共同行爲而設立的。

二、新國際勞動者團體名爲第三國際。

三、所有屬於第三國際的黨，都稱爲某國共產黨（第三國際支部）。

四、第三國際的最高機關，是加盟各團體的世界大會。

五、世界大會選任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

六、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所在地，是由第三國際的世界大會隨時規定的。

七、第三國際的臨時世界大會是依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或依第三國際最近一次世界大會時加盟各黨過半數以上的要求，始能加以召集的。

八、執行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委之於根據世界大會的決議決定爲執行委員會所在地之國家的共產黨。

九、執行委員會是指導從這一大會到另一大會時期中第三國際的全部工作，至少以四國國語來發行第三國際的中央機關報（第三國際雜誌及國際通信）用第三國際的名義發出必要的指令，對於一切第三國際加盟團體及政黨，給與有拘束力的準繩。

十、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有承認雖不曾加盟第三國際，但對牠抱有同情與之常相接近之團體及政黨的代表，能以顧問的資格參加執行委員會的權利。

十一、一切加盟於第三國際或表同情於第三國際之政黨及團體的機關報，負有刊載第三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之公示或決議案的義務。

十二、全歐洲及美洲的一般狀態，使全世界的共產黨，除了公開的團體之外，更有創設秘密團體的必要。

十三、加盟於第三國際的各黨間之政治的交涉，原則上由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來進行。

十四、承認社會主義的原則，在第三國際的指導之下，結合於國際規模上的各組合，構成第三國際的組合部，這些組合在第三國際世界大會時，經各該國的黨派遣代表出席。

十五、先鋒青年國際，也是第三國際的一分子，牠和其他一切分子同樣的隸屬於第三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

十六、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確認先鋒婦女運動的國際書記，組織第三國際的婦女部。

十七、第三國際的各會員，由一國移住他國時，能受到該國第三國際會員方面之友愛的扶持。

第三節　第三國際下的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的特徵

在目前國際社會運動的潮流裏，除了第三國際所領導的各國黨這一潮流外，還有第二國際所領導的各國號稱普羅列塔利亞政黨這一潮流，然而第三國際領導下的各國黨與第二國際所領導的號稱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究有什麼不明的特徵，在這裏必需有所說明，現在試就其主要方面的幾點，分別說明如後：

第一點：與現存國家的關係。在這一點上又可分爲關於國家本質的見解，關於議會的德謨克拉西之見解，關於政府之見解，關於反動勢力之見解四項述之：

（1）關於國家本質之見解，第三國際所屬之各國黨，以爲國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國家是階級的支配機關，因之如果將來無階級的社會實現了，國家就要自然歸於消滅。第二國際則恰相反，他們以爲國家不一定是階級的支配工具，寧可說牠是超階級的，或有機的包容各階級的一種存在。

（2）關於議會的德謨克拉西之見解。第三國際以爲現在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不過是布爾喬亞獨裁的假面具，

所以普羅列塔利亞特，決不能希望以議會的多數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但在目前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下，却不能忽視議會這一民主的機構。第二國際則不然，他們以爲現在政治關係的特徵，是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特，在某一程度上，已處於勢力平均的狀態。因之在包容各階級的議會裏，普羅列塔利亞特如能漸次占得多數，結局，政權即會自然落於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手。

（3）關於參加布爾喬亞政府的見解，第三國際認爲與布爾喬亞政黨不能有一瞬間的妥協。縱在某種條件下，需與其他政治勢力形成統一戰線，而組織上，政治上，必需保持絕對的獨立性。第二國際則認爲與急進自由主義布爾喬亞政黨，成立聯合政府，在策略上有時應服從其領導，即領導權應屬於布爾喬亞。

（4）關於反動勢力的見解，第三國際認爲在革命的現實鬥爭中，反動的壓迫政策，是必然要來的，絕不能因壓迫而即停止鬥爭。而且反動的尖銳化，或者還是使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政治鬥爭尖銳化的條件，第二國際則認爲反動之來，必然對於勞動運動，引起深刻的精力消耗，故因環境不好而停止鬥爭，是正當的。

第二點，是兩者——第三國際、第二國際——對於資本主義的見解。關於這一點，又可分爲對於資本主義運命的見解，對於帝國主義克服的見解兩項述之：

（1）對於資本主義運命的見解，第三國際以爲資本主義的生產，現在已達到了牠最後的階段，即帝國主義的階段，牠已經是無路可走，其崩壞的運命已迫在眼前。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不是同一速度的，雖不能夠在一天的日子同時崩壞。但每一國的資本主義，都是世界資本主義之一環，必然要走着同一形態的過程。而第二國際則以爲資本主義的經濟，並未走到發展的盡頭，雖然因第一次歐洲大戰，表現出來已到了絕路的樣子，但不久就恢復了常態。總之資本制內在的矛盾，尚沒有逼近山窮水盡的境地。至少資本主義，目前還不會急速的崩壞；再則資本主義崩壞的過程，其藉以決定的諸條件，各國決不是同一步驟。並且普羅列塔利亞特方面的各種條件，也還沒有充分成熟到全生

產組織的再建設。

（２）對於帝國主義克服的見解。第三國際肯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末期的必然現象，要克服他，除了由資本主義本身的克服以外別無其他的辦法，即祇有實行革命，從各國內部去克服資本主義。第二國際則以為帝國主義，可由「超帝國主義」來克服。一切促進和平的國際聯合機關，即是走向「超帝國主義」去的徑路，因之如現在的國際聯盟，亦儘可看做走向「超帝國主義」去的第一步。再則各帝國主義內部，戰爭的機會，也會隨着普羅列塔利亞特參與政權的程度之增大而減少。

第三點，則為兩者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現狀救治策的見解。關於這一點，第三國際認為一切的要求，都必需為促進前線的政治鬥爭的題目。即普羅列塔利亞黨的第一個目的，必需是使階級意識及階級對抗的情勢尖銳化，促進組織的鬥爭性及未組織者的鬥爭之組織化。因之各個要求的內容，不一定要在現實上是妥當的。而第二國際則以為現在的要求，其主要的為產業立憲制，即對於產業的經營管理確立勞動者的參與權，基本產業的社會化，布爾喬亞剩餘所得的社會化，確立生活工錢制度，促進工會運動及合作運動的發達以及勞動所得之獨立並資本化，即促進勞動銀行之設立，普及和發達等等。並且各種要求，必需其內容本身，在現實上是妥當的。

第四點，則為兩者對於與其他階層的關係之見解。關於這一點，又可分為對於農民之見解，對於小布爾喬亞之見解二項述之：

（１）對於農民之見解，第三國際跟着奪取政權的鬥爭，日益迫切，於是需要獲得小農及貧農的政治勢力，便愈加成為必要，所以他們始終不曾忽視農民革命的力量，然而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他們也不曾忘記在工業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領導之下把農民組織起來的方針。而第二國際則從來對於農民方面不很看重，但近來才開始努力獲得農民並且漸次伸展勢力於這方面來了。

（2）對於小布爾喬亞的見解。第三國際對於小布爾喬亞，也注重把他們爭取過來，領導權則須絕對握在普羅列塔利亞特手裏，即小布爾喬亞，決不能使他參與鬥爭的領導方面。——不過代表普羅列塔利亞特意識感情的知識分子出身者，是可以站在領導的地位的。而第二國際對於獨立的小工商業者，下級官吏人員，下級工商業使用人，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的所謂小布爾喬亞，認爲應當廣爲包容，就是在鬥爭的領導方面，也不應當排除他們。

第五點，是兩者對於哲學宗教的態度，現在分別述之如下：

（1）哲學的唯物論，第三國際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爲一切理論及行動的基準，同時以爲唯物史觀，須以全世界觀的唯物論爲基礎，即以辯證法的唯物論爲基礎。第二國際對於唯物史觀，有完全承認或附條件承認的，也有完全不承認的，就是在所承認的一部分，也不一定以爲必需立脚於全世界觀的唯物論上。

（2）對於宗教的態度。第三國際以爲在理論與實踐上，普羅列塔利亞政黨，都不能不嚴重的執行反宗教的鬥爭。即在理論方面，從唯物論的立場說，當然要絕對排斥宗教；在實踐方面，「宗教是鴉片」，是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麻醉劑；從這個見地說，當然也要絕對排斥宗教。然而第二國際則以爲宗教是純粹個人的問題，因之信宗教與否是各個人的自由問題。

第六點，則爲兩者關於國際聯合的組織問題。第三國際是一個嚴密的中央集權的統一體。凡屬於第三國際的各國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無論那一個，都不過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因之各國黨，須依照國際本部的指令而行動。這是從牠上述關於資本主義現階段的見解產生出來的必然的結論。而第二國際則是一種鬆緩的協議團體，參加第二國際的各國普羅列塔利亞政黨，是各自獨立的。

以上是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在國際運動上，對於各種問題斷然不同的幾個主要點，即幾種顯然相反的特徵。我們把兩者比較研究，便能舉加斷出第三國際及其所屬各國普羅列塔利亞政黨的特徵來。

第四節　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政黨之史的發展

——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

自十八世紀末歐洲發生了產業革命後，隨着資本主義往前發展，英、德、法等國的工人運動也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發展起來。可是那時工人的組織、運動，都很散漫、零星，領導者也未建立。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資本主義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工人的組織、運動，也隨之嚴密、高漲，特別是在英、法、德等國，於一八四六年便在德國成立一個秘密宣傳團體，這就是所謂「共產主義者同盟」。一八四七年春，馬克思、恩格斯兩氏亦加入其中成了這一組織的領導者。這一組織可以說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初步形式。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在倫敦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推舉馬克斯、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公布，它便立刻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旗幟。「共產黨」這個名稱，正式被工人運動採用，這是第一次。但自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壓迫革命勢力極凶，尤其對於工人運動的組織，於是這一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便在一八五〇年結束了。合計自成立至結束，只有短短四年的歷史。

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是西歐革命運動低落時期，國際工人運動陷於停頓狀態。但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矛盾，卻在不斷的發展。一八五七年資本主義的恐慌發生了，一八六一年南北美戰爭又爆發，西歐斷絕了紡織工業的原料，大批工人更加失業，工人運動不得不再起。一八六二年，許多工人代表都集中到了倫敦，使得各國工人發生了緊密的聯繫，於一八六四年各國工人代表在倫敦開會，便組織了一個「國際勞動者協會」，這就是無產階級政黨歷史上所謂「第一國際」。但第一國際的組織成分，在內部是不純粹的。領導者主要雖是馬克思、恩格斯，但同時，還有法國的蒲魯東派，俄國的巴枯寧派、德國的拉薩爾派、英國的工聯主義派。因此，第一國際的時期，可以說是馬克思、恩格斯與各派鬥爭的時期。馬、恩兩氏在共產黨宣言中，及在國際勞動者協會行全世界無產者宣言中，都指出資本主義必然走到滅亡，必然代之以社

會主義社會，但它的條件是革命，是工人自己起來爭取。而當時的空想家及無政府主義者，都不懂得資本主義社會本質及其發展法則，忽視創造新社會的力量忽視勞苦大衆解放的條件，想用和平的方法代替鬥爭，想以說明的方法使富有者統治者覺悟，這當然是一種空想。無政府主義者却主張小的私有財產不動，於二十四小時內消滅國家，反對工人運動的組織性及集中制，實際上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工人到勝利之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第一國際，即告終於一八七二年。合計自成立至告終，不過短短八年，它存在的時期雖短，但它在政治上的意義却很大。因爲它奠定了國際工人運動的理論基礎，它領導了巴黎公社的實際鬥爭，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

巴黎公社失敗之後，西歐對於工人運動的壓迫與改良政策的影響，使工人運動一時陷於低落狀態，到一八八〇年，工人組織才又逐漸恢復，英、法、德等國，重新組織各種勞動團體，一八八九年各國工人代表聚於巴黎，卒於一八九一年在比國京城布魯塞爾開聯合代表大會，成立了第二國際。第二國際所屬各種組織，通稱社會民主黨。它的組織雖擴大了，但嚴格說來，還夠不上一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只是交換意見互通消息的機關。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並未包含在組織裏面去。

第二國際是處在資本主義比較穩定時期，它把各國工人運動拘限在國會之內，企圖由國會多數和平達到社會主義，這種錯誤是由它一貫的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的，這在上面已作過詳細的比較研究，但這就是第二國際大多數領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公開擁護帝國主義戰爭，保衛帝國主義祖國，掠奪被壓迫民族的來由。這時，只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始終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堅決的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主張反對戰爭，主張變帝國主義大戰爲國內戰爭。所以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及意大利社會黨一部分外，第二國際的大多數都違反了過去歷次的決議案，而使第二國際本身破產了。然第二國際也不是全沒有它的歷史意義，它的主要意義在於它組織了和訓練了各國無產階級，擴大了各國工人運動的組織基礎。

列寧所領導的俄國布爾塞維克，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或在第二國際內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一切流派鬥爭，所以列寧主義成爲了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他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就主張改變黨的名稱，組織第三國際。他以爲應當像馬克思恩格斯一樣，稱自己爲共產黨，所謂社會民主黨在科學上說是不通的。因爲社會主義必然要發展爲共產主義，眼光需看得更遠一些，民主主義是國家形式之一種，國家不能成爲一個永久的目標。這是列寧主張改黨名的理由，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所以他即發起組織第三國際，亦即所謂共產國際。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國際開成立大會於莫斯科，出席代表五十人，代表二十四個黨的組織，並通過國際章程十七條（如前引）發表了反對第二國際的宣言，成立了國際執行委員會，選舉了主席團作爲大會閉幕後全世界各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機關。這便是全世界無產政黨之史的發展過程——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的過程。

第三國際自成立到現在，曾經領導過世界歷次革命運動，特別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德國革命運動。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國總罷工運動，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二八年七月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反對戰爭決議」、「殖民地問題決議」等，一九三五年七月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的決議案，提出國際爲擁護和平與反對帝國主義而鬥爭的任務。它現在包括六十四個支部。

第五節　蘇聯聯共黨史發展過程簡述

俄國的無產政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工黨，是在與一切錯誤觀點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首先是與俄國民粹派的鬥爭。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普列哈諾夫及所組織的「勞動解放社」，已給了民粹主義以決定的打擊，九十年代列寧在思想上又完成了粉碎民粹主義的任務。勞動解放社成立於一八八三年，在理論上建立了社會民主派的基礎，並向迎接工人運動走了第一步。一八九五年，列寧組織了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成爲俄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一個萌芽；據

着在工業中心及邊疆，都創立了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在一八九八年便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但眞正的政黨並不算創立，因爲那時還沒有黨綱、黨章、及領導的中心。在眞正統一的黨未創立前，列寧主張先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報紙，這便是火星報。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火星的出版，表示俄國工人政黨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即從散漫的集團和小組織進到組成統一的社會民主工黨時期。這時工人政黨主要的敵人是「經濟派」，他們否認這種政黨的必要，火星報恰恰打擊了他們。

自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俄國工人運動在生長着，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也在生長着。在反對「經濟派」的鬥爭中，火星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勝利。並且準備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三年），成立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通過了黨綱和黨章，並成立了中央領導機關。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出現了兩派，即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這時兩派主要的分歧是在組織問題上。孟塞維克和「經濟派」日益接近，代替了「經濟派」在黨內的地位。他們反對戰鬥的統一的黨，他們在黨內實行分裂的路線，在普列哈諾夫幫助下，一時竟奪取了火星報和中央。這時，布爾塞維克採取了制裁分裂者的辦法，動員地方黨組織，主張召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發行自己的報紙——前進報。

這樣，便達到俄國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即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夜。這時正在日俄戰爭結束的時期。自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短短地三年之中，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得到了異常豐富的政治教育的訓練。這是過去和平發展的三十年間所不能得到的。革命的幾年把和平發展條件下幾十年不能弄清楚的東西都弄得明明白白了。革命暴露了沙皇制度是人民殘暴的敵人，自由派資產階級不是想和人民聯盟，而是想和沙皇聯盟。革命指明了，只有工人能成爲民主革命及一切革命的領袖，貫徹革命到底，開創到社會主義之路。最後，革命指明了勞動農民，總是能和工人聯盟的惟一偉大力量。在第一次俄國革命時，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兩條路線鬥爭着。布爾塞維克採取的方針，是展開革命，以武裝起義推翻沙皇制度，爭取工人領導權，孤立資產階級立憲民主派與農民聯盟，創立以工農代表組成的臨時革命政府，貫徹革命到底。相反地，孟

塞維克採取的方針，是以改良沙皇制度來代替武裝起義，以立憲民主派的領導權來代替人工領導權，以和自由派的聯盟來代替和農民的聯盟；把國會作爲革命力量的中心來代替臨時革命政府。

很明白的，在這樣重大的意見分歧之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實際上分裂成爲兩黨，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想變更這種情形沒有做到，在第五次代表大會當總結革命運動時，才斥責了孟塞維克路線是妥協的路線，批准了布爾塞維克路線是革命的路線。

可是自一九〇八——一九一二年，是革命工作最困難時期。這時布爾塞維克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即從反對沙皇制度的直接鬥爭轉變到鬥爭的迂迴道路。在反動的極困難的條件下，它利用了一切最小的合法的可能以保持和羣衆的聯繫。革命失敗（第一次革命）後，對革命失望及離開黨的知識分子，例如波格達諾夫、巴柴洛夫等，對黨的理論基礎作機會主義的攻擊。這時，布爾塞維克成了黨內唯一的力量，只有它保持着對黨綱的忠實，團結布爾塞維克的基本骨幹去保衞黨及黨的革命原則。相反地，孟塞維克此時更加離開革命，變成取消主義者，主張取消非法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企圖組織自己改良主義的政黨。另一方面，還有一部分不了解迂迴策略的布爾塞維克分子，主張拒絕利用公開的可能，主張召回國會內的工人議員，他們以左的辭句在本質上和取消派聯合起來，互相呼應。取消派與主張召回國會內的工人議員的召回派聯合爲一個總的聯盟反對列寧，這就是托洛茨基組織的八月聯盟。在反對取消派與召回派的鬥爭中，在反對八月聯盟的鬥爭中，布爾塞維克蒸蒸日上，勝利地保障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時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一九一二年一月普拉格代表會議。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把孟塞維克驅逐出黨，永遠地結束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形式地統一在一個政黨之內的情況。普拉格代表會議安放了新型的政黨，即把布爾塞維克從政治集團形成爲獨立的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形成爲列寧主義的政黨。普拉格代表會議所實現的從黨內清除機會主義者及孟塞維克，對於黨和革命的發展有着重要的決定的意義。假如布爾塞維克不把工人事業的變節者驅逐出黨，那麼，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布爾塞維克就不能鼓起羣衆來奮

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大戰發生了。它的發生是由於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是由於主要列強間均勢的破壞，是由於帝國主義者有戰爭和新均勢方法來重新分割世界的必要。假使第二國際不違反歷次大會反對戰爭的決議，假使他們積極起來領導工人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反對戰爭的點火者，則大戰也許不會有這樣破壞性質，不會那樣大規模的展開。這時，只有布爾塞維克依然效忠於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事業而組織國內戰爭，以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成爲唯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所有其他第二國際各黨，因上層分子領導的錯誤，都作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倒到帝國主義方面成了大戰的幫凶了。戰爭既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反映，它同時，更尖銳化了這一危機，削弱了資本主義本身。俄羅斯的工人及布爾塞維克黨，乃是世界上第一個勝利地利用資本主義弱點，突破了帝國主義陣線，推翻了沙皇制度，創立了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黨。

這便是二月革命的勝利，小資產階層的廣大羣衆，甚至一部分士兵和工人，因被革命的初步勝利所陶醉，都對於克倫斯基爲首，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參加的臨時政府予以支持；而那時擺在布爾塞維克面前的任務，便是向陶醉於初步勝利的工人，兵士，乃至小資產階層羣衆，說明距革命的完全勝利還很遠，當政權操在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手中，而蘇維埃由妥協派——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操縱的時候，則人民便得不到和平，得不到土地，得不到麵包。要獲得完全的勝利，還必需再向前進一步，把政權交給蘇維埃才行。這於十月革命實現了。這時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便於一九一八年三月第七次全俄黨大會改稱共產黨，又於一九二六年以後，改稱聯邦共產黨。這便是聯共黨史的發展過程之簡單的記述。

第十五章　中國的政黨

第一節　中國政黨之史的觀察

政黨是近代社會階級對立尖銳化的產物，任何民族國家的歷史一走入近代，必然因其階級分化之日趨明顯，鬥爭之日趨尖銳，而反映出黨的組織來，並且因爲社會階層之特殊的複雜性反映出政黨的複雜性來。中國在這一點上，決不能是例外的。但說到中國，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政綱與革命要求的政黨之起源，都不能不首推孫中山先生組織之興中會。它在一八九四年成立於檀香山，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爲其政治目標。其後，即一九〇九年，孫中山先生把興中會改組爲中國革命同盟會，正式成立於日本，改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民國』爲四大政綱，卒於辛亥一役（一九一一年），完成了民主革命之一部分的任務。這是中國黨的革命派。但在他方面，有與革命派對峙的，那便是康有爲、梁啓超所領導之君主立憲派，亦稱保皇黨。君主立憲運動之發生，實導源於一八九八年康有爲等所發動之變法維新，結果演成戊戌政變，他們的中心主張，爲擁護清室，在清室統治之下，謀政治之部分的改革，而否認革命式的根本改造。終清季之時，兩派成對峙之勢，即於民國成立後十年中，亦尙隱然具有對峙局面。同盟會在民國成立後，遂演爲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立憲派在民國成立後，遂演爲共和黨、進步黨、研究系。

民國元年八月，成立於北京的國民黨，是合併那時的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諸團體而成的。那時的國民黨已不同於同盟會時代，祇圖黨勢擴張，不求主義貫徹，甚至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綱都認爲危險思想而完全拋棄了。因此，中山先生另組中華革命黨，希求恢復原來革命精神；而這一工作，却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爲中國

國民黨時，才能底於完成。所以民十三年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在中國的革命史上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它不僅恢復了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而且使中國革命，中國國民黨呈現一種新的姿態——走上真正的三民主義革命的途程，值得我們特別回顧一下。

此外類似於康、梁的改良派的組織，在清季還有資政院內各資政員——以張謇爲首所組織之憲友會，於一九一一年六月在北京成立，而資政之保守分子，官僚分子，亦組織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等。民國成立，新黨林立，始則國民黨、進步黨，繼則在南北兩國會中，北方有安福俱樂部、研究系、討論系、交通系、新交通系等，南方則有政學會、益友社、民友社等。形形色色，爭權奪利，已失政黨本意，有人把它叫做變黨時期，這是很確實的。

但民國以後，革命之黨，除中國國民黨外，還有中國共產黨。中國因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期間，民族資本已獲相當發達，又外受蘇俄十　之刺激，內受五四運動之激盪，所謂社會主義運動，乃盛行於民國八年之交，介紹社會主義的刊物及研究社會主義的團體，有如雨後春筍，到處萌芽而長。其最著的便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它便是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前身。開始只在研究馬克斯主義，後於民國九年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直至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才正式成立，次年加入第三國際，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其機關報紙，有嚮導、中國青年等，最初並沒有什麼力量，但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爆發了二七大罷工，其力量便漸漸表現出來了。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係中山先生採取聯俄、容共、工農三大政策，聲勢乃日益擴大，中國革命也日益向前發展。至五卅運動以至省港大罷工，其勢力乃遍佈於全國。那時，因國共兩黨之切實合作，各黨派及各種勢力，各種社會階層，在孫中山先生與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形成了堅強的國民革命的統一戰線，所以就產生了北伐的大勝利，爆發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共產黨可以說是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革命派。但在另一方面，也有所謂社會改良派的出現，這便是所謂基爾特社會主義派，介紹這一派學說最力的，是張東蓀、郭夢良等，其發行刊物有解放與改造及時事新報副刊。它的出現也在民國八九年間，他們是想以基

爾特社會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以改良主義代替革命主義。但其力量甚小，說不上什麼對峙局面，也沒有什麼組織。此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後，還有以陳銘樞爲領袖的所謂社會民主黨（但他們自己不承認），以鄧演達、譚平山爲領袖的第三黨（他們自己也不承認），其本質，其客觀意義，也多少只是代表小市民的政治要求。實則前者並無社會民主黨這一名稱，更不曾與第二國際有什麼聯繫，後者也不叫做第三黨（開始叫做中華革命行動委員會，後改稱中華革命黨，意在繼承孫中山先生中華革命黨的遺志）。福建事變以後，前者改爲中華民族解放大同盟，後者改稱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但抗戰不久，前者即自動宣言解散，以符精誠團結，一致對外之旨。

再則急性的寄於幻想的小市民的組織，還有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派。這一派雖在目前幾爲一般人所忘記，然自民元至民國九年之間，他們先後有晦明學舍、心社、華社、實社、無政府主義同志會、進化社等團體，其發行報紙有自由、互助、自由人、學匯、春雷、雞鳴、洞庭波等刊物。

中國一般政黨，還有大家所熟知的國家主義派，現改稱青年黨。其分子爲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啓天、常燕生諸氏。國家社會黨，其分子爲張君勱、張東蓀、陳鼎揆、羅隆基、諸青來、湯薌銘諸氏。

第二節 中國各政黨的現狀及主張

本節的標題，雖然是中國各政黨的現狀及主張，但決不能把上述歷史上的各黨派，一一加以說明，這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不必要。現在我們先就中國第一大黨，握有政權的黨，正在領導抗戰建國的黨，即中國國民黨說一說。

中國國民黨，是爲中國革命奮鬥五六十年，根據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及其全部遺教徹底革命的黨。中山先生說：『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及其對外，對內政策，乃至建國大綱所規定，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政治、經

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建國步驟與規畫，尤爲詳盡而正確，試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免諸權也。……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主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之爲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法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舉此二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得良好之基礎。於此猶有爲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爲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農民缺乏田地，淪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整頓水利，移殖荒郊，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或爲高利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爲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當爲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卹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

以上是它的全部主義乃至全部政治哲學及革命的政治、經濟方案。抗戰以來，特召開全國臨時代表大會，發布劃時期的有革命意義的臨時代表大會宣言，根據當前迫切需要，制定抗戰建國綱領，爲全國上下共同一致奮鬥的目標。改組總理制爲總裁制，以全民族領袖蔣委員長爲總裁，同時，又取消預備黨員制而組織與黨接近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陳誠等主持青年團工作。它主張在目前抗戰與建國同時並進，主張容納各黨派、各階層形成堅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抗戰到

治，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它是革命的黨，是目前正在領導抗戰建國的惟一大黨。

中國共產黨，它信仰並爲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或者說信仰並爲實現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而奮鬥。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落後的國家，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國家，它是徹始徹終爲反對封建制度、民族壓迫的民主主義或民主革命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它的一切運動或革命任務，正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性的，決沒有超過這一範圍而走到盲目的無產階級革命．試看一九二七年後，中國共產黨號召中國勞動者爲民主革命而奮鬥的綱領，便可明白。其綱領：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的自由權；四、（略）；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使耕地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士兵土地和給與工作；九、取消一切軍閥政府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與蘇聯。這些任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不但未超過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的範圍，而且客觀上是更能促進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因此，這一綱領如能實現，不但有利於工人與農民，而且也有利於民族資產階級。

由於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四省，由於日寇之繼續侵略華北以至於全中國，中華民族的深刻危機擺在整個中國人民的面前，民族矛盾（中日矛盾）超過了一切國內矛盾。根據這一歷史的新事變，根據這一迫切的具體情況，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五年（民廿四）發布了有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停止內戰，團結一切抗日黨派去共同抗日，以保衛中華民族之獨立生存；並且爲了挽救民族危機，爲了共同抗日救國，它自願作了一些必要的原則上的讓步，例如把蘇維埃政府改爲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停止反對政府的武裝起義與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把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這一提議得到全國愛國人士熱烈擁護，西安事變，竭力保衛全民族領袖蔣委員長出險，後亦得到中央政府、中國國民黨，蔣委員長的同意，國內的和平統一得以實現，國、共的光榮合作，亦復開始，在抗戰建國的基礎上，實現了國內各黨派各階層之空前的團結與統一。

抗戰開始以後他們發表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及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它對目前革命的認識及主張，都可以從這些文獻中看得出來，讀者可自行參考。

此外有一個集團，本來不是什麼政黨組織，而卻富有强烈的政治性，從『抗日救國』到『抗戰建國』這一偉大時代的轉變中，具有特殊意義值得我們特別指出的，則有所謂全國救國聯合會。它的產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一步吞併華北五省，冀東傀儡政權和北平冀察政委會成立的時候。特別是一二•九、一二•一六華北學生大示威，深刻的刺激了這些熱心救國的志士，先後在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國會，婦女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等團體，結果，便於一九三六年（民廿五）五月三十日，由各地救亡團體或個人，在上海成立了這個全國救國聯合會。當即通過了初步政治綱領及宣言。那時，華北的問題很緊迫，因此，他們對於華北事件的主張：一、以發動一個衞國之戰的決心去應付華北事件，二、立刻發動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根本消滅走私，同時，表示抗戰決心。那時，他們認爲：過去互相間曾經發生政治爭奪的各黨各派，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是必然的。但是因爲互相猜疑和互相警戒的緣故，內爭便要依然繼續，而一致對外便依然不可能。這種僵局的存在，要使每一個關心國事的人民感覺到憂慮與苦悶，要使民族永遠陷在自相殘殺的深坑裏面，以至於消滅。大會（按即救國會成立大會）認爲這種危險僵局的打破，是人民救國陣線當前最迫切的主要任務；也只有人民救國陣線的力量，才能打破這種僵局，才能促成各黨各派一致抗敵的聯合戰線，以樹立民族的生機。因此大會很鄭重地向各黨各派建議：一、各黨各派立刻停止軍事衝突；二、各黨各派立刻釋放政治犯；三、各黨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國陣線願爲介紹，進行談判，以便共同製定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四、人民救國陣線願以全部力量保證各黨各派對於共同抗敵綱領的忠實履行；五、人民救國陣線願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黨派違背共同抗敵綱領，以及種種一切足以削弱抗敵力量的行動。

這不過是其救國主張之犖犖大者，然在抗戰已經兩年的今天看來，他們不但對於時局的認識，國難的供獻，沒有什麼

錯誤、而且對於抗日救國的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有很大幫助的。雖然他們用了人民救國陣線這一名詞，但這只是表示他們那時的組織、純粹是人民救國的結合。決不是表示與政府對立，而且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想促成各黨各派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不是要形成一個像法蘭西、西班牙一樣的反對內部敵人——法西斯的「人民陣線」。他們的領導者是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王造時、史良、李公樸、沙千里等所謂七君子。然在抗戰開始以後，他們便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從事各種抗戰建國工作，而且連他們的獨立組織——救國會都取消了，藉以表示他們過去現在之純潔誠懇，即表示他們在政治上並無成見，正如他們一開始所再三聲明的一樣：「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權的企圖，而不過是盡一份人民救亡的天職」。

第三節　中國國民黨的特徵

中國國民黨是當前惟一大黨，握有政權的黨，正在領導抗戰建國的黨，已如前述。我們對於它必需有比其他政黨更具有明確之認識，即對於它的特徵必須堅實的把握定。著者與黃松齡、馬哲民兩氏，在集體寫成的貢獻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一文中，曾由黃松齡氏執筆在這一部分有詳盡的發揮，茲錄其全部如次：

第一，中國國民黨是代表掃除封建殘餘外廣大國民階層利益而表現爲全民性利益的革命政黨。這和那僅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如英、法、美、各民主主義政黨，僅代表勞動貴族及小資產階級利益如第二國際系統下各改良主義政黨，僅代表農民利益如俄國民粹黨、與本應代表進步的資產階級以至無產階級之全民性利益，而竟然排斥無產階級以與封建殘餘相妥協之諸落後民族之土耳其式國民黨，埃及、印度式國民會議之類溫情主義的民族解放政黨，以及以代表無產階級爲中心的第三國際之下的共產黨，均不相同；與以金融財閥爲領導，集中一切反動勢力所組成之帝國主義垂死狀態的法西斯政黨，更取尖銳對立。這固是因中國歷史條件特殊，使國民各階層有同時要求民族解放、民主權利、民生幸福使然；同時，却亦由中

山先生之偉大創造，能將客觀實質反映爲三民主義體系之故。並且三民主義不止於這種客觀之單純反映，即絕不止是將各階層間之利害，使之拘限於平面結合，壓抑矛盾以維持現狀；而是更進一步將廣大勞苦羣衆爲第一基礎，以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政策與直接民權制、推進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於最高階級，使之接近於社會主義之門。且以節制資本與國家經濟建設，使資產與社會兩種要素，經由長系列的革命與建設的發展過程而互相滲透統一地轉變爲社會主義前途。

第二、中國國民黨具有爲任何政黨所不能比擬的博大性。一方面因爲中國國民黨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政黨，又因近代化經濟之發展，全民中因利害分化而引起階層偏差爲歷史所不可避免，因而特殊的更適合的代表各階層利益偏差之其他政黨，也必然會相因而生。於是奉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也就天然具有包容各黨派、領導各黨派，於長期革命與建國過程中，共同努力，相互策勵，以求偏差利益之平衡發展，最後做到偏差利益之解消以減少革命過程的波折，縮短革命歷程。另一方面因中國革命過程的長期性，反映國民黨具有長期革命任務；同時，因中山先生的偉大與遠見，能使三民主義與國民黨適應於每一過程的歷史條件，不斷充實內容，不斷改組機構，以適合新的要求，吸收新進份子，剔除腐舊分子，永遠向前發展，並因保持革命傳統於不墜，表現於這兩方面的博大性，實爲中國國民黨最優異之點。

第三、中國國民黨的青年性。青年羣衆尤其是智識青年在中國近代史上實具有革命的先天性與國民黨的發展密切不可分，國民黨在組織成分上，實同時爲青年大衆黨，中山先生實同時爲青年領袖。國民黨每一次改組，實以吸收青年幹部爲對象。同盟會的基幹，即屬東西洋留學生，十三年國民黨改組與黃埔軍校建立，即是爲從五四到五卅數年間廣大的青年革命運動所推進。現在爲蔣總裁所領導之三民主義青年團，亦是以三年來普遍全國的青年革命運動爲其社會基礎。文化落後的中國，智識青年形成了國民中之先覺成份，加以智識青年本身所具有的比較超階級性，超黨派性，遂最好成爲國民革命、民族革命的担負者，以及維繫各革命勢力之團結的契機；現階段的統一戰線，亦是以革命青年羣衆爲結集的主要鏈環之一。國民黨的全民性，博大性，往往多由其青年性表現出來；反之國民黨的青年性，實同時爲其全民性，博大性之重要

反映。

第四、中國國民黨具有長期革命性。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革命上第一次從舊式農民暴動轉變爲新式民主革命的一個契機。反滿清、反禮教、以及土地公有三大要求，與歐洲十五、六世紀以農民戰爭爲中心，配合着宗教改革、民族解放具有同樣歷史意義。因爲它是動搖封建根基，開闢民主道路的先鋒，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平均地權思想，實受此影響。太平天國之後的李鴻章政權，是中國地主階層，感受革命刺激，自覺的企圖向資產階層轉化之開始。這與歐洲因農民戰爭之歷史的反激而首先典型的表演於英國，其次表演於德國，更其次表演於東方之明治維新者，亦具有異形同質的意義。李鴻章的這種新企圖，因比日本更遲了一步，致阻斷於甲午戰爭；但比起滿清來，仍是一種進步的力量，故中山先生曾勸鴻章自爲。甲午而後，改良式的近代化道路，已走不通，中山先生遂正式開始有組織之革命運動，以推翻滿清，樹立共和爲綱領，而與當時康、梁維新運動對抗。一九〇五年後，適應日俄戰後國內外條件，遂改組興中會爲同盟會，正式加入平均地權爲革命綱領，完成三民主義之最初步體系。辛亥革命成功後，又以袁世凱爲象徵之封建勢力，受支持於帝國主義以打擊幷分化革命勢力，遂第二次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藉保持革命傳統。推翻袁世凱後，國內封建勢力已喪失了統治能力，新興資本主義因歐戰得到相當發展，且以歐戰後世界革命運動高漲，蘇聯十月革命成功，於是在國內亦開始了羣衆性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推進了滲透社會主義意味的國民革命的高潮，於是使三民主義更具備了現實內容與社會基礎。中山先生遂在此時期完成了三民主義全體系，並吸收前進青年，容納共產分子，確立聯俄及擁護工農利益的政策，改組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爲中心的國民革命軍，乃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初步成功。一九二七年後，雖因國內外多變，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波折，幸賴有蔣總裁繼承中山先生革命傳統而爲領袖，完成國內和平統一，集中全國力量，結成統一戰線，領導全國民衆及各個黨派，更進一步推動革命走進最後完成之途的抗戰建國現階段。可見國民黨的革命傳統，上繼太平天國起，下達於最新社會建設完成止，實經歷了在中國近代史上所縮影，所特殊表演的全資本主義時代所必經的

各個民主革命階段之全過程，以及將來由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各過渡期革命的全過程。換言之，即從最原始性的農民戰爭起，經由無數系列到達民主革命之徹底完成，民族革命之徹底解放，以走進社會主義之門；復經由新中國之建設過程，使民生主義徹底實現，以走上社會主義途徑，達到大同世界之實現爲止，都是國民黨的任務。一切資產階級政黨，雖在反封建時期，有其革命性，但亦有因社會革命之抬頭，轉而與封建勢力妥協的反動性，且以經過長期統治過程，遭受內外矛盾的威脅，更必然變質而爲反動，以至通過法西斯形式而走進墳墓。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尤其比較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雖能徹底完成民族的、民主的，社會的革命過程，但對於初期之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則在理論上或事實上，並沒有負担的任務。至於其他一切改良主義的政黨，雖於民主革命過程中有其動力，但沒有高階級的革命理想。其他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政黨，雖其歷史條件，也應該具有長期革命性，但因無此偉大領袖的創造與領導，故未能在理論上表現爲體系化，在行動上表現爲現實化。這是國民黨所特具的又一優異之點。

第五、中國國民黨上述諸特徵表現於政權上面規定了國民政府的特殊任務。國民政府這種政權，在形式上頗類似於西方近代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謂「第三政權」。像法國大革命後所形成的拿破崙第一政權，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後在法國形成的拿破崙第三政權，稍後又在德國形成的畢士馬克政權，以及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形成之克倫斯基政府；但實質上則完全不同。拿破崙第一政權建立在資產階級、小市民以及廣大農民各種矛盾均衡之上，用以抵抗壓制國內外封建勢力的反動，保持大革命的果實，而它的主要任務，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發展資本主義前途。拿破崙第三與畢士馬克政權，建立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均衡之上，主要任務，在於將無產階級利益均膠於資產階級利益之中，以扶助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過拿破崙第三是用較廣大的民主制度，畢士馬克則用改良的社會政策作爲矛盾調節的機構，有所不同罷了。克倫斯基政府，則更包含有地主成分，其是形式上比沙皇較爲民主，因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勢力，突進發展，故其命運，比其他第三政權特短。國民政府則是建立在工農大衆爲中心的各階層共同利害關係之上，代表以工農大衆爲中心的各階層共同利

益。其基本任務，在於達成三民主義，確立一定方針，通過一長系列的革命與建設過程，使各階層的利害矛盾，適應着每一過程，得到合理的解決，同時，更能有機地互相滲透融和向新的前途轉化。換言之，國民黨的政權，是從有黨性走到社會性，從多階層內容之全民形式走到無階層差別之全民實質的一種有無限發展性的政權。這與西方現在已經有（法國、西班牙）將來更要發展的聯合政權，因今後世界革命，已經合流——具有相同的歷史意義與任務。不過一則是代表西方式的革命政權，一則代表東方式的革命政權，在內容所代表的階層略有廣狹不同，在形式上它是由人民陣線表現為各黨派並行聯合的政權；國民黨政權，則是以國民黨為領導，容納各黨派於三民主義體系之中和統一在一個民族戰線之內所組織的國民黨政府。

第六，中國國民黨上述諸特徵之現階段的發展。國民黨的諸特徵，發展到現在，則結晶表現為下列基本三點：一，現在是以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革命為中心，連帶實現民權民生，走進了完全實現三民主義革命的最後境界；為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遂使國民黨的全民性，博大性，青年性，進一步轉化為有機滲透各別階層利害，因而能團結各個黨派力量於三民主義體系之下，能結集全民族於抗戰建國綱領之中，構成以國民黨為領導中心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不是國民黨以外的東西，是國民黨之自我發展的一個更高形態與國民黨為不可分離的統一物，即是國民黨的內在發展之外的表現，同時，也是三民主義之具體化，現實化的一個契機。在長期統一戰線之抗戰建國過程中，將使各別階層利害，從有機滲透進到新的合致，各個黨派力量，從精誠團結進到高度的統一。所以如將統一戰線同國民黨分開看，則國民黨之現階段的發展這一概念，就變成沒有內容的抽象物了。統一戰線的發展與鞏固，同時，就是國民黨的發展與鞏固；反之，統一戰線如果破裂，論理的結論，必然也就是國民黨的破裂。三民主義的革命最後成功與否，即係於此；這是我們要深刻認識的最基本之一點。二，國民黨長期革命歷史的成就，使國民黨成為執政黨，使國民黨政權有其特殊性質與任務，現在以民族革命來完成整個三民主義時期，遂決定了國民黨之抗戰時期的建國性，這本應是一切已取得了政權的革命政黨所同具，不過過去因

歷史條件的障礙，使國民黨的這一特徵未能表現出來，現在因革命更進一步，遂使它具有的長期革命性，政權特殊性，發展到現階段而具體化於抗戰建國這一個特徵上面了。「抗戰建國」，是使國民黨從三民主義前階段的革命進到三民主義最後階段革命的一個歷史轉變的契機，對於建國的這一歷史意義之認識，是國民黨所以確立今後應該怎樣建國的方針的。這是我們應該認識的基本的第二點。三、中國現在所進行的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革命，既與舉世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革命、社會革命共命運、共生死，遂使三民主義同世界革命主義合流，使國民黨與統一戰線同世界革命陣線合流。因此、國民黨的「世界革命性」，遂具體化而構成了國民黨發展現階段的第三個基本特點，這一基本特徵的認識，是國民黨所以建立外交方針，決定國際路線的核心。目前三個基本特徵，原爲不可分離的有機的一串鏈環，亦爲前幾段所述諸特徵之現階段的發展。國民黨的優異性，不是命定的，而是中山先生的偉大創造以及在其領導之下革命黨員歷年努力的結果。特徵之現階段的發展，更具體化結晶化於三個基本契機，則又是蔣總裁繼承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更進了一步的結果。一般人對中國國民黨應該有這樣較深刻的認識，國民黨員，更應該深刻認識這些特點，繼續努力前進。如果有一點認識不清或將各特徵間之有機連系折開以至孤立起來，則小之可以障礙革命的發展，大之可以葬送國民黨生命乃至中華民族的生命！

第六編　革命論

第一章　革命的概念

由於社會階層矛盾產生了國家、政府、政黨，同時也產生了革命。社會階層矛盾正如一根紅線似的把全部政治範疇的各種政治形態貫串起來而結集到決定政治變革乃至社會變革的「革命」這一範疇，這是社會階層矛盾的頂點，這也是政治科學的總結穴。所以革命的概念是什麼，我們必需首先弄明白。

我們在前面說過『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的問題』，但這祗是從革命的任務上來解釋革命。也祗把革命拘限在政治方面，實則革命的全部意義，決不是這樣狹隘的。然則革命是什麼呢？答覆這個問題，最好先看下面一段話：

『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便和那從來活動於社會內部的生產關係，或單由法律表現出來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這種關係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到此便變成生產力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便來到了。巨大的上層建築的全部便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動，或者緩緩的或者激劇的變革了』。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革命是什麼。所謂革命，主要的，根本的，是社會制度的變革。但因革命總是社會發展途程中的一種「突變」，一種「飛躍」，一種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極端矛盾所演出之社會矛盾的最終勝負的決勝點，所以革命總是最尖利的最猛烈的，而又是極端複雜和殘酷的消滅舊社會制度產生新社會制度的一種貫徹于萬人民的生命過程。

本來人類社會的構成，如果把他分析一下，就是這樣：人類為謀社會的生產，相互進入一定的生產關係，結果，造成「社會的經濟構造」，然後以這經濟構造為地盤，「建築起來」「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築」；更形成那與此相適應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而人類整個的生活過程，便不外是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過程，上面所謂「社會革命」，便是指的

「社會的經濟構造」之變革。所謂「巨大的上層建築之全部，便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動，或者緩緩的或者激劇的變革了」，便是指的「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築」及「社會的意識形態」之變革。這三種變革，質言之，即社會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不過「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築」及「社會的意識形態」的變革，都是隨着經濟基礎之變動而變動的，即政治革命，文化革命，都是爲社會革命所決定的，所以嚴格的說，祇有社會革命是一切革命的主流、根本、總歸宿。所以主要的、根本的革命，便是社會制度的變革。但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亦能影響社會革命，促進社會革命。尤其是政治革命，往往爲實現社會革命之最主要的力量。例如社會上的被壓迫階級，必須改造這個社會組織才能得解放，而社會上的壓迫階級，必須維持這個社會組織，才能保持他的特權，但要改造社會組織與維持社會組織的兩方，都非握有政治上的全部機構——政權，便不能達到目的，所以奪取政權，便成爲革命的一個主要的任務，因此說：「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的問題」。這兩句話，也就正是針對着政治革命說的，就是政治革命的真實內容，這樣看來，社會革命是以政治革命爲手段的，政治革命是社會革命之一個有力的契機。然則文化革命就不重要嗎？不，它在政治與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往往起先行作用，社會意識的變革，往往先於社會存在的變革，爲社會存在的變革掃清道路，在革命成功後，文化上的各種努力，亦能促成社會的建設。

如上所述，所謂社會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雖有各種具體條件爲其內容，但它們彼此之間決不是孤立的，決非孤立或獨立在沒有關係的領域，而且恰恰相反，它們是具有最嚴密的裝置，最活潑的有機的聯繫，而或爲首要的或爲次要的顯現爲不能分離的具體的統一。

以上便是「革命的概念」之簡單的解釋。

第二章　歷史上革命的階段

歷史上的革命，即社會制度的變革，是經過了好幾個階段的，而最顯著的最為一般人所意識到的，便是由封建社會轉變到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階段。這一階段的革命，便是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資產階級以革命的手段破毀了封建社會的舊形式，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形式，較高的社會形式。但這一社會形式也不會停留在原地點，他必然要經過那發生，成長，沒落的過程。就全世界的範圍來說，現在的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帝國主義。就是說，他已走上了沒落的程途。也就是說，他已達到了蛻變期，他要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舊形式轉變到新的更高的另一社會形式。這一轉變，便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那末，就全世界的範圍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階段已經過去，而革命的現階段，正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自然，全世界經濟政治的發展不是同一的，在許多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裏，還沒有達到無產階級革命，即在這樣的國家裏，還要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至少是完成民主革命。因此，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可細分為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與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又有帝國主義內的資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同；從另一方面說，亦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的民族革命。

然而我們在這裏，主要的是以全世界的範圍為論點，就是說，我們在這裏，是站在一個大前提上，來論述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就全世界的範圍來說，整個的現社會正要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舊形式轉變到新的更高的另一社會形式——即社會主義社會形式。所以現階段的革命主要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上述一切不同性的革命，都將以此為總匯而形成整個世界的大變革。

有人說：「帝國主義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那末，我們要論述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從分析帝國主義開始。

即要理解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亦非首先理解帝國主義的本身不可。但是究竟什麼是帝國主義，牠的特徵在什麼地方？這是我們必須馬上要解答的。

第三章 帝國主義

第一節 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

我們在論及國家歷史的發展時，曾提出所謂「帝國主義國家」來說明過，但那不是以帝國主義的本身爲對象的。帝國主義在其最正確的意義上，它是二十世紀特有的一種普遍在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現象，我們要從現階段的政治經濟關係中，找出現階段的革命性質及其主潮，所以帝國主義本身的研究，就成了這裏的課題。

帝國主義是侵略主義，強權主義，這種解釋令人一說到帝國主義，便聯想到古代的羅馬帝國，聯想到歐洲中世紀的查理曼帝國，甚至聯想到中國的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成吉思汗的開疆拓土，這是不正確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是寄生或腐化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以上這種種伊里奇所下的解釋或定義，都是以帝國主義爲資本主義發展上的一個新階段，一個特殊的階段，而實則不過是以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延長。因此，舊資本主義時代所特有而基本的矛盾，例如勞資間的矛盾，資方與資方間的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佔有的個人性的矛盾，以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乃至經濟恐慌等等，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沒有消滅，而且反而走到更尖銳更高度的程度，所以使得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腐化性日趨嚴重，一直走入垂死的狀態，這是正確的。這是把帝國主義這一範疇，歸結到二十世紀所特有的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了。但這還不具體，還不曾從一般政治經濟現象中指示出其種種特徵來。所以伊里奇在所著帝國主義論二一三頁特再指出它五大特徵：

一、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已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於形成了壟斷，而這壟斷在經濟生活中是起有決定的作用

的。

二、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并且在這「財政資本」的基礎上造成了財政寡頭政治。

三、跟商品輸出不相同的資本輸出得到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四、形成了瓜分世界的，資本家的國際壟斷同盟。

五、在各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强之間，地球上的領土瓜分已經完竣了。（見吳清友譯，伊里奇原著：帝國主義論增訂本）。

以上這種種政治經濟的現實形態，實是資本主義發展爲帝國主義的根本原因，亦即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所以我們要研究帝國主義本身，必須從分析這些達到帝國主義統治的經濟條件、政治條件開始。

第二節　生產集中和壟斷

資本主義生產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工業之巨大而迅速的發展，及各部門的生產向較大的企業中迅速地集中。這主要的原因是在「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企業家相互間的競爭，誰勝誰敗，是係生產技術是否進步。而能利用較優良技術的一定是資本雄厚的大企業家。所以在生產過程中，大資本往往併吞小資本、大生產往往壓倒小生產，生產的集中成爲「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生產上鐵的法則。生產集中的結果，就是把無數中小工業變爲少數大企業家的犧牲品。不過生產集中的速度，因工業或生產部門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礦業、鋼鐵工業、電汽機械製造業、化學工業等重工業，其集中的速度較快，輕工業則比較遲緩。

由自由競爭演成生產集中；又由生產集中走向壟斷。所謂壟斷，就是少數大資本家聯合起來，在各種生產部門壟斷一切。例如幾個煤油大王聯合起來壟斷煤油，鋼鐵大王聯合起來壟斷鋼鐵。但當每一部門的生產是分散在成千百萬的獨立的

中小企業家手上的時候，是不容易實行壟斷的。所以壟斷必需以生產集中爲條件——隨着生產的集中，少數大企業就跟着也出現。少數大規模的企業與企業家之間，便產生了競爭的困難和壟斷的優勢。因此，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壟斷的成立便可能了。不過在這裏必需注意股份公司的出現，是造成大企業，造成壟斷的基礎。再則壟斷首先發生於主要而佔領導地位的工業部門——重工業部門，以次漸普及於輕工業各部門。

資本主義壟斷的方式有如下幾種：

一、卡德爾的方式——這只是共同商定出賣物品的價格，而各個企業之間，仍保持各自的獨立。換言之，這種方式，即各個企業之間，相互約定，不許用互相競爭的方法去損害同業的利益；同時，而是保持同業壟斷的利益。

二、辛迪加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之下，出賣商品有時購買原料，都需通過辛迪加這一總機關，甚至出品數量也要受辛迪加的共同限制，因此，壟斷組織的各企業之間，已不能保持各自營業的獨立了。

三、托辣斯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之下，各個企業差不多都完全合併起來了。因此，聯合的程度較之辛迪加更爲緊密。加入托辣斯的各企業，完全喪失了獨立營業的資格，一切都要服從托辣斯這一共同機關。

托辣斯的方式，如上所述，是更緊密的一種壟斷方式，自從有了托辣斯這一怪物後，它便在經濟生活上演着決定的作用，無論那一生產部門，都由少數托辣斯，佔着支配的地位。此等生產部門，或代表製造某種原料的各個階段，例如由鐵苗熔成生鐵，由生鐵鍊成鋼，再由鋼鐵完成各種工具，或者這一部門對於另一部門盡着輔助作用，例如利用廢物或副產品，生產打包用品等。此外，它往往經營與其主要生產部門的鄰接部門的企業。例如鋼鐵托辣斯，爲避免受煤業壟斷的限制，它往往自行經營煤礦。

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社會的，壟斷的盛行，更加使生產社會化。從前許多企業各不相謀，盲目的生產，現在似乎由壟斷組織可以實行有計劃的生產了。然而生產雖是社會的，生產雖由壟斷更趨社會化，而佔有仍保個人的，而且

個人的佔有，也更趨嚴重了。大多數人民所受少數壟斷者壓迫剝削，也今非昔比了。自由競爭爲壟斷所代替，但壟斷并沒有消除競爭，而且使競爭劇烈化。伊里奇說道：『自由競爭乃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商品生產的基本特性，而壟斷恰是自由競爭的反面。不過我們親眼看見，這種自由競爭變成了壟斷，它先創造了大生產，排擠了小生產；然後又使更大的生產代替了大生產，使生產和資本的聚積達到最高程度，因而生產了壟斷組織，爲卡德爾、辛迪加、托辣斯以及跟它們融合在一起的被大財閥操縱的數十家大銀行的資本。同時，由自由競爭長成的壟斷組織，并沒有消除自由競爭，而凌駕它之上并與它同時存在；且由此生產了特別尖銳、特別深刻的矛盾、敵對、和糾紛。

第三節　銀行的新作用和財政資本的寡頭統治

壟斷便是「資本主義發展底最新階段」中的最後一句話，但是倘若我們沒有注意到銀行的作用，那麼，我們對於現代壟斷組合的實力和意義的觀念，便會是極不充足、極不完全的。銀行的基本和最初的機能，便是充任支付的中間人，因此銀行就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爲活動的資本——即變爲能給與利潤的資本。它集聚所有一切貨幣的收入供資本家去利用。隨着銀行事業的發展和這事業的集中化，銀行乃由不關重要的中間人的作用，一變而爲萬能的壟斷者的作用了。它差不多支配了全體資本家和小私有主的貨幣資本，以及一國或數國以內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料來源。從無數不關重要的中間人變爲少數壟斷者的那個轉變，便是由資本主義成長爲資本帝國主義的主要過程之一。因此，我們必需首先考察銀行事業的集中。據一九〇九年的統計，柏林九個大銀行支配德國銀行資本總量約百分之八十三；又據一九三三年的統計：日本全國銀行的存款額，有百分之四十二掌握在五家大銀行手裏。在美國執牛耳的只有兩個銀行集團：一是摩根銀行；一是羅克菲勒銀行。

銀行事業由集中而壟斷，這是必然的。這樣便使銀行營業，已不限於像以前那樣，只作存款、放款的過付機關，它便

利用積聚的巨量資本，投入生產事業，把銀行與工業的關係密切起來，而且操縱工業生產。股份公司的出現，更給與銀行一種很大的方便，銀行只要購買某股份公司股票的三份之一，它就可以在該公司中取得完全無限制的支配權。當銀行與工業間的聯繫，日益密切常備，同時，銀行家與工業家的結合，也一天天密切。精明強幹的銀行家加入工業生產的董事會，而工業壟斷組合的領導人，也加入銀行的管理機關，於是銀行和工業巨頭融合在一塊了。銀行對某一工業部門投放巨量資本以後，它便與某一工業企業發生血肉相連的關係，而不能不注意它的命運，它便要秘密資助它發展，促成它們間的壟斷協調，這樣，銀行便更加倍地加強和促進資本集中與壟斷過程了。銀行的作用，由一個簡單的中間人變成了一個萬能的壟斷者，這便是銀行的新作用。規模最大的銀行與壟斷最有力的幾個工業部門，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壟斷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也就結合起來成了財政資本。壟斷的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結合，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所以帝國主義也有人把它叫做財政資本主義時代。

財政資本的發展使巨量財富愈益集中在少數資本巨頭手中，誰支配全國或全世界的經濟生活，誰就支配全國或全世界的政治乃至全資本主義世界的命運。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不管任何國家的國體政體如何，實質上的全部政權總握在少數財政巨頭手中。行政當局——就是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先生，也不過是這些財政巨頭的僕役罷了。財政巨頭爲了他們的利益之無窮的擴展，把競爭也擴展了，把競爭擴展到壟斷組合與壟斷組合間、國與國間，因此，挑撥戰爭，壓迫本國勞苦大衆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遂使帝國主義成爲工業國的壟斷托辣斯、銀行和財閥的萬能權力。壟斷托辣斯最巧妙的施行一種「參預制」。

所謂參預制者，就是一個總經理管理一個主要的股份公司，這一公司等於「母親公司」，這一母親公司又支配着附屬於它的所謂「女兒公司」，而女兒公司又支配着所謂「孫女公司」。依次遞演，可以建立許多銀行的參預制。因此，參預制的實行，一百萬元的母親公司，就可使八百萬的孫女公司服從自己。美國在經濟恐慌期間，曾經破產的「殷蘇爾」電汽

財團，利用六屆的參預制，控制了一三二家公司。參預制造成了幾十層高的金字塔，而在塔頂上站着的便是財政巨頭。

第四節　資本輸出與各資本家集團的瓜分世界

對於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的舊資本主義，它的特徵是商品輸出；對於獨斷佔統治的現代資本主義，它的特徵是資本輸出。資本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種社會關係，它怎樣由甲國輸出乙國，這裏有兩種方式：一是放款資本的輸出。例如假定中國向英國借款，英國的資本便輸出到中國了；可是其結果，是高利的息金，由中國流入英國。一是工業資本的輸出，例如假定英國在中國上海或其他城市開辦紗廠，每年由投資所獲得的利潤便落在英國人手中。但無論是放款資本的輸出或工業資本的輸出，其所得利潤都比商品輸出大。資本的輸出，在二十世紀初達到了巨大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輸出巨量資本的是英、法、德、三國。他們在外的投資，共計一千七百五十萬萬到兩千萬萬法郎。每年利息假定以五厘計算，是八十萬萬到一百萬萬法郎之多。這就是帝國主義寄生生活的堅固基礎。

資本輸出，使落後國家陷入他們的財政資本網中。假使落後國家需要借款，有時利用現物，即以定貨的方式取得。軍火大王和鋼鐵大王，因為他們和銀行密切結合在一起，就有許多方法，能以取得借款國家的有利定貨。這種方法，簡直漸漸代替了公開市場的競爭。

資本家的獨斷組合，例如卡德爾、辛迪加、托辣斯，首先瓜分了國內市場；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下，國內市場是必然要與國外市場相關聯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全世界的市場，所以隨着資本主義輸出之增加，各種國外聯繫和殖民地勢力之擴大，隨着這大的獨斷組合勢力範圍之擴張，便自然要發生如獨斷組合間的相互國際協調，并形成國際卡德爾。國際卡德爾的組織，通常規定銷貨市場的分配，在這種場合下，這些國家可以無顧慮的在某些市場出賣自己的商品，不怕其他非締約者來競爭。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電汽機械等生產事業，都是集中在德、美兩三個大托辣斯手中。他們

之間訂立協定，瓜分世界，每一國際托辣斯都取得許多完全歸它控制的國家。此外尚有國際鋅業辛迪加、國際石油托辣斯等等。

世界大戰後，國際卡德爾更成立了不少，它包括了歐洲許多國家。其中首推鋼業卡德爾，其次爲石油業、化學業、銅業、鋅業、無綫電業、鐵業、人造絲、鉀業、紡織業等。參加這些卡德爾的大多數國家，爲法、德、比、捷、奧等，波蘭、瑞典、匈牙利、西班牙、挪威也有若干加入其中。此外，各國的軍火大王，一面高唱愛國主義，一面成立軍火國際壟斷組織，瓜分市場，特別對那些能出高價的國家（不管是敵國或友國）供給軍火。因此，轟擊德國城市的往往是德國克虜伯砲廠的大砲，打死英國兵士的往往是英國威克廠製造的兵器。

國際壟斷協定是否可以消除國際間深刻的矛盾呢？不，決不。因爲資本家聯合起來瓜分世界，是爲資本的集中程度所漏迫，是少數資本家競爭力量的加大，是把通常資本家間的競爭變爲佔有世界瓜分世界的競爭。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在帝國主義時日益加劇，更使得國際壟斷組織，時常動搖不定。其中每一資本家都用盡方法進行鬥爭，設法提高自己瓜分的一份，實力的比重一發生變化，市場便要隨之而重新分割一次，每一次的重新分割必然要加劇競爭的形勢。所以國際壟斷組織，不但沒有消除國際間的矛盾，反而使國際間的矛盾尖銳化了。

第五節　各列強間的世界分割

帝國主義列強在其進行世界分割的過程中，佔奪了一切自由的土地。一切自由的土地，都先後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十九世紀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現的一個特殊時期。大約自一八七六年——一九一四年間，所謂列強共霸佔了兩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所霸佔土地的總面積，比整個歐洲大兩倍。就中當然是以英國霸佔的爲最多。此外德、意、要想佔一些或多佔一些，便只好向英國口袋裏去搜索。二十世紀初，世界的分割便完畢了，即世界上已沒有一塊自由的土地

了。任何帝國主義要想求得殖民地，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世界重新分割一次。但這又只有戰爭才能做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錯！把世界的版圖，重新劃分了一下。但是它并沒有最後解決世界分割的問題。因此，各帝國主義正在繼續躍進，準備第二次的分割；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是一天迫近一天，不，已經在歐、非、亞、三洲部分的開始。意大利法西斯已吞併阿比西尼亞，德意志法西斯併奧吞捷，德、意、兩法西斯共同干涉西班牙戰爭，日本法西斯在強佔東北四省以後，正在瘋狂地進行吞併全中國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野蠻戰爭。德、意、日、三法西斯國結成了侵略的同盟，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挑釁者，點火者。民主國家，如英、美、法，爲維持現狀，也不能不擴大自己的軍備，即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爲擁護世界和平，更不能不有自己鞏固的國防。

據一九三二年統計，全世界的人口，共計二十萬萬。蘇聯佔一萬萬六千三百萬，各列強佔三萬萬四千三百萬，比較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佔一萬萬三千九百萬，已經由殖民地解放了的國家，列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佔三千萬。此外殖民地的人口佔六萬萬六千二百萬，半殖民地國家的人口佔五萬萬三千七百萬。那麼，總計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人口便是十二萬萬人。所以帝國主義，便是區區少數國家對地球上絕對大多數人口施行財政奴役和殖民地壓迫的一個全世界體系。

說到殖民地原不是在帝國主義時代才有的。古代以奴隸制度爲基礎的羅馬，就曾經行過殖民政策，資本主義發生的初期，亦即資本主義的產生和形成，殖民地即起過重大的作用。所謂資本的原始蓄積，其重要來源之一，便是殖民地的搶刧。不過各時代殖民地的作用和意義，却有着本質上的不同。例如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殖民地的意義是：一、作爲商品市場；二、作爲過剩人口移殖的場所；三、作爲宗主國直接搜括財富的對象。但在那時，由於自由競爭這一法則之故，殖民地的實際價値還不顯著。英國的資本家們，曾部分地反對過殖民政策，他們有些人以爲把殖民地解放了，反而於他們有利。一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的意義便變得非常重要了。這時，殖民地成了各帝國主義相互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武器。資本的不斷集中而尋求出路，生產力不斷的發展，由於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所起的消費限制以及由此而發生的經濟衰疲和

利潤低降，都威脅着帝國主義只有向外發展，只有佔領殖民地。所以殖民地就成了帝國主義的生命線，所謂各列強間的世界分割，也就是殖民地的分割。

第六節　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帝國主義爲什麼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呢？這一由於它是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一由於資本主義矛盾的加深。帝國主義的寄生性或腐化性，表現於下列各種事實上：

一、寄生階級的膨大——資本家大多數是剪息票生活的人，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差不多都變成了股票、債券、公債、及其他有價證券的所有者，他們對生產過程都沒有直接的關係，資本的輸出，更加強了這種完全脫離生產的情形。寄生的腐化的資本家們和他們的侍從——政客、官僚、技術家，吃盡千萬直接生產者勞動的果實，把像瑞士那樣整個的國家，像法國南部那樣的區域，都變成了國際資本家縱慾享樂，浪費他們不勞而獲的所在。

二、技術進步的停滯——在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家爲要提高利潤，減少生產費，便需力謀生產技術的改進；而在帝國主義時代，少數壟斷的資本家，他們不僅壟斷生產價格，而且壟斷新技術的發明，他們就用重價買收，擱置不用，以免它走入生產界打破他們壟斷的地位。

三、對勞動力的摧殘——作爲社會的基本生產力的勞動力，在帝國主義時代，已沒有能力來利用，因此，經常造成慢性失業的現象，使勞動者的生活日益貧困化，影響人口生殖率的減低。此外戰爭、白色恐怖等等，都是直接間接摧殘勞動力的。

四、不生產勞動的增多——巨數的工人從生產部門走到供應縱慾享樂的部門，旅館、酒店、輪船上、避暑地，服役的人一天天加多了，生產勞動便相對的日益減少。

五、生產停滯——經濟恐慌，使得生產機關經常不能全部開工。

六、固定資本和生產品的破壞——戰爭期間或恐慌期間，工廠、機器、原料等的破壞及存貨的銷毀，是難以數計的。

七、流通費用的增長——在商品流通領域內服務的人數，日益加多，巨大的廣告費，使流通費用大大增長。

八、軍備戰爭、感彈裝備的擴大——這些費用的增加，比世界生產總量的增加要快得多。

九、對於工人上層分子的收買——帝國主義把從殖民地搶來的額外利潤，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中的上層分子，利用他們破壞工人內部的團結，這筆費用也不少。

十、道德的墮落——貪婪、腐敗、欺詐、驕淫、搶劫、偷盜等等，是普遍於各帝國主義的流行現象。這種現象，侵入政治、社會生活、文化藝術等各方面。

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矛盾的加深，表現在下列的三種矛盾上：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矛盾。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壓迫、剝削，在帝國主義時代，日益加緊加深，或者安於奴隸生活，或者推翻資本社會自爲主人，這便是帝國主義向千百萬勞苦大衆提出的問題。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各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殖民地而產生的矛盾。這種深刻矛盾的結果及其特點，就在它包括一種不可避免的因素——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的結果及其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自己削弱乃至整個資本主義陣線都削弱，使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時機迫近。

第三個矛盾——就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壓迫民族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結果及其特點，也在它包括一種不可避免的因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覺醒及民族革命。這種革命，也從根動搖資本主義的陣地，直接間接幫助了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推動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第四章　社會主義革命論

第一節　帝國主義時代與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範圍內當前是主要的階段，所以我們首先處理它。然則它的規律性或必然性，是在那裏呢？這是歷史本質的發展決定的，是二十世紀特有的世界政治經濟關係的產物。

如前所述，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走上腐化的垂死的道路。它在以前也曾經是經濟發展，技術改良，財富增進的推動機；可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它把極大部分的財富都握在一部分很少數的壟斷資本家的手中，即握在資本主義的壟斷組合的手中。這些壟斷組合規定商品在國內的最高價格，即壟斷的價格，更加殘酷的剝削工人乃至農民階層，把持國家機關，利用國家機關的全部力量來鎮壓工人和農民的反抗；同時，它們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之壓迫與剝削也更加緊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也再不能忍受這種難堪的狀況了。此外，帝國主義爲奪取新的商品市場、原料出產地、賤價勞動力，換言之，即爲重新瓜分殖民地瓜分世界，除用武力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使他們彼此之間作最殘酷的鬥爭一直走向戰爭。這樣，帝國主義便使大部分人類不能生活下去，造成極大的政治經濟危機，造成十二萬萬被壓迫民族的貧困，帝國主義的戰爭，更消滅了千百萬壯年的人，并使其他依壯丁爲活的人走入黑暗地獄。這樣，帝國主義便把全世界上兩個主要力量——最後決定一切的力量，逼迫起來爲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奴役而鬥爭了。這兩個力量：第一，就是帝國主義內革命的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勞動農民；第二，就是受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

此外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一切矛盾都特別厲害的擴大和加劇起來，因此而引起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戰爭，便會

減弱帝國主義勢力乃至資本主義全體系的力量，而使世界上兩個主要力量——最後決定一切的力量，即帝國主義國內革命的工農階級戰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內民族解放運動戰線，容易聯結起來，共同抵抗帝國主義的虐待，乃至推翻帝國主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帝國主義的經濟條件已爲社會主義築好了基礎，使得工農大衆能夠以這爲基礎而實行改造了。這就是說以前許多時代的人類的勞動給現代人類遺下了無可比擬的巨富，這種巨富便是建築新社會的鋼骨水泥；它現在雖仍爲少數壟斷家所佔有，但它是可以移過來創建新社會作爲勞苦羣衆很美妙的幸福生活的。這一巨富的轉移，必需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如前所說，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第二節　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與社會主義革命

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定律，而這一定律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更加緊張顯明，因此便引起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矛盾的特別緊張顯明。

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不是指不平均，不是在發展的程度上比較，說那一個上前了，那一個落後了，它乃是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不是順次的并行的漸進的發展，而是以越級的跳躍的突進的方式發展。好比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往往有一個新興國家從後面趕上騰躍向前；而原來的先進國卻一時現出停滯狀態被擠落在後面。例如古老的英國，在工業方面，比起歐洲其他國家來，要早一百多年，後來——從十九世紀末起，德國便在二十年內趕上了英國。此種發展的不平衡，使它們中間發生劇烈的衝突以至於戰爭。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是這樣造成的。大戰以後，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即由大戰引起的變化，更加厲害。例如大戰以後，美國很快的趕過其他各國乃至走到英國前面，日本也瘋狂地躍進了幾步。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爲什麼特別緊張顯明呢？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世界勢力範圍已被帝國主義集團瓜分完畢，任何角落早已沒有一塊自由土地，要達到世界分割的平衡，只有要求重新分割

世界，只有用於武裝衝突拚命備戰是當前各帝國主義的特徵，備戰的政治經濟條件因特殊原因更加不能平衡發展，又是當前各帝國主義的特徵。二、舊的先進國的技術發展因老大（或因走在前面而滿足）而表現停滯狀態，是有可能的；而新興國家因已落後而拚命向前追趕，不斷改進技術，增加生產也是可能的。而在帝國主義時，新的技術利用性更加擴大，技術改進的可能性更加容易，因此，新興帝國主義集團便必然要更廣大的利用新技術，發展生產，使它在爭奪市場、原料、投資地等鬥爭中，都能趕上并超過先進的帝國主義集團，於是使得發展的不平衡，更加劇烈。

這種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有血肉相聯的關係，它能使社會主義革命在資本主義矛盾最劇烈的地方，在帝國主義鏈條最弱的一環，首先發動并首先獲得勝利。社會主義革命之在帝國主義時代，等於是帝國主義某一環被衝脫的結果；但這種被衝脫的地方，是不一定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往往是在帝國主義最弱的一環，即在它的內部矛盾最尖銳的國家，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國，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加劇，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能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發生，而且能堅持革命勝利，能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因為不平衡律造成了一國的特殊條件，而工人又能和農民鞏固的聯合起來，這種工農聯合的力量，是能夠克服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任何障礙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內的勝利，是否可以說就是最後的勝利呢？不，因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還處於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這還不能說它的勝利已得到了完全的保障，已經脫離了武裝干涉的危險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如果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要得到完全的保障，要脫離武裝干涉的危險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即只有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至少要有幾國革命的勝利，才有可能。換言之，只有在這種情勢之下，一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才是最後的。這也就是說，沒有國際工人階級的幫助，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內最後勝利的任務便不能解決。但這決不能得出下列結論：應該放棄一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建設，坐待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托洛茨基在俄國，就是堅持非有世界革命的成功，一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能勝利的，一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也是

不能完成的、然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事實，把這種錯誤見解粉碎了。

第三節　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實例

因着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帝國主義鏈條最弱的一環發生，在矛盾特別劇烈的國家發生，所以因着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使社會主義革命的俄國首先爆發，使首先在俄國勝利。

俄國的矛盾是怎樣特別加劇的呢？這是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的。自然，俄國的歷史條件的特殊，是其主要原因。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它帶給了什麼給參戰國的民衆呢？可以說只有極大的災難與無數的痛苦。在所有參戰的國家中，它武裝了二千六百萬人，死於猛烈的砲火中的約計一千萬人，受傷殘廢或終身殘廢的達二千四百萬。戰費的消耗，計一萬二千萬萬馬克（每馬克約合中國五角），而在戰爭前，所有參戰國的財產總額，約計二萬四千萬萬馬克，這就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吞滅了歐洲人民累代所積累的總價值的一半。這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巨大財產都一時化爲烏有了。這使本來并不富有的俄國，在沙皇制度下已經非常痛苦的工農，更陷於不能忍受的死境。

這樣，於是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首先爆發了工農聯合的民主革命——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起來打倒沙皇專制地主貴族的政權，建立了工農蘇維埃，實現了工農民主專政。但因那時蘇維埃內部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一面幫助帝國主義，一面自願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其後（一九一七年十月）便再進一步，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實現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把蘇維埃轉變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剝奪舊俄羅斯時代資本家對於工廠、鑛山、輪船、銀行等所有權；同時，還剝奪了地主貴族對於土地、森林、水利等所有權，亦即附帶的完成了前一階段——民主革命階段所未完成的任務。

這樣，俄國工農聯合經過二月到十月的兩次革命，就完全推翻了地主貴族乃至資本家的政權，把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

勝利了。

第四節　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條件

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一切富於幻想而沒有科學頭腦的人，總以爲工人及一切勞苦羣衆，聰明的知識者羣，可以苦口婆心勸導資本家，使他們感覺到資本主義制度不好，有一天自願放棄所有的財富幷放棄保護他們財富的政權。這就是說以爲這一社會變革，可以不必採取革命手段——採取武裝起義的手段。的確，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些社會主義家，例如英國著名的著作家摩爾、社會主義家渦文，就有過這樣的幻想。法國的社會主義家聖西門和傅立葉，也有過這樣的幻想。這些幻想自然終於是幻想，世界上決沒有那樣蠢的資本家，不，歷史決沒有這樣輕鬆的一頁。

到了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才發現了歷史發展的眞正規律。他們證明一種社會制度之代替別種社會制度，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舊社會制度的結果。社會主義革命，是以革命手段消滅對一切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把工廠、地產，和其他一切財富變成無產階級國家的公產。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生產手段的私有，是有全部的國家機構保護着的，採取革命的手段，破壞舊國家機構，建立自己的政權，固屬必要與必然，不過革命決非兒戲，革命的階級及其羣衆，首先必需一致團結幷組織起來。有了堅强的團結與堅强的組織，才能有革命行動。而組織的首腦，組織的司令部，組織的作戰部隊，便是革命的政黨。革命的政黨把整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苦羣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當前是主要的階段。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領導工人階級革命的是無產階級政黨（在目前是共產黨），它是無產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同時，是拿在無產階級手上作戰的工具。在無產階級未取得政權以前，自然是以它爲爭得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的國家（如蘇聯），是以它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這在當前是主要的，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國家，它也是那些國家的工人、農民爲澈底反對

封建壓迫及反對民族壓迫，即是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勝利而鬥爭的工具。沒有它作爲無產階級鬥爭的工具，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反對封建壓迫、民族壓迫的民主運動也是不能澈底勝利的。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便成爲絕不可少的基本條件。革命的政黨與革命，也就成爲不可分的一物兩面了。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在無論什麼情勢下都可以發生幷成功的。要革命，還要把握革命的形勢。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主要有下面三種標誌：一、統治者由於巨大的政治經濟危機，本身已不能照舊統治，甚至統治者已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二、被壓迫者的貧困和災難，非常厲害，工人階級已明白認識革命之必要，幷且決心進行革命，廣大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也轉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願意與工人階級一起來進行革命；三、由於上述原因，羣衆的積極性大大增加起來，革命的暴風雨普遍的籠罩着。既有這樣的革命形勢，又有無產階級政黨來堅決的巧妙的領導工農羣衆武裝起義，那麼，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會到來，俄國的十月革命就是這樣勝利的。

第五章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論

第一節　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生

我們不能不於敍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後，再來說明資產階級革命。因爲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是貫穿於任何時代的，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這樣就使得一直到現在，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的國家還很多，中國就是一個，爲的要說明一國的較特殊的資產階級革命，先就要說明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如前所說，革命是產生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極端矛盾中，是代表生產力發展的階級以羣衆的力量行動起來推翻代表舊生產關係的階級統治，奪取政權，建立新生產關係的一種奠定數千萬人民生命的過程。然則爲什麼發生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呢？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內多少孕育了資本主義的因素，即在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制度的形式已經存在着。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工商業的發展，也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例如工商業資產階級、農村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傭農。這些階層的出現是代表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他們力圖推翻舊的封建的生產關係，造成適合於新生產力的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但是舊的封建關係，封建統治，却極力阻止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新興階級勢力的發展。例如專制統治的存在，農奴制度的保持，貴族教士的特權，國家的不統一，連年不斷的內爭，上層分子的荒淫，捐稅的繁重，度量衡的不一致，貨幣制度的紊亂等等，都是束縛工商業的發展的，同時，使得農業的改革也成爲不可能。這樣便產生了代表生產力發展的民主力量——這些就是在封建社會內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他們是與封建階級對抗的。因此，他們就與封建階級之間發生鬥爭。這種鬥爭逐漸尖銳化，便發展成爲廣泛的民主革命運動。

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就是說這種革命沒有超過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範圍。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表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它不但不破壞資本主義的基礎而且把它擴大把它深化。但這也不是說這一革命只有利於資產階級，只能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來完成這個革命。它同樣有利於工人、農民、及城市小有產者，因此，他們也參加並應參加這一革命使它達到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般的任務是什麼呢？它是：

「肅清封建制度，解決土地問題，獲得民族的統一，實現政治的自由。」

如果我們具體的來研究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就還有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與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是就時代說的。此外還有壓迫民族內（即帝國主義內部）所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與被壓迫民族內（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內部）所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是就民族說的。若就領導權說，便還有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時在消滅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自己政權，例如法國大革命）與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時是澈底完全民主革命，使它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例如俄國二月革命），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共同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時是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反對封建殘餘勢力，例如殖民地半殖民地進行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所以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必須最具體的就各國歷史特殊條件加以分別研究。

第二節　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

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主要爲如下幾國：一、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二、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運動；三、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四、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以下依次說明之。

一、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的英國還是一個農業國，但工商業已有相當發展，例如那時對外貿易已

有東印度公司、立陶宛公司、莫斯科公司等。商業資產階級，在那時已成爲封建制度與天主教的反對者。當時的政治狀況，英國已有兩院制的國會；上院代表多大地主與貴族、官僚；下院則多爲城市資產階級、中小貴族與一部分農民。在十七世紀初，英國國會與國王的鬥爭異常劇烈，結果爆發國內戰爭。革命方面領導者爲代表商業資產階級的克林威爾，以克林威爾的鐵騎軍爲革命軍隊的中堅，軍隊成分主要爲農民、手工業者、與紡織工人，因爲他們是當時最受壓迫的階層。革命軍的戰鬥力甚强，主要是因爲當時已創立了政治工作。所以終於一六四六年戰勝了國王查理第一，并於一六四九年一月十日判處國王死刑。革命是勝利了。但革命勝利後，當時資產階級急需一强有力的政權，鎭壓因革命發動起來的民衆運動，於是造成了克林威爾的軍事獨裁。此後歷經勝利的資產階級的反動與革命民衆勢力的消長，終於在威廉第三時代，批准了資產階級的「權利法典」，英國建立了資產階級自己的政權。

總而言之，十六世紀英國資產階級依賴廣大民衆反對君主專制及一切封建制度，結果與大地主共同取得了政權。經過一六八八年「權利法典」的批准，資產階級與大地主的政權便更加鞏固了。

二、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運動——十七世紀英國一些政治上、經濟上、宗教上的被壓迫者，便相率逃往北美洲。他們在那裏所遇到的只是半遊牧的印第安族微弱的抵抗，很快就把他們征服了。英國的被壓迫者，一時成了殖民者，他們利用北美的自然富源，利用對於土著印第安的掠奪，很快便發展了他們在那裏的農業、工商業。那裏沒有貴族，沒有封建地主，這種社會情形造成了自然性的民主政治的基礎。此後英國在北美各殖民地設一王家總督；同時，各殖民地也成立一個議會——如英國下院一樣，議會與總督間的爭執便時常發生了。英國把北美看做本國商品銷售市場與原料供給地，即是把它當做英國的殖民地，極力阻止北美工商業的發展，以免與英國工商業發生競爭；但北美殖民地的工商業家是反對的，於是殖民者與英政府間的鬥爭便日益激劇。一七六〇年，英王佐治第三，極力壓迫殖民地，擴張王家總督的權力，并派遣大軍赴北美，宣佈戒嚴，各殖民地便一致團結毅然踏上爲獨立而戰的革命運動之途了。一七七六年發表獨立宣言，宣佈獨立，經

過八年之久的戰爭，英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其獨立了。民主的北美合衆國於以成立，第一任大總統爲號稱美國之父的華盛頓。

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美國殖民地的解放戰爭，是真正爲求解放的革命戰爭，這在歷來貴族、地主、資本家間爲佔領土地或掠奪利潤而起的許多戰爭中是最少有最偉大的。這是美國民衆對壓迫他們而使他們陷於奴隸地位的英國侵略者的戰爭。這次戰爭對於歐洲的影響很大——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是對歐洲資產階級的警鐘！

三、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年初的饑荒與財政紊亂，可以說是大革命爆發的近因。革命一爆發，廣大民衆都被捲入到革命潮裏，同時，還波及到軍隊方面。資產階級公開號召以武裝保護國民會議。七月十四日，巴黎民衆武裝攻開巴斯蒂爾牢獄并奪取軍械庫等。革命勝利了。各地農民亦開始響應巴黎武裝起義，襲擊地主邸宅土地，焚燬封建義務文件，革命火焰燒盡了一切封建制度的基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可以說是第三等級（包括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與封建制度鬥爭的歷史。法國革命前的社會成分約分爲三個等級：第一等級爲天主教會，他們擁有肥沃大塊土地及大量資本，不繳納國稅，不受法庭審判，擁有政治上種種特權。他們利用種種特權對農民施以毫無人道的搾取，形成最殘酷的上層封建統治。第二等級是貴族。高級貴族對於國家也無納稅義務，而他們荒淫無度的生活，反建築在佃農與農奴的地租或年貢上。他們在政府機關與軍隊中都佔很重要的位置，或掛一虛銜，領受巨額薪俸，形成第二層的封建統治。第三等級却只有供給國家一切擔負的義務，政治上絕無任何權利。因此，他們對於封建統治的反對是共同的。所以他們都主張取消封建特權，爭取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擁護資產階級民主要求，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這種主張或要求，實際上不僅第三等級是共同的，并且第一、第二等級中的下層，即教會中的下級僧侶與貴族中的下級貴族，都在革命中願與第三等級聯合行動。所以有人說：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不僅是第三等級與封建制度鬥爭的歷史，也是第三等級聯合第一、第二等級的下層共同對封建上層鬥爭的歷史。

第三等級對封建統治的反對雖是共同的，但它們各自間的經濟地位却顯然不同。那時，第三等級中，只有資產階級力比較壯大，工人在第三等級中雖有相當數量，但力量不集中，還沒有明確的階級意識，因而提不出獨立的政治主張，沒有奪取政權的企圖。農民在當時佔法國人口中的大多數，而且所受壓迫與剝削也最大最深，取消一切關於賦稅的重壓、封建義務、教會什一稅等，是農民迫切的要求。然而農民的落後性、散漫性，使得他們也只能做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尾巴。因此，我們可以說，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四、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有些人以爲革命是由於少數人惡意鼓動起來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凡是發生革命的地方，必然有着社會經濟的根據，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正是如此。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其封建體系的衝突，是日益激劇化，革命已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恰逢一八四七年的災荒與瘟疫引起了德國空前的危機，再加以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影響，德國也爆發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這一革命可以說是流產了，即未能完成德國民主革命的任務。這是有原因的。第一、因爲德國當時距離世界貿易的大西洋太遠，工商業方面還不能形成像法國巴黎、里昂、英國倫敦、曼徹斯特那樣的中心，因此，德國資產階級也沒有英、法資產階級那樣集中有力，在革命中便也表現了他們的軟弱，特別因爲他們對於下層革命的恐懼，使他們更加不敢硬站出來領導革命。第二、由於工商業發展的不夠，小商人、手工業者在德國還佔着很大的數量。他們在近代一切革命中本也有着極大的作用，惟因他們是處在兩極之中間地位，在德國軟弱的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的情況下，更充分表現了他們的動搖性。第三、無產階級的發展原是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爲消長的。沒有巨富的集中的資產階級，自然也不會有數量廣大而集中的無產階級。那時德國工人在全國人口中還只佔百分之三，所以也不能由他們提出獨立的政治要求，擔負革命的領導權。他們之所以能使得德國資產階級害怕，只因他們在那時是積極參加革命的（人數雖少）。他們與那時的學生羣衆是巷戰、是革命戰爭的先鋒隊。第四、農民在德國佔最大多數，但因他們的落後性與散漫性又在封建地主的重重壓迫下，不能自發的有所行動外，還絲毫得不着領導（不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領導），

故對於革命亦不起作用。不過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雖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却留下了一些可寶貴的教訓。

這便是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爆發後，馬克思、恩格斯二氏立即返德參與革命運動，即當德國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時候，他們倆在料侖加入資產階級的民主集團，指導民主派的新萊茵報；但保留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批評權。這種以推動革命爲前提的與民主派合作的活動，在理論上與策略上都遺給後來革命者以豐富的經驗。同時，根據一八四八年革命經驗，馬氏又指出：工人階級爲了實現在革命中偉大的作用，應有自己獨立的組織，即應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的政黨，聯合勞動農民，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進而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大道。

總觀以上各國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我們可以看出下列的幾個共同點：一、這些革命產生在封建社會逐漸崩潰與資本主義開始形成時期，它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因而造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必要前提。二、在英、法革命中，資產階級是比較急進的革命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一六四〇年的英國革命與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資產階級都創下了他們光榮的史跡；但在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中，資產階級卻暴露了他們對於革命動搖恐懼的弱點，不能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三、工人羣衆在這些資產階級革命中，雖是積極的勇敢的參加了；但他們本身還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更未能發展成爲足以領導革命的力量，未能產生工人自己的政黨。四、農民在反對封建制度上是一個毅然的階級；但由於他本身的落後性與散漫性，任何時代他們都不能形成革命的領導。所以他們當時是由資產階級代表着他們實現爭取土地與自由的要求，他們在這些資產階級革命中便成爲資產階級的後備軍。五、由於上述各種條件的限制，這些資產階級革命的前途，所以只建立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未能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轉變。

第三節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革命，可以作爲實例的爲兩個：一是俄國一九○五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是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們的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五年一月九日，號稱「血的星期日」，驚醒了俄國工人及一切勞動人民對於沙皇制度所存的僅有的幻想，展開了英勇的革命鬥爭。罷工潮從聖彼得堡開始普及到了各大城市，而罷工運動成了革命鬥爭中的主要方式，在罷工運動中產生了富有歷史意義的工人代表蘇維埃；蘇維埃逐漸發展便成了武裝起義的機關與人民政權的萌芽機關。在蘇維埃領導下，罷工運動，一直發展到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莫斯科武裝起義，經過九日的英勇戰鬥，才被沙皇從外省調來的援軍鎮壓下去。但在工人羣衆罷工運動的影響下，農村中的革命運動亦起來了，軍隊中士兵的武裝起義也開始了；同時，國內少數民族（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也與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緊密地聯結起來。然而毫無疑義地，一九○五年的俄國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當時統治俄國的是腐惡的沙皇制度，農奴制度與一切封建殘餘都還存在着，它擋着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俄國人民所受資本主義的痛苦遠比不上所受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痛苦。

因此俄國人民無條件的需要推翻沙皇制度的封建統治。所以這一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推翻沙皇，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臨時革命政府。爭取一切民主自由，確立八小時工作制，承認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沒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只有澈底實現這些任務才能把俄國從老朽的沙皇制度下解放出來。然而這一資產階級革命已不同於以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要因爲它發生在帝國主義時代。由於俄國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階段的資產階級，它已轉到反動的沙皇方面，他們只需要一種小的革命，就是說他們不要使這個革命太澈底、太堅決、太無情，方有利於自己。他們爲了有利於自己，寧可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方面的各種必要改革不用革命方法來進行，而用改良的方法，漸漸地、謹愼地、不堅決地來進行。使這些必要的改革對簡單的人民（工農）的革命的積極性、創造力、與毅力，儘可能的少刺激、少發展，否則工人們便容易「把槍枝從右肩轉到左肩」。這就是說不要把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他們所鍛鍊的武器，亦即把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他們的自由，所給予他們在推翻農奴制度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的民主建設，用來反對資產階級。就在這一點上，使俄國資產

階級已不能成爲民主革命的動力了。所以一九〇五年俄國民主革命的動力，反而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伊里奇論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特點時說：

「根據它的社會內容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因爲它直接所要求的以及自己力量所能達到的，是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的巨大土地——一切這些都是法國大革命於一七九二至九三年已大部分實現了的。但它同時又有無產階級性的，不只因爲無產階級是領導力量，是運動的先鋒隊，而且因爲無產階級的鬥爭方法——罷工，是激醒羣衆的主要方法」。

資產階級革命絕不能說只有利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爲要充實自己的力量實現歷史所賦與它的使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它必需積極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若資產階級革命來得愈澈底、愈堅決，則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之鬥爭也愈有保證。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俄國工人羣衆已實現了它光榮的動力作用與領導作用，并創立了它獨立的政治組織——無產階級政黨，同時，還締造了堅強的工農聯盟，依靠着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工農聯盟，震動了腐朽的俄國，震撼了全世界。

一九〇五年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有可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因爲它是發生在帝國主義時代，而且俄國本身已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所以這一革命也就是上面說的在帝國主義內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時，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恐懼，已不可能成爲革命的領導者乃至參加者，而無產階級已以獨立的力量出現於政治舞台，已創立了自己的政黨，已締結了工農相互的聯合，在這個基礎上，充分存在着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充分存在着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形式，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可能性。不過那時俄國的孟塞維克派是堅持資產階級革命應由資產階級所領導，應建立資產階級政權，否認革命有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托洛茨基派則以左的面目出現，否認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性，否認農民的革命性及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之可能。但這兩派的理論是爲一九一

七年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事實所粉碎了。

跟着我們便來說說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戰裏，俄國沙皇政府表現了不能勝利的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三年多的大戰，特別是沙皇軍隊在前線的失敗，國庫費用的浩大支出，工業生產的急劇下降，農村經濟的破產，失業者的增加，物價的高漲，國民經濟的總崩潰，引起了政治經濟的空前危機——人民多數不能生活下去，前線兵士不斷發生叛變，後方工人不斷的舉行罷工，農村中亦發生繼續不斷的騷動，在這種情形下，沙皇統治已搖搖欲墜了。那時（二月二十六日），布爾塞維克起來發表宣言，號召工人、農民、士兵奮起組織武裝起義，推翻沙皇統治，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結束帝國主義戰爭。於是一下武裝鬥爭便在彼得格勒開始了，經過八天英勇的戰鬥，革命洪流終於衝破了帝國主義陣線最弱的一環。革命勝利了，這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的任務是：『推翻沙皇統治，剷除封建餘孽，結束帝國主義戰爭，實行土地革命』。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在俄國無產階級領導下實現的。但由於那時開始覺醒的俄國人民還浸潤在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中，無產階級本身的組織與覺悟也還不夠，所以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這些小資產階級政黨還具有相當影響，因此把政權一時落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手上；可是傍着這一臨時政府，還存在着一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它在那時雖是萌芽的、薄弱的，却毫無疑義的它是一個事實上存在着并正在成長着的政府。這就形成了那時的所謂「兩重政權」：一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政權——雖是合法而無力的政權；一是工農民主專政性質的蘇維埃政權——不依靠於法律而依靠於武裝民衆直接力量的政權。

但是二月革命仍然是未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沙皇政府雖已推翻，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仍在繼續執行，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仍未達到目的，國內經濟狀況與人民生活更加惡化。臨時政府只是反革命的合法的保護者與掩蓋者，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只成爲臨時政府反動的工具。根據這種情況，俄國革命已走到從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時期，於是必需利用這一時期的特殊條件來爭取無產階級與貧農去奪取政權。從這一時的特殊條件明顯的看出：不推翻臨時政府

——整個資產階級政權是不能以眞正民主的和平來結束戰爭的。因此，提出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提出了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戰鬥任務。因此，在俄國舊曆十月二十五日又勝利地發動了震撼全世界的十月革命。這一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它才附帶的徹底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這兩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却不同於以前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從下列的幾種特點可以看出來：

第一、俄國兩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是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亦即垂死的資本主義時代；而以前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却發生在封建制度走向崩潰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

第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已不可能成爲革命的動力。它雖與沙皇制度也存在着相當的矛盾，但由於工人力量的壯大，它對於工人革命的恐懼遠超過對於沙皇的矛盾。所以它反而轉到沙皇制度方面以求妥協，一面企圖用改良政策在政治上取得更多一點的權力；一面則力謀與舊勢力聯合以便共同對付革命勢力。

第三、工人數量在俄國人口中雖也未佔多數，但他們已形成一個集中而有組織的階級，且已創立了自己的政黨，因此，他們在俄國能形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

第四、俄國資產階級轉到反動方面去了，便喪失了在民衆中尤其是農民的信仰；再由於俄國無產階級之强有力的領導，更加能使過去是資產階級革命後備軍的農民變成無產階級革命後備軍的農民，而結成的鞏固的工農聯盟。

第五、俄國工人自己的政黨——布爾塞維克，不但一開始與俄國的民粹派、立憲民主黨等資產階級影響，作了總的淸算；而且還堅決地打擊了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與托洛茨基派。因此，布爾塞維克便在這不斷的頑强的鬥爭中鍛鍊了、壯大了，能在革命中起著非常大的作用。

第六、它與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大不同的，還在由於上述的條件，把資產階級革命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

第四節　殖民地半殖民地資產階級革命

這裏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資產階級革命，就民族說，亦即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就時代說，便是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就領導權說，是以工農為中心的全民性的領導。因此，在本節略分下列三點述之：一、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與民族革命戰爭；三、殖民地半殖民地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一　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我們曾經在本編第三章說過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是寄生的腐化的資本主義。對於帝國主義的特徵，亦曾說過財政資本家集團為着壟斷原料市場，投資等等，不能不進行劇烈的爭奪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分割。它們早把世界分割完了，世界上任何角落已沒有一塊的自由的土地。因此，它們把整塊的世界也分成了兩半邊：一邊是帝國主義極少數的壓迫民族；一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絕大多數的被壓迫民族。從另一方面說：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為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時代壟斷的資本主義後，一邊各個跑到前面的資本主義國家（德、意、英、美、法、日）馬上由一個民族的國家變為佔有很多殖民地的多民族國家，由要求獨立解放的民族變為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一邊許多原來獨立的國家却變為不獨立的殖民地半獨立的半殖民地，許多原來獨立的民族却變為不獨立的被壓迫民族，變為國破家亡的亡國奴隸，并且帝國主義全人口只有三萬萬四千三百萬人，而被壓迫民族的人口却有十二萬萬人。在壓迫民族內，把各民族平均計算，每一個人有四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內的奴隸，若各別計算就還要多些，例如一個英國人平均就有十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隸。然而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的結果。世界上有資本帝國主義存在着，而可以免除民族壓迫或不去搶奪殖民地的事，這是不可思議的。

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表現在各方面。

第一，在經濟方面，它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變爲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變爲原料、燃料、食糧、軍需資源等等的供給地，近代重工業是很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舉辦的，因爲要防止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上的獨立。此外帝國主義還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內的半封建經濟勢力，以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二，在政治方面，帝國主義特別懂得「分而治之」，挑撥民族感情的政治陰謀，以破壞殖民地半殖民地內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尤其善於利用被壓迫民族內各種反動勢力（半封建勢力或在國際間吃磨擦飯的間諜群）阻礙、破壞被壓迫民族的新興革命勢力。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一套辦法，便正是這樣。

第三，在軍事方面，帝國主義往往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重要軍事戰略據點建築龐大的海、陸、空軍，控制海上、內河、及陸路要道，即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咽喉，以便隨時以武力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英國之在印度、埃及、非洲，美國之在菲律賓，法國之在安南，意大利之在非洲屬及新被征服的阿比西尼亞，日本之在朝鮮、台灣、及我國東北、華北、華中等地，無不如此。

第四，在文化、思想方面，原來資本主義在未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在歷史的各方面，都曾演過相當的進步作用。例如十七、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上半期，西歐各資本主義國爲着反對封建制度，不僅在政治經濟上起過革命的進步的作用，即在文化、思想上也曾起了革命的解放的作用，很顯然的他們曾經有力的反對過中世紀的黑暗、迷信、宗教、野蠻等等。但資本主義逐漸發展——一直到帝國主義時代，他們却回轉頭去同一切中世紀的黑暗攜手來壓迫本國內的革命運動，尤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僅回轉頭去同中世紀半封建殘餘力謀妥協，而且實行所謂文化侵略政策，即宣揚宗教迷信，及反動哲學等等去麻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日帝國主義目前在中國所宣傳的王道主義，孔教思想，乃至擊卜星相，上諭聖旨及一切腐爛的封建意識的殘屑，正是這一套。

帝國主義時代，主要的是資本輸出，這樣，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內引起民族資本的發展，殖民地半殖民地也隨之而產生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同時，由於帝國主義侵入農村及各處小城市的結果，使得農民及手工業者破產，釀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生活上空前的大變動，而帝國主義又逞其故技勾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各種反動勢力——尤其是半封建勢力，對於被侵略民族中的窮苦人民，大施剝削與壓迫，於是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對於異族壓迫之深惡痛絕，因以爆發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及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洶湧泛濫，不可遏止，例如一九一九年印度獨立運動，同年中國的五四運動，朝鮮三月獨立運動，土耳其、阿富汗、波斯等國民族獨立運動，以及北非、南美各地民衆運動。當時各地民族解放運動是與帝國主義內社會主義革命配合着的。這就是所謂戰後第一個革命與革命週期——即戰後第一直接革命時期。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的失敗，結束了戰後第一個直接革命期，資本主義經濟趨於暫時穩定，然而在最大半殖民地的中國仍然爆發了偉大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又在美國開始，接着發展爲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又終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暫時穩定，於是自一九三一年中國九一八事變起，有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魔王希特勒的上台執政，有一九三六年意國法西斯併吞阿比西尼亞的劇變，有一九三六年德、意兩法西斯開始共同武裝干涉西班牙戰爭的野蠻舉動，有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倭寇開始直接進攻中國的戰爭，有一九三八年德國法西斯吞併奧國侵佔捷克的公開搶劫。這些接二連三的事變，同時終結了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的暫時穩定，全世界已一步步走上了第二次戰爭與革命的新週期，亞洲、歐洲、非洲已有許多地面正在作戰，全世界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捲入戰爭旋渦。特別是日寇進攻中國民族的戰爭，是日帝國主義大陸政策——殖民政策之一貫的繼續，其目的在吞併全中國奴役全中國人民。所以就日寇進攻中國的戰爭性質說，它所進行的是侵略的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中國的抗戰就其性質說，則是革命的正義的民族自衛戰爭，亦即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對異族壓迫之獨立解放戰爭。正因爲中國對日抗戰的性質是民族革命戰爭，所以我們提出了「保護祖國」的正確的口號，這與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

大戰，有些人們提出來的『保護祖國』的口號根本不同。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方面，都是為着搶奪殖民地，都是劫持贓物的強盜，都是反革命的戰爭。那時提出『保護祖國』的口號，是保護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祖國，那顯然是一種欺騙的反動的口號。但在被壓迫民族革命戰爭中提出『保護祖國』的口號是保護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求獨立自由的祖國，所以它就不是欺騙的反動的而是正確的革命的口號了。中國的抗戰是為祖國生存而戰，是全國各階層人民為共同『保護祖國』而戰！

再則帝國主義時代，所有民族運動，都可以說是革命的。因為被壓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革命的一個側面，是削弱動搖帝國主義統治的一種極大的助力。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帝國主義時代成了帝國主義經濟上主要來源之一，甚至就是帝國主義鎮壓本國無產階級革命勢力的後方。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無論是正規戰，游擊戰，無論是政治經濟罷工或正式的武裝起義，在客觀上都是削弱震撼帝國主義勢力及其存在的，所以都是革命的進步的民族運動。但在帝國主義時代也不是沒有反動的欺騙的民族運動，例如目前德國法西斯為吞奧併捷，也提出日耳曼民族主義來號召，日寇法西斯為吞併我國，離間我國民族的團結，也運動蒙、回各族來反對漢族，也提出什麼「蒙古民族自決」，「重建蒙古帝國」的口號，乃至一般的「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等招牌它也掛出來欺騙，就是明證。所以我們不但要在具體條件的嚴格限制上來理解「保護祖國」的口號，還要在具體條件的嚴格意義上來理解「民族自治」，「民族自決」等口號。

三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很顯然的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的提法與以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民族問題的提法是不同的。其不同表現在以下各點：

第一、以前人們把民族問題只看成國內的問題——看成歐洲文明民族如波蘭人愛爾蘭人等的民族問題；現在卻把民族問題由國內問題變為一般國際問題——變成世界問題，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奴役下解放的問題。即把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聯結起來了。

第二、以前人們把民族自決權縮小爲民族文化自治權，即把民族自決權變爲適應帝國主義資本家利益的口號；現在民族自決權的權利，却是被壓迫民族的分立權，各民族國家獨立自由的權利。

第三、以前人們對於「民族平權」的口號，是空洞的吶喊；現在却把民族平權看做帝國主義內被壓迫階級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內被壓迫民族的實際援助，不僅要在政治上民族平權，而且要消滅歷史上遺下來的被壓迫民族經濟上、文化上之不平等。

第四、以前人們把民族問題看做一個單獨的問題，以爲帝國主義內被壓迫階級可以不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聯合能單獨得到勝利；現在却以爲帝國主義內社會主義革命必需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亦即資產階級革命）聯合起來；反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必需與帝國主義內社會主義革命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堅强的統一革命戰線，才能共同得到勝利。

關於這一點，孫中山先生在講民族主義時，已輝煌的提出來了，他已把中華民族的解放看成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直到他臨死之前，還鄭重囑託他的後繼者，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重新提出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主張，製成抗戰建國綱領，這是切實把握了當前具體的歷史條件的。

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在當前成爲世界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這是誠然。但世界革命的擔當者——即帝國主義內的無產階級，必須如何實際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呢？最要緊的是世界革命的擔當者及指導世界革命的政黨必需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權」—直到被壓迫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壓迫民族的統治而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民族國家。只有這樣，世界革命的擔當者及指導世界革命的政黨，才能取得被壓迫民族及壓迫民族的工農羣衆之信任，而達到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國際一致。例如當前日帝國主義瘋狂地侵略中國，日本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主張日本軍閥政府失敗，主張把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戰爭變爲日本國內反法西斯軍閥政府的國內戰爭，主張日本一切海、

隊、空軍退出中國，并且在日本國內以實際行動援助中國對日抗戰，這就是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一致性，這就是世界革命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一致性。不過被壓迫民族——尤其是被壓迫民族內的工農羣衆，一面要堅決的積極的參加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去爲保護中華祖國而戰，去爲保護中華領土主權的完整及行政統一而戰；同時，另一面必需堅決主張中華民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過去所遺留下來的漢族對於國內蒙、回等民族的民族特權。因爲漢、滿、蒙、回、藏，在舊前都是被壓迫民族，都有變爲日寇亡國奴的危險。只有堅決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才能聯結各民族一致抗日，同時，爲要走向各民族自由的自願的民族大聯合，也只有堅決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才能取得各民族的信仰，促成真正的團結。這在孫中山先生所親自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明白而具體的規定了。即：『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以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獲得勝利之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從這裏我們又看出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一致性，世界革命與民族革命的一致性。

關於這一點，俄國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亦即社會主義革命，給了我們一個最輝煌的實例。俄國十月革命獲得勝利的因素之一，就是因爲那時俄國的工農得到了各邊疆內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如果那時沒有各邊疆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援助，俄國工農便不能奪取政權，乃至不能維持政權，換言之，即俄國社會主義大革命不能取得勝利；但反過來說，俄國各邊疆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若無壓迫民族內亦即沙皇統治內俄國無產階級的爆發革命幫助他們爭取解放，各邊疆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也是得不到像現在一樣的民族自由與民族獨立的。這證明了民族解放運動不是孤立的，也不能是孤立的。

第六章　當前資本主義總危機與革命高潮

第一節　從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到新經濟恐慌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所帶來的空前災難，開始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由於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加緊了帝國主義內部階級鬥爭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所以革命首先在俄國爆發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隨着十月革命的影響，在歐洲大陸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爆發了無數次的革命行動。例如一九一八年十月爆發了芬蘭無產階級革命，同年十一月奧、德發生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爆發了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與朝鮮人民暴動，同年四月德國、巴伐利亞省產生了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九月土耳其發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年九月意大利工人取得佔領工廠的勝利；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暴動，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亞發生暴動。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秋德國革命失敗，這才結束了第一期直接革命的危機。第一期直接革命危機，正是配合着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來的。

一九二三年秋由於德國革命失敗，結束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個時期；隨即進入戰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階段。這是由於到了一九二三年，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差不多都已達到戰前的水準了。如果同戰前一九一三年比較，煤的產額達百分之九十八，鐵達百分之九十，銅爲一百〇五，國際貿易爲九十八。由於經濟上局部的暫時的穩定，政治上的局部穩定或暫時穩定，也出現了。這一方面表現在資產階級暴力的抬頭，即在總危機深刻時政治上社會民主黨的地位，到經濟局部穩定時爲舊的資產階級政黨所代替；另一方面表現在各帝國主義間有限度的妥協，即在那時不斷的舉行國際會

議，締結妥協條約，這自然只能暫時緩和一下。然則資本主義所以能進入相對穩定階段的原因是什麼呢？第一、是由德國革命失敗，歐洲革命鬥爭一時轉入低潮；第二、資本帝國主義厲行合理化政策；第三、資本積聚和集中過程加速，各帝國主義厲行高壓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第四、改良派首領極力幫助各資本主義國恢復秩序；第五、美國以龐大的資本幫助歐洲資本家。這些都成為戰後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因素。

由於厲行合理化政策，由於拚命剝削工人階級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所得到的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將必然發展為新的更高級的矛盾，因而更加加深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創造世界革命成熟的條件。果然，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到一九二九年便結束了。即從一九二九年冬季開始資本主義恐慌的新週期。這一危機到一九三二年達到了最低點，以後雖有部分改善，但終不能恢復過去的繁榮，而且經濟危機的深刻性與普遍性有着與過去不同的許多特點。這些特點表現在：第一、這次工業危機普遍到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錯綜起來，農業危機也普遍到了一切農業國與半農業國；第三，農業危機又普遍到各農業部門，例如牧畜業等，第四、在工業內佔統治地位的卡德爾壟斷商品的高價，使危機特別痛苦并阻礙存貨的推銷；第五、主要因為此次工業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更加厲害的階段上發生出來的，所以非普通辦法（例如通貨膨脹、商品傾銷等）所能好轉。一九三二年以後，雖然由於軍需工業的畸形發展，雖然由於對本國工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更加殘酷的掠奪等，形成了部分的好況，然而完全恢復繁榮的前途是沒有可能的。不惟不可能，而且陷於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經濟特種蕭條的狀態。為什麼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的經濟蕭條是特種蕭條呢？原因就在它不僅沒有克服失業和貧困，反而因為嚴重的失業和廣泛的貧困，更加縮小了購買力，造成新的更加嚴重的危機。原因還在它沒有克服「不變資本」的慢性過剩。原來在危機以前，幾個主要國家的生產機關，就停頓未用，到危機最猛烈的時候，美、德等國的機器工廠開工率，最多也只百分之三十左右。到一九三三和三六年，英、美兩國的固定資本雖也開始在革新和補充，然而這并不是普遍的現象，一般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并未根本解決。最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雖有過部分

的好況也是不平衡的。一面是有些國家已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水平，有些國家則仍停留在原來的階段；另一面，所謂好況却只限於有關軍事工業的部門，其他如農業、工業、消費品生產則相對地或絕對地縮小了，好況的基礎是非常狹小而薄弱的。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春，資本主義好況，曾經一度部分的達到了最高峯；然而爲時不到幾個月，就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季新的經濟恐慌又從美國開始了。馬上就傳波到了全資本主義世界。新經濟危機使侵略國愈益困難，而侵略國之瘋狂的進行侵略戰爭，復更促進經濟危機深刻化。新的戰爭已經不斷的爆發了，這又是加速危機過程與加深危機深度的直接因素。這裏已經證明這一次新的危機是在還沒有恢復繁榮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展得最劇烈的條件下爆發的。它的面前已經在事實上出現了戰爭，而且還一定要走到新的革命危機的路上去，走到大規模的正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節　空前的緊張局面與新的革命高潮

自經濟恐慌發展以來，各帝國主義內部以及各帝國主義彼此間的局面，不斷的緊張起來。爭取國外市場鬥爭的加强，消滅了自由貿易的最後壁壘，而關稅高築、貨幣戰爭、傾銷政策、軍備競賽、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辦法，更使各帝國主義間的關係空前緊張，并且把重分世界重劃勢力範圍的最後的辦法——殘酷的戰爭迫切地提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了。過去締結的各種和平條約，凡是認爲於己不利或於侵略不便的，都在一通一通的加以撕毀，甚至早經視同廢紙。德國於一九三三年法西斯魔王希特勒上台之後，即以軍縮會議限制德國軍備爲藉口，突然退出國際聯盟，恢復自由行動。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八日希特勒宣言重整軍備，這便是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的第一步；接着是進兵萊因，要求恢復舊有殖民地。到一九三八年它便吞奧併捷，最近（一九三九年）更威脅波蘭，要求把但澤也併入版圖，至此凡爾賽和約已撕毀無餘了。意大利法西斯於一九三五年十月擧行了侵略阿比西尼亞戰爭，次年便把阿國一口吞滅。西班牙戰爭發生後，德、意兩法西斯又實行武裝

干涉，幫助叛軍佛郎哥，在兩年之內，硬把西班牙共和政府蠻橫地壓倒下去。凡爾塞諾公約早已由希特勒聲明廢棄，事實上也早不存在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野蠻似的起來撕毀了九國公約，武力佔領了中國東三省；繼續是其野蠻，又造成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爭；同年十二月進佔熱河，兵臨華北，造成了古北口戰爭；一九三五年又成立冀東自治區，直迫平、津，并且一再強迫中國簽定屈辱條約，例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爆發，這又是日帝國主義有計劃的陰謀，從此正式展開了大規模武裝進攻中國的戰爭。這一戰爭整整繼續到現在已有兩年多，然其進攻并未停止，其軍事進攻與政治陰謀更加毒辣。然這正充分證明當前政治局面的空前緊張，各帝國主義間的火併，要更大規模的開始。

拖延性的（慢性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已經使各帝國主義劍拔弩張起來，而在挽救危機的具體方策上不外兩端：一是對外戰爭，一是加緊對於本國工人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的剝削。因此便更加加重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現在廣大的工人羣衆不斷的脫離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而更加革命化，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衆亦不斷的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或民族革命戰爭。因工人與資本家間矛盾的加深，在一九二八——二九年，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裏就已經不斷的爆發了經濟的大罷工，例如波蘭、洛茨工人罷工，魯爾煤礦工人罷工，捷克、印度等處，也發生過大大小小的罷工運動。一九三〇年美國發生了廣大失業工人的大示威運動，一九三二年發生農民運動，不久又發生退伍軍人長途向華盛頓進軍的示威運動。一九三〇年——三一年，德國不斷發生示威運動一九三一年四月發生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一年英國有「因弗果頓」艦隊的罷工，同年智利艦隊亦發生暴動。此後有西班牙英勇反抗法西斯鬥爭達兩年之久，阿比西尼亞雖已亡國，然還在不斷的採取游擊戰爭方式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的野蠻侵略。中國的奮起抗戰震撼了全世界，正在英勇地爭取最後勝利。這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新開始所帶來的新的革命高潮。這一高潮表現在國際工人階級反法西斯鬥爭，而結成了反法西斯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線，以及勞動民衆的人民陣線，乃至反戰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此

外則還有國際間反侵略戰線的民主和平戰線。

第三節　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之下，由於反映在政治上的危機，使法西斯獨裁政治，好比「虎列拉」一樣在這六分之五的世界裏蔓延着。除意大利是一家老店外，近幾年來，從德國到波蘭、芬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利亞、希臘、南斯拉夫、西班牙，葡萄牙以至於遠東的日本，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或是純粹的法西斯統治，或是在蛻化中的法西斯統治形態，或仍舊披着議會民主政治的外衣，而實際則行法西斯統治，試看英國也有莫斯萊黨在野的吶喊，有過去紐爾濫的法西斯政變。法國有荷槍實彈選再舉奪取政權的「火十字團」。就是自翻不會生長法西斯的美國，也已有過「銀衫黨」的煽動，「黑軍團」的恐怖。法西斯把經濟恐慌的負擔轉嫁於勞苦大衆，減少乃至完全取銷社會保險基金與失業津貼，高度膨脹通貨提高物價，搾取苛捐雜稅，已使大衆生活陷於飢餓，半飢餓狀態，更瘋狂備戰，把國家全部預算移作軍費，實行戰時經濟收奪人民企業，驅使成千百萬壯丁受軍事訓練上前線當砲灰，更剝奪人民一切基本權利，實行强制義務勞動。在集中營裏，祕密警察拘留所裏，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監牢裏，無數爲自由、爲文化、爲人類解放而鬥爭的戰士，被囚、被施以酷刑或屠殺。很顯然的，法西斯的犧牲者，不僅是工人、農民，而且有城市小資產者、知識份子以及一切非特權的資產階層都在內。所以在政治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情勢下，法西斯的毒焰高漲，而反法西斯的民衆勢力及一切組織也逐漸抬頭或組織起來了。最先組織起來的，可以說是反法西斯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其次，則有廣大民衆的人民陣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則有反帝反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我們現在試先從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說起。

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法蘭西、西班牙兩國的是先鋒、是榜樣，現在即以它們兩國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作中心敍述。法蘭西人民陣線的勝利，給全世界反法西斯反帝人民陣線運動以莫大的興奮。同時，對於各國的自由主義者、社會

猛，共產黨爲保衛民主政治和大衆利益而聯合鬥爭，也給與了一個輝煌的典範。因此，我們應該深刻認識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主要任務，是爲保衛民主政治和大衆利益而鬥爭的聯合（統一）戰線。這種運動是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爲對付國內敵人——法西斯統治而聯合起來的民主運動。法國也和其他帝國主義一樣，陷落在深刻的經濟總危機的深淵裏，法西斯就在這種經濟狀況下，得着生長的土壤；法國又是世界上第二位多金的國家，可是大部分的黃金，却掌在二百個金融巨頭手上。這少數金融寡頭統治，搾取民衆，幾至導引民衆於毀滅；不滿現狀的情緒，廣泛的展開了。金融巨頭深怕民衆起來革命，便不能不重新覓取鎮壓革命的工具，於是法西斯便成爲大資本家天然的擁護者。一時法國的法西斯團體，就發展爲下列各種：「青年保皇黨」、「法蘭西團」、「愛國青年」、「火十字團」等等。就中最著名而具有相當力量的是「火十字團」。它所編練的國民義勇軍有武裝三十萬人。武裝奪取政權，是他們預定的工作；可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巴黎暴動，很快就失敗了。失敗的原因，由於巴黎工人第一次結成工人統一陣線的隊伍。工人統一陣線的成功，建立了人民陣線的基礎。人民陣線吸引着農民、城市小所有者、中產階級及青年群衆，使它獲得迅速而廣泛的發展。法國的人民陣線，共計包含九十八個團體，主要的是社會黨、共產黨、急進社會黨、人權大同盟、退伍軍人後援會等等。人民陣線全國委員會宣言，目的在要求一個自由的、强大的、美麗的、幸福的法蘭西，號召全國人民爲保衛民主政制、革命傳統而鬥爭。它的政治綱領的要點是：普遍的大赦，解除法西斯團體及其武裝，改正出版法，尊重工會的權利，保障婦女勞動權，延長義務教育年齡等。經濟要求的要點是：實行可以恢復大衆購買力的政策，創立救濟失業的國民基金，不隨工資減少而縮短工作週，改革稅制，增設大財產稅，建立大規模公共工程計劃等。關於維持國際和平的要求，其要點是：爲組織和平達到維持和平的目的，進行國際間人民——特別是勤勞大衆的合作；爲實行集體安全達到保障及制裁侵略的目的，進行國聯會內國際間的合作；採取限制軍備以至廢除軍備的步驟；軍需工業國有；擁護法蘇協定等。勃魯姆內閣時代，是典範的人民陣線內閣時代。此後各相次出現的內閣，乃至目前達拉第內閣，雖對於人民陣線政綱的執行不甚澈底，但人民陣線的勢力卻祇有日益

運動的發展，在人民陣線中心領導得到强力的支持與策略正確的運用之下，它必然是能最後擊破法西斯的壁壘的。為領導人民陣線前進，領導工農大衆到達於最後勝利，工人階級政黨的單一化是必要的，一個適應形勢發展的計畫與戰略也是必要的。這兩個迫切的問題，已被現實提出於法蘭西工人階級的兩大政黨之前。

西班牙，一九三四年十月革命，亞斯特里亞十五天的戰鬥，西班牙社會黨、共產黨、UGT（社會黨工會）、CGTU（共產黨工會），無政府黨及其工團CNT聯合作戰，襲就了西班牙人民陣線的典範。十月革命是失敗的，革命失敗以後，雖在反革命的恐怖時代，但大衆聯合鬥爭的精神却一點也沒有銷沉。大衆這種不屈服的精神，一方面使西班牙盧白爾主法西斯不敢實行獨裁政變，另一方面使工人各集團的親和繼續增進，隨即成立人民陣線政府。人民陣線政府成立以後，宣布大赦政治犯，恢復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恢復一九三二年基本勞動法，恢復因十月革命關係被開除的工人的工作，與普遍增加工資，規定四十小時工作週，清除天主教教育，增添學校五千所，設法分給土地與無地農民。……政府確實向人民陣線的政綱前進着。可是政府解決土地問題的步驟是迂緩的，而且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人民陣線綱領還有這樣澈底的規定，那時共和左派的阿柴那政府也不能做到這個程度，所以不久便發生了反動派法西斯的叛亂。叛亂的實力派是以佛郎哥為首所率領的大部分的西班牙陸軍以及召募來的摩洛哥的土著軍。它所代表的成份是：貴族、軍閥、天主教、地主、資本家、保皇黨及一切反動集團，奮不顧身起而應戰的是：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城市小資產者及知識分子。在戰爭進行中，改組政府使政府成為百分之百的人民政府，使政府的政策與人民的意志完全一致，使人民陣線政綱充分實現。西班牙的政府軍與佛郎哥叛軍，艱苦支持兩年之久，然終為德、意兩法西斯國的橫蠻干涉，對於叛軍的多方援助，把政府軍壓潰了，但決不就是人民陣線的失敗，在全世界範圍內，保衛民主政治和大衆利益而戰鬥的最後勝利仍將是屬於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

反法西斯人民陣線運動，不僅典範的展開在法蘭西，西班牙，即在法西斯的魔窟裏，也艱苦的生長出來了。德國被法

西斯摧殘的工農們、中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聯合起來討論人民戰線的實行問題，起草人民陣線綱領，并發表宣言。宣言的要點如下：

「由於漲價，由於擴軍，由於摧殘外國貿易與人民購買力，目前德國摧毀着經濟的社會的生存基礎。在這種統治以下，事情必然愈過愈壞。

「現政府以非日耳曼制度的專制、暴虐、生活的壓迫，統治者們個人發財，使差不多全德國人極端渴望這恐怖的終結與恢復基本人權。目前基本人權的恢復是最重要的要求。各黨各集團被結合在一起，不放棄他們各自前進的目標，領導他們全部力量，來實現下列普遍妥當的統一口號：

「『言論自由，研究與教授自由，良心與宗教自由，人的自由，尊重人民生命，改組政治機構，統制公共收支，取締法西斯獨裁統治』。

「在以毀滅來威脅德國自己與全世界的大恐怖面前，帝國主義大戰是否爆發，係於德國人民能否堅決反抗，『一切黨派與個人，如果願意加入這一陣線，必需儘可能的來阻止新世界大戰的慘禍，保全祖國與人民，保全其他國家與民族』。

這是德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呼聲，但這種運動與呼聲，不僅在德國有，它是普遍於德、日、意一切法西斯國家的。

第四節　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

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這裏只能以印度作一個典範的例子來敍述。

戰後，印度民族運動的發動，國民大會的出現，完全是在甘地的領導之下。因此，運動的政治目標，是一個不明確的「自己的政府」；經濟綱領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戰術是消極抵抗。領導運動的機關，即國民大會，正如它的名字的涵義，是全民的組織，包含各種階層，據一九二〇年的登記，會員約有一千萬人。但這是不可厚非的，這就是民族統一

戰線的初步基礎。一九二七年五月，印度的工農階層提出比較進步的綱領於國民大會，要求大會以民族獨立為目標，採取羣衆的直接行動——包括總罷工運動。大會初尙企圖否决這一建議，然終被羣衆堅持通過。一九二九年，民族運動向左翼在布斯領導下，提議與英國斷絕一切關係，建立印度與英國幷峙的政府，甘地則以相反的提議與之對消。但甘地雖堅持非武力抵抗主義，然而一九三〇年，終於出現了對英帝國主義的武裝反抗。一九三一年，甘地與印度總督歐文談判停戰，幷出席倫敦圓桌會議，然在他由倫敦回到孟買時，印度羣衆卻用大示威來答覆他。這證明了反帝民族統一戰線，是應該以工農階層作中心的。然而在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畢竟是國民大會的權力者，他們為維持其領導地位，在一九三四年孟買大會開幕前，主張削減大會代表至二千人，（前次在納革披開大會，代表是一萬四千人）。他們始終堅持，割斷民族鬥爭與經濟鬥爭的關連。但時代的潮流與印度本身的情勢，決不復能使這種堅持再繼續下去，於是大會不免發生左右翼的分化。工農大衆要求不妥協的鬥爭，要求參加國民大會前進；民族資產階層不歡迎這樣做，他們排斥大衆參加國民大會，他們只想和民主派聯合，和站在大會外面的與英帝國合作的人聯合。

甘地因此逐漸失去人民的信仰，他曾反省而很痛切的說：「我現在應當退到一旁，讓這個不可阻遏的急流，在我面前過去」。甘地退休了。現在國民大會惟一的權威領袖是尼赫魯，一九三三年他曾公開宣言：「我相信在今日政治領域內最基本的選擇，是類似共產主義或類似法西斯主義的二者之一，我是選擇前者的，那就是共產主義」。一九三六年三月，國民大會在魯克諾開會，左翼也發表他們的意見，提出國民大會的任務是反帝、反奴隸憲法，為印度的完全獨立，為勞苦大衆生命線的需要鬥爭到底。國民大會過去并沒有成為民族鬥爭統一戰線的國民大會，還把很廣大的羣衆關在門外，綱領也還不曾明白表現出是為民族鬥爭的綱領。所以必須修改大會組織法，讓工會、農會、青年、婦女團體以及各種民衆團體，集團的參加大會，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強基礎。魯克諾大會開幕，主席尼赫魯致詞，正反映出了這種需要。他說：

「我們不能把印度或印度問題從其餘的世界孤立出來，西方的社會主義和勃起於東方的及其他非獨立國的民族主義，

反對與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聯結。必須記着，東方的民族國家，完全和新的恐怖的獨裁的法西斯國家的民族主義不同。前者是把歷史推進向自由；後者是反動的最後的避難所。

『世界分成兩個集團，法西斯和帝國主義在一邊；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另一邊。

『我們——爲印度自由而工作的人，站在那一邊呢？無可避免的，我們要和徹底的反帝反法西斯的世界前進勢力站在一邊。

『假使前途是有光滿的希望，這主要是由於蘇聯和它所做的一切。假使世界災難不加阻礙，這新文明將展開於其他地域，終結資本主義所飼養出來的戰爭。

『我不知道這新秩序怎樣及何時來到印度，我想每一個國家，都會依據它自己的精力，仿效它追隨它之後。

『我相信解決的惟一鎖鑰，在於社會主義。我深願這大會成爲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和爲新文明工作的世界勢力攜手』。

這裏現出左翼勢力的成長，例如大會通過許多大衆有力的決議案；但仍有許多重要決議不能通過，這是受了右翼的控制。尼赫魯煞苦心維持印度反帝民族統一戰線，他對大會的階級構成分，最後來了一個折衷的態度。他說：『無可避免的，我們必須中等階級的領導，但必須深深注視着羣衆，吸取他們的力量與感應力』。這樣，便使得大衆力量得到很快發展的機會，而印度反帝民族統一戰線，也日益走上擴大鞏固之路了。

這裏，我們雖然只把印度反帝民族統一戰線作爲典範的例子來敘述，實則亞洲其他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尤其是中國的反帝抗日運動，此外有如拉丁美洲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非洲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都不知不覺的或有計劃的走上了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大道。

第五節　中國人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爲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法西斯中世紀的反動黑暗，帝國主義內部的工人階級結成了反戰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同時，并組織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團結一切和平的民主的力量，去推翻法西斯的獨裁，例如在德、日、意等國內；去阻止法西斯的興起，例如在法、英、美等國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內部工農大衆爲着推翻帝國主義的異族壓迫，也必須建立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上述印度反帝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一個典範的例子。但由於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歷史的經濟的階級關係的及民族特性等具體條件之不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形式與內容也就有很大的區別。例如在印度和中國，資本主義都已有相當發展；都已有相當數量的民族產業工人階級。這一點是相同的，然而印度是多年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中國却是各帝國主義的共同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印度與中國又有多少不同。有些殖民地國家（如埃及）資本主義并不甚發展，因之民族產業工人階級的數量也較少。有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摩洛哥、阿比西尼亞等）差不多完全沒有民族資本家，也就完全沒有民族產業工人階級。在這些不同種類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革命的傳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又是各不一樣的，因此，在這些各種不同的國家內，必需建立各種形式不同內容各別的反帝統一戰線，而不能忽視各別的具體條件，使之强同。根據歷史的階級的民族的特點等具體條件去建立各種不同的反帝統一戰線，這是起碼的必需遵守的科學原則。

由於日寇法西斯軍閥對於中國九一八以來的新進攻，中華民族危機之加深，又由於新進攻影響到我國內各階級各黨派各軍隊等等相互間關係之變更，并由於國際情況，特別是遠東情形之變動等具體的歷史條件之大大變動。因此，在中國不是建立一般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而是建立以工農爲中心國共兩黨合作爲基礎的由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前我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與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統一戰線不同；并且與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時代的反帝統一戰線有別。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時代所建立的反帝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革命的主要打擊方向，是集中在國內北洋軍閥身上，其次則間接打擊外國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當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革命的主要打擊方向

於集中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因爲日寇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着直接的強盜的侵略戰爭，軍事佔領我國領土，威脅整個中華民族和國家的生存。所以在目前對日抗戰的最高原則，是精誠團結，一致對外，團結全國各階層各黨派各抗日軍隊及各抗日地方政府，在國民黨、中央政府、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去一致抗日，去堅持抗戰到底，以求在持久戰中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第一次所建立的反帝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曾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因爲當時正處在資本主義暫時穩定時期，各帝國主義，不論英、法、德、意、美、日，都一致地鎮壓中國革命。因此，當時的民族統一戰線，不能不并且不得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但是目前的國際形勢，特別是遠東的形勢，大大變更了。由於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實際上已形成了三角軍事同盟。他們這夥強盜的侵略不僅威脅着中華民族和中國的生存，并且也威脅着各民主國家，例如英、法、美、荷、比等國切身的經濟政治利益。因此，我們二年來對日寇的英勇抗戰，在國際上就不僅取得全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民族及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之同情與實際援助，并且也得到了各民主國家愛好和平的人士們與一部分當局者之同情及某些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因此，目前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是可以着重對外抗日，并且也是必需着重抗日，而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目前對日抗戰，它是要完成我國民主革命中頭等首要任務的，所以在對內關係上，它是帶着全民族全民的性質。正因爲它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挽救中華民族國家的危亡，對外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把中華民國變爲名符其實的新式的眞正人民的民主共和國，眞正三民主義的國家，實現孫中山先生的理想，成爲全國各階級各黨派之共同要求與共同鬥爭目標，所以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不是包括各抗日階級各抗日黨派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不但包括工人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并且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一部分參加或同情抗日戰爭的地主。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既包括各個不同階級，而且這些階級之存在乃是客觀的現實的存在，決不能由個人主觀意志加以變更。那麼，在民族統一戰線內部，不免因局部利害不同而發生磨擦，也是不足爲怪的。問題就在無論如何不能讓磨擦擴大影響抗戰甚至於破

導抗戰。由於在客觀上我國社會內部既存在着各個不同的階級，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分，也不能不包括各個不同的階級。那末，因代表不同階級利益而產生的各抗日黨派間的某些政治上的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足爲怪的，關鍵就在無論如何要使各抗日黨派的利益，服從抗戰的利益，服從民族國家的利益。這就要各抗日黨派，尤其是領導抗戰建國的國民黨，認淸責任重大，局勢危迫，無論如何不受日寇及漢奸們的挑撥離間，而去按時按地適當地解決各黨派間的相互摩擦。這不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階級的存在既是客觀的現實，在目前歷史的階級上無法消滅，也是不能消滅的；因此，各抗日黨派的存在，也是客觀的現實，在中國歷史的現階段也是無法消滅和不能消滅的。十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我國歷史現階段發展的規律性，決定任何一個政黨，在今天不能違背歷史的發展與客觀眞理，也決定任何一個政黨，不能不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不能不爲抗戰建國而奮鬥，並且不能不在國民黨及其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而奮鬥，不能不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而奮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是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基本條件。

第六節　國際上的兩條陣線——侵略陣線、和平陣線

由戰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到新經濟恐慌，由新經濟恐慌下的空前的緊張局面到新的革命高潮，這是一面；另一面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也已經日益嚴重了。在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戰隨時隨地都有爆發的可能。而且大的戰爭已在遠東，西班牙，歐洲的某些部分，東非洲進行着。德、日、意已經結成了侵略的同盟，而以反共防共爲藉口掩護其掠奪的侵略戰爭。這一侵略者的同盟之存在，就表示出新的世界大戰危機之嚴重。

在這個新的隨時都可爆發的世界大戰中侵略者的目的何在。侵略者雖然極力把自己的目的描寫爲純粹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第三國際。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第三國際，反對蘇聯，固然是侵略者主要目的之一，因爲社會主義蘇聯的存在，

第三國際的存在，就表示法西斯專政是不鞏固的。但是侵略者在事實上，除了準備進攻蘇聯，還在進攻蘇聯之前，就進攻了中國，進攻了西班牙，併吞了奧大利、捷克，併吞了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利亞，現正謀奪取但澤進攻波蘭。這就是侵略者已經實行的目的或正在準備要實行的目的。這就說明了侵略者同盟的危險性，不僅對於蘇聯嚴重的存在着，就是對於整個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特別是英、法、美，同樣是嚴重的存在着。因此，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就不但是蘇聯所應關心的問題，也是全世界民主國家所應關心的問題，也是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所應關心的問題。德、意、日侵略者的同盟，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國際侵略陣線。同這個瘋狂的侵略陣線處於絕對對立地位的，就是國際反侵略的和平陣線。社會主義的蘇聯有世界無匹的強大的陸，海，空軍，有忠實於自己的祖國并不怕犧牲自己以捍衛祖國獨立自由的一億七千萬人民，有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但是蘇聯并不需要戰爭。蘇聯從它出現於世界以來就一直為保衛自己的和平與安全而奮鬥，為建立世界真正和平而努力，這便是蘇聯和平政策的基礎。沒有絲毫根據來說蘇聯的和平政策是欺騙世界的一種手段。蘇聯的外交政策，是拿它的和平政策貫徹着的。試看斯太林在聯共第十八次大會講演詞，它的外交政策，更覺得是非常明白而確定。他說：『一、我們擁護和平和力求增進蘇聯與所有各國之間的商業關係。這便是我們的立場，在各國也拿同樣的關係來對付蘇聯而不去企圖踐踏我們的利益時，我們將始終守着這個立場。二、我們對於和蘇聯有共同國界的鄰邦，總保持着和平的密切的和友誼的關係。這是我們的立場，只要我們的鄰邦也拿同樣的關係對待蘇聯，而不去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破壞蘇聯領土的完整和它的國界的不可侵犯性，我們將始終守着這個立場。三、我們贊助那些被侵略者所侵略而正在為自己國家的獨立而作戰的國家。四、我們并不畏懼侵略者的威脅，而且正準備給那些意圖破壞蘇聯的邊境的戰爭挑動人以加倍的打擊，如果他們果真來打擊我們』。這便是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

由於蘇聯之忠實於真正的和平，所以蘇聯的和平政策就得到了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與民主的人們，一切愛好和平與民主的國家的同情和贊助，成為團結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與民主的力量的中心。為着保衛世界的和平，就應當認清世界和平

是不能分割的，應當以集體安全制度去反對侵略者，應當採用集體的行動去制裁侵略者，應當運用一切對於世界和平有利的機構，如國聯等，應當擴大與加强和平陣線去打擊侵略陣線，由於蘇聯對於和平的努力，過去就訂立了法蘇與捷蘇兩互助公約，同時，中國、土耳其和其他各國也和蘇聯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美國這幾年來也表示更向蘇聯與和平陣線進了一步，最近各民主國家，特別是英、法、蘇的互助談判，顯然有成功的希望。所有這些，就證明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與民主的人們和國家，都已覺悟到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鞏固和擴大和平陣線，才能回答侵略者的進攻。

在這兩個基本對立的陣線外，英國的外交政策，始終不免顯示着動搖。基本上英國是應該站在和平陣線方面的。因為它有廣大的殖民地和市場，這正是侵略者垂涎的對象。可是英國在不久以前卻不惜犧牲和平國家弱小民族的利益，向侵略者無條件的妥協。助長侵略者的瘋狂。很顯然的這種動搖政策，表示出英國統治的不鞏固，害怕民眾起來。但它的妥協動搖政策不改變，它必然會在侵略者的血腥教訓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民主國家及其本國民眾的反對之下歸於慘敗。現在事實上已經證明英國動搖外交政策是失敗了，所以才有目前對蘇談判，希圖補救。但無論如何和平陣線的損失，侵略者的瘋狂，是張伯倫「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所給與的。

然而由於過去西班牙、阿比西尼亞人民之堅決的英勇的抗戰，特別由於中國之持久抗戰，抗戰到底的決心，對於日帝國主義的打擊，再由於蘇聯的實力充足與民主國家之覺悟，特別是英國外交政策之轉變，和平陣線將有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的可能。而且從目前國際形勢看，有許多事實，都是說明全世界和平的和民主的力量正在增長着。建立鞏固和擴大國際的反法西斯的和平陣線：有完全可能去制止目前已經進行着的德國對波蘭的侵略野心，有完全可能去制止日寇法西斯軍閥進攻中國的侵略戰爭，並有完全可能去防止這些戰爭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着達到以上的目的，就首先需要全世界工人農民的統一行動，需要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戰線的統一行動，需要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統一行動，需要全世界民主國家，特別是英、法、美等民主國家和平陣線之集體行動，去制裁反動的侵略的違反世界和平的侵略陣線

的國家，所以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反侵略的世界和平陣線，它們彼此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緊密的聯繫的，它們是由某種歷史具體條件之不同而形成的各別的革命支流，匯合統一在歷史現階段的革命高潮之下的巨瀑。

第七章　中國革命論

第一節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動力

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家，全國面積爲一千一百十七萬三千五百五十八平方公里，超過全歐洲面積的總和。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以上，佔全世界人口總額的五分之一。物產之豐與礦藏之富，爲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中國文化是全世界人類與歷史上最早最古的文化，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其中有偉大的思想家，卓絕的軍事家及出色的發明家。有異常豐富的典籍文藝，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遠在紀元前兩千年間，中國已有指南針的發明；而火藥的應用亦遠在歐人以前。二世紀時即有紙的製造；七世紀時，即有刻版印刷術的發明；到十一世紀更有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其他如華美精緻的金屬品及光澤美觀經久耐用的染料，亦爲中國自古著名的特產。中華民族是習於勤勞的民族，而忍苦耐勞，愛國熱忱與酷愛和平的精神，尤爲其他任何民族所不及。中國已有近代的大都市，有四百萬人口的上海，一百五十萬以上人口的天津，有一百萬以上人口的武漢，中國已有好些近代的工業，如紡織業、麵粉業以及其他許多輕工業。中國已有近代的交通，如鐵路、汽車路、內河航行等等。

但自鴉片戰爭後，特別是馬關條約與義和團事件後，帝國主義便在中國奪取了種種特權，大肆其經濟、政治、文化侵略，把中國看做他們的公共殖民地。在經濟上，帝國主義壟斷中國各種工廠企業，把持中國交通、鐵路、航運、及空運，操縱中國財政，强佔中國海關稅及鹽稅；此外還經過買辦、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及地方封建勢力，掠取中國農民，壟斷中國各種重要的農產品。在政治上，各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暴力威逼中國政府租借土地，開闢商埠，

簽定各種不平等條約，甚至強佔中國土地，任意屠殺中國同胞；并利用國內封建勢力，割據狀態，挑撥中國內戰，操縱中國政府，最近日帝國主義，則利用漢奸，偽組織，陰謀分化，以華制華，使中國淪爲其殖民地。在文化上，則藉口傳教，藉口辦教育，如日寇則藉口尊孔，尊經，闡揚中國王道，實行其文化侵略。而中國歷來政府——自滿清政府以至於北洋軍閥政府，一方面成爲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們本身即是國內封建勢力的代表。他們代表官僚、軍閥、地主，豪紳、大商人等剝削集團，對人民大衆施以殘酷的剝削與壓迫。因此，捐稅苛重，民不聊生，內戰不絕，政權不統一，封建勢力，籠罩全中國，阻礙中國走不上近代化的道路。

二十世紀初，由於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刺激，中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如紡織業、麵粉業及其他許多輕工業，都有着初步的發展，尤其是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因爲各帝國主義忙於應付戰爭，一時不得不放鬆對於中國的侵略，又因爲對中國市場若干軍需及日用品的需要，以及以中國本身因舶來品的減少對國貨的需要，於是使得中國近代工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的良機。紡織工業、麵粉工業、絲業、火柴業、水泥業等等，在此時固都有相當的發展；其他部門的重工業、金融業，亦開始發展了。但這種發展在帝國主義大戰結束後的幾年中，即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又復實行更大規模的侵略中，遭受了極大阻礙，甚至走向停滯與破產。這是因爲帝國主義想把大戰的損失轉嫁於中國人民，加倍侵略中國的結果。於是帝國主義的加倍侵略與中國半封建勢力的束縛，成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近代化的嚴重桎梏。

但無論如何，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總在艱苦中遲緩行進，隨着中國資本主義之某些發展，中國民族資本家，買辦資本家，已逐漸形成起來；他方面，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創立某些工廠，這與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相結合，也不能不產生中國的產業工人階級。現中國約有六百七十五萬大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則達一千二百萬以上。他們在外國及其他工廠中，奉獻極長的工作時間，換取極低微的工資，還要經常的失業。他們所受的是重重壓迫——資本的壓迫，民族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所以中國工人在工人運動中一開始便帶着濃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色彩。中國工人固然是很痛苦的，但其痛苦

決趕不上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之深。

中國農民，可以說是中國最受痛苦的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對於農民土地的侵併，是很可怕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淸邱家穗語）。『有田者只十分之一，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淸盧楓語）。這成了中國歷史上一種經常的狀態。大概歷代的大地主，即是中國真實的統治者。所以地主在農村中，往往具有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權。所謂「謀威特强，視佃民爲魚肉」，「武斷鄉曲」，「格殺非佃」，歷史不斷的記載着，而國家法律，如大淸律例的「鄉飲酒禮」，且公然規定：『佃戶見田主，不論齒敍，幷行以小事長之禮』。如有違反，杖責五十。農民終歲勤苦所換來的收入，除了要用一半以上繳給地主外，還要納糧負役。所以『今日完租，明日乞貸』（顧亭林語），就成了農民經常的生活，最後就迫得「賣妻鬻子」，不能自存。歷代封建地主對於農民殘酷的剝削，實造成了中國民族落後及歷史發展的停滯。加以近代帝國主義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後，不但在城市中壟斷各種新式企業，壓迫中國工人，而且也把他們的勢力侵入農村，從各方面參加對於農民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剝削，他們設法使地主依附於自己，使地主不得不變成自己的工具，同時，把自己也變成地主，在農村中用直接間接的方式，做高利貸事業，經營掠奪式的商業交換去剝削農民，使農民陷入他們所佈置的鐵桶中，幷使農民加緊的不斷的破產崩潰。農民生活無任何保障，不但無政治上的自由可言，抑且無生存上的人生可言。這就是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狀況的縮寫。中國革命的要求，就產生在這種社會經濟狀況裏。

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反映出中國革命的要求；同時，也規定了中國革命的內容——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的內容。因爲要使中國的經濟向上發展，要在政治上使中華民族得到徹底的解放，必須一方面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粉碎其在中國之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同時，另一方面剷除國內封建勢力，實現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澈底解放農民，改善工人生活，實現民主自由政治，建立一個真正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上述這些任務——

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是半殖民地條件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換言之，即完成這種革命的任務，不但未超過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範圍，而且客觀上只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中國近代化的發展掃清道路更能促進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因此，這一革命，不但是工農大眾所應該參加積極負起責任的，而且也是民族資產階級所應該積極參加共同奮鬥的。反帝反封建固然是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之兩大內容，亦即三民主義革命之兩大對象，它們之間雖然有着相互關係，彼此相互地推進着，但這兩大任務不是同時并奔并進的，它根據中國某一時期內外具體情況決定反帝反封建在某一時期特殊的重要性，這正是反映三民主義因時地不同而各有其特殊重要性來的。

以上是中國革命的性質。然則中國革命的動力是什麼？毫無疑義的，中國的革命是一廣大民眾的革命，是包含中國各社會階層在內的革命，在某一時期，甚至反映出全民革命的形式。不過一般講來，它應該是以工農為中心的全民革命。這就是說，工人與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城市小所有者，民族資本家，知識分子，也是革命的動力，合起來成為中國革命的總動力。自然，這不能機械的來理解，判定，隨着革命發展階段以及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動，而革命動力的各組成部分亦將有所變動。

第二節　中國革命之史的發展

近百年中國革命史，要詳細的敘述，在這裏沒有篇幅。只好劃分幾個階段，略舉綱目。現在試從辛亥革命說起。

一、辛亥革命——滿清末季，中國人民大眾，一面感受外侮日逼——帝國主義的壓迫；另一面受着滿清腐敗官僚政府的摧殘。社會經濟日趨崩潰，人民生活日趨惡化，痛苦日深，因而革命的要求，羣眾對於滿清的反抗也日形迫切。所以辛亥革命前，就充滿著人民大眾反對苛捐雜稅的運動，農民叛亂，且醞釀為太平天國大革命。辛亥前後，國外華僑資本家與國內新興市民，更起而要求對外解除帝國主義壓迫，對內解除封建統治的束縛，藉使中國資本主義順利發展，於是天誕答

智，由孫中山先生首創興中會，建立領導革命的政治力量，更不惜與當時羣衆下層組織的哥老會，三合會相聯絡。哥老會、三合會，是當時的祕密結社，帶着極濃厚的反清的民族運動的性質的。其後，興中會合併光復會與華興會而爲同盟會，更與三合會、哥老會密切聯繫匯合爲一反滿革命的統一戰線，甚至滿清政府的新軍分子也受着革命運動的影響投到這一統一戰線來了。這樣，便一時風起雲湧形成了異常廣泛的民族革命運動。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在全國人民反對滿清專制政府的憤怒下，在滿清政府本身的腐化、動搖、崩潰的情形下，在各省人民爭路運動的狂潮下，辛亥革命爆發了。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與各省革命運動之紛紛響應，滿清政權終於不能不在革命火焰下燒毀了。等到民軍佔領南京後，便成立了臨時政府，選舉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接着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孫中山先生讓總統位於袁世凱。這種史實想是人們所熟知的。

辛亥革命雖打倒了滿清政府，但由於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講和太速，革命的任務并未全部實現。即封建勢力并未剷除，帝國主義仍然在中國有種種特權。在袁世凱的獨裁下，北洋軍閥逐步向革命勢力進攻，國民黨曾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不幸失敗，北洋軍閥的統治反得到了暫時的穩定。

若就辛亥革命的全盤說，可以說是失敗了。但它有着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因爲它第一次推翻了中國的專制制度——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專制制度。推翻了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具——帝國主義爲維持其在華統治，是支持滿洲帝國的。在這裏，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値得我們來一番深刻檢討的，我們要從失敗的經驗中獲取血的教訓。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

第一，可以說由於當時反滿革命統一戰線之迅速的破裂。因爲當時的統一戰線僅僅建築在推翻滿清這一共同點上，因此，滿清一倒，便表現出「革命功成，革命黨消」的瓦解現象。

第二，由於當時革命組織還未注意廣大民衆的革命力量。對於辛亥革命前種種民衆運動——抗捐運動，爭路運動，未能予以切實的組織與領導，未能把這些民衆力量吸收到革命隊伍中來，推翻滿清，僅是單純軍事的勝利。

第三、由於革命勢力對反革命勢力的迅速妥協。因此，雖然打倒了一個滿清皇帝，而對他腐敗的官僚制度軍隊制度，不但未加以徹底破壞，反把政權讓給老奸巨猾代表這腐惡制度的袁世凱。

第四、由於帝國主義對於革命勢力的壓迫及對於革命黨人的軟化政策。帝國主義以善後借款幫助袁世凱，這自然是壓迫革命的。同時它又賄誘一部分意志不堅定的革命黨人做它的新工具。

由於這些原因，辛亥革命是失敗了，但它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教訓，對於未來革命的組織，使我們有事先的佈置與預防。

歐戰後，倖身於戰勝國之林的中國，在凡爾賽和會上仍然受到帝國主義，特別是日帝國主義的欺凌侮辱。這樣，在辛亥革命後便又爆發了中國偉大的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這是有廣大的學生羣衆及市民階層參加的，這使中國的革命勢力逐步向前。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更把各階層革命羣衆都吸收到黨內來，特別是把共產黨分子，青年分子，都容納到黨內來，革命勢力便一日千里的大踏步的向前發展着。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又在上海爆發了偉大的反帝運動，這是以上海工人反帝罷工開始的，這一運動可以說是中國工人參加中國革命有力的表示。在這一運動中，中國工人起了最積極最決定的作用，這一運動的烽火照耀了全中國，終於掀起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大風暴。這便是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試於下段略述之：

二、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國民黨改組的結果，在孫中山先生偉大精神領導之下，中國人民走上了反革命戰爭進行推翻全國反動統治的途徑。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實行北伐，由於廣大羣衆的熱烈擁護，由於國民革命軍中政治工作的建立與士兵戰鬥情緒的激增，北伐軍在短期內，便擊潰了聲勢浩大的北洋軍閥的軍隊，佔領了長沙、武漢、南昌等大城市。在北方，馮玉祥將軍所統率的國民軍亦佔領了陝西、河南等省。在北伐的過程中，各地民衆由於國民黨及革命青年之積極領導，有着迅速的發展，特別是工人團體與農民協會，他們以驚人的勇敢參加了戰鬥。固然不

雖有許多幼稚舉動，但給了北伐軍以無可比擬的重要幫助，則是鐵一般的事實。當時軍民合作的光榮，亦即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現在還在中國人民的新鮮記憶中與更加積極的徵效中。當時革命的北伐軍與各地民眾英勇鬥爭的配合，擊退了反動的北洋軍閥勢力，嚴重的減削了各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力量。

國民革命軍的發展，使得帝國主義在革命民眾面前發抖，同時，亦使得國內封建勢力瀕於崩潰，而在市民階層看來，革命的發展，甚至有超過資本主義的範圍，使民族資本家階層也感受相當的威脅之勢。由於帝國主義逐漸佈置反攻的壓力，由於國內封建統治之垂死的掙扎；特別由於新興市民階層本身所包含的動搖性與妥協性明顯的暴露出來，於是結束了這一偉大的暴風雨的革命形勢。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發生分裂，那時國民黨雖然繼續北伐，但力量已分散而減弱，帝國主義便出來干涉革命，例如濟南慘案之類，而砲擊南京事件，也就在濟南慘案之前大膽地毫無忌憚的表演出來了。這時，國內封建勢力乘機反攻，於是愈使帝國主義氣焰高張，特別是日帝國主義使冒險的扮演了「九一八」的一幕。

由於「九一八」日帝國主義佔領我東北四省，由於日寇之繼續侵略華北以至於全中國，中華民族的深刻危機明顯的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這時，民族矛盾超過了一切國內矛盾。根據這一新的歷史條件，停止內戰，團結禦侮，便成為迫切需要，於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便有着普遍的深入的進一步的發展，而終於不分階層，不分黨派，不分性別，不分宗教信仰的大團結，於以告成。共產黨為了挽救民族危機，為了共同抗戰建國，亦自願將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自願停止反政府的武裝暴動與沒收土地政策，自願把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自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這樣，中國的革命運動，就轉入了現階段。

三、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原是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半封建勢力，但由於「九一八」後日帝國主義之瘋狂的侵略，由於民族危機之特殊深刻，於是把反對日帝國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內容，使得一切行動皆應服從這一主要任務。新的歷史變動與具體情況，把中國革命的任務變動了。根據中國革命的性質，根據當前的具體條

件，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保衛祖國，爭取民族解放，實現民主政治，改善民衆生活，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這個統一的新中華民國——民主共和國，是應該由普選制的國會來産生的。它産生以後，仍然應該有眞正的民主國會，制定眞正的民主的五權憲法，建立眞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眞正的民主政策，一句話，眞正實現抗戰建國綱領。具有這樣內容的革命，仍然是資産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即這一革命的內容，并未越過資本主義發展的範圍，但也不是拘限在這一範圍的。它一方面爲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即爲中國的近代化掃除障礙；另一方面也爲較高級的社會秩序建立基礎。總之它是三民主義的革命，穩站在三民主義基礎上的革命。現在有人在中國鼓吹無産階級的革命，即認定中國革命的性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無産階級革命，這只是挑撥中國內戰，使有利於日寇侵略中國的讕言。

第三節　中國革命的前途

我們要論述中國革命，必須首先認清中國革命的性質，我們要論述中國革命的前途，必須首先認清中國對日抗戰的性質，亦即此次中日戰爭的性質。關於中日戰爭的本質（根本特質），著者與馬哲民、黃松齡二氏共同寫作的抗戰形勢的總檢討一文，由馬哲民氏執筆的一部分，論之最詳，爰引述如下：

這次中日戰爭決不是偶然的，因爲它是通過了國際關係之總的矛盾過程以存在於中日兩國的特殊條件中而必然爆發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與中華民族之爭求解放的鬥爭。在這個戰爭中，包含着自掘墳墓的日本法西斯之反動的殘酷的侵略，和創造光明的中華民族之爭求解放的進步的兩種本質不同的力量，作生死的決鬥。由於這個戰爭，決定了日本法西斯只有本着帝國主義之沒落的必然性，加緊向反動的死滅的路上奔馳；同時，又決定了中華民族，從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中，將自身躍進到時代的前線，成爲創造光明世界的一個基石。因此，這個戰爭不僅對於日本法西斯的崩壞和中華民族的解放，有着

決定的意義；日對國際法西斯的存在，和一切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民族解放的前途，也有着決定的意義。

一、中日戰爭與日本法西斯——本來在國際資本主義之一般的沒落過程，尤其從一九二九年國際資本主義總危機爆發以後，決定了各帝國主義者，更只有從事世界市場的再度瓜分，互相火拼。由於這個一般性，乃使那先天條件不良（如資源缺乏），後天條件很弱（如市場狹小）的帝國主義者（如德、意、日）、只有走上以冒險的賭博式的戰爭看做惟一出路的法西斯政策。日本是一個先天條件和後天條件都不良好，且當其剛發展到高度的資本主義階段，而世界市場；俱爲其先進的帝國主義者瓜分霸佔，并到了不能再進發展，而益深化其內在的矛盾（以勞資對立爲中心而展開之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及獨佔資本和中小資本的矛盾等等）與外在的矛盾（以其內在的矛盾爲基軸而展開之與蘇聯的矛盾及其與殖民地民族的矛盾并其相互之間的矛盾等等）的今日，她既不能有英、美那樣優良的先天條件和後天條件，倘不能形成如同英、美那樣有力的集團經濟，以求偷安一時，又深受着此種內在的矛盾與外在的矛盾之恐怖，乃只有將其政治經濟生活，轉化爲以冒險的賭博的戰爭爲中心任務的體系，并加緊向中國進攻。

因而從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以後，我們看到了她的政治生活，是以財閥、軍閥、獨裁爲中心的法西斯化，代替那原爲一般有產者所要求，現在只屬於其他的小有產所渴望的民主主義；同時，我們又看到了她的經濟生活，是以發展軍需工業爲中心的，犧牲其勞苦大衆和中小資本，并毀滅其一般的必需品生產的「消極擴大再生產」。

日本法西斯爲滿足其征服中國的欲求，當然要將其中心力量，更集中到軍事方面。然而她只有一方面本着法西斯政權之對其國民大衆，特別是勞苦大衆的敗奪，用增加捐稅，膨脹貨幣，發行公債，以刮得其龐大的軍費；在另一方面本着其資本主義法則，將一切資本、原料、勞力與高利率，特別爲保證軍需工業之發展，以強制的移歸於軍事工業部門。結果，不僅其以軍需工業爲中心之對勞苦大衆的極度榨取，無所底止；且其中小資本與一切必需品生產部門的資本，爲要對軍需資本的獨佔，戰爭剩餘價值的再生產，也不得不惡化其勞動條件（表現在工時的延長，工資的減低，失業之加多，以及她

租的增加，農民負債的加多等等現象上）。并且由這種以勞資對立爲主要矛盾之發展，又發生了軍需品工業與必需品工業，獨佔資本與中小資本，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一般的有產者與封建殘餘的種種矛盾。因而其戰時經濟的根本性質，不外乎是擴大消耗的軍需生產（軍械、彈藥，及其生產手段與兵士力的生產），縮小必需品的生產（必需的生產品與生產手段及其勞動力的生產者），以趨於其向上線的滅絕的道路（表現在其向日立國基礎的紡織業之衰弱，對外貿易入超的激增，現金枯竭，外匯慘跌，物價騰貴等等現象上）。

與上述日本法西斯內在矛盾之發展相并行，還有外在的矛盾之發展。日本法西斯之對中國的侵略，固然會使英、美、法在中國的既得權利，遭受損失，且使英在南洋、澳洲、印度等處利益，美在太平洋、菲律賓等處的利益，法在廣州灣、安南等處利益，大感威脅，同時，就其對蘇聯的關係說，不但因其對中國的侵略，便等於進襲西伯利亞之第一步，且會加緊德、意法西斯改進攻蘇聯的企圖。如果更就日本法西斯之進攻中國的國際意義來看，是明白的反映國際法西斯之反社會主義反民主主義反民族解放的任務，因而她自然會變成了這些國際前進勢力的共同敵人。

以日本法西斯之對華侵略的本質，建立在此種矛盾的尖端上，乃決定她的命運，是愈戰愈反動，愈戰愈減弱其力量，愈戰愈加深其矛盾，愈戰愈沒有出路，愈戰愈沒落到滅頂的深淵。在過去國際資本主義之向上線發展的過程中，日本帝國主義因爲幾次作戰（如甲午之戰、日俄之戰、歐戰），將其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提升到高度的階級。但是現在正當着國際資本主義之在向下線發展的過程中，因其陷落到積極的矛盾，會被迫的表現出瘋狂的好戰的法西斯殘酷侵略的本質。可以說因爲這一次戰爭的本質與其過去任何戰爭本質不同的緣故，必然會決定她之由戰爭起家者終會由戰爭而破產。

二、中日戰爭與中華民族解放——中國對於這次戰爭，是處在與日本法西斯完全不同的地位。中國的抗戰，不但在一般國際關係中，具備了由國際帝國主義之沒落過程，使弱小民族，可以從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完成其獨立解放的客觀可能性（這是與過去民族獨立運動本質不同的）；不僅在中國近代歷史過程中，有由歷次革命運動鍛鍊出來的民族解放鬥爭

之主義、力量，以作領導民族解放鬥爭的核心；不僅有良好的先天條件（人口多、土地廣、資源富）可以作自己創造新世界的憑藉；并且因爲敵人之對我們的侵略，是隨着矛盾關係前進的原因，使我們可以從蘇聯，可以從英、美、法，可以從世界一切角落裏的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民族解放主義者，獲得種種的援助，甚至於在敵人國內，我們也可以同樣找出援助我們的友軍。

從目前國際形勢看來，法西斯帝國主義，不僅是一切社會主義者的敵人——尤其是蘇聯的敵人，不僅是一切民主主義者的敵人，不僅是一切民族解放主義者的敵人；并且是那比較富有先天條件，同時受着內在矛盾與外在矛盾之威脅只圖極力保持現狀的帝國主義者（如英、美、法）的敵人。日本法西斯即是在東方進行擴大種種矛盾的主腦，因而我們之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就是爲國際反法西斯陣線擔任了先鋒者的任務。由於這個戰爭的本質，及推動舊的反動勢力之火速後退，與助長新的進步力量之突進發展；因而使我們在這個抗戰過程中，將自己上升到時代最前線的最光榮的地位。從我們國內形勢看來，可以由這個要求民族解放的戰爭，變化過去對國際帝國主義之隸屬性，尤其是逃出瘋狂的殘暴的法西斯惡魔的鐵吻，而成爲獨立自主。可以由這個要求民族解放的戰爭，變化內在的社會性質，階級關係，而肅清一切依附帝國主義——尤其是法西斯走狗的黑暗與腐化的惡勢力，開闢中國的新前途。因爲我們的抗戰，是通過由帝國主義之支配爲中心所形成之中國各階層的關係，以結合之共同要求（統一戰線的根據），所以絕不是某一階層所專有。但是因爲愈受壓抑的階層，愈有反法西斯帝國主義之侵略的必需的原因，一切下層的廣大的勞苦同胞，更會成爲抗戰的實際的基礎。

在政治上雖因我們過去之未通過健全的民主政治之發展，難於有健全的政治力量之集中（統一），但因爲抗戰之對民主政治的外的敵人（帝國主義尤其是法西斯）與內的敵人（帝國主義及法西斯的走狗漢奸），均爲民族解放鬥爭所漸次克服的原故，這表現在動員民衆之自上而下的需要與全民族解放之自下而上的要求，必然會使民主化與集中化（統一政權）之發展，成爲相依并行的東西。

在經濟上，過去因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將中國的封建經濟，變作適合其榨取「超利潤」的市場；另一方面卻利用其特殊權利的力量，阻礙中國向民族資本主義之發展，因而我們的國民經濟，完全成了一個隸屬於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矛盾體系，以使國民大衆——尤其是勞動的生產大衆，淪爲帝國主義之榨取對象的總過程。這次日本法西斯之對我們的進攻，即是此種帝國主義侵略發展之新階段。牠是要把整個中華民族變成牠十足不扣的奴隸。我們的抗戰，即是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尤其是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全稱否定的鬥爭。由於這個戰爭，必然會使製造中國內部矛盾的，使中國陷於自殺地位的帝國主義侵略——特別是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逐漸解體；並使我們的國民經濟，根據抗戰的需要，漸向新的發展方面轉換。因爲全面抗戰發展之自然形勢，將使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的鎖鍊，逐漸鬆懈，阻害人力和物力總動員之一切惡勢力，逐漸掃除，而在抗戰的政府之有計畫的統制下，取中國的無限勞力與無限資源，按照發展軍事工業與全國民經濟相配合之原則，開闢經濟建設的前途。

三、小結論與大前提——由上述一般的分析，可得出下述幾個原則上的結論：

一、中日戰爭，是通過了國際資本主義總危機之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同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之根本矛盾的爆發。

二、這個戰爭，是以反動的「迴光返照」的日本法西斯之侵略與進步的向上發展的中華民族解放而鬥爭着的，這兩個本質不同的因素，結成了一個「契機」（對立的統一物），並決定兩者不同的動向以互相乘除。

三、如果承認戰爭，是表現社會發展的矛盾之噴火口，是社會「飛躍」的轉動機。那麼，敵人是踏着腐朽的反動的矛盾根據的一方面；我們是踏着新生的進步的矛盾根據的一方面。在敵我力量之對比中，最爲人所迷惑的，是敵人的軍備，超過我們的軍備。殊不知敵人之此種優勢的條件，正是從其劣勢的根據上表現出來的；且以其此種優勢條件之發展，並助長其劣勢根據之發展，召致滅亡；同時，我們的此種劣勢條件，正是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性的產物。我們不僅會以民族解放鬥爭的優勢的根據，克服此種劣勢的條件；且以其優勢根據之發展，並會「揚棄」自身的劣勢的條件，助長敵人

之劣勢根據以趨於向上線。在敵我力量之對比中，同樣爲人所迷惑的，是敵人之物質生活方面的發展水準，高度於我，而不知敵我之戰爭的物質條件，其基礎完全不同。在敵人方面，完全支配在自相矛盾，自召滅亡的體系上，其物質力量之動員愈緊急，則其崩壞的速度愈迅速；而我們方面，則建築在否定帝國主義之侵略和腐化勢力之束縛的「質」的變化上，不僅愈戰愈集中力量，且愈戰愈增加其物質力量。何況我們土地的廣大，人口的衆多，資源的豐富，原來就對敵人佔絕對的優勢。至若在文化方面，以敵人之突進的法西斯的殘暴和反動的本質，不僅一切進步的思想和文化，完全被窒息着，就是那比較進步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也整個的被腰斬；但是我們則因民族解放鬥爭之廣泛的展開，使民族意識有普遍而高度的發展，結果，自然會將那過去的文化——少數人的舊文化，或外來的新文化，變做與大衆生活不可分離的中國文化。因此，日本法西斯是愈戰愈反動，愈戰愈縮小力量；我們則愈戰愈進步，愈戰愈增加力量。日本法西斯之侵略戰的前途，只有沒落；我們反侵略戰的前途，是誕生一個新中國。

四、在戰爭過程中，敵人之以軍事爲中心的優勢條件，不僅爲助長其內部矛盾與發展其劣勢根據的東西，且是「揚棄」中國腐化傳統以助長中國之優勢根據發展的東西；同時，敵人之劣勢根據，不僅是否定敵人優勢條件的因素，且是增大我們優勢根據的因素。我們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關係所表現之政治形勢的落後，本是我們劣勢條件的決定者。但這種劣勢條件，不但會爲民族解放鬥爭之優勢根據所克服，且會爲敵人的砲火所摧毀。

五、以中日戰爭爲「契機」所決定之敵我不同方向的轉換過程，無論是敵人方面或是我們方面，都是要通過許多矛盾的曲線的發展，發生質量的變化，表現爲不同的階級。但敵人之轉向反動沒落的法西斯侵略，我們之轉向光明和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均以這中日戰爭作質的變化的根據。此後敵人的變化，是加緊其內在的和外在的矛盾，一直到敵人的法西斯帝國主義的覆滅。我們的變化，是掃除內在的腐化傳統與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以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並且以此種量的與質的互相變化，而引起雙方面的力量「飛躍」的變化（當然是敵人向下我們向上）。其結果，都不

外乎使敵人之所得者變成其所失者的代價；我們之所失者變成爲我們之所得者的代價。

六、日本法西斯侵略，是其國內矛盾發展的表現，亦是國際矛盾發展的反映。我們民族解放鬥爭，是內在的要求，亦是國際矛盾根據之發露，因而敵人的法西斯侵略，必然與國際的反動勢力之結晶的法西斯（如德、意），展開共同的陣線；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亦必然與國際法西斯處於對立地位的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民族解放主義等進步力量成爲不可分的東西。

七、從表面上看，日本法西斯，似乎是一個很大的力量，然以它係踏着向下線的矛盾根據之尖銳，發展起來的原故，她的基礎，不但比英，美自愧不如，即比之德，意亦較薄弱；我們的民族解放，雖然在表面形式上，不足與敵人對比，但我們的客觀條件和我們的主觀力量，不僅超過阿比西尼亞萬倍，且與西班牙不可同日而語的原故，却已奠定了民族革命成功的基礎。因此，只要這個戰爭的性質，包含着兩種不同的矛盾根據，其結果必然會由此種矛盾根據之解決，而達到中國抗戰之最後勝利，亦即革命任務之完成。

以上把當前中日戰爭的性質，作了一番緻密的科學的分析，從敵我兩方不同的矛盾根據，因而不同的優勢條件與劣勢條件之闡發，達到中國抗戰之最後勝利的結論，同時，也就明確的指示出了中國革命的前途。

第八章 總結論

這本新政治學大綱，在這裏算是結束了。我們應該於結束之後，總起來說幾句話。這就是說應該就全書指示出它幾個特點：

第一、我可以說本書是把社會矛盾作爲政治的基本內容展開的，因此，社會矛盾如像一根線似的貫串着本書的各編。

第二、本書不像一般的政治學，把單純的國家作爲它的全部對象，而是把全部政治範疇作爲它的對象。而在全部政治範疇中與其說是加強國家這一政治範疇的闡發，毋寧說把「政黨」與「革命」較之國家的闡發更看得重要。因爲政黨在政治上的任務目前顯然成了一種基本的指導力量。革命在政治上的任務，目前斷然是被壓迫階層與被壓迫民族，以羣衆的力量取得政權，奠定千百萬人民生命過程的一種政治運動。

第三、本書在各編的敍述中，除了各種政治範疇，例如「階層」、「國家」、「政府」、「政黨」、「革命」之一般的理論敍述以外，特別注意中國之特殊的具體條件，結論出中國的階層、國家、政府、政黨、革命是怎樣的，而以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爲準繩。

第四、科學不是單純理論的游戲，政治科學亦然。所以專門研究客觀世界運動法則的科學，主要是服務於我們對這世界的活動，服務於我們的實踐。任何科學都成爲與實踐不可分的「契機」而和實踐統一在某種方式上。所以我對於這本政治學，不是把它當做一般的政治學來處理的，而是把它當做政治家革命家的政治的戰術、戰略或革命的戰術、戰略來處理的。

第五、當前中國的對日抗戰，是以直接單純反日寇法西斯侵略的民族革命爲中心，而在政治任務上，則要連帶實現民

權，民生主義的革命，走進完全實現三民主義革命的最後境界，亦即「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最後境界。本書特別從敵我兩方不同的矛盾根據及其優勢條件與劣勢條件之對比上，指出最後勝利的必然性，因而反映出政治科學的重要性來。


附


錄

民主政治的新趨勢

對於「民主政治」這一概念我不願多擺弄詞句以眩惑讀者的耳目。所謂民主政治，可以說就是一切都要以人民爲主體的政治，或者說一切都要由人民自己作主的政治。這當然不是說所有不相聯繫的人遇事都毫無組織的張開口來，伸出手來，而是要在一種特定的社會裏建立一種特定的制度，使人民或者直接的能有機會爲自己的利益，說自己要說的話，作自己要作的事（直接民權）；或者間接的能有機會爲着自己的利益，說自己要說的話，作自己要作的事（間接民權）。美國已故大總統林肯下民主的定義爲：「民有，民治，民享」。其義要不外此。國父中山先生引申其義時，『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其義更爲明確。

此爲民主政治之根本定義，亦即其眞實內容。然而它的發展形式，亦即其制度的表現上，則有人人所熟知的選舉制度，民意機關等等，令人一般想到民主便往往以選舉制度，民意機關等爲其特徵，嚴格的說來，僅有這些，是不能眞正符合於「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定義的。眞正有效的民主，名符其實的民主，必須要把民主的精神擴大而深入的滲透於全國人民各部分的生活中去，由政府機關到工廠，農場，商店，學校，乃至軍隊，家庭，由政治到經濟，文化，教育，乃至診療衞生；凡是與一般國民生活有關係的無不在民主原則之下進行着，即在國民生活的每一角落裏都無不有民主原則的運用與實踐。

因此民主不是片面的。僅有政治的民主，而沒有經濟的民主，則民主決不能澈底，所謂「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的人」。見「羅斯福國會咨文」。民主不是懸空的孤立的。離開工廠，農場，商店，學校，换言之，離開了一般的國民生活，也沒有民主，而民主原則的運用與實踐，即端在處處照顧人民的利益，使得大多數人民在各方面的利益，例如「在國內商店，

農田，或從事獲得既有益且有利的權利，有賺得足夠生活費，以供衣食娛樂的權利，每一農民生活所得，足以使他本人或家屬，獲得適當生活的權利，每一商人，不論大小，有免受國內外不合理的競爭和獨佔性的併吞而得的自由交易的權利，每一家庭有獲得適當居住的權利，人民有獲得適當診療和發展享受康健機會的權利，免受經濟恐懼，老年疾病，意外及失業，而有充分保障的權利，以及獲得良好教育的權利……」（同上）離開人民的利益更沒有民主。

以上是我對於「民主政治」這一概念的簡單的說明。（下略數段）

近代的民主制（即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編者），就其形式說，是較發展完全的，但它也同古代奴隸社會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民主制一樣，不同的國家形式，決不能變更其所代表的階級內容，如果古代和中世紀的國家，不論其爲君主國或共和國，都是奴隸主人和封建領主的國家，則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也不論其爲君主立憲國或民主共和國，將都是資本所有者的國家，因而所謂近代民主政治，仍然只是少數人的民主，不能與我們開頭所標舉的民主概念全相符合，就其形式說，成爲近代民主之特徵的東西，就是規定國家組織，機關職權，人民權利義務等等之一大套憲法及其他保障私有財產權之一大套公私法律條文，在法律條文上，我們可以舉出下列基本規定，如一、法律之前，萬民平等，二、人民在法律上享有如下各種權利，如人身，居住，遷徙，貿易，營業，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之自由權，三、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全體，四、國家最高權由人民選舉之立法機關行使之（民意機關，代議制度）。五、人民制定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全國上下，皆須共同遵守；……然這些都不過是民主之現象，形態，形式騙局。法國號稱民主制的母親，羅伯斯比爾於臨死時痛呼：「共和國滅亡了，強盜們勝利」；「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本主義的王國」。仍然可以說形式是民主的，實質（內容）是專制的。所以資本主義對封建制的革命，其目的，並不在取消爲封建制服務的僧侶貴族專政；取消封建關係的搾取制度，只企圖改變搾取形式，把搾取的特權從一種人手裏轉移到另一種人的手裏罷了。所以近代民主制的國家形式並不根本破壞封建制的國家機構，只是改造這國家機構，加強這國家機構使適合於資本制的需要罷了。等到資本主義實質的

專政，由隱秘的形式發展到公開的法西斯獨裁的時候，便更加要把昨天的敵人——王公貴族，當作朋友，要把昨天的友人——人民大衆當作仇敵，公然的回轉頭去實貝那些僵死的葬後的中世紀的封建殘渣，甚至採用宗教裁判等野蠻屠殺，焚書坑儒等殘酷暴行，把世界歷史硬拉回到民賊獨夫的黑暗世紀去。

這是因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由於產業革命所引起的經濟變革，產生了近代的民主主義，同時也產生了民族主義，可是民主，民族問題，不但未因資本主義的發展獲得解決，反而生長了新的內容，新的矛盾。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在表面上（亦即在法律條文上）承認法律之前，萬民平等，但在實際上却以財產的差別，納稅的差別，教育程度的差別，抑或男女兩性之差別等等，自己否定了自己，這等於從左手給出去的東西，用右手收回來。其於民族主義的矛盾，則尤顯然，在其內部，既因經濟上的不平等，引起民族的分裂（同一民族分成有產者與無產者）。而在其對外關係上，則因資本主義的對外發展，引起民族間的衝突（强大民族與弱小民族間的衝突）。等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後階段，亦即帝國主義階段，所有民主問題，民族問題，不但未曾解決，其矛盾衝突的程度反愈加尖銳化嚴重化起來了，那些資本主義發展不成熟，或者先天不足，或者後天不良的國家，（既無良好的資源，又無良好的市場，更無廣大殖民地供其搾取，因而民主政治原來就不十分發達，內部階級矛盾，無從緩和，外而又受强大帝國主義之威脅，——這即是所謂資本主義最弱之一環）。一遇特殊事變（如世界大戰），或則爆發社會革命（如舊俄）或則在夾攻中（內有社會革命危險，外有淪為强大帝國主義之附屬的夾攻中）。走上公開專政的法西斯之路（如德，意，日）。這可以說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法則的必然結果。

但這並沒有否定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及其表現在民主，民族問題上的進步因素。例如資本主義社會較之封建社會，確實在歷史的軌跡上進了一步——它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取消了農奴制超經濟的剝削，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轉化為更高級社會的條件，其表現在民主，民族問題上，特別是民主問題上，雖然也只是形式的民主，但其形式與內容之本質的規定，畢竟有着某些對立的一致（法律如果規定了工人的選舉權，工人總有可能投一票）而且形式的民主也會開闢了有條件的某些

自由平等的園地，使得人民大衆的解放鬥爭，更加容易。爭取解放的人民大衆懂得戰略戰術的革命政黨向來不曾因爲資本制民主的有限性，虛僞性，或在某些地方確乎是徒具形式，而拒絕使用這一武器，或輕輕放棄這一武器，抑或鄙薄輕視這一武器（形式的民主這一武器）。

況且一切都是發展的，近代資本制的民主政治，也在發展。在發展中加深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同時也屬不得不走向緩和矛盾，乃至消滅矛盾的程途。事實很明白的告訴我們，除非有資本制的根本改革，像俄國十月革命一樣，法西斯主義是絕對不能消滅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乃至緩和矛盾的事實很明白的告訴我們，民主制度的缺點，只能由更廣泛更純粹的民主來補救，這就是說形式的民主的缺點，只能由實質的民主來補救。隨着資本制民主的發展，其形式與內容對立的一致性也在展開。試再就歷史的軌跡加以一番追尋，我們便知道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便顯示出兩個主要不同階段，在這以前，是產業資本階段，亦即自由競爭，具有支配的階段，以後是財政資本壟斷一切的階段，亦即帝國主義階段。兩個階段的資本主義，自無實質上的區別，因而其民主制，也都未能完全達到實質的民主，換言之，資本制的民主總是資本所有者的民主，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資本制的民主不能在其發展的階段上使其統治權力，政治領導有所改變，事實很明白的告訴我們，資本制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愈加尖銳化，嚴重化，使得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亦即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不走向社會革命，就走向法西斯獨裁，而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亦即如英，美等資源較豐富，市場較廣大，殖民地較多，階級矛盾尚不尖銳，因而民主政治亦較有基礎的國家，其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的執行，除資本所有者外，便不能不顧到非資本所有者，或小資本所有者，乃至一切社會階層的利益，使其民主缺點得以補救，使其政治基礎得以擴大，使其所受於法西斯對外侵略的威脅得以解除。

在這種情形之下，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便轉化或總結爲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矛盾，由於法西斯主義之內而恐懼社會革命，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蘇聯，外而要求殖民地與世界市場之再分割，極端仇視英美，而企圖以極野蠻的非人性

的，較之中世紀尤為黑暗的統治，強固其少數金融寡頭地位，壓迫工農人民，反對民主，自由，挑動戰爭，獨霸全世界，遂爆發為此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大戰，由於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必然是民主統一戰線的（在國際不分蘇聯與英美在國內不分階級，黨派，宗教，種族，民族，性別的民主統一戰線），所以其本身已不能不由形式的民主逐漸走向實質的民主——即資本所有者一階級的統治，便不能不照顧到社會階層的各方面，而那些從法西斯侵略解放出來的新國家，便在民族戰線，民主戰線，愛國戰線的全民團結下，一個跟一個的形成了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所謂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即是由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聯合執行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不是像過去一樣僅在形式上（法律條文上）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而在實質上則是資本所有者一階級專政，因此，凡屬資本所有者一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可以說是過去了的舊型的民主政治；凡屬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的聯合政權，則是今天具有支配性的新型的民主政治。

當然我們絕對不能看掉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經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在形式上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大多數人民對於少數貴族，資本家等等的專政），而在實質上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最大多數人的民主），所以它的民主政治是更高級的民主政治。它的最大特徵有二：一、是國家政權，確實掌握在最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手中，二、是實行沒收土地及一切生產機關為國有（取消私有制），并厲行社會化的生產之建設；因此，它對於大多數的工農說是民主的，對於少數地主資本家說則是專政，可是這種專政，并不是以擴大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為目標；而是以最後消滅階級矛盾因而最後消滅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以建設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因而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所通過的新憲法便實現了由形式的民主到實質的民主之社會主義更高級的民主政治，根據這個新憲法的規定；（1）它實現了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平等——例如取消凡足以造成剝削他人的私有權，同時并積極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及消滅一切階級。（2）廣泛的確立以工農為中心的無男女，種族，宗教信仰等差別之公民權，并以各種積極條件保障

之——例如其公民的工作權，即以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保證之，其公民的休息權，即以減少工作時間，休假給薪，建立多數的休養所及療養所等保證之。（3）其政治組織，採取直接民主權，對於創制複決罷免等權，既可充分行使，且以立法機關為中心，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統一權，而最高權力機關，則以聯盟會議與民族會議相并行，一面保證全聯盟之集中運用，一面保證各民族之平衡發展。（4）實行公民之普選制，不拘教育程度，居住年限，社會出身，財產狀況（這與前述資本制的選舉正相反）。凡十八歲以上之公民，皆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且於選舉時，採秘密投票制，以上僅略舉其主要之點，已充分足以證明它與過去的一切民主制相較，是更高級的民主，只有在這種更高級的民主制下，民主，民族問題能矛盾才徹底解決了。這種更高級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可以說是最新型的民主政治。

舊型的民主政治——新型的民主政治——最新型的民主政治，這是民主政治發展之必然的史序，舊型的民主政治，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前一階段的產物——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的產物，其根本特徵，為其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掌握在資本所有者一階級手裏，新型的民主政治，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後一階段的產物——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產物，其根本特徵為其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掌握在資本所有者，小資本所有者，或非資本所有者的各社會階層聯合手裏（其所謂聯合政權的重心，反而是由非資本所有者所支撐）最新型的民主政治，同樣是壟斷資本主義階級的產物　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其根本特徵，為其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掌握在非資本所有者，亦即無產階級一階級手裏，（但其最後目標，在消滅階級，因而消滅一切矛盾）。

這樣舊型的民主政治，可以說已經失去了它的黃金時代，這裏我們可以不必多論；最新型的民主政治，雖然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已經實現，而且毫無疑義的要成為將來一定時期中之世界的政治統治形式，但在今天還不可能在全世界範圍內一下子形成，這裏我們也可以暫置不論，至於新型的民主政治，則正是當前「天之驕子」，歷史的「寵兒」，我們卻不能不在這裏加以申說，試略加探索。新型的民主，它在追求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以前，就在歐洲政治舞台上，已經

有過若干嘗試，例如納粹匪幫攫取德國政權以前，德國人民大衆爲了阻止德國大資本所有者絞殺民主的陰謀，而醞釀的人民革命政權，就是一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衆陣線的共和政府，又是一例，一九三六和一九三八年，以法國各階層人民聯合組成的民主陣線爲支柱的反法西斯反獨佔資本的勃魯姆內閣，是第三個例子，然而因爲當時客觀主觀條件都不夠，它們都不能不歸於暫時失敗，只有經過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戰爭的砲火，亦即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才於熊熊之火的大洪爐中把它燃燒起來了，把它鎔鑄成器了，而且鍛鍊得更結實，更壯大，更具體，它的一往無前的波瀾壯闊的精神，即其新鮮活潑光輝充實的理論系統，表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羅邱大西洋憲章裏面，表現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二十六國共同宣言裏面，更表現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會議公報及四國普遍安全宣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德黑蘭會議公報及其宣言裏面。從德黑蘭到克里米亞，到舊金山會議都是一貫的精神，它的各黨各派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亦即其壯大結實具體的新姿態，則表現在法蘭西，意大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匈牙利等所有新從法西斯侵略解放出來的各國政府形式裏，至於它的真實內容，亦即新型民主之「新」的特點，概括的說，則完全符合於我們開頭所標舉的「民主概念」，亦即符合於「民有，民治、民享」的真諦。具體的說，則是它將要從政治的民主擴展到經濟的民主，從國內的民主擴展到國際的民主。要儘可能消滅(至少是緩和)民主，民族問題的矛盾，所以它處理民主問題的根本方針，是廣泛的民主自由(政治的平等)，處理民族問題的根本方針，是澈底的民族自決，(民族的平等)；處理人民生活問題的根本方針，是普遍的民主幸福，(經濟的平等)。同時，更其重要的，成爲政治的民主，經濟的民主，國內的民主，國際的民主之決定環節的，是它的統治權力或政治領導，將不再爲資本所有者一階級所掌握，而是共同掌握在小資本所有者，或非資本所有者，乃至各個社會階層手裏，即在於它是人民大衆的或全民的，「且是以勞苦羣衆爲重心」，而非少數財勢分子的，是接近於實質的，而非徒具形式的，是表裏一致的，而非虛僞騙人的，是不斷進步的(必然進步到最新型的民主)，而非保守倒退的。這種包括這麼多新的特點的民主，已是當前支配世界普遍政治生活的主

潮，亦即當前民主政治的新趨勢。

編者跋

這一次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大戰，正和前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一樣，大大地豐富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內容，對政治學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有理論價值的問題，并且接着在實踐過程中又局部地解決了那些問題。但是這次世界大戰所加諸歷史發展的新的內容，是較之上次大戰更加深入了，它所提出的問題也更加具體化了。最顯著的一個事實，亦即構成現階段歷史發展之主流的一個事實，那就是世界政治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型民主的階段。新型的民主就是真正人民大衆的民主，是「人民的世紀」所決定的民主。不把握到這一嶄新的階段，在政治實踐上就會犯嚴重的錯誤，甚至不知不覺地變成反民主集團的俘虜。丟開了這一點不談，政治學的理論就成爲陳腐的脫離實踐的公式主義。

假使說上一次世界大戰所加諸世界歷史的新的內容，它替政治科學所提出的新問題，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由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的作用，在一個資本主義並非最發達但本身已發展到了獨佔階段的國度得了勝利，這一勝利的結果產生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並且只有經過無產階級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那末這一次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戰所加諸世界歷史的新內容和它所提出的新問題，却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在全世界人民大衆反法西斯鬥爭中，必然要被揚棄而上昇到它的更高階段——新型民主的階段，這一階段的徹底完成，才能進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境界。只有在各階層人民反法西斯的聯合民主政權（即新型的民主政權）之下，經過法西斯殘餘及其社會經濟根源的徹底消滅，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在今天，新型民主政治的問題，應當成爲新政治學的中心理論問題。

鄧先生的這一本「新政治學大綱」，無論從方法上講或從理論體系上講，都堪稱爲當今國內政治科學出版物中一部突出的巨著，但是因爲這本書的著述是在七年前完成的，即是說在這次反法西斯世界大戰以前就完成的，那時新型民主政治的

問題尙未被公開提出來，反法西斯的鬥爭尙未明白地被提昇到新型民主政權的問題，鄧先生書中的略去這一問題的闡述，是可以瞭解的。然而這本書既在今天印出再版來，加上一點附篇之類，作爲補充的說明，當然是非常必需的。我們因而從鄧先生去年出版的「民生的理論與實踐」一書選出「民主政治的新趨勢」一文作爲附錄，以補救這一缺點。同時因爲避免篇幅過多的緣故，我們把該文中一部分無關問題而在本書各章中已經闡明了的事情，加以簡略了。希望讀者特別注意到這一篇短短的附錄，至於詳細闡明新型民主政治一事，只好待諸本書作者日後自行大加修訂和補充了。這一工作，我們也在催請鄧先生從速完成，讀者拭目待之可也。

卅五年三月二十日，上海